



PROBE

国家期刊奖百种重点期刊
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入编期刊
CSSCI来源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
RCCSE中国权威学术期刊
重庆市出版专项资金资助期刊
重庆市社科规划资助期刊

探 索

“两个结合”与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意蕴

中华民族的当代重塑及其意义

新安全格局下社区韧性理论本土化的建构路径

论思想政治教育的网络贯通

组织再造、内容优化与制度建构：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三重向度



ISSN 1007-5194
CN50-1019/D

2023. 6

哲学社会科学 双月刊
2023年11月

探
索

二〇二三年第六期

本期作者简介



周平，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云南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担任中国政治学会副会长、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会副会长、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评审专家，享有国家级教学名师、全国模范教师、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等荣誉，被誉为我国民族政治学的创建者和奠基人。主要从事政治学理论、民族政治学、边疆治理等方面的研究，主持过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出版的15部专著和教材中有3部分别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和教育部推荐的《研究生教学用书》，发表的212篇论文中有27篇刊发于权威期刊、26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全文转载。获第七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第三届、第四届国家民委问题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5次获得云南省哲学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2次获云南省教学成果特等奖。



骆郁廷，武汉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院院长，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珞珈杰出学者。担任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首席专家、国务院学科评议组召集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学科评审组专家、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教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类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教育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指导咨询委员会委员、全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全国党建研究会特邀研究员、国家重点培育学科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负责人。主持国家和教育部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攻关项目及其他省部级课题十余项，独著、主编专著教材等十余部。获得省部级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和教学优秀成果奖8项，其中一等奖3项、教育部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2项。代表性著作有《精神动力论》《思想政治教育引论》《思想政治教育贯通论》《新时代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教育原理与方法》《文化软实力：战略、结构与路径》等。在《中国社会科学》《马克思主义研究》《教育研究》等权威和核心期刊发表论文220余篇，其中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等转载70余篇。



PROBE

哲学社会科学双月刊

国家期刊奖百种重点期刊
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入编期刊
C S S C I 来 源 期 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
RCCSE 中国权威学术期刊
重庆市出版专项资金资助期刊
重庆市社科规划资助期刊

致作者

为适应我国信息化建设，扩大本刊及作者知识信息交流渠道，本刊已被《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及 CNKI 系列数据库、万方数据库、超星数据库、维普数据库等收录，其作者文章著作权使用费与本刊稿酬一次性给付。免费提供作者文章引用统计分析资料。如作者不同意文章被收录，请在来稿时向本刊声明，本刊将做适当处理。

探 索

2023 年第 6 期 总第 234 期

2023 年 11 月 15 日出版

主管主办：中共重庆市委党校

编辑出版：探索杂志社

编辑委员会

主 任：谢金峰

副主任：张 健

委 员：（按姓氏笔画排）

孙凌宇 张志勇 陈 剑 周学馨

杨 杰 侯晋雄 黄建跃 谢来位

谢 菊 谢撼澜

总编辑：金华宝

副总编：王 慧

本期执行编辑：梁习琴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50-1019/D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ISSN1007-5194

国内发行：重庆市邮政局 78-84

国外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北京 399 号信箱）

国外代号：BM4024

广告经营许可证：渝工商广字 011153

地 址：重庆市渝州路 160 号

邮 编：400041

电 话：023-68593010

投稿系统：<http://www.tszs.net>

微信平台：tansuoazhi

印 刷：重庆市国丰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定 价：每册 15.00 元 半年价：45.00 元 / 全年价：90.00 元

目次 | CONTENTS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 “两个结合”与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意蕴 许士密 1
-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建构逻辑 吕晓斌 14

探索笔会

- 中华民族的当代重塑及其意义 周平, 郭志凯 28
- 民族复兴视域下中华民族主体性的建构逻辑 张淑娟 41

政治学研究

- 人工智能赋能国家安全: 理念、机理与路径 肖晞, 王一民 53
- 新安全格局下社区韧性理论本土化的建构路径 汪超, 宋纪祥 67
- 地方政府首席数据官制度运行的现实审视与优化路径 陈新明, 高小平 80

政党治理

- 组织再造、内容优化与制度建构: 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三重向度
——以利川市的“小院说事”实践为例 霍军亮 93
- 依规治党思维的三维面向及其准确把握 刘长秋 108

公共治理

- 中西比较视野下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特色与优势 张 蕴, 孙道进 120
-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促进农民共同富裕的内在逻辑与路径选择 张锦兰, 何 湾 134
- 制度画像与行动呈像: 乡风文明建设中的双重可视化路径
——基于山西 Y 县积分制的案例观察 马超峰 147

思想文化建设与传播

- 论思想政治教育的网络贯通 骆郁廷, 余 杰 161
- 驾驭资本与防范风险: 数字文明建构的实践策略 姜淑娟 173

Contents

No.6 2023 (Serial No.234) (Bimonthly)

1.“Two Combinations” and the Civilization Implication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XU Shimi	1
2.Study on the Construction Logic of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	LV Xiaobin	14
3.Contemporary Reshaping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Its Significance.....	ZHOU Ping, GUO Zhikai	28
4.The Construction Logic of Chinese National Subjectiv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ational Renaissance	ZHANG Shujuan	41
5.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mpower National Security: Concepts, Mechanisms and Paths	XIAO Xi, WANG Yimin	53
6.Construction Path of Localization of Community Resilience Theory under New Security Pattern	WANG Chao, SONG Jixiang	67
7.Realistic Review and Optimization Path of Local Government Chief Data Officer System Operation	CHEN Xinming, GAO Xiaoping	80
8.Organizational Reconstruction, Content Optimization and Institutional Construction: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Party Building Leading Rural Governance ——Taking the Practice of “Small Courtyard Talks” in Lichuan as an Example	HUO Junliang	93
9.On the Three-dimensional Orientation and Accurate Understanding of the Thinking of Governing the Party According to Regulations	LIU Changqiu	108
10.Characteristics and Advantages of China’s Agricultural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from the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of China and Western Countries	ZHANG Yun, SUN Daojin	120
11.The Inner Logic and Path Choice of New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Promoting Common Prosperity Among Farmers.....	ZHANG Jinlan, HE Wan	134
12.Institutional Portrait and Action Presentation: Double Visualization Path in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Civilization ——Based on the Case Study of County Y in Shanxi Province.....	MA Chaofeng	147
13.On the Network Penetr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LUO Yuting, YU Jie	161
14.Harnessing Capital and Preventing Risk: Practical Strategie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 Digital Civilization	JIANG Shujuan	173

“两个结合”与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意蕴

许士密

(曲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曲阜 273165)

摘要:“两个结合”是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也是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两个结合”的形成与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了深厚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明底蕴。作为坚守马克思主义“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的重大成果,中国式现代化既要体现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性和真理性,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也要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之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和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得以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内蕴接续推进现代文明、转化发展中华文明的文化自信和历史自觉,承担着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化使命。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一种全新的现代化模式,“两个结合”的坚持和发展使之展现出不同于西方现代文明的新的文明图景和文明前景,即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全新的文明叙事、复兴叙事,中国式现代化担负着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合力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双重使命。中国式现代化深刻的文明意蕴就在于显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现代价值和马克思主义对世界现代化与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指导意义。因此,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也彰显中国式现代化深厚的文明底蕴和引领人类文明进步的文明意蕴。

关键词:“两个结合”;中国式现代化;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文明意蕴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23)06-0001-13

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的基础上,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即“两个结合”),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为中国式现代化开辟了广阔的社会空间,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则为中国式现代化开辟了广阔的文化空间。“两个结合”是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的关键在于“两个结合”。“两个结合”也是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中国式”的关键也在于“两个结合”。“两个结合”与中国式现代化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原创性贡献,学者们对这两个方面展开了深入研究。一是探讨“两个结合”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关系。学者们认为,“两个结合”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华文化底蕴,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根本遵循^[1],其中“第一个结合”是开创和不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第二个结合”则是不断丰富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内涵^[2]。二是分析中国式现代化对人类文明的进步意义。学者们认为,中国式现代化既是现代文明的接引,又是对人类文明的推进^[3],回答了人类社会和文明发展的诸多难题^[4]。三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马克思世界交往理论视域下弘扬丝路精神研究”(19BKS129),项目负责人:许士密。

作者简介:许士密,男,博士,曲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是探究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使命。学者们认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使命是开启独立自主的文化精神^[5],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要更有力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6]。从相关研究来看,从文明的维度领悟“两个结合”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关系已成为热点问题。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作为一种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中国式现代化其文明意蕴何在,“两个结合”又如何凸显这种文明意蕴。中国式现代化研究的持续深化需要进一步凸显中国式现代化的时空价值意蕴^[7],因而本文试图对此作出回答,从而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学理支撑。

1 “两个结合”与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底蕴

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人类社会从传统到现代、从落后到发达的运动过程。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被动卷入由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现代化体系,由此拉开中华民族探索适合自身现代化道路的序幕。但直到中国共产党成立,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中国才找到了正确的、独立自主的现代化道路。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坚持不懈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在“两个结合”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创造性地走出了一条既有各国现代化共同特征又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这深刻表明,中国式现代化有着深厚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明底蕴。

1.1 “两个结合”奠定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基础

鸦片战争后中华民族在“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背景下开启了对现代化的艰难求索,经历了“器物—制度—文化”的递进式学习,“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8]1470}。究其缘由,没有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西方致力于将中国转变为促进其资本主义发展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注定不能在西方资本主义侵略下得以实现。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将希望转向马克思主义。“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8]1516}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导下,中国人民深刻认识到,只有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三座大山”,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才能独立自主地进行现代化。从历史逻辑来看,“走马克思主义指明的道路并非是中华民族在危亡局势之下试图迅速解决革命问题的权宜之计,而是其在经历过文明失落的阵痛之后追求超越走在现代化前列却充斥着剥削和压迫的资本主义社会作出的郑重选择”^[9]。因此,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革命与马克思主义建立起了本质联系。这种联系的建立、巩固和发展使得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第一个结合”)成为可能。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 and 先进性只有通过与其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才能得到充分彰显;另一方面,中国革命与现代化建设实践的特殊性也需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从历史维度来看,中国具体实际是客观的、全面的、历史的、复杂的,既包括中国的基本国情、中国的具体实践与中国的奋斗目标,也包括中国历史与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潜在地影响着中国具体实际,是中国具体实际的重要

组成部分。因此,“第一个结合”也有着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意蕴。就现实维度而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涵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10]15}。只有“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10]15},才能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牢牢扎根,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

中国共产党既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在中国式现代化初期阶段,中国共产党注重以民族的形式阐释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善于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邓小平赋予中华民族“小康”理想以新的时代内涵,制定了社会主义现代化“三步走”发展战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高度重视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规律性认识,明确提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第二个结合”),在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我们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11],因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之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和文化基因。中国式现代化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走出来的,也是从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史中走出来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共同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了深厚的文明基础。

1.2 “两个结合”赋予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使命

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能够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价值追求与马克思主义科学性和真理性、人民性和实践性、开放性和时代性的理论品格具有内在统一性。因此,“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源不同,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12]。这种“‘结合’不是‘拼盘’,不是简单的‘物理反应’,而是深刻的‘化学反应’,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12]。生成新的文明形态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使命,即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在这一过程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充分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其焕发出强大生命力;同时,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伟大精神和丰富智慧更深层次地注入马克思主义,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以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民族形式,让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深深扎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之中,从而更好地指导中国式现代化向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方向前行。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场域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结果是“互相成就”。一方面,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马克思主义以其先进性和真理性激活了中华文明的基因,推动了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找到了和现代社会的连接点,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实现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跨越,发展出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与文化支撑。另一方面,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那里获得了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标识的文化精华,在中国化时代化的道路上谱写了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两个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时代化道路上蓬勃发展,使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发挥重要价值,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的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从“两个结合”出发,我们更能全面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和重大原则的丰富内涵及其核心要义,更能看清楚中国式现代化担负的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新的文化使命和时代重任。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奋斗目标中,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指引着中国式现代化超越资本主义文明,为人类现代化提供新的文明图景和文明前景。马克思主义“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都包含着超越西方资本主义的文明基因。经由“两个结合”,中国式现代化造就全新的文化生命体和创造新的人类文明形态。中国式现代化诠释了马克思主义实现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的最高命题。实现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最高价值追求,是社会主义本质的最高体现。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内涵和最终目标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与西方现代化的“资本逻辑”不同,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人民至上的理念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因此,中国式现代化呈现出社会全面进步与人的自由发展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内在逻辑和发展趋势。同时,中国式现代化主张和平发展与合作共赢,倡导全人类共同价值,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新型国际关系,从而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展现了新的文明图景和文明前景。

2 中国式现代化体现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性和真理性

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在百年奋斗中,党在每一个历史时期都创造了与时代相适应的科学理论,指引党和人民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确保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始终立于不败之地”^[13]。中国式现代化不但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而且坚持“两个结合”,实现了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创新和发展。作为“两个结合”的产物,中国式现代化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凸显其文明意蕴,首要的就是体现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性和真理性。

2.1 中国式现代化体现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性

现代化既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趋势,又是具有地域特殊性与文明规定性的历史实践。“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14]367}同为世界历史进程中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本质属性和文明使命。中国式现代化要体现真正的世界历史,即人类的和平交往和人类的解放,要体现作为其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本质,即实现人民的共同富裕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都是为了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与使命、性质与宗旨决定了中国共产党能够“把中国式现代化的美好图景一步步变为现实”^[15]。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基础上,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初步构建起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其本质要求和重大原则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领导力量、精神旗帜、发展要求、动力机制、崇高目标,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创新发展的新成果,是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

思主义的新概括,“是党的二十大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最新重大成果”^[16]。

从历史逻辑看,“中国式现代化是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长期探索 and 实践中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重大成果”^[16]。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懈探索,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发展道路,所取得的历史性辉煌成就深刻体现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宏伟事业中。从理论逻辑看,“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10]18}。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根本指导思想,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守正创新,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从而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从实践逻辑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决定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性质”“直接关系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方向、前途命运、最终成败”^[16]。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汇聚起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磅礴力量,确保了中国式现代化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上,现代化的基本模式主要有两种:资本主义现代化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作为人类现代化的一种形态,建立在资本逻辑之上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因其内在矛盾无法克服而不可能成为人类现代化的终点,最终必然向社会主义社会和更高级的共产主义社会演进。这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在中国的实践场域中的具体化,既具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尊重人类追求现代化的普遍性规律和各国实现现代化的共性要求,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基础上取得的重大成果,具有区别于其他国家现代化的特殊性。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两个结合”,科学回答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出的重大问题,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中国式现代化源自中华民族的文明精髓、马克思主义的文明理论和中国共产党的文明担当,不但实现了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根本性突破和西方现代化模式弊端的整体性超越,而且塑造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自信——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因此,“两个结合”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力量,从而显现出马克思主义为人类社会发展进步指明方向、提供遵循和凝聚力量的先进本质。

2.2 中国式现代化体现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

“现代化不是单选题。历史条件的多样性,决定了各国选择发展道路的多样性。”^{[17]316}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成功走出一条适合自己国情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即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五个维度的特征相互联系,共同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刻内涵。”^[18]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和拓展,破除了“现代化=西方化”的历史迷思,打破了西方现代化模式的“神话”。这其中的根本原因在于,“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19]344},而是坚持“两个结合”,走出一条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从根本上源于马克思主义在指导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展现的真理力量。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影响深远,在于其以深刻的学理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真理性、以完备的体系论证其理论的科学性。”^[20]中国式现代化彰显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即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思想,需要沿着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

方向发展,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要求,即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通过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推进和拓展以及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来表现。这两个方面的内在要求,体现为中国式现代化对现代化的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的科学回答。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相互交织、相互激荡、相互影响下,对这“四问”的科学回答考验着中国式现代化是否为真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考验着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性和真理性^[21]。“中国之问”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到新的历史阶段面临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治国理政考验之大等前所未有的艰巨难题,需要根据新的发展变化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来回答中国式现代化提出的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世界之问”是世界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人类社会现代化何去何从的问题。当前世界各国与人民共同面临的严峻的全球性挑战和世界性难题,需要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观察世界大局、把握时代潮流、确定人类抉择,在统筹国内大局和国际大局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在科学回答“世界之问”中彰显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

中国式现代化科学回答“四问”的根本是回应好“人民之问”,即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的奋斗目标。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要求。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就是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过程。中国式现代化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本质要求,就是为了更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因此,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人民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而在“四问”中关键是要回答好“时代之问”。新时代以来进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国内大局与国际大局的相互交织提出了一系列重大时代课题,集中表现为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等重大时代课题。对这三个重大时代课题的科学回答,可以说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问题,也是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需要回答的核心问题。中国式现代化以其理论科学性、历史进步性和道路先进性^[22],对此作出了科学回答,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彰显出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和感召力。

3 中国式现代化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自觉

中国式现代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文化根基、以中国具体实际为出发点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走出来的,也是从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史中走出来的,更是从中国具体实际中走出来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的治理智慧,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人文气质,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底蕴与强大的精神支撑。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才能走出基于中华文明传承和中国具体实际、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之路,推动中华文明重焕荣光。中国式现代化既要体现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性和真理性,也要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分彰显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

容性、和平性。

3.1 中国式现代化需要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赋予中国式现代化深厚的文明底蕴,为其提供深厚的思想资源和精神动力。中国式现代化的形成与发展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念”“梦想”与“愿望”提供实现的动力与途径。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容是社会主义的,形式是中华民族的,其本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其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其魂系于马克思主义,其源发于“两个结合”的创新实践。在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尤其是在中国式现代化历程中,中华文明显现了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既推动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又在现代化建设中获得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和拓展,不仅是在经济科技等物质文明上标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更重要的是在精神文明与文化思想上显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因此,中国式现代化承载着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彰显中华文明显著特性的使命,通过这种方式来突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底蕴与文明追求。

在中华文明的显著特性中,突出的连续性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一脉相承的优秀文化基因和坚实的文明根基。中华民族的生产生活实践是中国式现代化形成的历史根基,中华民族创造的文明成果是中国式现代化形成的丰厚养分。中国式现代化既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引,又包含中华文明的价值导引,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特质和深厚的中华文明底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思想资源,滋养了中国式现代化独特的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赋予了中国式现代化强大的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23]。“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而不是消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是从中华大地长出来的现代化,不是照搬照抄其他国家的现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结果,不是文明断裂的产物。”^[12]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华文明突出的创新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决定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12]。这就赋予了中国式现代化守正创新的精神品格。中国共产党坚持“两个结合”,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赋予中国式现代化强大的凝聚力,既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整体性的现代化,其中包含着的各个民族在社会主义现代化中走向物质生活共同富裕和精神生活共同富裕^[24],也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获得各个民族的支持和拥护,激励全体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同时,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与和平性赋予中国式现代化开放包容的宽阔胸襟和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显著特征。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两个结合”,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超越了西方固有的单一线性、渐次发展的现代化模式,为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提供了新的选择。中华文明突出的和平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12],也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中华文明这些突出的特性赋予了中国式现代化深厚的文明底蕴、精神内涵和团结统一、勇于创新、和平发展等鲜明特质,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和拓展需要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世界上彰显中华文明的这些突出特性,增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吸引力、感染力和影响力,从而更加显现中国式现代化对人类现代化的文明贡献。

3.2 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其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不仅是我们中国人思想和精神的内核,对解决人类问题也有重要价值。”^[25]³¹⁴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和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26],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是当代中国发展的突出优势。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根脉”对维护民族国家团结统一和推动社会发展进步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源源不断的文化滋养。随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开启,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迎来新的历史机遇和挑战,也面临一系列新课题新任务。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要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首先,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需要深入了解中华文明历史,增强对中华文明的认同。“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12]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须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内在精髓和逻辑动因,从根本上筑牢中华文化认同的“精神之基”“思想之根”“情感之源”。在深入了解中华文明史和增强中华文化认同的同时,要处理好“古与今”“中与外”的关系。文化创新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焕发新活力、创造新辉煌的必由之路。所谓“古”与“今”的关系,就是传统与现代的关系。要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25]³³。所谓“中”与“外”的关系,就是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要秉持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倡导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为实现世界永续和平发展贡献中国力量。

其次,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需要着力赓续中华文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根脉,赋予现代化以“中国式”的特征与优势,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为民族复兴立根铸魂的内在要求,也是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精神动力的现实需要。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一是坚持守正创新,以“两个结合”的方法不断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中国式现代化汇聚自信自强的中国力量。二是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三是把握好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以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中国智慧、繁荣中国理论、贡献中国方案,充分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利文化条件”^[27]。

4 中国式现代化承担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使命

作为“人类在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活动中所创造的物质的、制度的和精神的成果的总和”^{[28]296},文明是社会发展的基石。从人类社会历史来看,文明具有内嵌于现代化的本质规定性。从传统到现代意味着文明的一次巨大嬗变和质的跃升,“现代化”蕴含并必然指向一种“文明形态”。“中国式现代化”必然内生并通向一种“人类文明新形态”。从“中国现代化”到“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是构筑全新现代化模式的过程,更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过程。将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人类文明新形态关联起来,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高度的历史自觉与文化自信,为我们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进程中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根本遵循。

4.1 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必将推动中华文明重焕荣光。”^[12]这就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国式现代化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承担着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化使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作为“两个结合”和中国式现代化造就的新的文化生命体,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内涵丰富,可以从不同的角度阐释和理解^[29]。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华文明在“两个结合”基础上创新性发展的文明形态。创新性是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之一,也是中华文明从传统文明到现代文明不断发展的动力。作为中华文明创新性发展的结果,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蕴涵民族性和时代性的内在规定性。从民族性来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中国大地上创造的文明形态,必然要彰显中华文明的主体性和中华民族的自主性。就时代性而言,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内蕴中华文明由传统到现代转型的客观要求。中国共产党在“两个结合”中找到了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新路径,开辟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广阔道路。

从文化的角度来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建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之上的文明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25]32}换言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建立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基础上的文明形态。革命文化承载了党和人民实现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人民幸福的时代诉求,传承和升华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底蕴,是文化自信的重要源头,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在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实践中形成的社会主义文化。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的实践前提,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应有之义。

从现代化的角度来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国式现代化创造的、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相适应的现代化文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30]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文明的相互作用、相互促进,构成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生成机制。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推动中华文明由传统向现代转型。中国式现代化将中华文明

带入现代化潮流之中,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实现中华文明的创新性发展。换言之,中国式现代化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了实践场域。另一方面,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的文化底蕴。中华文明为中国式现代化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底蕴,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撑,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智慧,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色和独特优势。因此,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华文明在“两个结合”中的创新性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创造的、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相适应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从中华文明与中国式现代化相互融通、彼此成就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来看,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追求。总之,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明叙事”,是开启人类文明多样性发展的新篇章。

4.2 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现代化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趋势,一方面是创造某种文明形态的过程,另一方面本身也是一种文明形态,是某种文明形态形成的标识。西方现代化是资本逻辑主导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在其历史进程中具有对外战争、殖民、掠夺和对内剥削、压迫、奴役的明显特点,是霸权式、扩张型现代化。建立在这种现代化基础之上的西方现代文明本质上也是扩张型文明。西方现代化和西方现代文明在全球扩张的过程中不仅存在令人怵目惊心的野蛮,而且造成了人类社会生存境遇的分化与割裂。因而西方现代化给人类带来现代文明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深重的苦难。从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来看,西方现代文明的历史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因此,西方现代文明不会是人类文明的终结形态,而终将被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所取代。中国式现代化作为社会主义性质的现代化,作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现代化,承载着创造新的人类文明形态以超越西方现代文明的历史使命。作为世界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式现代化既是对西方现代性危机及其文明的内在超越,也是中华民族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实现文明重塑的创造性探索。可以说,中国式现代化既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也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建构和创造过程。

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能够改写人类文明版图、重塑人类文明格局。中国14亿多人口整体迈入现代化,规模超过现有发达国家人口的总和,缔造了人类文明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奇迹。中国式现代化在发展自己的同时,也携手世界各国共同做大人类社会现代化的“蛋糕”,让现代化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各国人民,为推动人类现代化进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了强劲动力。中国式现代化“既基于自身国情、又借鉴各国经验,既传承历史文化、又融合现代文明,既造福中国人民、又促进世界共同发展,是我们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也是中国谋求人类进步、世界大同的必由之路”^[31]。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同时,必将为世界现代化和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更大贡献。西方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占据主导地位,建构了“西方中心主义”的文明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中国式现代化走出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老路的新路,撼动了西方国家主导的世界现代化格局,打破了西方现代化营造的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的霸权幻象,为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开辟了新的前景。

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能够推动人类文明转型、促进人类文明升华。西方现代化及其文明形态虽然具有进步意义,但具有“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32]³⁶的霸

道性与扩张性。伴随资本逻辑宰制的西方现代化在全球的拓展,西方现代文明排斥多元化现代化道路,把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看作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最高形态。“长期以来,人类社会受缚于西方文明优越性和西方现代化模式普适性等迷思,以西方文明发展道路的一元性遮蔽了人类现代化路径选择的多元性和现代化本质内涵的普遍性意蕴。”^[33]但世界各国通往现代文明的路径是多种多样的。发展中国家并非只有效仿西方国家并采取资本主义发展模式才能实现本国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不是西方现代化的“翻版”,而是致力于促进全球发展繁荣、世界和平稳定、人类文明进步的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现代化的政治、经济与文化诸方面的一个合成结构”^[34],以叠加发展的“并联式”发展逻辑建构了现代文明转型的新范式,打破了西方对人类现代化实践与理论的垄断,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独立自主迈向现代化树立了典范。“一个和平发展的世界应该承载不同形态的文明,必须兼容走向现代化的多样道路。”^{[14]469-470}中国式现代化以全新的文明视野深化了对文明多样性的认识,不断突破西方现代文明的视野局限,引领人类文明向更高水平跃进。这是中国式现代化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承载的历史使命。

5 结语

现代化是世界发展的潮流,是各国人民的共同向往。从世界来看,在人类现代化进程中西方现代化具有先发性和先进性,但基于“主客二分的哲学范式”和“资本至上的内在本性”,西方现代化在西方国家内部和全球范围都造成了文明危机,人类需要有新的文明形态来指引人类文明发展进步。从中国来看,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同时马克思主义以及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最新理论成果为中华文明的发展进步提供了前进的方向和动力,中国式现代化致力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作为“两个结合”的伟大创造,中国式现代化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性和真理性,既具有“现代化”的普遍性,又凸显“中国式”的主体性,具有生成根基、本质特征的优越性和哲学范式的先进性,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作为全新的现代化模式,中国式现代化超越了西方现代化的资本逻辑,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终结了西方世界试图以资本现代性及其文明形态同化非西方世界的历史幻象。作为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过程,中国式现代化内蕴接续推进现代文明、转化发展中华文明的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承担创造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新的文化使命。作为全新的文明叙事、复兴叙事,中国式现代化彰显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与和平性,为推动世界现代化进程、促进人类文明进步、破解时代难题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在理论和实践上开启人类逐步走向和合共生、美美与共的新的文明进程,为促进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将成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新走向。中国式现代化担负着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历史使命,从而彰显中华文明的现代价值和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性和真理性,这就是中国式现代化最深层次的文明意蕴。

参考文献:

[1] 刘仓. 中国式现代化与“两个结合”的实践路径探析[J]. 山东社会科学, 2023(5): 19-26.

- [2] 费虹寰.从“两个结合”的角度理解中国式现代化[J].党的文献,2023(2):22-24.
- [3] 曹恒瀚,任剑涛.升华文明:现代化指向与“中国式现代化”目标[J].学术界,2023(4):20-32.
- [4] 王梦可.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开创[J].毛泽东研究,2023(2):39-47.
- [5] 吴晓明.中国式现代化与独立自主的文化精神[N].光明日报,2023-09-04.
- [6] 陈来.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N].人民日报,2023-08-28.
- [7] 郑吉峰.中国式现代化研究:现状与展望[J].探索,2023(2):14-27.
- [8] 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9] 颜晓峰,任倚步.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学理探析[J].思想教育研究,2023(6):3-9.
- [10]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 [11]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不断深化对党的理论创新的规律性认识 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取得更为丰硕的理论创新成果[N].人民日报,2023-07-02.
- [12]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J].求是,2023(17):4-11.
- [13] 习近平.为实现党的二十大确定的目标任务而团结奋斗[J].求是,2023(1):4-14.
- [14]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
- [15] “把中国式现代化的美好图景一步步变为现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苏纪实[N].人民日报,2023-07-09.
- [16] 习近平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正确理解和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N].人民日报,2023-02-08.
- [17] 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
- [18] 陈琦.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个维度[J].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5):17-26.
- [19]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 [20] 习近平.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J].求是,2023(20):4-9.
- [21] 付文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四重阐释及其整合[J].探索,2022(3):15-28.
- [22] 任铃,赵儒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开拓创新的内在逻辑[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22(4):9-14.
- [23] 汪信砚.从中华大地长出来的现代化[N].人民日报,2023-08-28.
- [24] 吴艳东,廖小丹.精神利益与精神富裕: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文明特征[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2):27-38.
- [25]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 [26]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 推动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N].人民日报,2022-05-29.
- [27] 习近平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利文化条件[N].人民日报,2023-10-09.
- [28] 中国大百科全书:第23卷[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
- [29] 何星亮.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什么样的文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基本内涵[J].人民论坛,2023(14):8-13.
- [30] 习近平在江苏考察时强调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做示范 谱写“强富美高”新江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N].人民日报,2023-07-08.
- [31] 习近平.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N].人民日报,2023-03-16.
- [3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3] 张晓萌.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N]. 经济日报, 2023-04-20.

[34] 任剑涛. 在现代化史脉络中理解“中国式现代化”[J]. 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1): 1-11.

“Two Combinations” and the Civilization Implication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XU Shimi

(School of Marxism, Qufu Normal University, Qufu 273165, China)

Abstract: Integrating the basic tenets of Marxism with China's specific realities and fine traditional culture (“two combinations”) is the only path to strike out and develop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also the only path to promote and expand Chinese modernization.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two combinations” have laid a deep foundation of both Marxist and Chinese civilization for Chinese modernization. As a major achievement of adhering to the soul of Marxism and the roots of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Chinese modernization should not only embody the advancement and truthfulness of Marxism and represent the direction of development of the progress of human civilization, but also inherit and develop the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so that it can be creatively transformed and innovatively developed in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and under the guidance of Marxism. The connotation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continues to promote modern civilization, transform and develop Chinese civilization, that is, the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and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of “recreating civilization”, and undertakes the cultural mission of building modern civilization of Chinese nation. As a new mode of modernization, the persistence and development of “two combinations” make Chinese modernization show the new picture and prospect of civilization different from western modern civilization, that is, to create a new model for human civilization and build the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As a brand-new civilization narrative and rejuvenation narrative, Chinese modernization bears the dual mission of comprehensively promoting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jointly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 of human civilization. The profound civilizational implication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lies in the manifestation of the important modern value of the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the important guiding significance of Marxism for moderniz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 of human civilization. Therefore, on the basis of the profound foundation of more than 5,000 year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integrating the basic tenets of Marxism with China's specific realities and fine traditional culture to build the modern civilization of Chinese nation and create a new model for human civilization is an inevitable requirement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and it also reveals the deep civilizational heritage of the Chinese modernization and the civilizational implication of leading the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 of human civilization.

Key words: “two combinations”, Chinese modernization, Marxism, the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civilized connotation

责任编辑: 牟 怡 蒋英州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建构逻辑

吕晓斌

(西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7)

摘要:建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到新阶段的必然要求,需要遵循中国式现代化自身的发展逻辑与理论体系自身的学理逻辑。建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首先要明确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立场,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引领,还要明确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用,并突出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理念。其次要明晰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资源基础。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中国式现代化的具体实践和人类现代化文明有益成果所提供的理论资源和实践智慧构成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理论来源。再次要用中国特色话语来表达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中国特色话语表达方式要关照现代化概念体系及内涵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注重中国式现代化标识性概念的发掘与提炼,增强学术话语与政治话语、中国话语与世界话语的良性互动。这种话语表达的具体内容即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主要范畴,包括中国式现代化的历程和经验、内涵和特征、布局和策略、动力和运行、目标和意义等方面。最后需要明确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重大意义。这个理论体系不仅是对中国式现代化历史成就与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为新时代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理论支撑与理论指导,而且为丰富人类现代化理论体系作出中国贡献。沿着这种理论与历史相统一的逻辑建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能更好地为新时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学理支撑。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政治立场;理论资源;主要范畴;建构逻辑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23)06-0014-14

2023年2月习近平提出“我们进一步深化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和本质的认识,概括形成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和重大原则,初步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使中国式现代化更加清晰、更加科学、更加可感可行”^[1]的重要论断以来,学者们围绕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这几个方面。一是理论体系的演进脉络。学者们认为,其演进经历了近代时期、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等几个历史阶段^[2]。二是理论体系的思想渊源。学者们认为,其基础性来源是马克思现代化理论、根本性来源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借鉴性来源是国外的现代化思潮^[3]。三是理论体系的主要构成。学者们认为,其理论硬核主要由领导力量论、制度属性论、中国特色论、本质要求论、显著优势论等构成^[4],其话语表达样态表现为功能指向上的目标话语、本质特征话语、原则要求话语和路径方法话语相配合的样态,在外部形态上呈现出理论性话语、实践性话语、制度性话语、价值性话语相协调的样态,在内在属性上表征出政治话语、学术话语、生活话语相统一的样态^[5]。四是理论体系的建构原则和建构路径。学者们认为,这一体系的建构必须坚持人民至上、自信自立、守正创新、问题导向、系统观念和胸怀天下等基本原則^[6],可以从“以一统多”的现代化主体力量、打造融通中外的现代化内容范畴、借助媒介融合的现代化载体工具、依托共同价

作者简介:吕晓斌,男,西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助理研究员。

值的现代化情境预设等方面着手,建构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7]。五是理论体系的重大创新。学者们认为,这一理论体系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开拓了科学社会主义发展新境界^[8],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最新重大成果,科学回答了在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中国式现代化向何处去、人类文明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9]。由此可见,当前研究实现了从政治表达、文本阐释到学理性建构的转向。通过阐述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概念内涵与思想基础,再将理论基础与理论体系创新发展相结合,对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内生逻辑展开了深入研究,从而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基础。但若只是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作为一种固定的观念表达来分析,不阐明其内在的建构逻辑,可能难以真正实现理论形塑和价值引领的目标^[10]。作为一个建构性概念,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在不同历史语境和特定的问题境遇下生发出不同的样态和功能指向。因此,本文探讨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建构逻辑问题,以便进一步探讨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建构方法、建构路径与建构意义等。

1 建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政治立场

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性伟大成就,是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不断以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行正确的现代化实践中获得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也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共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重大成果,其推进和拓展是为了写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篇大文章、开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11]。因而建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需要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

1.1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引领

习近平指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持。”^[12]建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必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两个结合”)。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提出了建设“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13]454}的目标。经过几个“五年计划”的实施,新中国初步建立起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显著成就。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继续坚持和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团结带领中国人民顺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现代化奇迹。因此,建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前提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但“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14]691},因此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建构,不是简单地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和思想,而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在“两个结合”的基础上将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实践有机结合起来。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是一种思想表达体系,这一体系所反映的实质内容是基于中国现代化实践的理论提炼,在本质上属于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理论体系。建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也就需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引领,而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推进中我们必须将马克思主义作为看家本领,以在建设实践中和在世界格局中不断赢得优势、赢得主动、赢得未来^[15]。

1.2 明确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用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在中国式现代化初期阶段,毛泽东就明确指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16]461} 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卷入由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世界现代化进程。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洋务派的技术现代化,还是维新派的改良现代化,以及革命派推翻封建帝制的制度现代化,均以失败告终。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先进的政治力量来领导中国的现代化。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自觉担负起推动中国现代化的历史使命,正确分析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开创了中国式的现代革命与现代化建设道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发展成就表明,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能够取得伟大胜利,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准确把握时代大势,倾听人民心声,回应时代诉求,着力开创与国情相适应的现代化建设。因此,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发展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发展一样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都有力地证明,要领导中国实现现代化,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才能不断使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指导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发展,向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迈进。这是中国共产党先进性的体现,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根本保证。党的领导决定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性质,确保中国式现代化锚定奋斗目标行稳致远,激发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劲动力,凝聚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17]。因此,通过科学总结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式现代化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就会明白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在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中至关重要的领导作用。

1.3 突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毛泽东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18]1094} 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牢记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与使命,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根本利益而奋斗。因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作为指导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理论总结,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必然突显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始终遵循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中的人本定位,把人的现代化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19],深刻诠释了“发展为了谁、发展依靠谁、发展成果由谁共享”的这一现代化核心理念。首先,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强调“发展为了人民”。“始终把人民安居乐业、安危冷暖放在心上”^{[20]137}，“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20]142},中国共产党人的这些重要理念深刻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其次,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明确“发展依靠人民”。中国式现代化强调人民在现代化建设中的主体性和主动性,依靠和汇聚人民的磅礴力量不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因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是真正的英雄,必须相信人民、依靠人民”^{[20]137}。再次,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坚持“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中国式现代化就是“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目标稳步迈进”^{[20]35}。因而,基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基础之上的现代化理论体系,必然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作为主线贯彻始终。

2 建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理论基础

中国式现代化属于后发型现代化,必然会受到先发现代化国家的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的影

响;同时,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现代化,生发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大地上,因此中国式现代化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也有着丰富的现代化资源可以利用与借鉴。这也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基础性理论来源既有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也有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以及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础,还有中国现代化实践形成的经验总结和人类发展过程中的现代化文明成果。这些现代化的理论资源,在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中的地位与功能各自不同,但共同推动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发展。

2.1 以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为基础

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起源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正是这一现象使得不少人认为后发国家要实现现代化就得走西方现代化的道路。但马克思主义认为,现代化是一个生产力发展的趋势,资本主义现代化只是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阶段。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与人们普遍交往的进一步加深,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成为人类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种文明形态,而现代性的内涵和外延也由此不断得到丰富。但资本主义社会并不是人类社会现代性和世界历史的终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推动着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21]287}，“人”是衡量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尺度,不仅要实现人的政治解放,还要实现人的社会解放与人类解放。但是,在资本主义现代化下“人”是被异化的人,称不上是“现代人”,人类社会也并没有实现人的解放,因而不能算是真正的和彻底的现代化。而资本主义现代化不是各国实现现代化的必经之路,落后国家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现代化来跨越“卡夫丁峡谷”,以实现资本主义阶段的跨越,从而进入社会主义阶段。马克思明确指出,只有在真正共同体中人才可能有个人自由,这个未来现代化社会的形态是“根据共产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社会,将使自己的成员能够全面发挥他们的得到全面发展的才能”^{[22]308},即共产主义社会才是人类社会现代化的历史归宿。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指导思想。同时,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现代化的规律,尤其是对生产力发展、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变革、人类社会发展方向、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与人民群众的主体性力量发挥以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等现代化问题有着科学合理的深入阐释,因而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基础性来源^[3]。

2.2 以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为支撑

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其现代化理论需要中国化时代化,才能更好地指导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发展与实践发展。“我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要运用其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解决中国的问题,而不是要背诵和重复其具体结论和词句,更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当成一成不变的教条。”^{[23]15}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的“第二次结合”,即“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24]557}。毛泽东提出了对中国现代化发展具有原创性意义的理论,如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统筹和综合平衡以及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指导、农轻重协调发展等。这为成功开辟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奠定了理论基础。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明确提出走“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在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式现代化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出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两步

走”战略,并在理论上进一步深化对中国式现代化内涵和本质的认识,初步构建起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因此,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来看,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成果的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着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其中包含的丰富的现代化建设思想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核心内容,并支撑着理论体系的框架结构。

2.3 以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经验为重要来源

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为构建具有中国自主性的现代化理论奠定深厚基础^[25]。系统全面总结这种伟大实践的的经验既是实践发展的需要,也是现代化理论发展创新的需要,更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到新时代的迫切需要。使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悲惨境遇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取得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快速增长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迈进的中国式现代化,其丰富而生动的实践经验需要系统全面的总结,并上升为中国现代化的本土理论而贡献给全世界。通过这种总结,把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实践中的有益成果和有益经验及时转化成理论,进而指导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就经济现代化实践与理论升华而言,能够充分反映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及其经验总结推动现代化理论进步的这个鲜明特点。在改革开放初期,在传统计划经济的实践基础上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之后经过8年的经济建设实践,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极大地推动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26]⁵¹³从“基础性作用”到“决定性作用”,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认识发生重大变化。这是一个重大的理论突破,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由此可见,提炼和升华现代化实践中的有益经验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重要来源。

2.4 以人类现代化文明有益成果为经验借鉴

中华民族从古到今都在不断地学习和借鉴外来文明的优秀成果。人类在探索现代化的进程中形成了几种不同的模式及其理论,为建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提供了参考与借鉴。一是借鉴吸收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有益成果。西方国家在人类现代化历程中处于先发地位,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均取得了显著成就,积累了现代化的丰富经验。西方学者提出的经典现代化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依据西方国家现代化历史与实践经验而得出的,虽然不完全适合后发现代化国家,尤其是不符合走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国家,但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模式与经典现代化理论仍然有值得借鉴吸收的方面,主要是对工业化、市场化和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的重视与创新,极大影响了后发国家对现代化的认识与实践。同时政治上的民主与法治的现代化也有值得借鉴的地方。二是对苏联式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及其理论的借鉴吸收。苏联作为第一个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并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国家,其现代化方法与理论精髓深刻影响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其成功的方面值得借鉴吸收,其失误、失败与教训也对中国式现代化起到

了警示作用。三是借鉴后发国家的现代化经验与理论。拉美学者提出的“依附理论”及其实践对中国而言,其启示在于既坚持独立自主又坚持改革开放。同为亚洲国家的韩国、新加坡等抓住西方国家产业转移机会,吸引外国大量资金和技术,适时调整经济发展策略而发展迅速。这对中国式现代化起到了较明显的启示作用。任何社会的发展模式都不是一次性形成的,形成后也不是一成不变的^[27]¹⁶¹。因此,中国式现代化也在加强与其他国家、其他文明之间的交流对话,“以海纳百川的宽阔胸襟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23]¹¹⁸,从而丰富和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

3 建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话语表达

建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有着丰富的理论资源,但不同的理论资源有着不同的话语体系表达,那么用什么样的话语来表达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就成为一个关键问题。中华民族有着自己独特而丰富的语言文字,自然也有着相应的话语来表达和建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同时,中国式现代化还处在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中,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也是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因而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话语表达也需要随着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发展和其理论体系的发展和丰富而不断丰富和创新。这就要求在建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时需要用既有成熟的现代化话语和创新发展的现代化话语来表达和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

3.1 关照现代化概念体系及内涵的普遍性与特殊性

在现代化历程中,西方长期的现代化实践促成了一系列现代化概念的生成,在不断生产概念的基础上以判断和推理的逻辑方式形成了西方现代化理论体系。从普遍性维度看,西方现代化概念及理论体系给出了一些符合人类历史发展的现代性规定,为后发国家或者发展中国家提供了现代化参照。从西方现代化实践与理论抽象出来的并且符合后发国家现代化需要或者可以参考借鉴的概念、理论与指标,反映了现代化的普遍性。作为后发国家的中国,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其现代化进程都受到了西方现代化的影响,并且中国的现代化属于人类现代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28]³⁶⁷,其理论体系包含的概念及其内涵也必然与现代化的普遍性有一致之处或共识。从特殊性维度看,任何国家的现代化都有着自己的特殊性或特色,基于特定国家或地域的现代化实践产生的现代化理论同样有其特殊性。当前西方国家现代化话语的强势在世界范围内造成了一种以“西方中心论”为基调的话语体系,设计出一种“现代化=西方化”的话语陷阱。要跳出这一话语陷阱,中国式现代化需要把现代化的一般要求与中国实际的特殊要求相结合^[29],也即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需要反映中国式现代化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理论,而是具有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的根本规定性。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基础上形成的,是建立在中国国情、历史经验、文化传统等基础之上的,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因此,我们在建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时既要反映现代化普遍性又要关照中国特色。

3.2 注重中国式现代化标识性概念的发掘与提炼

从根本上说,明确中国式现代化的特殊性是为了以此为出发点建构与时代相符、与国情相符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在建构过程中,我们不仅要引入国际社会科学既有的理论概念,也要在特定意义上升华和延展这些理论概念,更重要的是总结和提炼具有标识性的现代化概念

来增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解释力。在现代化话语方面,我们的创新性概念的传播力和影响力相比于西方国家还有差距,特别是解释中国现代化成就的概念与理论更是如此。西方学者不断抛出各种新概念,如“民主化转型理论”“威权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等,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世人(也包括我们中国人)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认知。这就要求我们加紧供给一些标识性概念,掌握阐释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主动权和主导权^[30],来客观正确地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的经验、成就与价值。一是要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程中总结、概括和提炼新概念。二是要从历年的现代化建设决策性文件中析出学术概念,因为重大的政治决策中包含重要的概念与理论,例如协商民主、自我革命、对口支援等。三是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提炼出符合中国式现代化需要的概念,如“小康社会”“德治”“大同”“和谐”等。在坚持“两个结合”的基础上,我们还需要继续深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炼出符合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标识的概念。四是要从中国人民的实践创造中提炼新概念。人民群众在现代化实践中创造了很多新的概念与社会治理机制,需要使这些新概念新机制上升为学理性概念,如“村民自治”“三治融合”“枫桥经验”等。因此,我们需要注重发掘和提炼反映中国人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热情和积极性的实践经验与思想智慧的概念与观念,使之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重要来源。

3.3 增强学术话语与政治话语、中国话语与世界话语的良性互动

中国式现代化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展开的。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程度越来越高,中外之间的交流不仅仅是官方交流,学术交流与民间交流也越来越多。这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话语表达不仅包括政治话语、学术话语与社会话语,而且表现为国内话语与世界话语的结合。通过学术语言把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与根本原则、路线方针政策讲清楚,使政治话语有着学术话语支撑、中国话语与世界话语平等交流和良性互动就十分必要。一方面,使政治话语和学术话语相互关照。在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提下充分展开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经验的总结、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探讨和中外现代化的比较研究,坚持学术与政治相结合^[31],有助于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在学术话语和政治话语上相互切换、相互支撑。另一方面,建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话语表达也要关照中国话语与世界话语的交流互动。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是建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基础与“两个结合”理论基础之上的话语表达。同时,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符合人类社会现代化发展趋势,并深刻揭示了人类对现代性的共识,这就是全人类共同价值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这种共性,使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包含了世界话语。中国式现代化有着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是一种开放式的现代化,也需要吸纳其他现代化理论的有益成果,使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中国话语与世界话语展开交流互动、各取所长。虽然中国话语与世界话语会存在一定张力,但需要良性互动,因为中国式现代化不仅仅是为了自身的发展,还要为世界发展贡献中国力量。这就为两种话语的良性互动提供了条件与动力,从而使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既突出世界性又保持民族性。

4 建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主要范畴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是一个由基本范畴支撑起来的思想体系与逻辑系统。作为一套崭新的现代化理论体系,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必然要实现了对既有现代化理论叙事的扬弃,确立属于自身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核心理念与主要范畴。基于理论逻辑与历史逻辑的有机统一,建构中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需要贯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中国立场与世界情怀的统一。这就需要从现代化理论的核心理念与主要范畴出发,全面系统地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

4.1 中国式现代化的历程和经验

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历程与经验,是建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前提和基础,同时现代化历程中各个阶段积累的经验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重要来源。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正式开启了现代化建设,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四个现代化”和“社会主义强国”的奋斗目标。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提出了改革开放,确立了“三步走”的现代化战略。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 21 世纪中国发展面临的新问题,提出了“两个百年”的现代化奋斗目标。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丰富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提出了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综合研判国内大局和国际大局,明确提出加快推进现代化建设,确立了从 2020 年到 21 世纪中叶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两个阶段性目标,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23]¹⁸。在一系列与时俱进的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指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些成就既离不开理论的科学指导,也形成了现代化建设的宝贵历史经验,包括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人民至上、坚持理论创新、坚持独立自主^[32]等。中国式现代化积极总结经验、实事求是地制定和推进相应发展方案,不断推进理论创新^[33]。这些宝贵经验凝聚着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化建设的科学认识和理论总结,指导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发展。

4.2 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和特征

准确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和特征是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根本原则与本质属性的关键所在。作为理论基础的内涵和特征,共同规定了中国式现代化“是其所是”的内在依据^[34],有助于在众多的现代化理论中准确识别和定位中国式现代化。邓小平明确指出:“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35]¹⁶³因此,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实践赋予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独特内涵。其一,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与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本质属性,是对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内涵的根本规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特质,也是这一现代化模式区别于其他现代化模式的根本标志。其二,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主要任务。这五个方面分别对应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文明建设、政治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社会文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从国家的层面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任务作出部署,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属性与人民属性。其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式现代化胸怀天下和世界情怀的生动体现,科学回答了“世界将向何处去”“人类将向何处去”的重大时代难题。其四,中国式现代化有着鲜明的中国特色,即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

道路的现代化^[23]¹⁸⁻¹⁹。把握好这些内涵和特征,才能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及其理论体系核心理念^[36],并以此为中心搭建起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四梁八柱。

4.3 中国式现代化的布局和策略

厘清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布局与策略规划,是理解和建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重要方法,同时布局和策略中的关键概念与中心思想也构成理论体系的资源与基础。中国式现代化的具体实践是在顶层设计与基层实践探索相结合中有序推进的。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五年规划”(五年计划)与长远的现代化战略策略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新时代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布局与策略规划的有机统一,在整体部署上,着眼于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注重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等各个领域的均衡发展,涉及治党治国治军、内政外交国防等各个环节,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战略支撑。在策略规划上,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不断强化现代化建设的人才支撑、增强现代化建设的“第一动力”,同时坚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以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推进扩大内需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对外开放战略等深入实施,继而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优势保障。在中国式现代化布局和策略的背后,是马克思主义提供的科学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强调客观、全面、系统、发展、普遍联系地观察、分析和解决中国式现代化面临的问题。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处理好顶层设计和实践探索、战略和策略、守正和创新、效率和公平、活力和秩序、自立自强和对外开放等六对重大关系^[37]。因此,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布局和策略规划既目标明确、步骤细致,也是对既往现代化建设的经验总结、理论提升,体现了历史性与前瞻性、科学性与理论性的有机统一。

4.4 中国式现代化的动力和运行

深入探究和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多重动力及其运行机理机制,既是理解中国式现代化勇毅前行的密钥,也是建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内在要求。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长期而又复杂的系统性工程,之所以能够行稳致远,是因为有着强劲的动力予以支撑。一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动力与世界现代化发展的外在动力。从内生动力来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人民自近代以来孜孜以求的伟大梦想。中国式现代化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仅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鲜明的民族特色,为现代化建设提供明确的目标指引,而且源源不断地为其注入强大的精神动力。从外生动力来看,先发国家和现代化迅速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对中国产生直接的压力性影响,这种悬殊的差距使中国人民产生了强烈的紧迫感和赶超意识^[38],迫使中国在现代化中奋起直追。二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同资本主义现代化相竞争的动力。社会主义国家产生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进入垄断或帝国主义的阶段,因此社会主义国家必须进行现代化建设,同时必须与资本主义现代化同台竞争,并在自身发展和与之竞争中证明社会主义优越性和科学社会主义先进性。在此意义上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对中国式现代化提出了更深层次的要求。三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与中国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强大动力。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政治保证、价值引领和领导动力,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最大的前进动力。概言之,中国式现代化的拓展和推进是多重动力综合作用的结

果,而对其中的运行机理机制的总结提炼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

4.5 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和意义

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和意义内在地规定着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建构方向和根本旨趣。就国内目标而言,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同时也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过程。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文化根基,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化建设为实践基点,中国式现代化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迈进,坚持把“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就国际目标而言,中国式现代化秉持“以和为贵”“天下大同”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致力于不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对中华民族而言,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指明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路径,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达至新的高度。对世界来说,中国式现代化所坚持贯彻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难题与促进人类和平事业发展作出了新的更大贡献。对人类现代化发展来说,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表明,“合作共赢”替代“零和思维”,“多中心的现代化”替代“中心—依附”的现代化格局是有可能的^[39]。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说,中国式现代化是继承、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的成功范例,是对其深层次原理和思维方式的科学凝练^[40],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使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明晰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和意义,不仅有利于凝聚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共识和热情,而且有助于准确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重大价值意蕴。

5 建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价值意蕴

建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是回顾过去、展望未来,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提供理论指导。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孕育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历程之中,实践的成功推进和拓展证明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正确性和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科学性。新时代需要全面总结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成就与历史经验,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最新成果以及现代化理论来分析其成就与经验蕴含的深刻道理、哲理和学理,从而建构起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既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理论支撑,也为丰富发展人类现代化理论体系作出中国贡献。

5.1 有助于全面总结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成就与历史经验

理论与经验是实践的提升,及时总结历史经验、创新发展理论有利于更好地指导实践。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人民便开始致力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开始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中国共产党肩负着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现代化的历史重任。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以工业化为核心的“一化三改”战略决策和“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国工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架构起了较为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新中国实现工业化奠定了坚实基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提出走“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的时代命题,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确立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和实现途径,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充满新的活力的体

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启了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这些历史性成就、历史性变革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最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最过硬的事实支撑,也是它富有实践生命力最鲜活、最有力的历史证明^[41]。因而建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一大重要任务就是要全面系统总结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成就和历史经验,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从而更加坚定道路自信和理论自信,积极稳妥地继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5.2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理论支撑

从发展过程看,中国式现代化是“并联式”的现代化,是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并驾齐驱的发展形态。但与此同时,这一并联式发展样态也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同时解决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等各个领域的问题。这些问题既有历时性的,也有共时性的,还有国际与国内相互交织而产生的;既有后发国家现代化面临的普遍性难题,也有中国特殊国情产生的独特难题。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探索性事业^[42],这些问题与难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交织汇聚,一方面加大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难度,另一方面也迫切需要创新发展的现代化理论指导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更好地解决这些问题与难题。这就使得中国式现代化在解决这些问题与难题中形成的现代化理论体系相比其他现代化理论更具影响力和说服力。因此,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建构既基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经验与理论资源,又要立足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未来发展需要,以便更好地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服务。“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坚持新发展理念、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重大布局和策略,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系统协调发展的生动呈现,也是每一领域协调发展的客观要求。为此,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不仅要在微观、中观、宏观上反映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要求与发展趋势,而且要在横向和纵向上系统布局,从而有条不紊地全面指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就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系统观、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建构起完整而又开放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既总结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成就,又指导中国式现代化的未来发展。

5.3 为丰富人类现代化理论体系作出中国贡献

对世界现代化何去何从的时代之问,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将人类现代化置于当下中国和世界现代化所面对的时代环境中予以科学回答,即“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28]48},世界各国需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携手起来共同解决人类面临的挑战和难题,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式现代化由此形成的一系列新概念、新理念、新理论,丰富和拓展了人类现代化理论体系。具言之,一是内涵拓展。中国式现代化坚持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之间协调发展,个人与社会、国家与社会之间协调发展,中国与世界之间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在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上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二是观念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新发展理念,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三是方式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通过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坚持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相结合,全面推

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四是道路拓展。中国式现代化不走对外扩张、血腥掠夺的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老路,坚持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和平发展的现代化道路,坚持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因此,中国式现代化为发展中国家通往现代化提供了新理论新方案新路径,从而为丰富和发展人类现代化理论体系作出了中国贡献。

6 结语

综上所述,建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既需要掌握中国式现代化的历程、经验、成就、价值、内涵、特征、机制、结构等要素及其蕴含的现代化思想与理论,还需要科学回答中国式现代化面临的“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建构也就需要有科学的理论来指导,这就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事实上搭建起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主要内容和框架结构,在这一思想指导下系统梳理和总结中国式现代化的历程与经验,结合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成就和发展前景,借鉴吸收其他现代化理论的有益成果,也就能够建构起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在建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实际操作中,需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指导。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站稳马克思主义政治立场、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前提、是基础,是决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败的关键。作为一套完整的并区别于西方现代化的理论体系,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必然得具备一套适合的话语表达来展现和传播。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话语表达既要有中国特色也要有世界共性、既要有学理支撑也要有政治指引。一套理论体系的核心和基础,首先要讲清“是什么”。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必须理清中国式现代化的历程与经验、内涵与特征、布局与策略、动力与运行、目标与意义等诸多范畴之间的关系,继而构建一种整全意义上的现代化理论体系。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中推进理论创新,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不仅要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服务,而且要为实现人类现代化和人类解放服务。只有这样的价值理念,才能使其具有世界影响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越走越宽,其实践经验与理论创新越来越丰富,对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建构与发展的要求也就越来越高。因此,中国共产党要永葆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需要不断根据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发展与时代发展而持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发展与完善,从而不断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理论指导,不断为丰富和发展人类社会现代化理论体系作出更大贡献。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正确理解和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N]. 人民日报,2023-02-08.
- [2] 任志江,梁越月,李卓远.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溯源——以近代以来我国现代化思想理论变迁为视角[J]. 财经科学,2023(5):62-74.
- [3] 胡长生.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重要范畴与思想溯源[J]. 湖南社会科学,2023(3):9-16.
- [4] 项久雨. 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J]. 马克思主义研究,2023(3):1-9.

- [5] 齐道新. 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的构成样态与功能指向[J]. 探索, 2023(2): 1-13.
- [6] 杨楹.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建构的方法论、内容及其当代价值[J]. 中州学刊, 2023(8): 5-12.
- [7] 张国启, 蒯叶坤. 中国式现代化叙事体系的建构: 时代旨趣、思维逻辑及实践向度[J]. 社会主义研究, 2023(3): 1-8.
- [8] 高继文.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最新重大成果[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23(5): 38-45.
- [9] 杨金海. 深化对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认识[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23(4): 4-14.
- [10] 杨彬彬.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话语的存在形态与建构逻辑[J]. 探索, 2022(2): 27-38.
- [11] 蒋英州, 王创宇.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史起点、主要内涵与使命追求[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2): 1-13.
- [12] 习近平.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 2016-05-19.
- [1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 第5卷[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
- [1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0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15] 付文军.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四重阐释及其整合[J]. 探索, 2022(3): 15-28.
- [1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第5册[G].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 [17] 习近平.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J]. 求是, 2023(11): 4-7.
- [18] 毛泽东选集: 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 [19] 刘儒, 陈舒霄. 中国式现代化: 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的新飞跃[J].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1): 9-20.
- [2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3卷[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20.
- [2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2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 [23] 习近平著作选读: 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3.
- [2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 第2卷[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
- [25] 赵刘洋. 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逻辑: 现代化理论史的视角[J]. 广东社会科学, 2023(4): 38-46.
- [2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上[G].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4.
- [27] 罗荣渠. 现代化新论——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增订本)[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4.
- [28] 习近平著作选读: 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3.
- [29] 赵锦英. 从中国现代化到中国式现代化[J]. 教学与研究, 2023(4): 18-28.
- [30] 代晓光, 曹景文. 中国式现代化话语的存在形态、生长逻辑与成长空间[J]. 学习与实践, 2023(8): 3-13.
- [31] 黄海, 祝羽泽. 新时代中国特色话语体系构建研究的视域拓展[J].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5): 20-25.
- [32]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N]. 人民日报, 2021-11-17.
- [33] 付文军, 姚莉. 全新人类文明形态的中国式现代化论析[J]. 理论探索, 2023(5): 23-30.
- [34] 方兰欣, 郑永扣.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生成逻辑与学理阐释[J]. 河南社会科学, 2023(1): 36-43.
- [35] 邓小平文选: 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4.
- [36] 任剑涛. 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基于现代化的独异性视角分析[J]. 探索, 2023(5): 1-13.
- [37] 习近平.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处理好若干重大关系[J]. 求是, 2023(19): 4-8.
- [38] 王岩, 吴媚霞. 大历史观与中国式现代化的三重阐释[J]. 思想教育研究, 2023(6): 10-16.
- [39] 来庆立. 中国式现代化的源流与世界历史意义[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23(7): 37-44.
- [40] 何爱平, 徐艳.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品格承继及其引领意义——基于《资本论》理论品格视域[J]. 中国经济问题, 2023(3): 8-18.

[41] 张跃国.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生成逻辑:“术语的革命”与“集义所生”[J]. 开放时代, 2023(2):13-28.

[42] 虞崇胜. 中国式现代化的三重属性:现代性、中国性、世界性[J]. 探索, 2023(3):15-28.

Study on the Construction Logic of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LV Xiaobin

(School of Marxism,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127, China)

Abstract: Constructing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has become an inevitable requirement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to a new stage. Constructing this system needs to follow the development logic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itself and the academic logic of the theoretical system itself. To construct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firstly, we should clarify the value stance of Marxism, adhere to the ideological guidance of Marxism, clarify the leadership role of the CPC, and highlight the concept of people centered modernization. Secondly, we should clarify the theoretical resources of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The modernization theory of Marxist, the Chinese modernization modernization theory, the specific practice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and the beneficial achievements of human modernization civilization constitute the theoretical source of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Thirdly, we should use the discourse of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o express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The discourse expression mod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universality and particularity of the concept system and connotation of modernization, the exploration and refinement of the symbolic concept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and enhance the positive interaction between academic discourse and political discourse, Chinese discourse and world discourse. The specific content of this discourse is the main category of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including the process and experience, connot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layout and strategy, power and operation, goals and significance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Finally, we should clarify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This theoretical system is not only a comprehensive summary of the historical achievements and experience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which provides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guidance for comprehensively promoting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in the new era, but also makes Chinese contributions to enriching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human modernization. That said, building a theoretical system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along the logic of the unity of theory and history could better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the comprehensive construction of a socialist modern country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theoretical system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political stance, theoretical resources, main categories, construction logic

责任编辑:陈卓 蒋英州

中华民族的当代重塑及其意义

周平,郭志凯

(云南大学民族政治研究院,云南昆明650500)

摘要:中国由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转型背景下推进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促成国家和社会一系列深刻变化的同时,也必然导致中华民族自身的一系列变化,从而构成中华民族的当代重塑。于是,中华民族的演进,就在经历了古代存在、现代构建两个阶段之后,进入了当代重塑阶段。在这样的当代重塑过程中,中华民族出现了内部结构优化、民族意识提升、整体功能增强和外部形象改善等一系列根本性的变化,从而日益成为一个受到世界其他民族尊重的优秀民族。同时,中华民族的当代重塑,也将对民族复兴的实现、国家的统一和稳定、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设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产生积极影响的过程中彰显自己的价值。

关键词:中华民族;重塑;文明转型;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人口国民化

中图分类号:D6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23)06-0028-13

中国近代的民族国家构建于新中国成立而宣告完成时,中华民族也与现代国家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成为一个现代民族。在这样一种民族与国家相互嵌入、支撑和塑造的结构性关系中,国家的发展变化必然导致民族变化,民族的演变也会给国家的发展造成深刻的影响。党的十八大后,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提出,民族复兴逐渐成为时代的最大主题,尤其是民族复兴被确定为国家发展目标以后,整个国家的治理与发展皆围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展开。党的二十大作出的“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部署,更进一步突出了国家的建设与发展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间的联系。

民族复兴被确定为国家发展目标以来,随着党和国家推进国家治理与发展的一系列战略、方针和政策的实施,以及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强国建设与民族复兴的进程稳步推进,取得的成就越来越突出。在此过程中,作为复兴主体、发展主体的中华民族本身,也发生着一系列深刻和前所未有的变化。这样的变化涉及中华民族的整体结构、民族意识、内在机制、民族功能和外在形象等诸多方面。中华民族自身的一系列变化,反过来又对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进程产生直接的影响,从而与之形成一种互动的关系和过程。中华民族自身在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过程中发生这一系列的变化,实际上形成了一个中华民族的当代重塑过程。

中华民族自身的一系列深刻变化,对今天中国的历史、现代文明的塑造以及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都具有重要而深刻的影响。而且,这样的变化或重塑本身由时代和历史的多种变量造成,蕴涵着一系列的社会历史机制,变化本身也有多重或多个侧面的具体表现。今天,中华民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华现代国家建设中的民族问题治理研究”(22JJD810002),项目负责人:周平。

作者简介:周平,男,博士,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云南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云南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首席专家;郭志凯,女,云南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族的重塑还处于一个量变的过程中,量变积累到一定程度必然引起质变,其间蕴涵的一系列问题将更加突出。因此,对中华民族的当代重塑进行学理性的梳理和全面把握,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时代课题,也是有效推进民族复兴过程中必须作出明确回答的重大议题。

1 中华民族重塑是历史的必然

中华民族是一个以“中华民族”为称谓的庞大民族实体。同世界上的其他民族一样,作为稳定人群共同体的中华民族,也处于发展和演变的过程中,是一种处于变化过程中的客观存在。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民族’不是亘古既有的生物实体;它们是通过社会构建的,这个过程既是自下而上的,也是自上而下的。”^{[1]142} 中华民族在其演变的不同历史阶段,具有不同的本质、内涵、结构、样貌和特征。既然如此,对中华民族的认知和理论论述,也必须以发展的和历史的的眼光来看,只有这样才能准确把握中华民族演变和发展的内在逻辑。中华民族有五千多年的历史,其演变和发展中所具有的内涵的丰富性和变化的复杂程度,都超过了世界上的其他民族。这需要作为一个学科的中华民族发展史来进行详细研究,才能作出全面而准确的回答。站在今天的历史方位上看,概括地看待和描述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可将中华民族的演进大致划分为三个大的阶段。

1.1 第一个大的阶段是中华民族的古代存在阶段

今天的中华民族,即作为一个现代民族的中华民族,是由历史上中国疆域内众多民族群体在持续互动中逐步凝聚而演变过来的。中国悠久的历史为中华民族的历史演变和发展注入了丰富的内涵。

中国自古以来便拥有广大的疆域,在这辽阔且内部的区域差异明显的疆域内生活着众多的民族。如此众多的民族在按民族内在规律而自我演化的同时,相互之间也进行着持续的互动,乃至激烈的竞争。“竞争的胜利者,走向发展和强盛、文明;竞争的失败者走向了没落直至消失。”^{[2]22}

这样的互动乃至竞争,有两个根本的因素在其间发挥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一是皆围绕着一个强大的中原王朝或中央王朝而进行,也包括不同民族对这个王朝政权的争夺和控制,因而基本上是在这个强大王朝的框架下进行的。虽然这个王朝也有分裂,分分合合乃历史之大势,但总体上看是以合即统一为主,且分裂后再度统一时王朝的疆域会更大。因此,各个民族的互动就一直存在着一种“合”的力量,从而使各个民族或这样的民族间的互动有了特别的内涵,即在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中朝着合为一体的方向发展。二是以汉族为核心。费孝通对此作过专门的论述,他说:“汉族的形成是中华民族形成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在多元一体格局中产生了一个凝聚的核心。”^[3] 在这样一个以汉族为核心的众多民族群体的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各个民族之间形成一个常常以“滚雪球”来形容的凝聚过程。其间,“许许多多分散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3]。

1.2 第二个大的阶段是中华民族的现代构建阶段

正是经过了这样一个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尤其是民族国家构建的背景下形成的现代构建阶段,中华民族具有了明确的族称和今天的形态,成为一个与中华现代国家有机结合并具有突出

国家内涵的民族实体。

对于中华民族演变和发展来说,“中华民族”不仅是一个概念,它更是一个民族的称谓即族称,同时也是民族成员认同从而凝聚成为一个整体的符号。对于中华民族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实体并从自在到自觉的转变来说,“中华民族”这个称谓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是实现中华民族由古代存在阶段到现代构建阶段转变的质的飞跃不可缺少的环节。

但是,在中华民族处于各个民族群体交往交流交融并朝着一体方向演进的古代存在阶段,这样的族称并不存在。这样的族称是在古老的中国于19世纪末出现了民族国家议题^[4],以及与民族国家相关的一系列概念被引入中国的背景下才逐渐形成的。1902年,梁启超率先提出“中华民族”概念,开始的时候用来指汉族,随后又在“大民族主义”与“小民族主义”之论辩的基础上,形成了中华民族乃国内诸族结合而成的大民族的定义,使“中华民族”有了与今天相当的内涵,从而为中华民族的现代构建提供了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

辛亥革命终结中国延续数千年的王朝国家历史之后,中国开启了现代国家构建的进程。其所构建的现代国家,就是最早在欧洲以取代王朝国家的方式出现的民族国家。这样的国家不仅具有国家与民族结合的本质,也形成了一套体现由此而确立的国家伦理的国家体制。民族国家一套完整地体现“主权在民”原则的国家伦理的体制机制,皆建立于一元性的国民权利之上,从而便形成了或具有了由全体国民构成的民族的基本特征。构建这样的民族国家,回应了以一个民族实体存在的中华民族的内在需要,从而促进了中华民族的现代构建。

于是,在中华现代国家构建的进程中,中华民族便在古代存在形态的基础上开启了现代构建的进程。一方面,中国人在由王朝国家的臣民而转化为现代国家之国民的“人口国民化”进程中,逐渐成为具有国民身份的个体的同时,又在统一的国家框架和“中华民族”的族称下凝聚为一个整体,从而成为一个由全体国民构成的中华民族。另一方面,中国历史上的众多民族群体在近代的民族构建中,实现了从“××人”到“××族”转变的同时,又在统一的国家框架和“中华民族”的族称下凝聚为一个整体,从而成为多族聚合体意义上的中华民族。这样由两条相互交织的路线推进的中华民族现代构建^[5],将中华民族的历史演进推向了新的阶段。

新中国成立之时,中华民族的现代构建也宣告完成。由此形成的具有“全民一体”和“多族一体”双重属性的民族实体——中华民族,与经过长期努力而构建起来的中华现代国家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具有了国家的形式,成为 nation-state 之 nation。因此,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时发出“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的庄严宣告的同时,也向全世界宣告,“我们的民族已经站起来了”^①。

1.3 第三个大的阶段是中华民族的当代重塑阶段

今天,中华民族当代重塑已经形成并持续地推进着。这样的当代重塑,将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尤其是随着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而持续进行。这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并将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面实现之时而宣告完成。中华民族也将在这

^①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发表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的著名讲话,在宣布“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的同时,还宣布:“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参见:毛泽东. 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M]//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 毛泽东民族工作文选.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样的重塑过程中发生深刻而根本性的变化。

中华民族完成现代构建时,支撑起整个中华现代国家大厦的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的东方,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样的事实毋庸置疑,得到了新中国从政府到社会、从学者到百姓的广泛认可,大家都为这样的伟大创举而欢欣鼓舞。但是,在这样一个新兴国家内继续存在的各民族,尤其是经过近代的民族构建而增强了自我意识的少数民族,被历史所凸显并受到了极大的关注。它们之间的关系尤其是以民族关系中矛盾和冲突为主要内容的民族问题,成为新国家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各级政权并实现政治制度的统一,从而完成国家整合的过程中必须认真面对的一个根本问题。

在应对迫在眉睫的各种民族问题的过程中,国内各民族尤其是少数民族一再被提及和强调,并在相关的学术研究、政策的制订和实施,以及社会关系协调和意识形态的论述中占有重要地位,以至于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中,“民族”一词与少数民族之间形成了根深蒂固的联系并被固化,而汉族、中华民族与“民族”概念之间的联系在一定程度上被淡化。在组成中华民族的各个单元尤其是少数民族被一再强调,作为整体的中华民族很少提及的情况下,中华民族被“虚化”的问题便出现了。正如有学者指出,“把‘民族’这个核心概念定位在 56 个‘民族’这一层面,其客观结果是架空和虚化了‘中华民族’”^{[6]35}。

面对这样的状况,费孝通 1988 年到当时尚未回归的香港中文大学发表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演讲。随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传回内地,尤其是该演讲于 1989 年在《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发表后,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民族实体的理论再次凸显于党和国家的理论与社会大众的视线中。在这样的学术和思想氛围中提出的中华民族是与中华现代国家有机结合在一起的国家民族的观点和论述,进一步巩固了中华民族作为一个现代民族和民族实体的理论。

今天,正在展开的中华民族的当代重塑,将进一步夯实中华民族作为民族实体的根基,丰富中华民族的内涵,强化中华民族的意识,彻底改变此前长期存在的中华民族虚化、松散化、凝聚力下降的状态,极大增强中华民族的内聚力和整体性,从而凝聚起更大的力量,焕发出更大生机,具有崭新的面貌。

2 中华民族重塑中的影响变量

中华民族的当代重塑,是中华民族演进和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中华民族的现代构建与中华民族的古代存在形态一脉相承,在各个民族群体交往交流交融并朝着一体方向演进的基础上进行,并通过现代构建赋予古老民族以时代内涵,把中华民族的演进和发展推到一个全新阶段。在中华民族已经成为现代民族的基础上,促成中华民族朝着更具内聚力、整体性以及更具活力的方向发展,不仅能为民族复兴提供强大支持,而且会在与世界其他民族的交往中对人类的历史和命运贡献更大的积极能量。

中华民族的这样一种深刻而巨大的变化,固然是每个中国人的美好愿景,也是党和国家各种战略和政策推动的结果,其间的主观能动性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这样的宏大历史进程绝不是主观愿望的产物,而是这个时代多种力量共同促进的结果。其间的影响变量多样而复杂,涉及中国今天社会生活的每一个具体的领域。不过,以下几个方面显得十分突出,构成了中

华民族当代重塑的主要影响变量。

2.1 文明转型的力量

作为一个由众多的人口和民族群体凝聚而成的庞大民族实体,中华民族在历史上的演变和发展,以及现代构建和当代重塑,皆在一个宏大的文明发展的基础上进行。这样的文明的演变及其形态转化,不仅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和演变提供了最深厚的背景,而且这样的文明演变和转型也构成了巨大的历史性力量,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塑造提供着强大的推动力。

在中国传统的农业文明阶段,生活在差异较大的不同区域的人们,在多样性的生产、生活和交往方式的基础上创造了不同的历史和文化,并由此凝聚为不同的民族群体。中国历史上生活于中原地带的人群及其所造就的传统农业文明分布广泛、体量巨大且发展水平较高,对生活于草原或山地的游牧和狩猎文明产生了影响力和吸引力,于是便促成各个民族群体以汉族为中心而交往交流交融,在一种核心力量和向心力的影响下朝着一体化的方向演变。

到了近代,古老的中华民族受到现代工业文明的影响,接受了民族国家体制并构建自己的民族国家,进而在推动国家工业化的背景下,开启了自己的现代构建进程。在此过程中,中华民族由众多民族群体交往交流交融而成,各民族朝着一体方向演进并发展成为具有“中华民族”族称的一体化的中华民族,从而促进了中华现代国家的构建。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现代化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持续有效地推进,促成了中国社会全方位和实质性的改变。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达到全球第二位,不仅极大地提升了国家的综合国力,根本性地改善了人民生活,而且实现了整个国家由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转型。于是,在传统农业文明基础上形成的刻画国内众多民族群体基本特征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逐渐被现代工业文明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及交往方式所取代。这样一种建立在现代工业文明基础上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促进了全体国民和各个民族朝着增进共同性和凝聚力的方向发展,从而形成了一股推动中华民族当代塑造的不可抗拒的文明力量。

2.2 民族复兴的力量

在文明转型已经实现的背景下,党中央根据历史条件的变化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随着“中国梦”被广泛地传播和接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不仅成为人民共识、国家共识和民族共识,而且演变为牵引或引导党和人民共同努力的宏伟目标,孕育并蕴涵着巨大的社会政治能量。

党的十九大不仅把“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列入会议主题,而且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新时代的基本特征,进而提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于是,就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的基础上,增加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表述。较之强国建设的目标来说,民族复兴是一个文化性、历史性、道义性的目标表述,具有浓厚的中国文化特色,二者结合就使得国家发展目标的表述更加充实、更加丰富、更具动员力和感召力。党的二十大又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党和国家的工作和全国人民的奋斗提供了一个更加强有力的目标指引。于是,整个国家的治理和发展便围绕着民族复兴的目标而全面展开。

民族复兴成为国家发展目标并发挥引导作用的事实表明,国家治理和发展的全部工作皆围绕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进行。因此,国家治理和发展所产生的实际变化与所取得的成

果,皆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具体表现。而这样一系列的民族复兴的实际表现和成果,正是促成中华民族自身在此过程中发生深刻变化和重塑的巨大力量,即民族复兴的力量。

2.3 政策推动的力量

在强国建设与民族复兴有机结合的宏大目标指引下,以及由此形成的发展总体框架中,党和国家推出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推动着国家发展目标的实现。这些政策措施在促进国家治理和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作用的同时,也为中华民族的当代重塑注入了强大的政策推动力。

一方面,党和国家在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彰显了通过更加有效的治理来应对国家发展中各种问题的决心和意志以后,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而推出了一系列解决现实问题尤其是发展难题的重大决策。在不长的时间内推出的这些政策措施,所体现出的意志之坚强、政策的涉及面之广泛、政策的力度之大以及对资源的动员和调动能力之强,都是前所未有的。这样的政策措施在促进现代化的深度推进以及国家的整体发展的同时,也直接导致了中华民族自身的一系列改变,推动了中华民族的当代重塑。

另一方面,党和国家在推进国家治理和发展的同时,也在调整国内民族关系方面推出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其中最为重大的便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部署。这一部署不仅为民族工作确立了主线,而且为全国人民形成共同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指引。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立足点,为培养和增强各民族之间的共同性而出台的政策,凸显了民族工作在增进共同性基础上进行调整的同时,也对民族工作进行了强有力的推进和全面的改进。这样一系列体现新的政策取向、内容丰富而又体系化的政策措施,不仅对作为中华民族之组成单元的56个民族的演变和发展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也对新中国成立以来通过有效的民族问题治理而塑造的国内民族关系进行了深刻和实质性的调整,推动着中华民族朝着更具凝聚力和整体性的方向发展。

2.4 中华文化的力量

对于由历史上众多民族群体凝聚而成的、具有复杂内部结构的庞大民族来说,由各个民族共同创造、共同享有且各自也受其影响的中华文化,对中华民族的形成、演变和发展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和深厚的。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在长期演变和发展的过程中,不仅形成了儒家文化的主导或核心地位,也融入了处于交往交流交融中的各个民族的优秀文化,是众多民族群体共同创造和共同努力的结果。这样的文化形成以后,又对各个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并朝着一体化方向发展产生了推动作用,增强了各个民族之间的凝聚。历史上的各个民族之所以形成交往交流交融并朝着一体化方向发展的格局,中华文化在其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中华文化在近代与西方文化的激烈冲撞中,尤其是受到五四运动中的科学、民主精神的影响,借鉴和吸收了与工业文明结合在一起的现代文化,促进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涵化和现代变革。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创造的革命文化、新中国成立后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先进文化,也深深融入中华传统文化中。中华传统文化因此而进行了重塑和现代转型,进一步增强了文化的内涵、活力和影响力。中国改革开放后之所以能推进现代化持续而快速地发展,创造了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奇迹,就与中华文化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这样一种内涵丰富并充满活力的中华文化,对中华民族在文明转型和民族复兴中所形成的

当代重塑,也发挥着突出而重要的影响,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民族之魂,不仅为中华民族的当代重塑提供了一种强大的推动力,也为这样的重塑提供了价值指引。

3 中华民族重塑的主要表现

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积淀深厚、内涵丰富、结构复杂的庞大民族实体,中华民族的当代重塑,是一个涉及中华民族每一个具体面向、具体方面的整体性的变化。但是,从总体上看以下几个方面的变化显得尤其突出和重要,体现了中华民族重塑的深刻内涵。

3.1 内部结构的优化

今天的中华民族即作为一个现代民族的中华民族,同世界近代以来形成并以 nation 指称的其他民族一样,是一个与现代国家有机结合的人群共同体。这样的民族具有突出的国家属性,是现代国家真正的主权者^①,但归根到底是一个人群共同体。而作为一个稳定且复杂的人群共同体,就不可避免地具有内部结构。民族的内部结构的状况,既是该民族的本质内涵之所在,也决定着这个民族的整体面貌。

现代民族,即 nation-state 之 nation,在法国大革命中经由《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而确定其历史地位时,就是一个由全体国民组成的国民共同体。“在当时,‘民族’即是国民的总称,国家乃是由全体国民集合而成。”^{[7]21}因此,民族国家的“整个主权的根源本质上在于国民”^{[8]84}。这样一种国民共同体意义上的民族,支撑起了现代国家一整套体制机制,因而才成为不同于人类历史上广泛存在的历史文化共同体意义的传统民族的现代民族。中国在辛亥革命推翻了最后一个王朝,并按民族国家的国家伦理和体制规范而构建现代国家的过程中,也通过人口国民化的进程塑造国民,进而通过国民整体化而构建了国民共同体意义上的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因而具有全民一体的基本属性。

但是,中国历史上本来就存在着众多的民族群体,在中华现代国家构建过程中形成的所有国民也分属于不同的民族群体。这些民族群体在近代的民族构建进程中,由“××人”转化为“××族”的同时,又延续了历史上交往交流交融并朝着一体方向演进的逻辑,在“中华民族”的族称下凝聚为一个有机整体,从而形成了多族聚合体意义的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因此而具有“多族一体”属性。

中华民族在当代重塑的过程中,不论是作为国民共同体来看,还是作为多族聚合体来看,其内部结构都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一方面,所有的国民由于自身的权利得到有效保障,因而加强了对中华民族认同,并增强了国民之间的团结,从而提升了国民共同体的凝聚力和整体性;另一方面,组成中华民族的56个民族,在民族团结的基础上增进了内在的凝聚力,增进了共同性,从而提升了多族聚合体的凝聚度和整体性。这样两个方面变化的形成和持续进行,便促使中华民族的内部结构得到前所未有的调整和优化。

3.2 民族意识的提升

民族意识是人们对自己归属于某个民族的意识。梁启超说:“何谓民族意识?谓对他而自

^① 正是由于 nation 是现代国家真正的主权者,具有突出的国家属性,可与 state 互换,所以联合国就表述为 United Nations。

觉为我。”^[9]民族意识成为维系和巩固民族共同体的基础性力量,以及推动民族自强不息、奋发有为的精神力量。民族意识的状况,也体现着一个民族的特点和发展水平。在中华民族的演变和发展的过程中,民族意识的演变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

中华民族意识的内容十分丰富,包括中华民族的自我意识、分界意识、命运意识、团结意识、奋进意识、发展意识,等等。但归根到底,就是中国人对中华民族的认知、信念、情感和进一步的想象,核心是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和进一步的想象。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意味着中国人对中华民族的接受、认可和归属感,这是中华民族形成和稳定的基本条件。但是,如安德森所说,民族“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10]。因此,中华民族的维系还需要中国人以及国内各个民族的进一步的想象。正是通过进一步的想象,民族认同得以在一个动态的过程延续。因此,“认同”和“想象”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得以维持、巩固和发展的基本支点,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内容。

中华民族在当代重塑的过程中,尤其是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求的指引下,一方面,每个中国人或国民,在发自内心地增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和归属感的同时,也增强了对中华民族的进一步想象,把今天的中华民族认同进一步延续下去;另一方面,各个民族尤其是少数民族成员,在认同各自所属民族的同时,也增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并将对中华民族的认同通过进一步想象的方式而得以延续。每个中国人以及56个民族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和进一步想象的不断提升,必然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一步增强,进而促成中华民族内在属性的重塑。

3.3 整体功能的增强

作为稳定的人群共同体,民族在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形成,其在形成和演变过程中生成的各种机制也沉淀下来,包含民族形成的内部机制。这样的内部机制所蕴涵的能力也就成为民族的功能。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的历史,又在现代构建中成为一个现代民族,也蕴涵着丰富的机制和功能。这样的功能对国家的治理和发展来说,都具有不可或缺的意义。

从对民族和国家的影响来看,中华民族的功能中有三个方面表现得最突出:一是国民塑造功能,即将人口个体塑造为国民的功能;二是人口组织功能,即国民个体整合或组织为整体的功能,也就是人口整合功能^[11];三是族际政治整合功能,即国内各个民族整合为一个整体的功能。从中国开启现代国家构建以来的历史来看,这些功能逐渐地形成和凸显,并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经由国民塑造功能,中国人褪去了臣民身份并获得国民身份,从而成为行为自主的积极的社会行动者,为现代国家、现代社会的构建提供基础性支撑;经由人口整合功能,分散的人口个体有了一种将它们整合为整体的组织形式,从而使历史上“一盘散沙”的状态从根本上得到改变;经由族际政治整合功能,国内各个民族结成一个统一的政治共同体,为国家的统一奠定了坚实基础。

今天,中华民族在当代重塑的过程中,这些功能都将进一步增强和优化,进而通过国民塑造功能,进一步塑造权利义务关系清晰的国民个体,为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提供更加积极、自主的社会行动者;通过强有力的人口组织功能,把全国人民进一步地组织起来,增强国民团结、增进国民共识,从而增强民族的整体力量;通过族际政治整合功能,把56个民族进一步整合为一个强大的政治共同体,为国家的统一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3.4 外部形象的改善

民族形象是民族的内在结构、内在素质、自我意识和结构功能的外在表现,也是其他民族对本民族的基本印象,对本民族与其他民族的交往及其所处的地位具有重要影响。一个民族要获得尊严、产生影响,一个好的民族形象是必备条件。但是,民族良好形象的形成或促进民族形象的改善,需要付出长期而持久的努力。

中华民族在演变和发展的历史上以众多民族群体交往交流交融并朝着一体方向演进形态存在的时候,文化意义上的“中华”以及中原王朝成为其意象上和实质上的代表,获得了泱泱大国、礼仪之邦、天朝上邦的美誉,形成了万邦来朝的效应。但是,在鸦片战争中面临建立了民族国家体制、开展了工业革命,从而建立了现代工业文明的西方列强激烈冲撞的时候,古老的王朝便完全处于颓势,“令外国谓以散沙”^[12],自己也有“中国四万万之众等于一盘散沙”^{[13]412}之讥,整个国家四分五裂、积贫积弱,日本帝国主义入侵时更是有了亡国灭种之虞。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中华民族完成了自己的现代构建,拥有了国家主权,终于站立起来了,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并通过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战胜了头号强国美国而树立了良好的形象。进而,中华民族又通过改革开放及其所推动的现代化的快速推进,创造了经济持续发展和社会持续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由站起来到富起来的飞跃,彻底改变了历史上贫穷和落后的形象,并形成了自己的发展道路,从而为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今天,中华民族在当代重塑中优化了自己的内部结构、增强了共同体意识和整体功能的同时,更是孕育了更加强大的能力,焕发出更大的生机与活力,进一步树立起凝聚力、竞争力、影响力突出的优秀民族的形象,展现出在悠久文明历史中涵养的独特风格和气质,并将赢得世界上其他民族的尊重。

4 中华民族重塑的重要意义

中华民族将所有的中国人包括在内,聚合了国内的56个民族,支撑着现代国家的大厦,因而是今天中国的历史主体、国家主体和时代主体。中华民族在当代重塑中所发生的各种变化,也将对整个国家和以国家为主体的各种进程产生深刻的影响,并对世界历史和人类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从而体现出中华民族当代重塑的重要意义。

4.1 中华民族的当代重塑为民族复兴的实现提供强大动力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经被确定为国家发展所追求的目标,在对整个国家的治理和发展具有牵引作用的同时,也要通过国家的治理与发展才能实现。这样一种以“民族复兴”来界定或表述的国家发展目标,蕴涵着对历史上曾经取得的辉煌的自豪,也表达了创造新的辉煌的坚定决心和意志。而且,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大国,中国在历史上创造的辉煌以及未来创造的新的辉煌,都是在与世界各国的比较中界定的。这样一种以国家为整体和全球比较意义上的辉煌,皆以中华民族为主体,因而与中华民族自身的状况息息相关。

自秦至清的整个王朝国家时代,在王朝国家框架内互动的各个民族群体充满了生机与活力,并以自己的勤劳、勇敢和智慧,创造了辉煌的农业文明,历史上许多个朝代的经济实力、财富数量和文化的灿烂都居于世界的前列。但是,近代面对创造了现代工业文明的西方民族的强力冲撞,古老的中华民族无力应对,国家沦为半殖民地,中华民族陷入了苦难的岁月。民族复兴成

为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

经过了一个半世纪的努力和奋斗,尤其是中国共产党诞生后带领人民所进行的艰苦奋斗,使中华民族战胜了帝国主义的压迫、入侵和围困,取得了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建立了新的现代国家。同时,通过改革开放推动了现代化持续而稳定的发展,从而增强了国家实力,改善了人民的生活,发展了科学技术,繁荣了整个民族的文化,中华民族在站立起来以后又走向了富裕,并进入了持续发展的稳定轨道。

在已经取得的成就基础上,中华民族开始了迈向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但是,中华民族经历苦难的时间太长,世界舞台的中央已经被西方强国占据,中华民族的复兴不仅面临着发展经济、政治、文化的一系列任务,而且面临着国家间关系刚性化背景下的激烈竞争,尤其是西方国家凭借早已实现现代化所积累的力量和控制的国际规则,对中华民族的复兴进行无底线的打压和围困。这样一种激烈的民族竞争,使中华民族再创新的辉煌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前进的道路上充满艰辛和险阻。

但是,中华民族在当代重塑中发生的一系列变化,尤其是结构的改善、民族意识的巩固、民族功能的增强,以及民族凝聚力、民族共识力、民族竞争力的提升,将为民族复兴注入新的力量,为民族发展提供不竭的动力,推动着民族复兴目标的稳步实现。换句话说,中华民族根据新的条件而进行的重塑,也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必要环节。

4.2 中华民族的当代重塑为国家的统一和稳定筑牢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中华民族的民族国家,其既有现代国家体制机制的内涵,也具有统一的政治共同体的内涵。中华民族自身的重塑,尤其是内部结构的优化和整体功能的增强,不仅为现代国家体制机制的完善和有效运行提供支撑,也能为国家共同体的统一提供支持,从而为中华现代国家的统一和发展筑牢基础。

中国自辛亥革命推翻最后一个王朝而构建现代国家以来,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而使中华民族与现代国家体制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之后,作为现代民族的中华民族,便与作为现代国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一方面,中华民族是中华现代国家真正的主权者,促成了“主权在民”国家伦理的建立并有效发挥作用,并且通过国民的一元性权利而为国家体制机制的构建提供基本依据和基础;另一方面,中华民族是由国内 56 个民族凝聚而成的整体,并与现代国家体制结合在一起而成为国家共同体,从而为国家的统一奠定基础。

中华民族与中华现代国家这样一种互构性关系表明,中华民族朝着更好方向的演进和发展,对现代国家体制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方面,中华民族在当代重塑中夯实国民身份和促进国民凝聚功能的增强,能够进一步丰富为现代国家提供价值原则和规范的国家伦理的内涵,为现代国家体制的完善和运行提供强有力的价值指引,同时也为现代国家体制机制的丰富和完善提供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中华民族将历史上众多民族群体演变而来的 56 个民族凝聚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并使这样的整体与现代国家合而为一,尤其是通过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各项行动巩固了各个民族之间的凝聚,为国家的统一提供了稳固的基础,并瓦解将差异性的地域演变为分裂因素的根基。

4.3 中华民族的当代重塑推动中华现代文明的构建

在人类文明发展的整体进程中,中华民族在历史上创造了自己独特的文明。亨廷顿也认

为,中华文明是区别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的基督教文明、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以及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的一种独特的文明^{[14]29-32}。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华民族在历史上创造辉煌,以及今天再创造新的辉煌,都是在一种独特的文明进程中实现的。因此,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就具有重构或重塑中华现代文明的内涵。

从文明演进的角度来看,中华民族在历史上创造了辉煌的古代文明。近代以来,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华文明受到了西方文明的强烈冲击,但中华文明的发展并未中断,而是在学习和借鉴西方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尤其是吸收其现代工业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强有力地改造或塑造了自己的文明机制。这使得传统的古老文明形成更大的生机与活力,并在现代化快速推进的过程中创造了新的文明成果,进而实现了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转型。其间,也包含着新形态的人类文明成果。

在中国已经完成文明转型的背景下,不论是推进强国建设还是实现民族复兴,都意味着推动中华现代文明的构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构建,也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样的中华现代文明构建,既包含中华传统文明的基本因素,也包含或体现着现代工业文明的最新成果,同时还是在与世界上其他文明和民族的激烈竞争中实现的。尽管这一进程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但其间遇到的挑战和阻挠也是前所未有的,因而更加艰辛和困难,需付出更大的努力。

中华现代文明的构建已经在逐渐且有序地向前推进,中华民族的当代重塑本身也是这样的文明构建的有机组成部分。作为这种文明之主体的中华民族的塑造本身,尤其是此种塑造所取得的积极成果,反过来又为这样的文明构建提供强大的动力,推动着这样的文明构建不断地向前发展。

4.4 中华民族的当代重塑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支持

作为一个全球性大国,中国的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都是在全球格局中谋划和实现的。中国的发展和中华民族的复兴,也给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注入新的能量,并通过自己的发展和复兴而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这样一种将自己的利益与整个人类命运结合在一起的发展方式,不仅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天下观和“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传统美德,也体现了中华民族博大的胸怀。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体现了人类的根本利益和价值,得到世界上许多国家的认同、支持和拥戴。但是,这样一种可能促成新的世界格局塑造的理念和机制,也受到了西方国家明里暗里的阻挠。这些国家凭借自己的先发优势,不仅使自己在世界格局中占据了有利地位,从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而且企望进一步维持和发展这样的格局,因而不仅对中国的发展和民族复兴采取排斥的态度,而且也对不利于或有损于它们所建立的世界格局的努力和进程进行阻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在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和中华民族的努力。

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中承担着特殊责任的中华民族,由自身在复兴的过程中发生的一系列变化所形成的自我重塑,尤其是在这样的重塑过程中形成的新品质,包括自己的内部结构、整体功能及外部形象的改善,都会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产生直接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华民族的当代重塑在可能发挥政策能动性的范围内,也应该将中华民族的重塑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结合起来谋划,并采取有效的措施来加以推动,从而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5 结语

中华民族在自己的演进和发展中,从来都与自己国家的命运具有紧密的联系。尤其是当国家在发展的进程中,形成或出现了必须以中华民族整体来承担国家建设或发展责任的情形,即中华民族本身的状况直接关乎国家的建设和前途的时候,中华民族自身都会在回应历史呼唤的过程中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形成中华民族的塑造过程,并以这样的民族塑造来承担和回应历史的责任,促进国家建设和发展目标的实现。

鸦片战争后,在国家沦为半殖民地的境遇下,中国人在探求救亡图强道路的过程中,选择了构建现代国家即民族国家的发展道路。于是,中国人便引进民族观念、创造“中华民族”的族称,推进了中华民族的现代构建。在辛亥革命终结历史上延续了数千年的王朝国家,并开启中华现代国家构建的进程后,中华民族更是以自己的现代构建来为这样的现代国家构建提供支持。在日本帝国主义入侵而使国家面临亡国灭种危难的时候,中华民族又通过加速凝聚而汇聚和激发整个民族的力量,最终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继而推翻了国民党政权,建立了中华民族的现代国家。

今天,历史发展不仅再次将中华民族与整个国家的内在联系凸显了出来,而且要求以整个民族的整体性变化来为国家发展目标的实现提供支撑,从而把中华民族自身的变化,尤其是整体性塑造的问题凸显于历史舞台之上。中华民族自身的变化与整个国家的发展和前途的联系前所未有地紧密。因此,中华民族便以自身的全面变化而体现的整体性塑造,来回应历史和时代的需要。中华民族的当代塑造,既是历史上尤其是中华民族现代构建过程中自身塑造进程的延续,而且具有此前不曾有过的内涵和特点,具有突出的时代性。

正在展开的中华民族的当代重塑,由若干的因素或条件所导致,其间不乏由党和国家的政策尤其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所体现的历史主动性。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样一种由中华民族自身的一系列变化所构建和勾勒的“民族塑造”,总体上仍处于自在、自发的状况。对其所作的分析和论述也落后于中华民族自身变化的实践进程,通过全面的政策引导而推进这样的民族塑造的框架和机制尚未真正形成,中华民族的重塑进程与时代的要求或期待之间尚有差距。如果在国家层面形成或推出相关的政策指引来加以推动,将会对中华民族的当代重塑产生更加积极的影响,进而为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注入更多的能动性力量。

参考文献:

- [1] 弗朗西斯·福山. 身份政治:对尊严与认同的渴求[M]. 刘芳,译. 北京:中译出版社,2021.
- [2] 王钟翰. 中国民族史[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 [3] 费孝通. 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4):1-19.
- [4] 周平. 中华现代国家构建中的人口国民化[J]. 江汉论坛,2020(12):5-15.
- [5] 周平. 中华民族的现代构建及其意义[J]. 社会科学研究,2021(6):1-9.
- [6] 马戎. 中国民族关系现状与前景[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 [7]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 民族与民族主义[M]. 李金梅,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 [8] 郭华榕. 法国政治制度史[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 [9] 梁启超. 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二[M]. 北京:中华书局,1989.

- [10]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M]. 吴叻人,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 [11] 周平. 中华民族的人口整合功能[J]. 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2023(1):89-104.
- [12] 上海强学会章程[J]. 强学报,1895(1):11-17.
- [13] 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 孙中山全集:第6卷[M]. 北京:中华书局,1985.
- [14] 塞缪尔·亨廷顿.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 周琪,等译. 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

Contemporary Reshaping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Its Significance

ZHOU Ping, GUO Zhikai

(*Institute of Ethnic Politics,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650500, China*)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China's transformation from traditional civilization to modern civilization,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has not only facilitated a series of profound changes in the country and society, but also inevitably led to a series of changes in the Chinese nation itself, thus forming the contemporary reshaping of the Chinese nation. As a result, the evolu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has entered the contemporary reshaping stage after going through two stages of ancient existence and modern construction. In the process of contemporary reshaping, the Chinese nation has undergone a series of fundamental changes, such as internal structural optimization, national consciousness elevation, overall function enhancement, and external image improvement, gradually becoming an excellent nation respected by other ethnic groups around the world. At the same time, the contemporary reconstruc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will also demonstrate its value in the process of having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 realization of national rejuvenation, national unity and stability,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Key words: Chinese nation, reshaping, civilization transition, great power construction, national rejuvenation, nationalization of population

责任编辑:赵 超

民族复兴视域下中华民族主体性的建构逻辑

张淑娟

(大连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辽宁 大连 116024)

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话语政治地位的确立为中华民族主体性的历史性反思和建构提供了宏大视野。实现民族复兴是接力跑,民族复兴从高度、宽度和时间跨度上全面彰显中华民族主体性。因此,学术界一般认为二者是同义语。实际上,主体性是民族的生命自觉,不光看重向外呈现的主权独立、平等、利益和尊严等方面,同时应关注向内反思的文化特质、实际境遇和民族精神等方面,更应注意内外部的同步和协调,外在呈现应是向内反思的自然呈现。中华民族主体性建构,首先是其文化主体性的内涵建构,完成中华文化的连续性、整体性和内聚性的历史书写,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持续为中华民族主体性提供精神标识;从不同历史时期的实际境遇出发是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建构的基本原则;民族精神则是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建构的精神动力,应加强民族精神的凝练和培育。其次是在坚持中华民族主体地位前提下,进一步完善其内部主体性的层级构筑。最后是在新时代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同时,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探索实现“自由的超越”之路,为建构全人类共同价值积极贡献力量。

关键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华民族主体性;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华文化

中图分类号:D6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23)06-0041-12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共同梦想,是接力跑。“民族复兴”实现了从词汇到概念、从思想到话语、从理论到行动,最终成为现实和继续前行旗帜的转变。民族复兴具有丰富内涵,能够概括近代以来波澜壮阔的中国历史。中华民族主体性是在中华民族复兴历程中孕育成长的,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过程就本质而言正是中华民族主体性不断提升和确立的过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提出来源于文化自信,而“文化自信就来自我们的文化主体性”^[1]。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最新呈现。因此,在中华民族传统文明的基础上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过程,同样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也是中华民族主体性不断生长、建构的历史过程。

目前,关于中华民族主体性的研究主要聚焦以下几个方面。从内涵看,中华民族主体性的叙事逻辑建立在世界历史坐标上,具有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统一的特点^[2]。从主导力量看,中国共产党形塑了现代性意义上的中华民族主体性^[3]。从动力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动了中华民族主体性的重建进程^[4]。从建构路径看,基于包容中华民族的结构张力、落实民族平等原则等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共产党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百年历程与基本经验研究”(21AMZ002),项目负责人:张淑娟;北方民族大学国家民委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基地项目“‘第二个结合’与中华民族主体性研究”(23BF001),项目负责人:张淑娟。

作者简介:张淑娟,女,博士,大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方民族大学国家民委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基地研究员。

方面推进民族共同体的建构^[5]。从内部结构看,少数民族主体地位的确立是其国家认同建构的基础,通过少数民族主体身份培育来强化其国家认同^[6]。总体来看,学术界鲜有将中华民族主体性与民族复兴相结合的研究,因而需要将中华民族主体性的成长融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大叙事中来理解。民族复兴由内到外的展开同中华民族主体性向内反思与向外展现两个方面的呈现相契合。民族复兴从高度、宽度和时间跨度上全面彰显中华民族主体性的生长,而主体性的彰显既是认知不断深化、实践领域不断扩展的过程,又是中华民族实力不断显现的过程。中华民族主体性的建构又不断确证并助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因此,加强中华民族主体性的研究能进一步丰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涵,也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奠定理论基础。

1 中华民族主体性的现代意涵与主题演变

中华民族演进史就是中华文明的发展史,中华民族创造了中华文明,而中华文明滋养了中华民族。主体性作为中华民族从自在到自觉、从自觉到自信的重要标尺,在其演进的不同历史时期社会主要矛盾决定了中华民族主体性历史主题要不断转变。实际上,民族主体性又是近现代国际政治生活的产物,因而民族主体性的现代意涵是讨论中华民族主体性的基础。

1.1 民族主体性的现代意涵

主体与客体相对应,是指个人或群体在关系中处于能动性地位,体现能动的价值关系,并在与客体关系中获得自身规定性。主体性是人作为主体的价值特性,“主体性就是主体谓之主体的特性,也是主体谓之主体的根据和条件”^{[7]259},主体性建构了主体。主体性是能动性的标志,意味着特定主体在社会关系中的优势与主动。自为的自律性、自觉的能动性、自由的超越性^{[7]259-264}共同成就了作为主体的能动价值存在。在现代语境下,主体分为个体主体、群体主体和类(人类)主体,因而存在着对应的个体主体性、群体主体性和类(人类)主体性。无论哪类主体,其主体性都从内外两个方面呈现出来,不仅有内在的反思,也有向外的关照,二者相互影响、互动统一。

民族主体性是群体主体性的一种,指某个民族成为主体的特性,或者一个民族成为主体的条件和依据。从向外呈现的视角看,民族主体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主权独立。主权是现代民族国家独立存在的基本标志,“构成最高仲裁者属性的权力或权威,这类仲裁者对作出决策以及解决政治体系内的争端具有某种程度的最终权力。能够进行这种决策意味着对外部力量的独立性和对于内部团体享有最高权威或支配权”^{[8]725}。拥有主权意味着能够根据民族和国家利益自主作出决策,并能够承担决策产生的相应后果,在国际社会享有独立地位,对内享有最高权威。二是自觉能动性。民族主体性的鲜明特征是具有主动性,特别是后发民族能彻底从“挑战一应战”的被动模式中走出来,在处理内外事务时能够科学预测、准确施策、主动应对。三是对前两者的统一与超越。根据自身发展需要主动作出选择,并在关注自身发展的同时,还要具有前瞻性,关注人的“类本质”及全人类的命运。

从向内反思的视角看,民族主体性主要呈现为民族的自我意识。民族的自我意识要依托自身的历史和文化并通过与其他民族的比较而产生,是对自身的肯定与关照。这种自我意识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对自身历史演变规律有认识和把握。从历史、理论和实践三重逻辑的契合中把握当下,并以当下的实际状况作为选择和行动的基础。二是尊重自身的文化传统。在历

史发展的逻辑中证明当下选择的正当性,以自身所构建的传统规定自身的存在价值,在传统中彰显与他族的区别,呈现自身的文化认同和身份归属。如此,“有了文化主体性,就有了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文化自信就有了根本依托”^[1]。三是每个民族都用不同方式解释自我的存在。其核心表现为民族精神,个体生命的意义渗透并存在于民族精神之中,个体的主体性渗透并存在于民族群体的主体性之中。在多民族国家,单元民族的主体性同样渗透并存在于国家层面的民族主体性中,个人生命的意义与单元民族的价值都在民族精神的滋养中获得绽放。当然,对国家(或国家层面的民族)的认同建立在对个体和单元民族主体性内在价值的肯定基础之上。一个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中获得主体地位要经过艰难复杂的历史蜕变,但已经获得主体性的民族一定是成熟理性、开放包容、内外兼修并富有主动性、有远见和担当精神的民族。

本文所讨论的民族主体性是民族主体地位的达成,是民族演进的“饱和”状态,即一个民族正常演进进入现代阶段后的结果或应然状态。这种状态可用化学实验术语“浓度”来形象地表达,即液体的“浓度”要达到适宜的程度,即达到或接近饱和状态。“主体”与“主体性”既是描述性概念又是规范性概念,规范性概念具有鲜明的价值指向,标明道德原则和道德理想,内含应该、必须等指向,表达一种理想和趋势,可用来限制或促进某种行为。“新的概念具有明显的开放性和目的性,语义中融合了经验、期待和过程。”^{[9]169}可见,此类概念在使用时不仅涉及事物的应然状态,更牵涉实然状态,从实然到应然的过程可以理解成概念“浓度”不断提升的过程。而完成“主体”“主体性”从实然到应然之路显然比表示溶液构成的“浓度”概念复杂得多,但可通过此比喻形象地呈现概念背后复杂的历史发展过程,也能在对历史的深入研究中把握概念巨大的概括能力。中华民族“主体”“主体性”从实然到应然的过程正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从词汇到概念、从思想到现实的伟大实践。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则从高度、宽度和时间跨度上全面彰显中华民族主体性的提升。

当然,讨论民族主体地位的获得和主体性的确立并不意味着用静态或静止的视角去分析如此鲜活的人类现象。主体和主体性都具有相对性和过程性,从当下国际关系的视角看,民族的主体地位和主体性是一个无限提升的历史过程。本文借用自然科学的“浓度”和“饱和”概念,来形象地呈现中华民族主体地位和主体性提升的过程性和无限接近的状态。

1.2 中华民族主体性主题的演变历程

中华民族主体性属于群体主体性。将中华民族置于几千年的历史中观察,其主体性显然是动态的,在其演进的不同阶段,主体性蕴含的时代主题也不断变化。在近代之前中华民族处于相对封闭的自在阶段,如果以民族主体性现代意涵中向外呈现的核心内容——独立性——作为判断标准,主体性不言自明。本文所讨论的中华民族主体性是基于现代语境的分析,因而近代之前的历史阶段不是本文讨论的范围。但近代以前的中华民族为后世留下丰厚的历史遗产,为中华民族主体性的确立提供了物质基础、文化资源和心理基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我们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我们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我们伟大的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10]4-6}。近代之前的历史阶段可理解为中华民族主体性的潜在阶段,中华民族主体性的现代意涵就是在这一漫长的历史阶段逐渐涵养起来的。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文化自信就来自我们的文化主体性。这一

主体性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中国大地上建立起来的;是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通过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建立起来的。”^[1]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主体性历史主题经历了独立性阶段、现代性阶段,而这两个阶段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历和完成的。

进入近代,中华民族主体性以追求民族独立的方式表现出来。这一阶段围绕如何实现中华民族主体性展开争论:是依靠以地缘与血缘为基础在历史上累积下来的文化传统,在传统文化中寻找出路;还是借助来自西方的理论改造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这两种方案并非替代性关系,前者为民族独立提供民族自信心,后者则为民族独立指明现实道路。对中华民族的肯定性认知是中华民族能够走上独立的前提,即“危机即转机”。因此,在实现民族独立的过程中提出“民族复兴”话语就顺理成章,这一话语的提出本身就反映出对中华民族主体地位的渴望。近代中国各种社会力量为实现民族独立前仆后继,既有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等政治努力,又有“保国”“保教”“国粹”“国学”“中国文化的复兴”等文化抗争,还有从“商战”到“实业救国”的经济探索。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实现了民族独立,中华民族以现代国家形式登上国际舞台。新中国成立后,中华民族主体性呈现为现代性,通过现代化建设以满足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主体性的要求。但中国现代化进程又不同于西方国家,“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早发内生型的西方现代化道路有着本质的区别”^[11]。现代性包含极为丰富的内容,不仅包含社会行为的理性化、社会治理的科层化、公共生活领域的自律化、公权力的规范化和制度化,还包含精神生活领域的理性、科学、契约、信任、自由、自我意识、社会参与意识、创造性和批判精神等。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初步探索、实行改革开放、中国式现代化的提出都是不断提高中华民族主体性“浓度”的历史过程。同样,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两个结合”、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等的渐次提出都是中华民族主体性成长的重要标识。可见,中华民族主体地位的确立不仅包含向外展现,更包含自我反思和成长,是不断丰富历史过程。

2 民族复兴视域下中华民族主体性构建的历史契机与现实反思

“民族复兴”话语的提出是中华民族主体性现代意涵建构的逻辑起点。民族复兴具有丰富的内涵:中华民族复兴具有过程性,是事实,是认识,是对中华民族发展趋势的认识、判断及其话语表达;也是一种实际行动,当然更是对中华民族发展趋势的生动描述和美好期待。毫无疑问,民族复兴代表了一种连续性的探索和努力,为中华民族主体性研究提供了宏大视域。以“中华民族”概念为核心的话语体系的生成与演进构成了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主轴,为不同时期的国家构建提供了合法化基础。“中华民族”话语体系是对中华民族的整体性认知和利益为思想基础的现实表达。“中华民族”话语体系包含一系列相关话语,这些话语均建立在“中华民族”整体性思维基础之上,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华民族大家庭”等。其中“民族复兴”与“中华民族”的提出都以近代严重的民族危机为背景,“民族复兴”话语经历了由以民族独立与解放为核心的话语、以富强为核心的话语、以振兴为核心的话语到以圆梦为核心的话语流变,中国人

民从寻梦、追梦到圆梦的历程被全景展现。

“民族复兴”话语的提出与构建,是对民族主体性的确认与肯定,也是对民族主体性的回归与强化,更是对民族主体意识的不断唤醒。“民族复兴”话语构建的内在逻辑不断彰显中华民族主体性的回归与高扬。“一般而言,社会科学概念的政治化指其从学术圈、学术文本中走出,被政治领导人的讲话、署名文章,或官方权威媒体的新闻通稿、社论,或国家政策、法律文件,或官方主编的意识形态教育读本采用,成为政治话语的常用概念。”^[12]经过一百多年的历史沿革,民族复兴的相关话语经历了从“振兴中华”到“民族复兴”再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演变。“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写入党的十三大报告,此后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等重要政治文本中频繁出现。党的十八大报告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明确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任务;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又将其明确为党百年奋斗的主题;党的二十大则确定通过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目标。“民族复兴”话语完成了政治化的过程,为当前中华民族主体性研究提供了宏大背景。

2.1 “民族复兴”为中华民族主体性建构提供了历史契机

从高度看,中华民族复兴为中华民族主体性“浓度”的不断增加提供了比较的视角,“民族复兴”话语的提出本身就是中西比较的结果。近代以来,在西方国家的侵略下,中华民族丧失部分主权,沦为半殖民地。有识之士面对中华民族从东亚国际秩序顶端跌入低谷的现实,提出“民族复兴”的目标。因此,无论是近代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抗争,以及新中国成立后实现主权独立与共同富裕的努力,还是新时代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人类命运的关照,都是中华民族试图摆脱在国际关系中的客体地位,试图从国际关系的边缘向中心迈进。这是中华民族主体性“浓度”不断提升的过程,特别是在向外呈现方面。同时,这种比较不仅是国际视角,也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纵向比较,民族复兴是连续的螺旋式的上升过程。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13]57}这一论述表明,当前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演进最好的历史阶段,也是中华民族主体性“浓度”最高的历史阶段。

从宽度看,中华民族复兴不断丰富中华民族主体性的内涵。民族复兴是全方位的复兴,在中华民族发展的不同阶段要完成的历史任务也有所不同。近代中华民族的主体性表现为独立性,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是核心任务。新中国成立后中华民族的主体性表现为现代性,要通过现代化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虽然不同阶段的任务不同,但都要确保中华民族作为主体自身的连续性。中华民族主体性的“体”是中华民族在几千年演进中所形成的历史和传统文化,中华民族主体性有丰富的历史和内涵。如果抛弃这些内涵,中华民族就会丧失自我意识和反思能力。因此,不管是革命时期还是建设和改革时期,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是不同时期政治力量绕不开的课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和创新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题中应有之义,为中华民族主体性的巩固和提升提供了创新空间。祖国统一显然也是民族复兴的重要内容,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台湾问题因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随着民族复兴而解决”^{[14]410}。祖国统一同样也是中国政治传统中“大一统”政治理念在当代的必然要求,从中华民族主体性的向外呈现上体现为维护民族尊严、主权和领土完整。

从时空跨度上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践历程为中华民族主体性“浓度”提升提供了时间坐

标。中华民族在鸦片战争后受到众多列强侵略,遭受的苦难深重,但“危机即转机”,中华民族复兴的起点正是中华民族作为一个现代民族的主体地位确立的起点。中华民族复兴之路是漫长的历史过程,是近代以来一代代中国人的接力赛,其中有缓慢的积聚过程也有关键性的历史节点。学术界普遍认为,五四运动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起点^[15]。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五四运动“以磅礴之力鼓动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实现民族复兴的志向和信心”^{[16]240}。新中国成立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中华民族实现了独立自主,“中华民族走上了实现伟大复兴的壮阔道路”^{[16]268-269}。实现民族独立、建立现代国家、获得平等的国际地位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阶段性目标。而要与世界发达国家比肩,恢复中华民族固有的地位,即“中国从前是很强盛很文明的国家,是世界中的头一个强国”^{[17]57}才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真正实现。何为“世界中的头号强国”?不外乎有世界级的伟大思想家,这使中华民族的思想有世界高度,能为人类发展贡献智慧;创新的内生动力以及对世界文明成果的接纳能力;世界一流科技水平和国家实力;国家统一并具有强大的凝聚力等。而这些目标的实现为中华民族主体性“浓度”的不断提升准备了时间表。

2.2 中华民族主体性“浓度”提升进程中存在的偏差

回顾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和中华民族主体性确立与提升的过程,二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总体上呈现正相关。但反思历史过程,不难发现在中华民族主体性的确立过程中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实践中都存在一些偏差。这些偏差如果不及时调整可能会进一步影响中华民族主体性提升的速度和质量,进而影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

第一,对中华民族主体性认知的偏差。“民族复兴”话语的演进与中华民族主体性“浓度”提升在纵向上具有对应性。自近代国际关系体系确立以来,民族国家成为最重要的国际行为体,以维护国家民族利益为核心的民族叙事成为主流叙事方式。近代中国正是在此种语境下被纳入国际关系体系的。在将摆脱民族危机、实现民族独立作为中华民族主体性的集中表达情况下,“关于‘民族主体’的认识没有得到进一步反思和深化,仍然在把哲学上的‘主体’与政治上的‘主权’概念极度混淆基础上,认为已经有了政权的新中国,不存在所谓民族主体性问题了”^{[18]149}。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民族复兴”被不同的社会力量所援引,构成其政治话语体系的组成部分,但也成为不同主体争夺话语权的重要场域。新中国成立后,民族独立任务已经完成,在一段时间里阶级叙事居于主导地位,“中华民族”话语体系鲜见于党和国家的重要政治文本中。对“中华民族”话语体系社会动员功能认识存在不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与话语产生错位,出现了其他话语对“民族复兴”话语的替代。这样的认识不利于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传统文化为民族复兴、民族凝聚、社会动员提供援引资源的基本功能也容易被忽略,进而造成中华民族自我意识和反思精神不足。

第二,“中华民族主体性”话语被遮蔽。“民族复兴”之所以在近代成为不同政治力量政治团结、社会凝聚的精神力量,除了这一词汇能够反映全民族诉求外,还与该词汇生动易懂、易于传播有密切关系。而“中华民族主体性”主要聚焦于文化心理,这一词语本身比较难懂,属于更深层次的问题。因此,相比于广泛传播的“民族复兴”话语,“中华民族主体性”话语容易被遮蔽。进一步而言,民族复兴是宏大叙事,谈及伟大复兴人们更多关注其向外呈现的部分,生动鲜活又能通过可评估测量的指标来表征,通常用GDP、政治、军事、外交、科技、教育、文化产业等显

性因素来衡量。这些与民族主体性的向外展现有相一致的部分,但民族主体性更深层次的意义是一个民族的自觉状态和生命觉醒。因此,中华民族主体性向内反思部分往往被有意无意遮蔽,内外的同步与协调也容易被忽视。

第三,对主体性内涵的静态理解不利于推动中华民族主体性的动态演进。作为群体主体性,中华民族主体性的主要内容是动态的,在不同时代被赋予不同的内涵。中华民族主体性的动态性意味着要根据时代变化不断作出调整。近代以实现民族独立为目标,维护民族独立地位的革命方式显然具有重要价值。新中国成立后,中华民族主体性的内容发生实质性变化,需要重新解读其内涵并根据内容采取不同的方式推进。但对中华民族主体性的理解存在一定的偏差,“只能使民族主体在徒具‘独立’外表的现实下,丧失其主体性”^{[18]229}。同时,维系主体性的基本元素具有连续性,如作为身份标识的历史文化传统。中华民族在不同时期都要通过独特的方式延续自身的文化传统,并通过与其他国家的接触获得具有时代意义的自我意识和自我反思,通过交流互鉴强化身份认同,使主体性内涵不断丰富。但对主体性内涵的静态理解、对历史文化传统不够重视,会使中华民族主体性正常演进受阻。

第四,中华民族主体性内外两部分出现错位。中华民族主体性由内外两个部分构成,对内反思是对外呈现的思想基础和精神内核,向外呈现是向内反思的自然表达和积极呈现,二者要在动态中实现统一。过度看重外在呈现,忽视中华民族的自我意识和反思能力,容易出现两种极端情绪:一种是对传统文化的历史虚无主义态度而表现出的极度自卑;另一种是在对现实妄自尊大的肯定中表现出的极度自傲^{[18]151}。鸦片战争后,中华民族领土完整、主权安全和民族尊严逐渐丧失。面对这样的困局,洋务运动在器物层面的尝试、维新变法和辛亥革命从制度层面的尝试都失败后,新文化运动则从文化上反思,试图借助外来文化探寻民族未来。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民族独立是一个共识性的目标,民族的凝聚力强。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里,“中华民族”在国家建设、民族凝聚中的重要功能发挥不够明显,而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又需要在外在呈现方面有不凡的表现,这样势必造成向内反思与向外呈现的错位。

3 中华民族主体性的多重建构

在民族国家依然是最重要的国际关系行为体的现实世界中,国家认同是最重要的认同形态,只有强大的民族凝聚力才能确保国家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中华民族主体性建构,首先是文化主体性的建构,这是中华民族主体性建构的灵魂,为中华民族主体性提供持续的精神标识和文化资源。其次是在实践层面坚持中华民族主体地位前提下进一步完善内部构成主体性的层级构筑。最后是在新时代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同时,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探索实现“自由的超越”之路。

3.1 中华民族主体性的文化主体性建构

与中华民族主体性向内反思的内涵相对应,中华民族主体性的文化主体性建构分为三个层面。

第一,文化主体性建构是中华民族主体性建构的灵魂。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19]142},还是民族的精神标识和身份表征。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演变中积累了丰富的精神财富,形成了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精神气质和文化传统,中华民族的文化模式是独有的。因此,

要加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内涵建构。首先,站在国家民族高度对中华民族传统文明进行科学定位是新时代理解中华民族主体性的钥匙,也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思想基础。“只有立足波澜壮阔的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才能真正理解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文化内涵与独特优势。”^[1] 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既概括了传统文明的突出特征,又明确“两个结合”正是中华文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具体实际三者新历史时空交汇的产物,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确定了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发展的底色和根脉,传统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在现代文明建设中依然有效,一直“在场”,是确证中华民族主体性的文化根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近代以来引导中华民族走向独立富强的行动指南,也一直“在场”,筑牢了道路根基。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国具体实际”是不断变化的,在解决“中国具体实际”问题过程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断“相遇”,不断增加中华民族主体性的“浓度”,推动其生长。其次,对于传统文化而言,要将历史的具体性和思想的普遍性区分开来,传统文化产生于农耕文明,立足今天以儒家思想为中心的传统文化已经“走出历史”,所面对的问题和扮演的角色都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因此,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要致力于传统文化之道德精神的挖掘和传承,在传统承袭中完成民族的自我重建,重塑民族自尊和自信,这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双创”的题中应有之义。再次,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内涵及内在关系的研究。三种文化是中华民族在演进的不同阶段所产生的精神财富,对应中华民族演进的不同阶段。因此,不仅要提炼不同阶段文化的精髓,也要对三者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进行研究,为中华民族历史主体性提供全面的精神支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20]¹³。“第二个结合”就是要凸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中华民族主体性坚守中的底色功能。

第二,从中华民族不同历史时期的实际出发是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建构的基本原则。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能够完成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富民强的任务正是以中国实际情况作为出发点和判断标准,以“为我”为目标,不断完成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化,进而指导不同阶段实践的历史过程。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就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等主张。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邓小平明确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21]³ 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22]¹³,“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23]¹⁰⁵。无论是革命、建设还是改革,中华民族在不同时期的具体实际是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构建的现实基础,而具体实际本身就包含具体的文化内容。

第三,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建构的内在动力,应加强民族精神的凝练和培养。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在长期共同生活中逐渐沉淀累积形成和提升的,被本民族大多数成员所普遍认同并产生广泛影响的价值取向、道德规范、思维方式、精神气质和行为准则的总称。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伦理道德、宗教信仰等具体形式呈现民族精神的特质,民族的具体特质要通过民族精神这一共同性的特质来理解和把握,民族精神沉积于民族社会生活的具体实践之中。民族精神是在民族演进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的精神,是“民族延续发展的思想基础和内在动力”^[24]⁶⁶。中华民族在几千年发展中形成了伟大的民族精神,中华民族精神蕴含于文化之中,经

过漫长的文化浸润,民族精神融入民族成员的基因之中。“数千年来,各民族在逐梦过程中不断注入民族特质和禀赋,熔铸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25]因此,要及时凝练不同历史时期的民族精神,加强民族精神的传播、普及和教育,唤醒民族成员“日用而不自知”的精神因子。个人的主体性和生命价值、单元民族的价值都能在中华民族精神中得到滋养和绽放,要将个人、单元民族的诉求融入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中。

3.2 中华民族主体性的内在层级建构

在实践层面中华民族有复杂的内在结构,其内部组成单元主体性的获得和巩固是中华民族主体性得以巩固的基础。中华民族是群体主体,较之个体主体内部结构更加复杂。中华民族主体性分为三个面相:一是国家层面(中华民族层面)的主体性;二是单元民族的主体性;三是个人的主体性。因此,中华民族主体性的内在层级主要包含四种关系:中华民族主体性与各单元民族主体性的关系、中华民族主体性与个体主体性的关系、各单元民族主体性与本民族群众主体性的关系以及各单元民族主体性之间的关系。无论是哪种关系都处于动态之中,中华民族主体性的巩固要依靠各种关系的动态平衡。前两对关系涵盖了后两对关系,本文主要围绕前两对关系进行分析。

首先,要处理好中华民族主体性与个体主体性的关系。个体主体性是现代国家认同产生的基础,是中华民族主体性建构的基石。个体的主体性及其自我意识的生成和成长,是现代性的本质规定性之一,是全部现代精神的基础。个体主体性建立在公民身份确认和培育基础之上。在政治方面,随着新中国成立和宪法的颁布,全国各族人民确立了主体地位,成为国家的主人。各族人民公民身份的认定和政治权利的保障为其国家认同奠定了政治基础。在经济方面,新中国成立后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全国各族人民当家作主奠定了经济基础。经过改革开放的发展,人民群众的主体性不断提升。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进一步提升个体主体性。因此,一方面要通过发展经济、完善政治制度为个体主体性的提升创造条件;另一方面要通过教育、宣传等方式加强公民意识培育,增强人民群众的国家意识、公民意识和法治意识,培养具有独立政治人格,拥有“自为的自律性、自觉的能动性、自由的超越性”的现代人。只有这样才能夯实中华民族主体性建构的基石。

其次,处理好中华民族主体性与单元民族主体性的关系。新中国成立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少数民族聚居区普遍实施,少数民族的利益受到保护,单元民族的主体性得以确认。除宪法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作出专门规定外,《民族区域自治法》的颁布实施为单元民族主体性提供了法律保障。但在一段时间里,中华民族主体性与单元民族主体性发展不够均衡,“‘中华民族’作为重要的政治符号在国家层面一定程度上被忽视,强调不足”^[26]。相较而言,围绕单元民族的问题持续跟进,强调民族问题研究仅限于单元民族,模糊了单元民族在中华民族中的位置。在中华民族主体性与单元民族主体性关系问题上,要关注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强调增进共同性。“共同性是主体间结成共同体的关系纽带”^[27],是共同体存在的基础,在实践中能整体把握向内反思与向外呈现的协调和均衡。单元民族则更关注局部利益和当下发展,因而在强调增进共同性的同时也要包容差异性,“尊重和包容差异性”^[28]是民族工作的重要原则。但局部利益的实现要在整体利益得到实现的前提下才能实现,因而要“在实现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整体利益进程中实现好各民族具体利益”^[28]。中华民族主体性与单元民族的主体性要在动

态中实现平衡,不能顾此失彼,单元民族的利益保障不能以牺牲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为代价,反之亦然。

3.3 中华民族主体性“自由的超越”之建构

中华民族的历次蜕变都是超越自我的过程,自身演进过程中累积的政治智慧是实现其“自由的超越”的文化基础。中华民族主体性的确立和巩固是实现其“自由的超越”的前提,实现民族独立,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利益,维护民族尊严是中华民族主体性向外呈现的核心内容,也是自我超越的基础。“从哲学的意义上说,‘超越’不是对‘外在对象’的超越,而永远是对‘自我’的超越。”^{[18]231} 在近代,正是在对自我反思中使中华民族从“自在”发展为“自为”,不断突破自身束缚,在实践中不断成长。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人民逐渐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进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西方对现代化模式的定义,超越了西方国家“国强必霸”的逻辑,中国式现代化为理解中华民族主体性提供了新视角。因此,在中华民族主体性基础上提出超越中华民族自身的新构想是自然的逻辑过程。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走出“主体性的黄昏”的积极尝试。中华民族主体性是在国际交往与比较中产生的,中华民族不仅以复兴回应外来挑战,还站在全人类整体利益的高度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同一时期提出,是对中华民族自身主体性肯定的同时的“自我”超越,积极关注全人类的共同命运。“从‘群体本位’到‘个体本位’再到‘类主体本位’,从‘民族共同体’到‘人类命运共同体’再到‘真正的共同体’都体现了人类社会螺旋式上升的自然过程。”^[29] 从主体性走向主体间性,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和践行者的历史责任感和担当,为人类未来发展提供了共同价值。

4 结语

“中华民族”话语体系中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华民族大家庭”等话语政治地位的渐次确立,是中华民族主体性不断提升的现实表达,反映出中华民族主体地位实现过程中强烈的自觉意识。这些政治话语助力中华民族主体性“浓度”不断提高,进而缓解了中华民族主体性的阐释焦虑,反映了中华民族自我意识水平的提高,是其自我意识的当代表达。选择“民族复兴”作为分析中华民族主体性内涵、历史演进和建构逻辑的理论视域,在于民族复兴具有丰富的内涵,能够涵盖民族主体性的大部分内容,并在高度、宽度和时间跨度上为中华民族主体性建构提供宏大视野。同时,通过对“民族复兴”话语的梳理和中华民族主体性历史演进的过程分析,能够全面反思中华民族主体性提升中存在的偏差和不足。

中华民族的主体性是中华民族的生命自觉,由向外呈现与向内反思两个部分构成:向内反思是向外呈现的基础;向外呈现是向内反思的自然表达。因此,中华民族主体性建构主要侧重于文化认同和民族精神凝练和以此为基础的社会境遇,以及从个体主体性到单元民族主体性再到中华民族主体性的内生性生成逻辑,进而使民族主体性实现“自由的超越”,为全人类提供共同价值。而在向外呈现方面,除了一般意义上在独立自主原则指导下维护独立主权、平等、利益和尊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中国话语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也是中华民族主体性向

外呈现的重要一环。以上概括是民族复兴视域下中华民族主体性建构的基本逻辑。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华民族生命自觉的进一步彰显,而中华民族主体性的“浓度”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进程中将得到全面提升。因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继承与创新相统一的文明、是向内反思与向外呈现相协调的文明、也是比较与超越相一致的文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任务完成正是中华民族主体性“饱和”状态实现的时间节点。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J]. 求是, 2023(17): 4-11.
- [2] 贺金瑞. 中华民族的主体自觉与思想自我创造[J]. 理论研究, 2015(3): 2-6.
- [3] 张明. 民族复兴、社会主义发展与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从多维视角理解“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与百年党史[J].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 2021(4): 5-34.
- [4] 张学昌. 主体自觉与传承: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民族性[J]. 世界民族, 2017(2): 11-15.
- [5] 赵文心, 何虎生. 主体性视域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在要求[J]. 民族教育研究, 2021(4): 42-49.
- [6] 张雪雁. 主体性视域下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建构逻辑[J]. 民族研究, 2014(6): 22-34.
- [7] 李楠明. 价值主体性: 主体性研究的新视域[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 [8] 戴维·米勒, 韦农·波格丹诺. 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M]. 邓正来, 译.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2.
- [9] 方维规. 什么是概念史[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0.
- [10] 习近平. 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9.
- [11] 刘纯明, 兰曾妮, 卿晓秋. 比较视野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成功经验与世界意义[J]. 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2022(12): 114-124.
- [12] 杨须爱.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的主要理论渊源和政治化效应——基于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中国化的考察[J]. 西北民族研究, 2023(1): 15-28.
- [1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2卷[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7.
- [14]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4卷[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22.
- [15] 李飞. 五四运动: 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起点[J]. 红旗文稿, 2021(11): 24-26.
- [16] 习近平. 论中国共产党历史[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1.
- [17] 孙中山. 三民主义[M]. 长沙: 岳麓书社, 2000.
- [18] 李广昌. 民族主体性的觉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想象力[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
- [19] 安德鲁·海伍德. 政治学核心概念[M]. 吴勇,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
- [20] 习近平.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1.
- [21] 邓小平文选: 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
- [2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3卷[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20.
- [23] 习近平著作选读: 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3.
- [24] 张岱年. 文化与哲学[M].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1988.
- [25] 王传发, 毛国旭. 增进共同性: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学理[J]. 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4): 34-41.
- [26] 张淑娟. 新中国70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回溯[J]. 学术界, 2019(9): 162-169.
- [27] 赵超. 增进共同性: 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要方向[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3(5): 37-46.
- [28] 习近平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

[N]. 人民日报, 2021-08-29.

[29] 张淑娟. 论两个共同体理念的理论契合与践行张力[J]. 学术界, 2022(6): 53-62.

The Construction Logic of Chinese National Subjectiv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ational Renaissance

ZHANG Shujuan

(School of Marxism, Dal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Dalian 116024,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political status of the discourse of “the great renaissance of the Chinese nation” has provided a grand vision for the historical reflec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s subjectivity. The realization of national renaissance is a relay run, which fully demonstrates the subjectiv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in terms of height, width and time span. Therefore, the academic circles generally believe that the two are synonymous. In fact, subjectivity is the life consciousness of a nation. It not only values the independence, sovereignty, equality, interests and dignity presented to the outside, but also pays attention to th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actual circumstances and national spirit reflected to the inside, and pays more attention to the synchronization and coordination between the inside and the outside, and the external presentation should be the natural presentation of internal reflecti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s subjectivity first of all is the connotation construction of its cultural subjectivity, which completes the historical writing of the continuity, integrity and cohesion of the Chinese culture, and builds the modern civiliz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continues to provide the spiritual symbol of the Chinese nation’s subjectivity. Starting from the actual situation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is the basic principle of constructing the subjectivity of Chinese culture. National spirit is the spiritual driving force of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cultural subjectivity, and it should be strengthened to condense and cultivate national spirit. Secondly, on the premise of adhering to the subject status of the Chinese nation, we should further improve the hierarchical construction of its internal subjectivity. Finally, while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omm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in the new era, the concept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the Mankind” is proposed, and the road of realizing “transcendence of freedom” is actively explored, so as to contribut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ommon values of all mankind.

Key words: the great renaissance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e subjectivity of Chinese nation, a modern Chinese civilization, the Chinese culture

责任编辑: 赵 超

人工智能赋能国家安全:理念、机理与路径

肖 晞,王一民

(吉林大学 国家发展与安全研究院/公共外交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

摘要:人工智能技术的重大突破性进展为高水平国家安全的实现提供了强大动力。人工智能赋能国家安全可以从理念、机理和路径三个维度展开系统分析。就理念而言,“四个统筹”整体明确了人工智能赋能的价值引领,即统筹发展和安全、统筹维护安全和塑造安全、统筹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统筹善智与善治。就机理而言,人工智能技术在机器感知、机器学习和机器行动三个阶段与国家安全战略规划、国家安全能力提升、国家安全风险应对三个方面耦合,人工智能可以通过获取数据、学习、推理、智能计算、提升作用效能等有效赋能国家安全。就路径而言,人工智能赋能国家安全的具体实现方式包括:维护人民群众的安全利益,增强人民群众的国家安全意识和能力;提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能力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维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安全和助力意识形态安全建设;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有效应对经济领域安全风险;提升军事、科技、文化、社会安全的保障力度;赋能国际安全合作升级,科学高效应对全球性安全风险挑战等。

关键词:人工智能;国家安全;统筹协调;技术耦合;“五位一体”

中图分类号:D6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23)06-0053-14

人工智能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核心技术,也是人类历史上最具创造性和颠覆性的技术之一。国家安全是国家生存和发展的根本,“维护国家安全是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1]177}。维护国家安全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以及新时代新征程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和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安全风险挑战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人工智能赋能国家安全是新时代新征程上高水平国家安全实现的重要内容。

1 文献评述与问题提出

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国家安全,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单独把国家安全作为专章论述、专门部署,充分凸显了国家安全在党和国家战略全局中极其重要的地位。科学技术的发展与应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近年来随着深度学习等技术的发展,人工智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成为当前全球主要国家竞争的焦点,其对国际体系、国际秩序、全球安全等都将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作为前沿尖端科技的人工智能对于国家安全也将会产生巨大影响。因此,人工智能赋能国家安全研究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那么人工智能究竟如何赋能国家安全,应当如何科学合理地将人工智能具体运用于国家安全?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共建‘一带一路’安全保障体系研究”(22VRC169),项目负责人:肖晞。

作者简介:肖晞,女,博士,吉林大学国家发展与安全研究院院长、公共外交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国家安全学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家级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吉林大学匡亚明卓越 A 岗教授;王一民,男,吉林大学国家发展与安全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人工智能赋能国家安全相关研究主要包括以下三类。一是关于美国、俄罗斯等主要大国和欧盟的研究。这类研究主要聚焦于美国,包括对美国人工智能赋能国家安全战略的认知^[2]、战略举措^[3]、人工智能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影响^[4]等。此外还有针对欧盟^[5]、俄罗斯^[6]、日本^[7]等国家和国际组织人工智能赋能国家安全的研究。二是关于人工智能赋能国家安全的应用场域、风险与对策的研究,具体研究内容包括国家安全的技术属性^[8]、人工智能嵌入国家安全及其应对策略^[9]等。三是人工智能赋能国家安全的具体细分领域研究,包括国家安全治理的应用范式、风险识别与路径选择^[10],以及政治^[11]、经济^[12]等具体领域相关研究。

现有研究较为深入全面地分析了人工智能赋能国家安全的重要议题,对本文的研究具有重要启发。但相关研究体系性相对不足,大多缺乏较为完整的分析框架,尤其是在人工智能赋能国家安全具体技术的作用机理研究方面的深度有待提升。鉴于此,本文尝试从理念、机理和路径三个维度展开研究,努力构建一个相对完整的分析框架。理念部分阐明人工智能赋能国家安全的价值导向,机理部分阐释人工智能具体技术赋能国家安全的运行规则和原理,路径部分呈现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人工智能赋能国家安全的具体实现路径。

2 统筹协调:人工智能赋能国家安全的理念引领

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一个被确立为国家安全工作指导思想的重大战略思想^[13]¹,为新时代新征程上我国国家安全取得新的伟大历史成就提供了根本遵循和科学指引。总体国家安全观是系统性、全面性、辩证性、创造性的国家安全思想,蕴含着深刻的统筹协调理念,强调必须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既重视发展问题,又重视安全问题;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14]。遵循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统筹协调理念,人工智能赋能国家安全的理念引领包括统筹发展和安全、统筹维护安全和塑造安全、统筹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统筹善智和善治四个方面。

2.1 统筹发展和安全

人工智能赋能国家安全要遵循统筹发展和安全理念。实践中发展和安全的关系是复杂的,两者并非总是统筹协调的,甚至有时会因为关系不平衡而相互损害。事实上,发展和安全两者之间存在六种关系:发展促进安全、安全促进发展、发展和安全相互促进;安全损害发展、发展损害安全、发展和安全相互损害。统筹发展和安全理念指的是六种关系中的发展和安全相互促进。一方面,安全是发展的基础,随着安全对于发展的意义凸显、安全在发展中的分量加重,需要把安全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在发展中更多考虑安全因素^[15];另一方面,发展是安全的保障,发展对于安全的持续提升和优化具有愈加重要的支撑作用,发展在安全中的地位更加凸显,要把发展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要在安全中更多考虑发展因素。统筹发展与安全理念强调发展和安全是相辅相成、相互助益的。因此要正确看待并科学处理发展和安全的关系,努力形成在发展中保安全、在安全中促发展的格局^[16],力求两者之间通过相互激发和促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可持续的发展和安全的。

人工智能赋能国家安全的过程中不仅要合理促进发展,也要有效提升安全。运用系统思维、辩证思维等科学思维方法,精准把握和统筹协调发展和安全之间的关系,加强发展和安全态势的动态评估,努力实现发展和安全的动态平衡,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

动。人工智能赋能国家安全过程中统筹发展与安全理念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人工智能在赋能国家安全能力提升的同时,也要提供高质量发展的动力。人工智能不仅要有效提升国家安全风险应对能力、国家安全综合保障能力、国家安全塑造能力等,同时要提供高质量发展的资源整合利用能力以及效益提升能力等。人工智能从各种能力的主体、客体、生成过程、结构、形成逻辑等不同方面进行深度学习和理解,在优化国家安全各个层面能力的同时探索国家安全各方面系统效应提升的路径。人工智能在赋能国家安全能力提升的同时也要提供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包括利用人工智能提供新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模式,通过合理优化经济要素结构提升经济高质量发展效能,合理提升科技因素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作用等。

二是人工智能赋能国家安全治理提质增效的同时,也要合理提升国家发展治理的水平。人工智能在信息收集、决策制定、方案执行和监控实施等认知域和物理域的应用将极大地提升国家在安全领域的治理水平^[10]。人工智能要统筹协调地赋能于国家安全治理和发展的主体、客体、结构、过程等各要素,赋能主体更高的数字化、智能化治理能力,拓展和提升治理客体的适用场域和作用效力,优化治理的顶层设计和子系统等结构,提升治理过程中领导、组织、决策、执行等环节效率,从而实现国家安全治理和国家发展治理的提质增效。此外,可以通过人工智能对国家安全治理和国家发展治理的互促性机理进行分析,内容包括国家安全和国家发展治理相关风险互促性预防和应对、国家安全和国家发展治理手段的互促性协作等。

三是人工智能赋能国家发展和国家安全协同效应的整体性提升。可以利用人工智能对国家安全和国家发展的协同机理进行深入挖掘,通过算法优化等方式提升安全和发展协同作用的效能,最终实现系统性整体提升。人工智能通过对大量的国家安全和国家发展数据进行机器学习后,初步归纳和总结出统筹发展和安全的作用原理与机制。随后通过算法优化进行深度学习,不断进行迭代升级和认知更新,进一步挖掘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深层次规律与提升统筹发展和安全新的作用方式及路径,从而整体性地提升国家发展和安全的协同效应。

2.2 统筹维护安全和塑造安全

统筹维护安全和塑造安全是人工智能赋能国家安全的重要理念,国家安全需要维护也需要塑造。国家安全维护更多强调对国家安全现状的保持,使得现有状态得以较长时间存在,至少不能使国家安全现有状态明显变差;塑造安全相对于维护安全而言则更具主动性和前瞻性,其目的在于使现有国家安全处于更高水平和实现较大程度的提升。就实现难度而言,国家安全的塑造通常比维护更加具有挑战性,主要体现在国家安全的塑造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以及更低的可操作性,因此往往需要更高的水平和能力才能实现对于国家安全的塑造。就适用场域和范畴来看,国家安全维护的作用范围比安全塑造更广,需要占用的国家安全资源也较多。因此,国家安全的维护和塑造本质上表现为有限国家安全资源的合理分配问题,即是实现更高难度、更高水平的安全,还是保障较低难度、维持现有水平的安全。尽管维护安全和塑造安全有相互对立的一面,但两者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统筹维护安全和塑造安全理念强调国家安全维护和塑造是统筹协调的,维护是塑造的基础和依托,塑造是维护的发展和提升。二者的统筹协调要实现的是有限的国家安全资源的高效合理匹配,以促进国家安全效益的最大化。因此,统筹维护安全和塑造安全理念具体表现为依据能力和难度等因素合理分配国家安全资源,最终实现维护安全和塑造安全的双向促进和动态平衡。人工智能赋能国家安全过程中统筹维护安全和塑造安

全理念,体现为在有效维护国家安全的同时要适度合理地塑造国家安全。

一是提供新的国家安全维护与塑造的模式和路径。一方面,人工智能具有自主、智能和自适应的特点和能力,通过海量的数据学习与大规模的训练后,具备在专用领域内很强的智能化水平。人工智能通过分析历史和当前不同国家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的相关内容,自我进化出维护和塑造安全的新模式和路径。其不仅可以通过对既有内容的大数据分析归纳总结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的内在机理和规律,分析和挖掘出潜藏在数据背后的国家安全维护与塑造的因果机制,还可以通过强化机器学习能力对既有的维护和塑造安全模式和路径进行优化迭代,产生新的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的模式和路径。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具有强大的推理能力,能够基于人类的思维机理实现机器的自动推理。利用人工智能产生式推理、自然演绎推理、归结演绎推理等对国家安全维护与塑造模式 and 路径的发展演化趋势进行分析和预测,进一步深入理解和掌握相关作用机理,进而提供新的国家安全维护与塑造模式和路径。

二是提升国家安全维护与塑造的自动化、智能化程度。国家安全维护和塑造工作纷繁复杂,大量的日常性国家安全维护工作操作尽管已较为规范且技术含量相对较低,但耗时耗力。人工智能能够通过数据赋能、算法优化和算力提升等途径构建出常态化的科学、高效、精准的国家安全日常维护机制,可以分担大量原本由人机械化操作来完成的工作,提升国家安全维护自动化、智能化程度。在国家安全塑造过程中,利用人工智能建立自我学习和自我进化的决策辅助专家系统,在实施方案选择、路径判断等方面辅助决策,帮助决策者提升决策的科学性,提升国家安全塑造决策的自动化、智能化程度。在国家安全塑造的具体实践中,通过人工智能自我学习和强化对实施过程进行仿真模拟,以立体化、沉浸式体验预先对实施过程中的问题和可能的优化路径进行分析研判,提升国家安全塑造过程中的自动化、智能化程度。

2.3 统筹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

全球化时代的安全问题具有联动性、跨国性、多样性等特征。一国自身安全风险外溢的同时也会面临他国安全风险内渗,单个国家凭借一己之力无法完全有效地维护自身安全,国际安全合作是大势所趋,全球性威胁和挑战需要全球性应对^{[13]135}。同样,技术在生成和扩散的过程中也具有鲜明的全球性特征,人工智能本身就是全球合作的产物,其进一步发展也依赖全球合作的深入发展。统筹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体现为个体安全和整体安全的辩证协同关系,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在某种程度上是整体和局部的关系,整体的安全需要各个组成部分自身的安全以及不同部分之间协同合作的安全,各个部分的安全同样依赖于整体的安全。

人工智能赋能国家安全过程中统筹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理念包括三个方面。一是降低人工智能赋能国家安全过程中的风险。人工智能赋能国家安全过程中不同国家要有效地保障自身安全,不通过人工智能制造和传播危害共同安全的风险,不利用人工智能损害共同安全,尽量控制自身安全风险使其最低程度外溢到国际社会,尽最大努力减少自身安全问题对共同安全的危害。二是通过合作、友善的方式应对其他国家产生的安全问题给本国国家安全带来的风险和挑战。在人工智能赋能国家安全过程中,各国要遵循维护自身安全时坚守不造成全球公害的原则,采取合作、友善的方式处理他国产生并外溢到本国的安全风险。风险挑战发源地国家应该对风险挑战作用地国家提供自身责任范围内力所能及的帮助,风险挑战作用地国家不对风险挑战发源地国家进行政治、价值理念、技术等层面的攻击,两者要共同合作减少直至消除风险挑

战。三是推动国际社会共同构建更好促进人工智能赋能国家安全健康发展的保障机制。国际社会应在人工智能赋能国家安全的作用范围、程度等方面达成共识,避免人工智能赋能国家安全的实践中由于滥用和乱用等产生全球性安全问题,尤其是避免主要大国利用人工智能赋能展开恶性军备竞赛,寻求签订类似于核军备控制的国际条约等。

2.4 统筹善智与善治

新技术发展本身潜藏着技术风险,人工智能亦是一把“双刃剑”,既有自然属性上的优劣之分,也会给人类社会带来积极(善的)后果和消极(恶的)后果^[17]。拉里·唐尼斯提出的颠覆定律表明,社会、政治和经济体系表现为渐进性变化,但技术呈指数级变化^[18]。也就是说技术发展和变化的速度要明显快于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变化,在两者巨大的发展差距中潜藏着难以预测的技术风险。相比于前几次工业革命和科技革命的核心技术,比如蒸汽机技术、电力技术、原子能技术、信息技术等,人工智能具备感知和模拟人类思维的能力,技术本身的不确定性风险更高。人工智能赋能国家安全过程中产生正能量的同时,也不可避免会产生无法预测、难以防范的风险和挑战。根据英国技术哲学家大卫·科林格里奇的观点,在技术应用的早期难以预料其可能产生的社会后果,当技术的后果明显显现时,其改变的难度却很大,需要很高的成本和很长的时间^[19]。因此,统筹人工智能善智与善治具有重要的意义,在科学合理发挥人工智能正能量的同时,也要尽最大可能减少其负面作用。

善智,即善良的智能,也就是人类发明创造的具有智慧和智能的物体本身是善的。换言之,智能体本身符合人类善的价值理念,不会损害人类自身的智慧和利益。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其本质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实现两者的最佳状态,包括合法性、透明性、责任性、法治、有效等基本要素^[20]。善智理念要求人工智能本身是一种“善”的智慧,善治理念则要求人工智能在应用中符合“善”的要求。人工智能赋能国家安全过程中统筹善智与善治的理念要求确保人工智能技术本身安全可靠的同时也要在其应用过程中确保安全。一是在人工智能底层研发的过程中提升安全意识,加大安全技术研发,确保安全可靠,强调“基于安全的设计”,即技术在设计之初就应该考虑其可能的安全问题,必须在相应设计中体现出对安全的控制^[21],也就是确保核心底层技术和设备等自身安全可靠。二是在应用中确保安全可控。人工智能本身极强的开放性会带来风险的极大不确定性,赋能国家安全时要建立全范围覆盖、全过程严格把关的风险管控体制机制,坚持负责任、公正、透明等原则,从平台、拓展应用等多个环节全过程强化安全检验和审查,强化人工智能监管,有效防范和及时消除在国家安全应用中的风险。

3 技术耦合:人工智能赋能国家安全的作用机理

人工智能技术包括机器学习、深度学习、计算机视觉、自然语言处理、智能机器人、自动驾驶等。机器学习是指计算机通过对数据的学习而具备学习能力的技术,包括预测、聚类、分类和降维等方面,可分为监督学习、无监督学习、半监督学习和强化学习四种方式^[22]。深度学习是建立、模拟人脑分析学习的神经网络,模仿人脑的机制进行数据的解释。深度学习将原始数据通过一些简单的非线性模型变换为更高层次的抽象表达,再组合多层变换,学习提取出非常复杂的函数特征^[23]。计算机视觉技术是一种通过对生物视觉的模拟,对图像、视频等视觉元素进行

处理以获得和理解其中的信息,使计算机能够具备生物视觉功能的技术,目前应用最广泛和最成熟的是人脸识别技术和图像识别技术。自然语言处理技术(NLP)是一种计算机通过学习和理解人类语言并实现机器通过自然语言与人类交流的技术,该技术涉及文本朗读、语音合成、语音识别、自动分词、词性标注、句法分析、自然语言合成、问答系统和信息抽取等^[24]。人工智能赋能国家安全的具体作用机理是机器学习、深度学习、计算机视觉、自然语言处理、智能机器人、自动驾驶技术等人工智能技术在机器感知、机器学习和机器行动三个阶段与国家安全战略规划、国家安全能力提升、国家安全风险应对的深度耦合。

人工智能赋能国家安全的技术耦合包括机器感知、机器学习和机器行动三个阶段:机器感知是基础,目的是通过人工智能获取国家安全状态、能力等相关数据;机器学习是关键,目的是对前一阶段的国家安全相关数据进行深度学习,实现关联、推理等功能;机器行动阶段则是在前两个阶段的基础上实现技术能力的提升。具体的技术耦合机理如图1所示。一是在机器感知阶段,通过计算机视觉技术和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对国家安全战略规划、能力提升和风险应对三个方面相关的文字、语言、图像、视频等信息进行数字化处理,获取相应的国家安全数据。二是在机器学习阶段,通过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技术对国家安全战略规划、能力提升和风险应对进行学习、推理、智能计算等。三是利用智能机器人、自动驾驶等提升国家安全战略规划、能力提升和风险应对三个方面在具体作用场域中的效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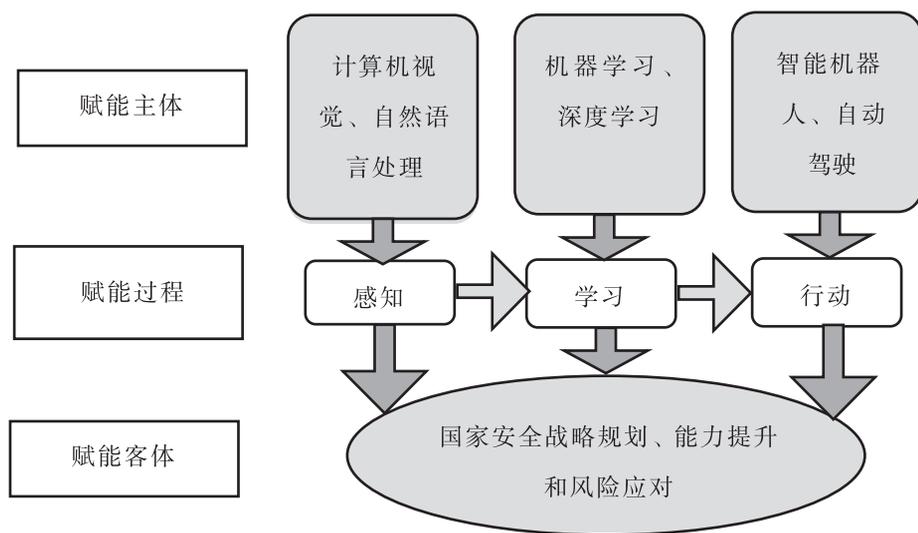


图1 人工智能赋能国家安全的作用机理

3.1 人工智能技术与国家安全战略规划的技术耦合

国家安全战略规划是对国家安全的长期性、全面性、系统性和前瞻性的战略设计,其核心是通过有限国家安全资源的合理分配实现国家安全效益的最大化。国家安全战略规划通常包括国家安全总体态势的评估、国家安全战略指导思想的确立、不同层次国家利益的判定、国家安全战略的实施等。

在国家安全总体态势评估方面,首先通过智能机器人、自动驾驶等采集国家安全态势信息,随后通过计算机视觉技术和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对国家安全态势图片、视频、语言、文字等信息进行分类、检测和判断。利用机器学习、深度学习技术对国家安全态势进行判断,借助虚拟现实技

术和增强现实技术对国家安全态势进行交互式三维动态视景和实体行为系统仿真,提供立体、生动的国家安全态势信息。在国家安全战略指导思想确立方面,利用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技术对党和国家战略决策的历史资料、古今中外战略史以及重大代表性战略案例进行学习,从中分析和研究出不同战略思想下国家安全战略的指导效用,提供可供参考的国家安全战略思想。在国家安全利益判定方面,通过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技术,依托自学习、自适应能力以及并行计算等优势,对复杂的国家安全利益系统问题进行求解和大规模数据分析建模,从而对国家安全利益重要程度进行排序,辅助判定核心利益、重要利益和一般利益等,为国家安全战略决策主体提供参考。在国家安全战略实施方面,通过机器学习、深度学习技术建立国家安全战略方案辅助实施系统,利用智能机器人、自动驾驶技术等提升战略实施能力,包括在具体战术运用中完成人力难以完成或危险性很高的战略行动以及对战略实施过程进行跟踪监测等;通过计算机视觉技术和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对国家安全战略实施信息进行分析和处理;通过数字记录和展现国家安全战略实施状况,总体上提升国家安全战略实施效果。

3.2 人工智能技术与国家安全能力的技术耦合

国家安全能力是指国家安全主体预防和化解国家安全问题、实现国家安全目标的能力总和。国家安全能力对于国家安全具有重要意义,为国家安全问题预防和化解提供了工具支撑,在国家安全中占有重要位置^[25]。人工智能赋能国家安全能力提升的作用机理包括人工智能技术在国家安全领导能力、国家安全执行能力和国家安全保障能力三个方面进行耦合。

国家安全领导能力是指国家安全主体为了实现国家安全目标,在预防和化解国家安全问题过程中,依法对国家安全路线方针的决定、重大安全问题和危机事件等国家安全事务的处置所具有的领导能力。国家安全领导能力包括组织、决策、指挥、协调等能力。首先利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和计算机视觉技术对我国国家安全组织、决策、指挥、协调等能力相关材料进行数字化采集、归类和分析,提供国家安全组织、决策、指挥、协调等能力构成和演变的清晰图景,通过借助虚拟现实技术和增强现实技术以立体性、全景化、沉浸式的方式呈现出来。其后通过深度学习和机器学习技术对我国国家安全组织结构、决策模式、指挥效率、协调能力等进行分析研究。同时运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和计算机视觉技术采集美国、俄罗斯等国家安全领导能力相关信息,利用深度学习和机器学习技术对我国和其他国家的国家安全领导能力进行对比分析,提供合理可行的国家安全领导能力提升路径。此外,通过人工智能构建高效的国家安全组织、决策、指挥、协调辅助系统,提升国家安全领导能力。国家安全执行能力是指有效执行国家安全政策的能力。在国家安全执行能力层面,利用计算机视觉技术和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对国家安全执行过程中的图像、视频、语音、文字等信息进行数字化处理,通过深度学习和机器学习技术对国家安全执行的各要素、整个过程的不同阶段进行分析,找出国家安全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对执行的全过程进行跟踪和监测,提供提升国家安全执行能力的路径。国家安全保障能力是指国家安全主体为了实现国家安全目标,在预防和化解国家安全问题过程中所依法具有的保障能力^[25]。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大对维护国家安全所需的物质、技术、装备、人才、法律、机制等保障方面的能力建设,更好适应国家安全工作需要。”^[26]¹³ 人工智能赋能国家安全保障能力的作用机理体现为综合运用机器学习、深度学习、计算机视觉、自然语言处理、智能机器人、自动驾驶等技术提升国家安全物质生产、调配、运输等能力,加强国家安全物质保障,辅助构建立体化、

全景式的国家安全技术平台,提升国家安全装备智能化、自动化水平,通过人机交互等方式提升国家安全人才培养能力等。

3.3 人工智能技术与国家安全风险应对的技术耦合

安全与风险密切相关,在国家安全风险应对过程中,要尽早发现潜在风险并及时消除安全隐患,难以预测和判断的风险发生时要尽可能降低风险的损害程度。人工智能自动化、智能化等属性为国家安全风险应对提供了新的作用方式并注入了新的强大动力。人工智能基于数据技术可以通过扩大数据收集范围、提高数据处置效率、减少数据信息失真以及建立相关分析模型,更好地预测国家安全风险,并及时介入其中阻断风险传播与恶化,遏制或减少风险带来的负面影响^[9]。人工智能赋能国家安全风险应对作用于风险态势监测、预警和处置三个方面。

首先是国家安全风险态势监测。人工智能赋能国家安全风险态势监测的作用机理是基于深度学习的卷积神经网络模型,对涉及国家安全风险挑战的图像、视频等相关因素进行检测、分类,利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对涉及国家安全风险挑战的语言、文字等信息进行收集、理解和处理,对语言进行识别,对文字进行对比和解读,高效及时地锁定国家安全风险源。其次是国家安全风险预警。利用深度学习和机器学习技术对国家安全大数据进行学习,对不同类型的国家安全风险进行分类,根据风险作用的危害程度和发生概率将国家安全风险分为高危害性高概率风险、高危害性低概率风险、低危害性高概率风险、低危害性低概率风险四类,并建立四个对应的数据学习集,通过算法优化探究四类不同风险的高效预警机制。此外,通过计算机视觉技术和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对图像、视频、语言、文字等信息进行分析和跟踪,对可能出现的国家安全风险进行前瞻性预判,提升风险预警能力。最后是国家安全风险处置。当国家安全风险发生时,利用计算机视觉技术和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对风险发生的位置、时间、危害程度等信息进行采集和分析,为风险的进一步处置提供基础,其后利用智能机器人、自动驾驶等技术对国家安全风险进行快速有效的智能化处置,通过智能机器人对人员难以进入、对人体伤害较大的场域进行风险前置处理,利用自动驾驶技术高效快速地向人员难以到达地区运送风险处置物资、装备等,协同高效地处置国家安全风险。

4 “五位一体”:人工智能赋能国家安全的实现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科技、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14]。“五大要素”全面、辩证地阐释了国家安全不同构成部分的逻辑关系,构筑了“五位一体”的国家安全指导思想,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上筑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安全屏障、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五大要素”指明了实现高水平国家安全的方向,为人工智能赋能国家安全的具体实现提供了重要指引。

4.1 有效维护和促进人民安全

人民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宗旨,人民是国家安全的根本依靠,也是国家安全的最终受益者,国家安全工作归根结底是要保障人民安全。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坚持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为群众安居乐业提供坚强保障^{[13]39}。人工智能有效维护和促进人民安全的具体路径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通过人工智能有力增加人民群众的安全利益,增强人民群众安全感和幸福感。通过人工智能赋能增加人民群众的安全利益,包括收入、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等领域。在赋能人民群众收入和就业方面,要通过人工智能有效提升人民群众的收入水平,有效预防和减少人工智能带来的失业问题,提供更高质量的就业岗位,提升人民群众就业安全性和舒适度。在赋能社会保障、教育和医疗方面,通过人工智能推进教育数字化,增加知识普及的便利性,提供更加公平、优质、高效的教育,加速社保经办数字化转型,全面提升社会治理效能,构建更具保障能力的社会保障体系,赋能更高质量的医疗,实现更可靠、更快速、更高水平的诊断和治疗,有效解决广大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和幸福感。

二是采用人工智能有效减少涉及人民群众安全的自然灾害和生产生活安全事故,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安全利益。通过人工智能对地震、洪水、台风、干旱等自然灾害的生成机制进行深度学习,提升自然灾害风险监测和预警的灵敏度,通过风险的事前防范有效地避免和减少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损失。灾害发生时,通过人工智能赋能抗险救灾能力提升,有效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灾害发生后,通过人工智能赋能事后处置,对受灾群众进行妥善安置,合理运用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技术,通过强化学习的手段有效提升产品生产、交通运输、网络安全等领域的安全能力,减少生产事故、交通事故等带来的死伤率,切实保障人民安全。

三是利用人工智能开展国家安全教育,有效有力地提升人民群众的国家安全意识和能力。利用人工智能辅助构建完善的国家安全教育体系、改善国家安全教育教学活动,增加国家安全教育资源,辅助加强国家安全教育师资队伍建设和建立健全教育教学评价机制,助推国家安全教育实践基地建设,丰富和拓展国家安全教育内容和形式,提供个性化、精准化的国家安全教育,提升国家安全教育质量。构建立体化、沉浸式国家安全教育平台,促进国家安全教育高质量、高水平进学校、进教材、进头脑、入人心,有效提升人民群众的国家安全意识和能力。

4.2 巩固政治安全的根本地位

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根本,其核心是政权安全和制度安全,最根本的就是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地位、维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13]58}。政治安全涉及国家主权、政权、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稳固,是一个国家最根本的需求,是一切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条件^{[27]71}。人工智能赋能巩固政治安全的根本地位的具体路径包括提升党的领导能力和巩固执政地位、有效维护社会主义制度安全和助力意识形态安全建设三个方面。

在提升党的领导能力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方面,人工智能通过对危害党的领导和执政地位的风险挑战进行监测和预警,有效且有力地化解风险挑战。利用人工智能构建党的领导和执政地位能力提升系统,助力加强党的领导干部队伍建设、廉政建设等,切实有效提升党的领导能力和巩固执政地位的权威性、合法性和公信力,夯实党的执政基础,增强人民群众对党的领导和执政地位的政治认同和价值归属。在维护社会主义制度安全方面,首先,利用人工智能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等制度文本体系,利用深度学习的自适应、自进化等功能挖掘文本信息,进而通过对文本关联信息的深层关联机制进行分析和解读,给出制度优化的建议方案。其次,通过对现有专门领域国家安全制度文本进行学习,辅助生成国家安全制度。利用人工智能对国家安全的组织、指挥、协调等制度文本进行深度学习,建立专门领域智能化系统,辅助生成专业领域的国家安全制度文本。最后,利用人工智能的海量数据和便捷传播

优势强化社会主义制度宣传效度、力度和频度,提升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价值认同,有效应对国内外制度攻击。在助力意识形态安全建设方面,利用人工智能及时高效地监测和管控意识形态风险挑战,对削弱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主导地位的行为进行及时预警和有效处置,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教育,有效提升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价值认同。

4.3 夯实经济安全基础

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础,以经济安全为基础,就是要确保国家经济发展不受侵害,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提高国家经济实力,为国家安全提供坚实物质基础^{[28]20-21}。人工智能赋能夯实经济安全基础包括两部分。

一是人工智能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一方面,利用人工智能赋能生产力构成要素优化的方式促进生产力提升。生产力包括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三个要素。在劳动者方面,通过人工智能提升劳动者的劳动能力,降低劳动者的劳动强度,提高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在劳动资料方面,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赋能智能化生产,增进生产设备和机器的智能化程度,提升生产能力和效率。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对电力等生产安全相关重点行业赋能,有效提高生产保障能力,助力生产安全、高效、稳定运行。在劳动对象方面,人工智能通过提升钢铁、塑料、石油等物质的加工、运输和使用等效率和能力,提高产品质量,减少生产过程中的能源消耗,有效助推生产力提升。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有助于在经济运行的各个环节提升经济发展质量,例如通过人工智能在生产环节优化要素配置、在分配环节寻求效率和公平的均衡、在流通环节提升效率等。

二是人工智能赋能有效应对经济领域安全风险。一方面是利用人工智能构建具有更好性能的经济安全风险评估模型和系统,在金融风险防控、投资风险管理、财政风险管控、市场风险预测、信用风险评估等领域提升风险监测和预警能力。另一方面是通过人工智能提升经济安全风险处置能力。利用人工智能鲁棒性等特征构建金融、财政、贸易等经济领域的知识图谱和关联网络,挖掘风险应对能力提升的作用机理,提升经济系统的抗冲击性和韧性。此外,通过人工智能有效打击经济领域违法犯罪行为。利用人工智能赋能高效、精准打击危害经济安全的侵犯财产、贪污贿赂、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洗钱、电信诈骗等违法犯罪行为,有效提升经济领域安全风险应对能力。

4.4 提升军事、科技、文化、社会安全的保障力度

国防和军队建设是国家安全的坚强后盾,军事手段始终是捍卫和平、维护安全、慑止战争的保底手段^{[13]106-107}。科技安全既是支撑国家安全的重要力量和物质技术基础,也是实现其他相关领域安全的关键要素,更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基本保障。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社会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社会安全既事关每个社会成员切身利益,也事关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28]115-137}。人工智能赋能提升军事、科技、文化、社会安全的保障力度是实现高水平国家安全的重要举措。

人工智能在提升军事安全保障力度方面,一是赋能军事武器信息化、智能化水平提升。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推动智能化武器研发和生产,辅助提升现有军事装备的信息化、智能化水平。二是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人工智能的军事化应用不仅能够实现作战效率的全方位提高,并且能够以无人化的作战形式来降低可能造成的人员伤亡^[10],包括推动建立和完善军事战略决策辅助系统以提升战略决策的科学性、有效性与可靠性^[29],构建战争模拟系统

以提升战备应对能力,通过采集和分析实战演习等数据更为完整地还原全部战场信息并进行全盘推演和模拟分析。在提升科技安全保障力度方面,通过人工智能自学习、自适应、自进化等功能推动原始创新能力和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提升,有效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助推科技创新产业化发展,助力科技创新力量优化布局,提升科技安全发展效能。利用人工智能赋能辅助制定科技安全规划和制度,加强科技发展风险预警、监管和防控,提升科技安全保障力度和能力。在提升文化安全保障力度方面,一是利用人工智能提升文化安全风险应对能力,有效防范和抵制文化渗透和侵略;二是通过人工智能推动文化事业发展,助推文化产业升级,赋能高质量文化产出;三是人工智能赋能文化传播,拓展文化传播平台和渠道,提升文化传播能力,辅助培育文化传播人才,提升文化自觉、自信、自强,拓展国际话语权。在提升社会安全保障力度方面,利用人工智能构建高质量社会安全风险防控体系,有效提升全面排查各类社会安全风险隐患的能力,推动安防系统技术升级,提升社会治理水平,加强社会生活重点领域的安全保障能力等。

4.5 促进国际安全合作

中国的安全与发展同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密切相关,中国的安全与发展助推世界实现更好的和平与发展,而世界和平与发展有助于中国实现更高质量的安全与发展。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刻阐释了国际合作与国家安全的辩证关系,强调必须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习近平总书记在博鳌亚洲论坛上明确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强调要“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共同维护世界和平和安全”^[30]。《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是对国际安全合作的进一步深化,指明了重点合作方向、合作平台和机制等具体构建内容^[31]。人工智能赋能国际安全合作提升的具体路径包括三个方面。

首先,人工智能赋能国际安全合作升级。一是利用人工智能助推国际社会就更具包容性的国际安全合作理念达成共识。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对不同国家和地区涉及国际安全合作理念的信息进行分析,比较不同理念的异同,努力寻求国际安全合作理念的最大公约数。就国际安全合作理念差异和分歧较大的部分进行深度分析,对差异和分歧的深层机理进行深度学习,提供扩大国际安全合作共识的可行方案。二是通过人工智能拓展国际安全合作的范围。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对不同国家和地区提出的国际安全合作相关倡议和方案等的重点合作领域进行匹配性分析,构建不同倡议和方案等之间的全球合作网络图谱,拓展国际安全合作的范围。三是利用人工智能提升国际安全合作效果。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对国际安全合作的过程、结构和要素等进行学习和推理,找出阻碍国际安全合作效果提升的主要作用因素,通过流程优化、要素聚合和结构重组等方式提升国际安全合作效能。

其次,人工智能赋能科学高效地应对全球性安全风险挑战。全球性安全问题包括网络攻击、生物多样性锐减、水资源短缺和污染、土地荒漠化、国际恐怖主义、全球性流行病等。一方面,通过人工智能构建全球安全风险网络图谱和全球性安全风险智能化监测、预警平台和系统等,有效判断不同风险的作用范围和程度,对风险演变的趋势进行研判,赋能建立全球一体化安全风险应对体制机制,有效提升全球性安全风险挑战应对国际合作水平。另一方面,利用计算机视觉技术和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对各种全球性安全问题的数据进行采集,通过深度学习分析各种全球性安全问题的生成演化机制,提出尽可能使风险不发生的方案和路径。在全球安全风险发生后,赋能提供快速高效应对风险的可行方案,通过智能机器人、自动驾驶等提升全球性安全

风险挑战应对能力。

再次,通过人工智能有效提升国际安全合作的便利化程度。一是通过人工智能辅助构建更高质量地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的体制机制。通过人工智能对现有的国际安全合作文本、流程等进行数据采集和深度分析,挖掘影响国际安全合作便利化的因素,分析不同因素对国际安全合作便利化的制约程度,有效识别国际安全合作流程中的冗余环节,推理得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便利化的集成解决方案。此外,还可以通过人工智能辅助生成提升国际安全合作便利化体制机制文本,对国际安全合作便利化进行监督、评估等。二是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赋能全球远程线上会议等方式极大地提升不同国际安全合作主体就国际安全议题交流和磋商的便利化程度,畅通和拓展国际安全议题交流和磋商渠道,减少交流和磋商的时间和空间限制,推动全球安全问题快速、有效地得到解决。

5 结论与讨论

科技进步是推动国家安全发展的重要动力。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核心,人工智能的科学合理运用将会极大地促进我国国家安全高质量发展,进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坚实的基础。本文构建了人工智能赋能国家安全的“理念—机理—路径”分析框架。人工智能赋能国家安全要坚持“四个统筹”理念,即统筹发展和安全、统筹维护安全和塑造安全、统筹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统筹善智与善治。统筹发展和安全理念包括人工智能在赋能国家安全能力提升的同时要提供高质量发展的动力,赋能国家安全治理提质增效的同时要合理提升国家发展治理的水平,赋能国家发展和安全协同效应的整体性提升;统筹维护安全和塑造安全理念包括提供新的国家安全维护与塑造模式、路径,以及提升国家安全维护和塑造的自动化、智能化程度两方面;统筹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理念包括降低人工智能赋能国家安全过程中的风险,通过合作、友善的方式应对其他国家产生的国家安全问题给本国带来的国家安全风险和挑战,构建更好地促进人工智能赋能国家安全健康发展的保障机制;统筹善智与善治理念包括在人工智能底层研发过程中提升安全意识,加大安全技术研发,确保技术安全可靠,在应用中确保安全可控。

人工智能赋能国家安全包括赋能主体、赋能客体和赋能过程三方面,在机器感知、机器学习和机器行动三个阶段与国家安全战略规划、国家安全能力提升、国家安全风险应对三个方面进行技术耦合。在机器感知阶段,通过计算机视觉技术和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对国家安全战略规划、能力提升和风险应对三个方面相关的文字、语言、图像、视频等信息进行数字化处理,获取相应的国家安全数据;在机器学习阶段,通过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技术对国家安全战略规划、能力提升和风险应对进行学习、推理、智能计算等;利用智能机器人、自动驾驶优化国家安全战略规划、能力提升和风险应对三个方面在具体作用场域中的效能。

人工智能赋能国家安全的实现路径包括五个方面。一是有效维护和促进人民安全,包括利用人工智能有力增加人民群众的安全利益,增强人民群众安全感和幸福感,有效减少涉及人民群众安全的自然灾害和生产生活安全事故,开展国家安全教育,有效提升人民群众的国家安全意识和能力。二是利用人工智能巩固政治安全的根本地位,包括有力提升党的领导能力和巩固执政地位,有效维护社会主义制度安全和助力意识形态安全建设三个方面。三是利用人工智能夯实经济安全基础,包括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有效应对经济领域安全风险。四是提升军事、

科技、文化、社会安全的保障力度,包括人工智能赋能军事武器信息化、智能化水平提升,推动科技原始创新能力和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提升,增强文化安全风险应对能力,有效防范和抵制文化渗透和侵略,构建高质量社会安全风险防控体系等。五是人工智能赋能促进国际安全合作,包括赋能国际安全合作升级、科学高效地应对全球性安全风险挑战和有效提升国际安全合作的便利化程度三方面。

人工智能的发展可以划分为弱人工智能、强人工智能和超级人工智能三个阶段,目前仍处于弱人工智能阶段。面向未来,人工智能会向强人工智能和超级人工智能发展,这将会对世界产生更大的影响力,不仅会产生巨大的科技、经济等推动力,也会不可避免地带来更大的和更难以预测的风险挑战。未来人工智能赋能国家安全要做好前瞻性规划,及时把握人工智能发展最新动态和趋势,充分挖掘赋能国家安全的新增长点,尽量减少其带来的风险挑战,实现人工智能赋能国家安全更高质量的发展。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M].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9.
- [2] 刘国柱,尹楠楠.美国国家安全认知的新视阈:人工智能与国家安全[J].国际安全研究,2020(2):135-155.
- [3] 李恒阳.美国人工智能战略探析[J].美国研究,2020(4):94-114.
- [4] 彭红梅,刘忠.人工智能对国家安全的影响——基于美国四家智库的观点分析[J].情报杂志,2020(7):36-41.
- [5] 宋黎磊,戴淑婷.科技安全化与泛安全化:欧盟人工智能战略研究[J].德国研究,2022(4):47-65.
- [6] 戢仕铭.俄罗斯人工智能发展的能力约束及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困境评估[J].国际关系研究,2020(1):91-109.
- [7] 刘姣姣,黄膺旭,徐晓林.日本人工智能战略:机构、路线及生态系统[J].科技管理研究,2020(12):39-45.
- [8] 封帅.国家安全学视域下的人工智能安全研究:议题网络建构的初步尝试[J].国际安全研究,2023(1):26-49.
- [9] 李贝雷.人工智能嵌入国家安全的应用场景、潜在风险及其应对策略研究[J].情报杂志,2023(4):20-26.
- [10] 阙天舒,张纪腾.人工智能时代背景下的国家安全治理:应用范式、风险识别与路径选择[J].国际安全研究,2020(1):4-38.
- [11] 孙会岩.人工智能时代政党的政治安全:风险、治理与启示[J].太平洋学报,2019(9):13-22.
- [12] 于孝建,彭永喻.人工智能在金融风险管理领域的应用及挑战[J].南方金融,2017(9):70-74.
- [13] 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室.总体国家安全观学习纲要[M].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22.
- [14]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强调 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 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N].人民日报,2014-04-16.
- [15] 高培勇.构建新发展格局:在统筹发展和安全中前行[J].经济研究,2021(3):4-13.
- [16] 钟开斌.统筹发展和安全:概念演化与理论转化[J].政治学研究,2022(3):74-87.
- [17] 颜佳华,王张华.以“善智”实现善治:人工智能助推国家治理的逻辑进路[J].探索,2019(6):83-90.
- [18] DOWNES L, MUII C. Unleashing the killer app: Strategies for market dominance[M]. Boston: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2000.
- [19] COLLINGRIDGE D. The social control of technology[M].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0.
- [20] 俞可平.治理和善治引论[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9(5):37-41.
- [21] 李艳.新兴技术与国家安全:发展规律、治理逻辑与实践路径[J].国家安全研究,2022(4):67-83.
- [22] 崔雍浩,商聪,陈懿奇,等.人工智能综述:AI的发展[J].无线电通信技术,2019(3):225-231.

- [23] 毛勇华,桂小林,李前,等.深度学习应用技术研究[J].计算机应用研究,2016(11):3201-3205.
- [24] 李晓理,张博,王康,等.人工智能的发展及应用[J].北京工业大学学报,2020(6):583-590.
- [25] 李文良.国家安全学基础理论框架构建研究[J].国际安全研究,2022(5):3-29.
- [26]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习近平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
- [27] 全国干部培训教材编审指导委员会.全面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M].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9.
- [28] 《总体国家安全观干部读本》编委会.总体国家安全观干部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 [29] 封帅.人工智能时代的国际关系:走向变革且不平等的世界[J].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18(1):128-156.
- [30] 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2022年年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N].人民日报,2022-04-22.
- [31] 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N].人民日报,2023-02-22.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mpower National Security: Concepts, Mechanisms and Paths

XIAO Xi, WANG Yimin

(Institute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Security Studies/School of International and Public Affairs,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12, China)

Abstract: The significant breakthrough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has provided strong impetus for the realization of high-level national securit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mpowering national security can be systematically analyzed from three dimensions: concept, mechanism, and path. In terms of concept, the “four coordinates” overall clarifies the value guidanc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mpowerment, namely, coordinating development and security, coordinating maintenance and shaping of security, coordinating self-security and common security, and coordinating good intelligence and governance. In terms of mechanism,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is coupled with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ic planning, national security capability improvement, and national security risk response in the three stages of machine perception, machine learning, and machine acti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an effectively empower national security through data acquisition, learning, reasoning, intelligent computing, and improving effectiveness. In terms of path, the specific implementation method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mpowering national security include. Maintaining the security interests of the people, enhancing their national security awareness and ability. Enhancing the leadership ability of the CPC and consolidate its governing status, safeguarding the institutional security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assisting in the construction of ideological security. Empowering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ffectively addressing security risks in the economic field. Enhancing the guarantee of military, technological, cultural, and social security. Empowering international security cooperation to upgrade and scientifically and efficiently addressing global security risks and challenges.

Key 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national security, overall coordination, technical coupling, “five in one”

责任编辑:赵超

新安全格局下社区韧性理论本土化的建构路径

汪超,宋纪祥

(中国矿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江苏徐州 221116)

摘要:风险社会的到来使社区韧性成为基层风险应对的重要路径选择。学界虽经历了“取经—效仿—自觉”的理论性探索,但囿于学科属性、治理情境及基层视域的研究局限,难以准确刻画我国社区韧性的本质特征。作为党和国家有关国家安全的战略思考,新安全格局提供了兼具宏观视域和本土色彩的理论视野。基于此,在深度把握新安全格局整体性、权变性、主体性、基础性特征的基础上,从价值、结构、管理、技术、环境维度构建社区韧性理论的本土化分析框架与实践路径。其中,价值韧性追求“以人民为中心”的风险应对理念,实现社区居民安全保障同居民参与双轮驱动;结构韧性以基层党组织领导弥合科层结构与网络结构张力,实现多元治理主体协同配合;管理韧性强化多元治理主体在预防、准备、响应、恢复、学习等过程中的动态统筹能力;技术韧性以技术化手段为支撑,增强基层社区风险应对的信息、资源整合能力;环境韧性以系统化思维实现社区内外部环境彼此作用、相互协调。这一研究与西方已有研究在治理目标、治理主体、治理重心、学科取向上存在本质区别,并在扬弃本土化探赜基础上尝试突破基层视域的理论局限,促成新安全格局与社区韧性建构双向互动,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区韧性话语体系以及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提供理论支撑。

关键词:新安全格局;国家安全;社区韧性;本土化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23)06-0067-13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速演进,全球正进入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和复杂化的风险社会^[1]，“黑天鹅”和“灰犀牛”事件的频繁发生使“风险”逐渐成为理解当代社会的重要关键词。正如乌尔里希·贝克预言，“生活在现代社会就是生活在文明的火山口”^[2]¹³。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神经末梢,基层社区始终处于防范化解风险的最前沿,由此引发的社区安全讨论不绝于耳。其中,社区韧性被学界普遍认为是理解社区安全的新型理论解释框架,但多拘泥于基层视域的实践反思与理论建构。党的二十大强调,“夯实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基层基础,完善参与全球安全治理机制,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3]。新安全格局为如何基于“中国之治”的基层治理场景,从更宏大的国家安全角度构建具有本土特征、彰显中国话语的社区韧性解释框架提供理论指引与实践指向。

1 文献回顾与问题提出

回溯我国社区韧性研究,大体可以概括为三个阶段(见表1)。一是“取经”阶段,重点介绍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暨优秀博士论文项目“新安全格局下城市社区复合风险的韧性治理研究”(23FZZB007),项目负责人:汪超;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安全格局下江苏城市社区复合风险及其韧性治理机制研究”(23ZZA002),项目负责人:汪超。

作者简介:汪超,男,博士,中国矿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宋纪祥,男,中国矿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西方社区韧性相关理论成果。“韧性”最初源于物理工程领域对物理材料属性的理论探讨,后经帕顿引入社区灾害治理领域,成为理解社区风险治理的重要视角。伴随着社会风险的不确定性和复杂化加剧,国内学者通过外文编译、评述梳理等方式将社区韧性概念^[4]、评估体系^[5]等社区韧性相关知识引入国内。二是“效仿”阶段,试图以西方相关理论来解释我国社区风险治理现象。这类研究较为普遍,既包括以社区韧性基本理论、复杂适应性系统理论^[6]、社会资本理论^[7]等审视我国社区的风险治理问题,也包括运用依托西方治理情境所建立的社区韧性评估体系对我国社区韧性治理现状进行量化评估。三是“自觉”阶段,旨在打破西方社区韧性研究的理论桎梏,强调构建社区韧性研究的本土化理论分析框架。当前这类研究虽然还处于初步探索阶段,但本土化建构意识已然“在祖国大地上”生根发芽,并试图在扬弃西方社区韧性研究基础上^[8],依托中国本土治理实践着力推动概念框架的本土化^[9]。

表1 社区韧性研究的演进历程

演进阶段	主要观点	主要特征
“取经”阶段	过程论	自我调整与适应过程
	能力论	稳定能力、恢复能力、适应能力
“效仿”阶段	秩序论	秩序重构与韧性能力提升
“自觉”阶段	整合论	要素整合与资源集聚
	人心论	人心整合与价值凝聚

社区韧性研究的引介与本土化探索既拓展了韧性研究的理论空间,也加深了学界对社区韧性的理论认知。从微观视角考察,可以将其归纳为五种理论认识。一是过程论,这种观点将社区韧性理解为社区面对外部风险冲击时的自我调整与适应性过程^[10]。二是能力论,即社区韧性实质上是社区风险应对时所表现出的稳定能力、恢复能力以及适应能力的集合^[11]。三是秩序论,这类观点重在关注社区风险治理的秩序重构与韧性能力提升^[12]。四是整合论,意在强调社区风险应对时的要素整合与资源集聚^[13]。五是人心论,区别于上述认识,该观点试图将社区韧性置于公共管理学科范畴下加以考量,并将其理解为人心的整合与价值凝聚^[14]。

从理论延展的角度来看,这种历时态的社区韧性研究推进了韧性研究走向深化,但反思不同历史阶段的韧性内涵,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理论拓展上的缺陷,致使其既难以对我国社区韧性形成较为深入的理论认识,又难以深度剖析当前我国社区安全治理存在的现实困境。一是工科取向的研究导向。韧性研究起源于物理工程领域,但并不妨碍其他学科对韧性研究的理论探讨。当前,社区韧性研究多局限于物理工程领域,较少从社会科学角度,尤其从公共管理角度予以理论剖析。二是西式阐释的研究情境。既有社区韧性研究多吸收西方韧性理论成果,较少同中国本土化治理情境相结合,从而使其多悬浮于本土治理情境之上。三是基层视域的理论桎梏。虽然已有学者认识到社区韧性研究本土化的必要性^[15],但视角多局限于基层,同国家宏观战略结合不紧密。

作为国家安全宏观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基层社区安全同新安全格局紧密相关。新安全格局的提出也将原本属于应急范畴的社区安全提升为公共安全^[16]。这意味着要深化社区韧性的本土化理解,既不能简单沿袭社区韧性研究的西式阐释,也不能局限于应急范畴的底层逻辑,而

是需要从新安全格局的宏大视野重新审视社区韧性的结构性要素,构建出既能突显公共管理学科属性,又能同国家宏大战略紧密结合的本土化理论分析框架,进而拓展社区韧性研究的理论范畴。那么,立足于新安全格局,该如何理解社区韧性?尤其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的时代背景下,该如何基于新安全格局构建出具有中国风格、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社区韧性理论?对此,本研究将依循新安全格局的理论指引来阐释社区韧性本土化建构这一问题。

2 新安全格局:社区韧性理论本土化建构的新视角

社区韧性作为理解社区安全的重要理论维度,也是新安全格局构建的基层路径选择^[17]。基于基层视域的理论探讨虽然有助于深化社区韧性的内涵阐释,但是同国家安全战略结合并不紧密,难以从更宽广的视角挖掘社区韧性的理论内涵。新安全格局是党和国家立足新发展阶段与国内外复杂环境所作出的重大战略判断,其对于安全内涵的重新理解和再阐释,无疑为社区安全研究提供了理论指向,为理解社区韧性提供新的思想启迪。

2.1 新安全格局的主要理论意涵

“新安全格局”最初源于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的我国第二份国家安全战略规划《国家安全战略(2021—2025年)》。该份文件明确指出:“新形势下维护国家安全,必须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加快构建新安全格局。”^[18]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以专章论述国家安全问题,提出“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的重要阐述,明确了包括“健全国家安全体系”“增强维护国家安全能力”“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的四大战略任务^[3]。

作为理解国家安全的最新战略思考,新安全格局的提出既肇始于党和国家长期以来有关统筹安全与发展关系的系统性概括,又源于对当前国内外复杂性风险所作出的理性研判。一是风险常态化已然成为社会共识。随着现代社会的加速演进,“黑天鹅”与“灰犀牛”并存已经成为当前社会最显著的时代特征,由此社会风险的常态化逐渐改变事物出现的社会属性,即由“小概率事件”演化为“大概率事件”,由“例外”演变为“常态”,形成风险常态化的理性认识就显得尤为重要。二是风险复合化特征日益显著。相比传统社会的单一性风险,现代风险所展现的“叠加效应”“溢出效应”“放大效应”“链式效应”使其日益呈现出复合化的典型特征^[19],既突出表现为历时态风险共时态交叉存在,又表现为各个领域、各种形态风险之间的动态聚合^[20]。三是风险的特殊性更加彰显。与西方现代化进程相比,中国的现代化是后发的、突进式的,兼具时空压缩和风险共担的发展特点,其所形成的风险形态也具有独特的属地特征^[21]。

基于复杂性风险的理性认识,新安全格局对于安全内涵的深度拓展也蕴藏着较为独特的理论性思维,为进一步理解国家安全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一是权变性,旨在避免传统国家安全应对过程中的僵化思维,以一种动态、灵活的治理理念积极应对复杂多变的现代化风险。二是基础性,强调基层在新安全格局构建当中的基础性作用,尤其突出基础场域、制度根基^[22]以及治理重心等在深化国家安全宏观战略定位同微观基层治理实践中的理论关联。三是主体性,试图打破以往群众被动式参与的主体定位,强调群众参与积极性、主动性在国家安全体系建构和国家安全治理能力提升方面的重要作用。四是整体性,意在破除以往碎片化、零散化的治理思路,以一种整体性视角深度探究国家安全体制建构和可持续性问题^[23]。

2.2 新安全格局视域对基层视域的超越

新安全格局既是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路径,也是理解国家安全的新视角,其意涵的基础性、整体性、权变性、主体性思维对社区韧性的本土化建构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社区韧性在本质上是新安全格局在基层社区治理场域的具象显现,强调社区在应对不确定性风险时的人心整合与价值凝聚,旨在最大化降低社区脆弱性以保障社区安全,夯实新安全格局的基层基础。然而,既有研究多将其置于基层治理范畴之下,需要从新安全格局视域探究社区韧性本土化建构的潜在优势(见表2)。

表2 新安全格局视域与基层视域的比较

主要维度	基层视域下的社区韧性	新安全格局视域下的社区韧性
治理思维	适应性治理:适应性不足	系统权变思维:韧性有余
治理结构	基层治理场域:松散关联	国家治理场域:紧密衔接
治理主体	以行政为中心:被动参与	以人民为中心:主动参与
治理方式	碎片化治理:资源分散	整体性治理:资源整合

从治理思维上看,在应对不确定性风险时,社区韧性具备较强的反应力和组织力,因而被理解为颇具操作化特征的适应性治理思维^[24]。然而,这种建立在自上而下科层体制之上的基层定位,由于缺乏统一指挥协调的管理功能,往往表现出适应性不足的治理困境,这就需要跳出社区的基层视域,从更为宏观的国家安全角度增强社区风险应对的系统权变能力。

从治理结构上看,基层社区是国家结构体系中的基础性部分^[25],尤其在本土治理语境中社区的形成并非自生自发,而是国家自主渗透并理性建构的结果^[26]。由此,基层社区同国家的关系不再是西方治理视域下的松散关联,而是基于国家建构考量的强联系,基层治理的实际效果也同国家治理紧密相关。社区韧性作为基层治理在安全领域的具象表现,对其内涵的考量就不能简单停留在基层视域,而是需要将其纳入新安全格局的理论范畴予以审视。

从治理主体上看,社区韧性得以重塑的关键在于社区居民的人心凝聚与集体行动。然而,基于基层视域的社区动员通常具有行政性、被动性特征,不仅难以深刻理解社区居民的主体性作用,更难以充分发挥社区居民的主动性、创造性。要充分发挥社区韧性在风险应对过程中的治理效能,就需要从国家安全层面,将“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考量渗透到基层治理场域,通过“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价值理念的强调,实现社区居民的主动参与、积极行动^[27]。

从治理方式上看,社区韧性在风险应对时强调不同类型的人力、物力等资源的科学匹配与相互协同,进而凝聚成强大的治理合力,降低社区脆弱性。然而,这种资源的适配由于社区的基层定位不仅会面临着链接不足的治理困境,也会遇到协调不够的棘手问题。这就需要从国家安全角度,以整体性、体系化的行动思维提升社区风险应对的链接协调能力,增强社区韧性。

基层视域下的社区韧性突显基层功能定位的治理缺陷,而新安全格局的理论引领实现了基层视域下社区韧性的理论超越。从理论演化的角度看,主要得益于两个方面的理论考量。一是新安全格局夯实基层基础的必然要求。作为国家安全战略的新思考,新安全格局的目标并不在于纯粹擘画出宏伟壮阔的战略蓝图,而在于将这种理念与思路具体落实到基层治理实践中,进而形成“以新安全格局统筹基层安全,基层安全夯实新安全格局基础”的新局面。二是当前社区

韧性研究的理论局限。当前,社区“就基层谈基层”的风险应对思路所展现出的局限性迫切需要从新安全格局角度增强基层社区的风险应对能力和水平。由此,要深度把握社区韧性的内涵,就不能固守基层视域的局限,而应该从国家宏观视野予以透视和把握。

2.3 新安全格局视域下社区韧性理论本土化的认识维度

站在风险社会的时代前沿,新安全格局从宏大理论视野对安全的理论内涵进行了深度拓展,并将以往对安全的阐释置于国家的理解范畴之中。这种建立在新安全格局理论视野下的安全内涵认知,克服了基层视域下社区韧性的理论局限,并通过基于整体性、权变性、基础性、主体性特征的深度诠释为社区韧性的本土化建构提供了崭新的理论分析视角。结合新安全格局的理论内涵,扬弃基层视域下社区韧性的理论局限,可以将社区韧性解构为价值韧性、结构韧性、管理韧性、技术韧性、环境韧性五个维度(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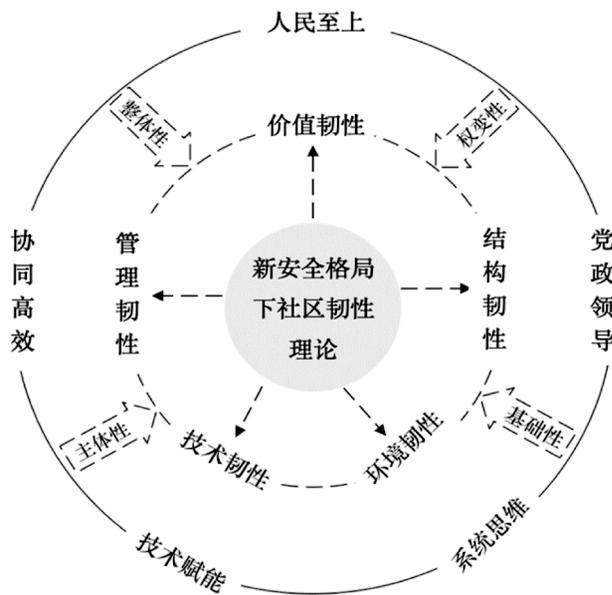


图1 新安全格局下社区韧性理论本土化的认知维度

第一,基于人民至上的价值韧性。价值属于哲学范畴,通常具有引领性、导向性作用。价值韧性是指治理主体在风险动态变化中能够迅速锚定共同价值,并在共同价值的领导下,针对共同面临的不确定性风险进行集体合作、共同应对。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党的根本宗旨,并在新的历史时期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理论命题。这一理论命题并不是抽象的、玄奥的概念,而是一个时刻贯穿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各个环节当中的重要原则。新安全格局作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环节,也是党和国家有关国家安全的重要思想,始终将“以人民为中心”作为国家安全建设的价值考量,并不断渗透到基层社区安全的理念建设当中^[28]。具体而言,价值韧性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始终强调一切为了人民,即将社区居民的生命健康置于各项价值中的优先位置;二是强调一切依靠人民,即通过不断激发社区居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增强社区应对不确定性风险的能力;三是一切成果由人民共享,即依托社区居民安全利益所构建出的社区安全最终应由社区居民共享。

第二,基于党政领导的结构韧性。结构是指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安排,结构韧性则强调治

理主体在应对不确定性风险时既能充分发挥科层结构的程序化优势,又能彰显网络结构的多中心特点,进而在保障特定场域治理结构冗余(指社区治理体系存在一些平时不发挥作用的“冗余”结构,在非常态下可激活并发挥关键作用)的同时实现多元治理主体的相互协同,增强不确定性风险的抵御能力。然而,从组织管理视角来看,科层结构的科层属性同网络结构衍生的社会属性之间的结构性张力,使得组织通常难以形成韧性,这就需要统筹性力量的介入,以实现科层结构与网络结构的有机融合^[29]。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核心,其在应急管理主体结构中的统领性角色有助于弥合科层结构与网络结构的治理张力^[30]。新安全格局要求坚持党对国家安全工作的绝对领导,充分发挥党在中国特色国家安全实践中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作为新安全格局的基层基础,社区基层党组织的坚强领导与统筹协调不仅强化了党的领导在基层治理结构中的领导性角色,更有效弥合基层科层结构同网络结构间的张力,增强社区结构韧性^[31]。

第三,基于协同高效的管理韧性。对于管理的理解,管理学有着比较丰富的理论探讨,但多将其归结为管理者通过计划、组织、领导、控制等手段协调他人活动完成既定目标的过程。作为管理的衍生性概念,管理韧性强调从过程角度出发,将其看作非常态治理情境下预防、准备、响应、恢复、学习的动态管理过程,进而提升风险应对的精准性和统筹应对能力。从时间维度来看,管理韧性更为关注风险应对过程“事前—事中—事后”的连续性,并以动态互补、有机衔接的表现形式,消除既有“风险存量”,遏制潜在“风险增量”,最终达到风险管理的动态平衡^[32]。然而,这一过程的韧性演化并非线性的,既包括不同发展阶段结构上的动态衔接,也包括不同治理主体关系上的动态关联。面对日益严峻的复合风险,新安全格局要求更加注重协同高效,实现国家安全工作从“事后反应、被动应对”向“事前预警、主动塑造”转变。这就意味着要从过程角度强化不同治理主体在风险管理过程中形成相互协同、行动敏捷的动态统筹能力。

第四,基于科技赋能的技术韧性。技术韧性是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强化组织成员间的信息沟通能力、资源链接能力,进而提升组织协同度和资源丰富性。伴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现代信息技术所具备的超时空、延展性特点,使得组织不仅能够实现信息的及时沟通与传递,更能在有限空间内实现不同类型资源的链接。新安全格局要求更加注重科技赋能,更加注重基层基础^[33]。前者意味着要充分发挥现代信息技术的信息集成优势和资源链接特点,以增强国家安全的信息沟通能力和资源整合能力;后者则强调将这种国家安全领域的技术理念渗透到基层社区治理场域,在摸清信息技术底层逻辑的基础上,增强基层社区风险应对的信息和资源整合优势,进而提升不确定性风险的应对能力。

第五,基于系统思维的环境韧性。环境韧性将社区安全不再简单看作是组织结构、价值等单一因素作用的结果,而是强调组织内外部环境的综合作用,并通过内外部环境的彼此作用、相互协调,提升组织不确定性风险的应对能力。组织环境通常由组织中的硬件和软件组成。其中,硬件包括组织基础设施、组织制度、组织结构等,软件则由组织文化、组织心理等要素组成。不同类型要素的协调程度影响着组织不确定性风险的韧性能力。新安全格局立足于国内外日益复杂的社会环境,具有统筹兼顾的系统思维,要求不同治理要素的密切配合,进而形成外部社会风险的应对合力,增强国家安全的治理韧性。夯实国家安全的基层基础,旨在将新安全格局的风险应对思路落实到基层社区。这种系统辩证的思维观点强化了社区风险应对的系统路径,

有助于从整体视角增强社区风险的系统性应对能力,降低社区脆弱性。

立足于新安全格局的理论分析视野,价值韧性、结构韧性、管理韧性、技术韧性、环境韧性成为新安全格局下社区韧性理论本土化建构的维度。然而,这五个维度并非孤立的,而是彼此联系、相互作用的。其中,价值韧性是先导、结构韧性是基础、管理韧性是重点、技术韧性是手段、环境韧性是保障,共同构成理解新安全格局下社区韧性理论的新思路。

3 新安全格局下社区韧性理论本土化建构的路径指向

伴随着风险社会的到来,社会风险的复杂化、叠加化使得社区韧性成为基层风险应对的路径选择。然而,既有研究的西式思维和基层局限考验着我国社区韧性的理论解释力。新安全格局作为党和国家新时代发展与安全思想的新思考,为深入理解我国社区韧性提供兼具宏观视域和本土色彩的理论分析视角,并通过价值韧性、结构韧性、管理韧性、技术韧性、环境韧性的本土化建构,以回应不断变化的社会风险和人民群众的非常态化治理需求(见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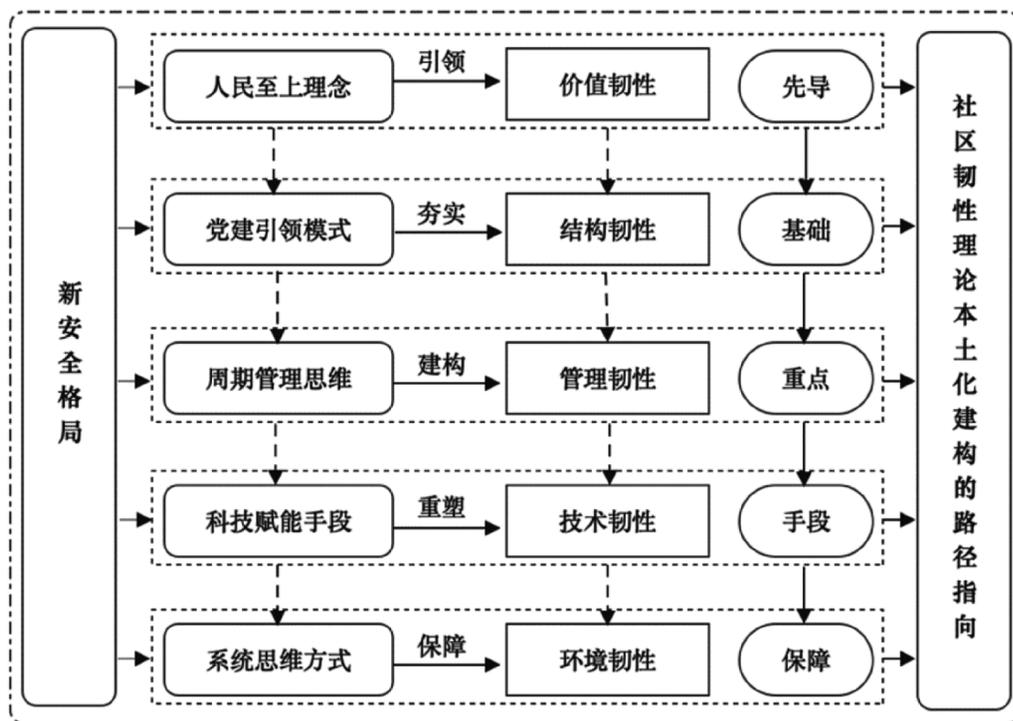


图2 新安全格局下社区韧性理论本土化建构的路径指向

3.1 强化人民至上理念以引领价值韧性建设

新安全格局作为党和国家安全与发展思想的最新理论成果,对于国家安全的价值考量涉及方方面面,但最核心、最重要的是人民安全^[34]。这就意味着要实现社区韧性价值建设,需要将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寓于社区公共价值的培育当中。一是始终将居民安全放在价值首位。“一切为了人民”是新安全格局的最高价值追求,这就需要将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渗透到社区韧性建构当中,通过对社区居民生命健康的充分重视、对社区居民健康利益的充分关注,最大限度地保障社区居民的生命安全。二是强化社区居民的主体性地位。对于“一切为了人民”的强调,并不

意味着要抑制社区居民在非常态治理情境中的主动性、积极性,而是要摒弃传统治理理念中社区居民被动性角色的主体定位局限,最大程度地激活社区居民,增强社区风险应对的冗余性^[35]。三是实现社区安全成果共享。对于社区居民生命健康的充分重视以及社区居民的主动性参与,其最终目的都是通过社区安全环境的营造实现社区安全共享,并在这一过程中将这种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渗透到社区居民的公共价值塑造当中。

3.2 坚持党建引领模式以夯实结构韧性基础

结构韧性是理解新安全格局下社区韧性的组织基础。夯实社区结构韧性的组织基础,需要加强基层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领导地位,通过科层结构与网络结构的彼此融合、相互协同,提升社区风险的综合应对能力。一是加强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地位。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也是新安全格局构建的内在要求。夯实结构韧性的组织基础,就需要基层党组织通过强有力的政治领导、组织领导、战略领导,实现社区治理结构的组织化整合,进而凝聚起社区风险应对的最大合力^[36]。二是在纵向层面发挥基层党组织的纵向协调功能^[37]。在现代社区治理结构中,虽然在纵向层面已然形成了“居委会—楼组长—居民”的纵向治理结构,但科层化、程序化的行政程序通常难以应对日益复杂多变的社会风险。这就需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纵向协调功能,推动纵向行政链条的有序参与和协同配合,进而拓展社区风险应对的冗余能力。三是在横向层面强化基层党组织的综合统筹功能。社区治理主体的多元化虽然为建构社区治理共同体夯实了社会基础,但是利益分散化、价值多元化也影响了非常态治理情境下的集体行动选择。这就需要基层党组织打破利益多元的分散化困境,通过综合统筹功能充分凝聚多元治理主体共识,进而实现社区横向网络结构的最大合力^[38]。

3.3 秉持周期管理思维以推动管理韧性建构

管理韧性是实现新安全格局下社区韧性理论本土化建构的重点环节,也是满足社区居民安全需求的重要条件^[39]。相比于人民至上的公共价值引导、党建引领的治理结构重塑,管理韧性更加强调从全周期的角度去理解社区应急管理实践,并在此基础上形成调适均衡的全周期管理流程。一是“补短板”。“补短板”就是要打破传统应急管理过程中“重救轻防”、学习滞缓的陈旧思想,以一种均衡化的管理思想、均衡化的分配逻辑实现社区应急管理过程中的全流程均衡。二是“活主体”。社区管理韧性建构的主体力量是社区居民,社区安全保障的主体也是社区居民,要形成调适均衡的全周期管理流程就必须破除传统社区风险应对中社区居民的被动性角色定位,充分激活社区居民的主体性力量,强化社区居民在突发事件应对中的冗余性能力。三是“重衔接”。社区应急管理的每个阶段并非孤立的,而是一个彼此联系、相互衔接的闭环整体。其中,既包括时间序列的管理流程,又包含空间序列的应急功能,能将其贯通融合的则是社区居民在应急管理流程中的衔接性角色。

3.4 重视科技赋能手段以实现技术韧性重塑

技术韧性旨在强调通过数字化手段的广泛运用来推动社区不确定性风险应对的智慧化、智能化、精准化。此语境下的技术不再是悬浮于国家安全层面的“利维坦”,其在基层社区治理场域的广泛运用有助于增强社区内外部风险的应对能力和治理水平^[40]。一是着力推动社区应急管理的数字化转型。现代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助力智慧社区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数字技术覆盖不全面及社区运用技术不熟练的双重困境,使当前社区还难以有效应对日益复合化的社会

风险。这就要通过基层治理资金的有效下沉和技术同人员的合理匹配来实现技术韧性重塑。二是强化数字智慧技术的信息整合能力。数字智慧技术的最大优势在于其不仅能够超越时空界限实现社区外部环境的数字化转化,而且通过其超时空优势在有限的时间内,能够推动监测信息的有效整合和及时沟通,进而提升社区非常态治理情境的科学研判和执行监督能力^[41]。三是拓展数字智慧技术的资源链接能力。相比于常态化治理情境,非常态治理情境对时空的限制,使得社区资源面临捉襟见肘的治理困境。这就要充分利用数字智慧技术的信息传递优势,拓展现代社区的资源链接能力,进而提升社区风险治理资源冗余性。

3.5 树立系统思维方式以增强环境韧性保障

环境韧性是实现新安全格局下社区韧性的现实保障,本质上强调社区不同治理要素的系统化配置,以增强社区风险应对的治理能力。基层社区面临着内外部不确定性环境的干扰,尤其是外部环境的扰动冲击,需要以一种系统化的思维方式实现社区硬件与软件的双轮驱动,进而增强社区外部环境的抵御能力。一是强化系统思维观念。伴随着风险社会的到来,社会风险的复杂化、叠加化使得基层社区成为风险应对的重要载体,仅靠零散性思维来进行风险应对明显力有不逮,由此增强社区环境韧性就需要强化系统应对观念,既要看到物理基础设施应对风险的基础性作用,又要看到社区文化培育等软性因素在风险应对过程中的溢出效应。二是重视社区基础设施的合理配置。社区基础设施是影响社区韧性的基础性因素,其配置是否科学合理,关乎社区风险应对的实际水平。因此,重视社区基础设施的合理配置既要看到社区基础设施的配置程度,又要充分考虑到社区基础设施的冗余性。三是强化社区文化的系统培育。相比于社区基础设施,社区文化是社区韧性生成的软性因素。一旦形成兼具责任与信任的社区文化,就会将常态治理情境下的社区社会资本存量加以系统转化,通过集体行动的公共选择,来增强非常态治理情境下社会风险的抵御能力。

4 结论与讨论

伴随着风险社会的到来,社会风险复杂性的增加,不仅使得韧性治理成为社区风险应对的重要路径选择,也使其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议题。然而,通过回溯我国社区韧性研究发现,既有研究的西式思维、基层局限,使得社区韧性不仅难以从实践层面回应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难以从理论层面突破物理工程领域的理论局限,进而难以形成富有本土化特征的社区韧性理论。新安全格局作为党和国家安全的最新理论思想,其所具备的整体性、权变性、主体性以及基础性特征为社区韧性的本土化建构提供了适恰的研究视角。沿袭这一理论逻辑,本研究构建了新安全格局下社区韧性理论的本土化断想。

4.1 新安全格局下社区韧性理论本土化建构的内涵凝练

新安全格局是党和国家新时代统筹发展与安全思想的新理念,要求夯实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的基层基础。由此,以新安全格局推进社区韧性理论的本土化建构,既要紧扣新安全格局的战略要求,又要兼顾新安全格局的基层基础特征。与此同时,基于新安全格局重新审视社区所面临的复杂性风险,以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为内在驱动,着力构建起集价值韧性、结构韧性、管理韧性、技术韧性以及环境韧性为一体的理论分析框架,进而形成新安全格局下社区韧性的本土化理论认知。这既从理论层面回应统筹发展与安全重要战略思想,又从实践层面积极回应人

民群众的非常态化需求。

具体而言,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新安全格局下社区韧性理论的本土化内涵。从建构前提上看,新安全格局下社区韧性理论的本土化建构并非凭空产生,它既是为了从理论层面积极回应当前社区韧性研究西式化、底层化的理论困境,又是为回应日益复杂的社会风险,试图将社区安全纳入新安全格局的理论范畴来不断满足社区居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向往。从领导力量上看,新安全格局下社区韧性理论的本土化建构,强调将基层党组织的坚强领导视为社区韧性生成的核心力量,这既体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也从实践层面表现出基层党组织在社区风险应对中的领导作用。从建构内容上看,新安全格局下社区韧性理论的本土化建构旨在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实现基层治理体系的建构与完善,进而从整体性治理角度弥合外部风险复杂性同基层治理能力不足的张力。从建构主体上看,新安全格局下社区韧性理论的本土化建构,试图通过强化社区居民的主体性作用来激活社区风险应对的积极性,进而增强社区安全,助力新安全格局的国家安全建构。从建构目标上看,新安全格局下社区韧性理论的本土化建构意在通过社区治理主体的广泛参与、治理手段的综合运用,来提升社区风险的综合应对能力,进而达到社区安全的实际目标,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4.2 新安全格局下社区韧性理论建构的比较

新安全格局下社区韧性理论的本土化建构并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其理论内涵所表现出的典型特征,既建立在西方社区韧性理论成果基础之上,也同我国已有的社区韧性本土化建构理论密切相关。从比较视野予以审视,新安全格局下社区韧性理论的本土化建构同西方社区韧性理论成果、我国已有的社区韧性本土化建构成果依然存在着理论差异(见表3)。

表3 中西方社区韧性理论比较

主要维度	西方社区韧性理论	新安全格局下社区韧性理论
治理目标	回应社会风险	回应人民需求
治理主体	社区居民	基层党组织
治理重心	资源整合	人心凝聚
学科取向	物理学、工程学	政治学、公共管理

相比于西方社区韧性研究,新安全格局下的社区韧性理论更加符合本土化治理情境。一是治理目标不同。基于西方治理情境的社区韧性理论阐释重在回应复杂多变的社会风险,新安全格局下的社区韧性理论则重在回应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二是治理主体不同。基于西方治理情境的社区韧性理论以自由主义精神为指导,强调社区居民的集体行动、自主选择,而新安全格局下的社区韧性理论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内化于社区韧性理论建构当中,突出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地位,并强调社区居民有组织的集体行动、公共参与。三是治理重心不同。基于西方治理情境的社区韧性理论更为关注社区不同治理要素的结构化整合,而新安全格局下的社区韧性理论更为强调人心的凝聚与价值整合。四是学科取向不同。基于西方治理情境的社区韧性研究多源于物理工程领域的稳健性理解,而新安全格局下的社区韧性理论更侧重于从公共管理视角予以理论剖析,试图将其置于“公共人”的理解范畴。

除此之外,新安全格局下的社区韧性理论阐释与当前已有研究也有着较为鲜明的理论差

异。一是超越基层视域研究的底层局限。与既有研究“就基层谈基层,就安全谈安全”相比,新安全格局下的社区韧性理论超越了基层视域的理论局限,试图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理解社区韧性,力图形成社区韧性理论的宏观阐释。二是强调新安全格局与社区安全的双向互动。从古至今,基层始终是国家的基础性治理场域,基层安全也同国家安全紧密相关,由此也形成了“基层安则天下安”的实践表达。以新安全格局重新理解社区韧性,打破了既有研究当中基层安全同国家安全的割裂状态,通过新安全格局的构建来统领社区安全,并以社区安全的强化来夯实新安全格局的基层基础。

4.3 新安全格局下社区韧性理论本土化建构的研究反思

本研究立足新安全格局构建出包括价值韧性、结构韧性、管理韧性、技术韧性、环境韧性的理论分析框架,既拓展了韧性研究的理论内涵,也深化了对社区韧性理论的本土化理解。然而,将社区韧性纳入新安全格局的理论分析视野仅是从国家安全层面考虑基层社区安全的初步尝试,因此当前仅停留在理论构想层面。基于理论建构的深度反思,新安全格局下社区韧性理论的本土化建构依然存在可推进的探讨空间。

一是加强实证层面的证据验证。伴随着风险社会的到来,社区韧性研究得到学界和实务部门的广泛关注,尤其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的时代背景下,社区韧性理论的本土化探讨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话题,但实践层面还缺乏较为成熟的经验证据。由此,新安全格局下社区韧性理论的本土化建构主要为未来社区韧性建设实践提供理论上的牵引与指导。要推动社区韧性本土化建构的理论成熟,还亟待大量的实证研究加以深化。二是充分考虑我国社区类型的多元化治理实践。伴随着单位制解体和城市化进程加速推进,我国涌现出多样化的社区类型,以回应日益复杂的社区治理需求^[42]。然而,新安全格局下社区韧性理论的本土化建构,多聚焦在我国社区的普适类型,缺乏对不同类型社区异质性治理实践规律的深度把握,因此亟须进一步深入田野,在考虑不同类型社区治理实践基础上,强化这一理论研究的本土化建构力度。三是以理论深化实践部门的治理认知。自20世纪80年代在民政部门的倡导下推进社区建设以来,我国实务部门对社区安全的探讨多停留在“就基层谈基层”的底层思维,这一认知局限无疑固化了实务部门对社区安全的建设思路。由此,未来亟须进一步突破社区安全建设的底层路径,通过新安全格局的理论认识强化社区韧性理论的本土化建构,并在此基础上拓展实务部门的理论认知。

参考文献:

- [1] 范如国.“全球风险社会”治理:复杂性范式与中国参与[J].中国社会科学,2017(2):65-83.
- [2] 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新的现代性之路[M].何博闻,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
- [3]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22-10-26.
- [4] 廖茂林,苏杨,李菲菲.韧性系统框架下的社区建设[J].中国行政管理,2018(4):57-62.
- [5] 崔鹏,李德智,陈红霞,等.社区韧性研究述评与展望:概念、维度和评价[J].现代城市研究,2018(11):119-125.
- [6] 许峰,陈其荣.系统复杂性下城市社区韧性建设的现状、问题及策略研究[J].云南社会科学,2023(2):161-168.
- [7] 徐治国,陈杏钧.社会工作介入“社区韧性”的生产机制与“韧性社区”的目标构建——基于对重大疫情防控的经验研究[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4):68-76.

- [8] 吴晓林,谢伊云. 基于城市公共安全的韧性社区研究[J]. 天津社会科学,2018(3):87-92.
- [9] 汪超,宋纪祥. 共同缔造:社区韧性的一种本土化理论探赜[J]. 社会科学研究,2023(4):32-41.
- [10] 蓝煜昕,张雪. 社区韧性及其实现路径:基于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视角[J]. 行政管理改革,2020(7):73-82.
- [11] 王东杰,谢川豫,王旭东. 韧性治理:社区应急管理新向度[J]. 江淮论坛,2020(6):33-38.
- [12] 李志强,曹杰. 城镇过渡型社区公共安全治理研究新视野——基于“结构—场域”的分析[J]. 江苏社会科学,2017(5):16-24.
- [13] 张勤,李京客. 韧性治理:基层社区应对复合风险面临的挑战与探索[J]. 学习论坛,2022(6):76-84.
- [14] 张力伟,高子涵. 人心与治理:如何通过提升社区温度塑造社区韧性? ——基于D社区的个案研究[J]. 社会政策研究,2022(3):94-110.
- [15] 张伟,陈琪伟,朱宇霁,等. 重大公共卫生事件背景下社区韧性影响因素模型研究[J]. 公共管理学报,2022(3):96-109.
- [16] 童星. 兼具常态与非常态的应急管理[J].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6-15.
- [17] 朱正威,高双,胡倩倩. 构建新安全格局的逻辑与路径[J].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4):139-147.
- [18]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N]. 人民日报,2021-11-19.
- [19] 吴晓林. 特大城市社会风险的形势研判与韧性治理[J]. 人民论坛,2021(35):56-58.
- [20] 刘岩,赵延东. 转型社会下的多重复合性风险——三城市公众风险感知状况的调查分析[J]. 社会,2011(4):175-194.
- [21] 陈始发,毕蕾. 新安全格局的理论内涵与核心要义[J]. 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23(3):3-13.
- [22] 刘凤. 新安全格局下公共安全治理边界的变迁及其对策——以城市社区为例[J]. 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23(7):131-140.
- [23] 高小平. 整体性治理塑造新安全格局:理念与政策之断想[J].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4):121-130.
- [24] 李志强,管祥. 挑战、机制与路径:组织调适视角的城市社区应急治理[J]. 阅江学刊,2022(2):112-120.
- [25] 徐勇. 基层治理的基本问题与结构转换[J]. 探索与争鸣,2023(1):5-9.
- [26] 李华胤. 国家建设视野下基层治理的社会基础构筑[J]. 江苏社会科学,2023(4):54-63.
- [27] 朱正威,刘莹莹. 韧性治理:风险与应急管理的新路径[J]. 行政论坛,2020(5):81-87.
- [28] 易承志,龙翠红. 风险社会、韧性治理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J]. 人文杂志,2022(12):78-86.
- [29] 陈军亚. 科层化和社会性:基层治理的结构性问题及破解思路[J]. 探索与争鸣,2023(1):32-35.
- [30] 雷尚清. 应急管理中的党政结构[J]. 南京社会科学,2017(7):90-96.
- [31] 颜德如. 基层党组织统筹社区应急治理的组织化整合路径[J]. 探索,2021(1):125-138.
- [32] 斜晓东. 从“刚性规制”迈向“韧性治理”:环境风险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变革[J]. 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22(5):96-109.
- [33] 陈一新.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加快构建新安全格局[J]. 求是,2023(8):36-42.
- [34] 陈朋. 公共危机治理中的人民性与政治性——基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初步分析[J].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0(11):90-95.
- [35] 施生旭,周晓琳,郑逸芳. 韧性社区应急治理:逻辑分析与策略选择[J]. 城市发展研究,2021(3):85-91.
- [36] 容志. 组织应变力:中国共产党成功应对重大风险的理论解释——以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为例[J]. 探索,2021(3):69-81.
- [37] 刘欣,田丰. 城市基层党建与社区社会资本生成——基层社区党建的延展效应[J]. 学术月刊,2021(6):160-170.
- [38] 王杰,陈义平. 新时代推进韧性社区建设的实践经验与议题聚焦——基于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考察[J]. 湖北社会科学,2022(5):57-63.

- [39] 唐皇凤,王豪.可控的韧性治理:新时代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模式选择[J].探索与争鸣,2019(12):53-62.
- [40] 易承志.从刚性应对到弹性治理:韧性视角下城市应急管理的转型分析[J].南京社会科学,2023(5):63-71.
- [41] 容志.构建卫生安全韧性: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城市治理创新[J].理论与改革,2021(6):51-65.
- [42] 原珂.中国特大城市社区类型及其特征探究[J].学习论坛,2019(2):71-76.

Construction Path of Localization of Community Resilience Theory under New Security Pattern

WANG Chao, SONG Jixiang

(School of Public Policy&Management,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 Xuzhou 221116,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advent of risk society, resilience governance becomes the main path for community risk. Although the scholars have gone through the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of “learning-imitation-self-consciousness”, it is difficult to depict the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s of community resilience in China due to the theoretical limitations of disciplinary attributes, governance situations and grassroots perspectives. As the strategic thinking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the state on national security, the new security pattern provides a theoretical vision from both macro and local perspective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construct a localization analysis framework and practice path of community resilience theory from the dimensions of value, structure, management, technology and environment on the basis of deeply grasping the integrity, contingency, subjectivity and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ew security pattern. Value resilience pursues the “people-centered” risk response concept, and realizes the security of community residents and the participation of residents in the two-wheel drive; Structural resilience bridges the tension between hierarchical structure and network structure with the leadership of grassroots party organizations, and realize the coordination and cooperation of multiple governance bodies; Management resilience strengthens the dynamic coordination ability of multiple governance entities in the process of prevention, preparation, response, recovery and learning; Technical resilience is supported by technical means to enhance the information and resource integration capacity of grass-roots communities in response to risks; Environmental resilience realizes the interaction and coordination between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environment of the community with systematic thinking. This research exploration is fundamentally different from the existing western studies in terms of governance objectives, governance subjects, governance gravity and disciplinary orientation, and attempts to break through the theoretical limitations of the grass-roots perspective on the basis of abolishing local geochemical exploration and analysis, so as to promote the two-way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new security pattern and community security. It provides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constructing a discourse system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promot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security system and ability.

Key words: new security patterns, national security, community resilience, localization

责任编辑:赵超

地方政府首席数据官制度运行的现实审视与优化路径

陈新明¹,高小平²

(1.首都师范大学 管理学院,北京 100048;2.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北京 100017)

摘要:国家数据局成立后,政府首席数据官制度成为当前推进数字治理制度建设和公共组织数字化改革的新焦点。通过对地方政府首席数据官制度运行情况的调查发现,在组织结构方面,地方政府选择成立依托权威的层级制协同组织,形成包括战略领导层、协调管理层和业务执行层等三级政府首席数据官体系,并配合设立团队式、专家型等组织模式;在职能配置方面,政府首席数据官通常具备“治数”“统数”“用数”“监数”等四项核心职能,扮演数据战略领导者、数据资产运营者、数据开发赋能者、数据安全监管者等数字治理角色;在任职特征方面,现任的政府首席数据官学历水平与年龄分布较为合理,不过具备与数字化相关的学科背景与履职经历的领导干部数量占比不高。当前,地方政府依托政府首席数据官制度建设,通过建立协同机制,尝试解决“数字烟囱”等数字治理组织困境;通过明晰职责分工,尝试破解“群龙无首”等数字治理责任困境;配合数据行政管理机构改革,尝试打破“权威缺漏”等数字治理能力困境,制度效能初显。然而,制度运行中仍存在诸如政府首席数据官领导权威不足、权责边界待明晰,治理环节前重后轻、工作场景待拓展,技术型领导稀缺、人才储备待提高等问题。基于此,按照“结构—运行—赋能”的制度优化框架,提出建立“中央—地方”两层级政府首席数据官组织体系、将政府首席数据官提升为各级数字治理第一责任人等体制性实践进路,遵循数据共享全生命周期、服务数字治理全流程等机制性实践进路,设立“双政府首席数据官”、推进绩效管理和监督制度建设等工具性实践进路。

关键词:政府首席数据官;数字治理;大数据局;数字化组织变革;制度创新

中图分类号:D63-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23)06-0080-13

《国务院关于加强数字政府建设的指导意见》强调,要“健全数字治理制度”,“到2025年,政府数字化制度规则等数字政府体系框架基本形成”。2023年3月,党的二十届二中全会通过的《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明确要组建国家数据局;同年10月,国家数据局正式揭牌成立。这是国家层面的数据治理制度改革和机构职责优化,也是对学界和业界多年呼吁的回应。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数字中国战略推进,各地陆续设立大数据管理专职机构,也为本次机构改革积累了丰富的地方探索经验。国家数据局设立之后,学界和业界已探讨多年的政府首席数据官制度,自然成为推进数字治理制度建设和组织体系建设的新焦点。探索建立政府首席数据官制度,既是地方政府提升信息化履职能力和行政效率的重要举措,也是地方政府响应国家数字化发展战略和建立长效数字化转型机制的重要抓手。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应急领导力的结构、测量、形成机制与发展路径研究”(22YJCZH020),项目负责人:陈新明。

作者简介:陈新明,男,博士,首都师范大学管理学院讲师;高小平,男,博士,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学术顾问,研究员。

1 文献回顾与问题提出

1991年美国制造商和贸易商银行(M&T Bank)创造性地任命了第一位首席数据官,不过这并非一个高层级的管理岗位;2003年美国第一资本(Capital One)金融公司首次任命首席数据官作为高管。随着互联网和移动技术高速发展,信息爆炸带来海量数据,特别是2006年谷歌提出“云计算”概念之后,首席数据官这一以数据为中心的组织高层管理角色开始进入更多行业,普遍作为数据处理、分析、挖掘、交易以及在企业内部治理和利用信息资产的高管,负责企业数据相关战略工作。一份连续调查的结果显示,在94家《财富》1000强企业和行业领先组织中,任命首席数据官的比例从2012年的12%上升至2022年的73.3%^[1]。该趋势也很快影响到了公共部门的组织设计,2009年美国科罗拉多州率先设立政府首席数据官,随后纽约、伊利诺伊州和康涅狄格州也先后设立了首席数据官。2019年,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签发的《基于循证决策的基础法案》规定,“联邦政府各机构负责人应指定一名非政治任命的常任制雇员担任机构的首席数据官”。除美国外,法国、英国、新西兰等国家也纷纷实行政府数据官制度。在当前的组织设计中,首席数据官成为诸多被赋以“首席”头衔的组织职位之一。随着数据被视为一种新的生产要素和决策依据,越来越多的公共部门将数据官视为数字时代组织转型和数字化赋能的有力助推。而当年首位首席数据官高管卡茜·当斯(Cathy Doss)女士也离开美国第一资本金融公司到非盈利的美联储第五区奇蒙德联储担任首席数据官。在中国,首席数据官同样较早出现于企业组织。2012年阿里巴巴集团设立首席数据官,由前淘宝网CEO兼阿里巴巴集团执行副总裁出任,其他互联网企业纷纷跟进开始设立该职位;2015年9月,中国新一代IT产业推进联盟联合易观智库、华为技术等在北京成立首席数据官联盟。2015年国务院印发的《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系统部署了我国大数据发展工作;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建设数字中国的战略目标,数字被视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资源。此后,地方政府开始出现首席数据官这一职位并逐渐上升至制度层面,目前已有北京、天津、广东、广西等省级政府发布试点政府首席数据官制度的专项文件;杭州市、南阳市镇平县、马鞍山市当涂县等市县级政府也开始探索政府首席数据官制度。

中国地方政府首席数据官的制度实践轨迹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018年到2021年的萌芽探索期。随着国家大数据战略的推进,各地开始探索适应数字化要求的组织变革。借2018年新一轮省级机构改革方案陆续发布之机,部分地方组建或调整了数据治理机构,同时开始尝试将企业的首席数据官引入公共部门。比如山东省评选的2018年度全省“优秀首席数据官”中,除企业、高校外,诸如工商局、公安局、人社局、民政局信息中心等地方政府部门的首席数据官也有入选;广东惠州市2018年成立首席信息官与数据官协会,部分事业单位的首席数据官参与其中。不过,这段时间公共部门出现的首席数据官,大多仅是增加了组织中信息部门主管的称谓,而尚未进行职位的系统性制度设计。202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将“数据”定位为五种参与分配的生产要素之一,并提出加速培育数据要素市场。地方政府贯彻数字战略的步伐加快,首席数据官制度开始进入地方政府政策议程。2020年福州市印发的《数字福州工作要点》中指出,“加强部门政务数据管理,落实部门首席数据官制度”;2021年上海市出台的《上海市数据条例》强调,“本市鼓励各区、各

部门、各企业事业单位建立首席数据官制度”；浙江省发布的《浙江省数字政府建设“十四五”规划》中提出，“探索建立‘首席数据官’”；同年广东省率先出台《广东省首席数据官制度试点工作方案》专项政策文件，明确了政府首席数据官的使命、工作机制和职责范围，并在10个地级市及6个省属机关试点首席数据官制度。第二阶段是2022年至今的快速发展期。2022年出台的《国务院关于加强数字政府建设的指导意见》明确了政府部门数字化改革的战略方向。各地在构建现代化政府机关职能体系和机构编制配置管理体系的过程中，开始纷纷设置首席数据官。课题组调研发现，截至2023年4月全国有15个省级政府出台了首席数据官专项文件或将其列入政策议程、76个地级市推行首席数据官制度^①。

当前学界的相关研究主要聚焦于政府首席数据官制度建设的应然层面：一是制度构建的必要性和价值，将政府首席数据官置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宏大场域^[2]，探讨与国家信息化发展、推进数字中国建设等战略协同问题^[3]；二是制度内容的理论设计，包括政府数据官的角色与职能划分^[4]、选任方式与评价维度^[5]、设置模式与运行机制^[6]等；三是制度推进的多元路径，包括组织法构造^[7]、与大数据局的制度衔接^[8]等。而实然层面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域外企业与公共部门首席数据官制度的运行特点分析和经验总结介绍^[9]⁴¹⁻⁵²，缺乏从组织层面对这一制度运行进行现实审视。

那么，当前中国政府首席数据官制度的运行现状如何？效果怎样？存在什么问题？未来实践发展方向是什么？随着政府首席数据官制度地方试点日益增多，这些问题亟待解答。由于中央层面尚未设置政府首席数据官，本研究聚焦已经设立政府首席数据官或已发布试点方案的省级市和地级市，借鉴新制度主义的理论视角，分析当前地方政府首席数据官制度的运行现状、效能等实然层面，并结合现存问题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2 地方政府首席数据官制度的运行现状

新制度主义对于制度概念的界定非常宽泛，几乎涵盖了所有能够对个人或组织产生影响的正式或非正式的规则、惯例、程序。制度是政治的基础特征，不仅仅是一种激励或约束机制，更意味着规范或规则。制度运行能够形成外在的制度环境，从而对组织的结构、程序、实践产生影响。当前，首席数据官在各地已不仅仅是一类简单的工作岗位，而是作为一种规范性的制度出现，运行过程中蕴含的权力行使方式能够对所在地方政府的数据管理行政组织产生深刻影响。本研究对已经设立政府首席数据官或已发布试点方案的省级和地级城市展开调查（不含港澳台），采取查阅地方政府官网、直接电话咨询、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和查阅官方媒体信息等方式，从组织模式、职能配置、任职特征三个方面对地方政府首席数据官制度的运行进行现实审视。

^① 调研过程如下：课题组依托首都师范大学数字治理与智能决策研究中心，首先以“北大法律信息网”（北大法宝V6）为政策文本数据库，分别使用“政府首席数据官”“数字政府”“大数据局”等主题词进行精确检索；其次，对匹配搜索出的政策文本进行筛选，剔除失效政策、会议通知、重复政策、提案答复、批复函、多批次的目录类政策、项目申报通知等，形成政策文本目标对象；再次，检索政府网站补充核验政策文本；最后，为进一步确保样本相关性和准确性，邀请数字政府领域学者和相关政府部门实务工作者核验政策文本，并查阅地方政府官网、直接电话咨询、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和查阅官方媒体信息等方式，校准和最终确定政策文本数据库和实行政府首席数据官制度的城市目录。

2.1 政府首席数据官的组织模式

本次调查发现,地方政府通常依托数字城市或数字政府工作领导小组,采取“市级—部门”层级制政府首席数据官组织模式(见图1)。当前,各地纷纷成立数字城市或数字政府工作领导小组等落实数字中国战略的任务型组织,负责数字管理、信息化建设的市级分管领导担任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或主要负责人。该组织下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等办事机构,成员单位主要是市级职能部门或者职能部门负责数字化、信息化工作的科室。大数据局或者市政府办公室作为牵头单位,其负责人兼任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成员单位分管相关科室的行政副职担任副主任。这种组织形式往往以开放的组织结构适应任务环境、以聚焦特定专项目标提升治理效能,从而具备较强的行动优势^[10]。而地方政府往往依托数字化工作领导小组拥有的特定赋权、特定人员、特定资源,设置三级首席数据官体系。第一级是战略领导层,数字化工作领导小组中负责数字政府、信息化建设的市级分管领导担任政府首席数据官。第二级是协调管理层,数字化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担任政府首席数据执行官,负责战略落实与部门协同等工作。第三级是业务执行层,该层级往往由两类人员组成:一是人社局、交通局、公安局等职能部门负责人,或者职能部门数字化、信息化建设的分管领导担任政府首席数据代表/部门(单位)首席数据官;二是职能部门相关业务科室人员担任数字专员,他们负责数字化建设的具体工作事项。首席数据官和首席数据执行官由数字化工作领导小组任命,而首席数据官任免通常须向省级数据管理机构报备;首席数据代表和数据专员由职能部门任免,向数字化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报备。如果城市首席数据官制度推进至下辖区县,则同构化这种组织体系,区县数字化工作领导小组负责人担任本级首席数据官,同样也是本市数字化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成员。在该组织体系下,通常存在两种协同联动的工作机制。一是联席会议机制。数字化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召开全市首席数据官联席会议,政府首席数据官召集各区县、部门的首席数据代表或本级首席数据官参加,共同研判相关战略决策,协同联动各区、各部门的数据管理工作。二是述职报告机制。政府首席数据官同时也是全市数字化建设的主要负责人,各区县、部门的首席数据代表或本级首席数据官定期向其汇报相关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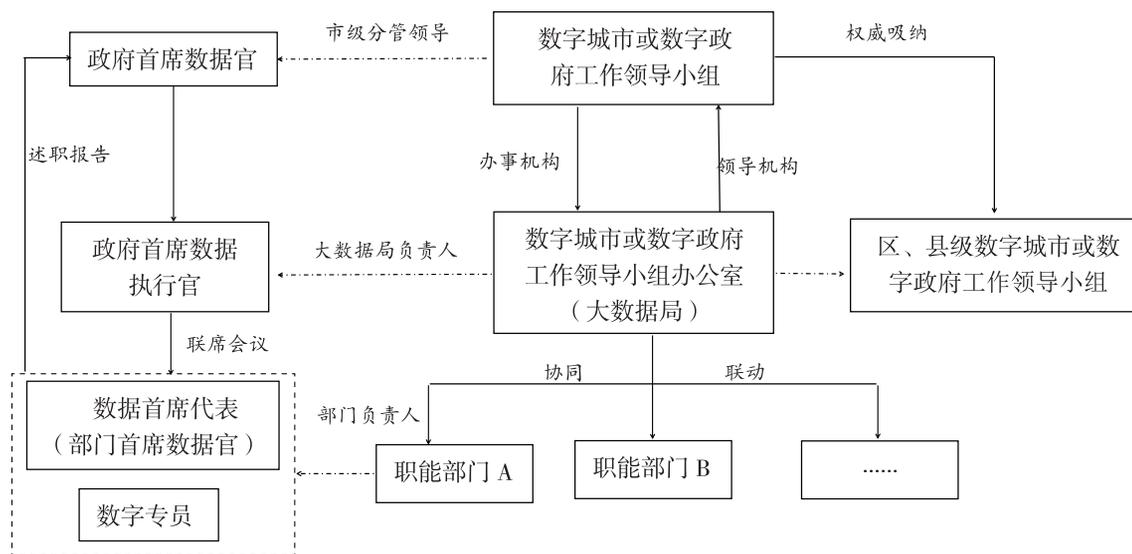


图1 地方政府首席数据官组织体系

此外,有些地方采取另外两种组织模式。一是团队式政府首席数据官组织模式,如安徽蚌埠市。该模式往往将若干职能部门作为推行首席数据官的试点单位,分管信息化、数据资源的部门负责人担任数据官,再从本单位选出数据专员或首席代表协助首席数据官开展工作。这样每个试点单位拥有一支首席数据官队伍,负责本领域的数据归集、开发利用以及数字化场景建设等工作,市委市政府负责首席数据官的任免和考核。二是专家型政府首席数据官组织模式。该模式的主要特点是政府首席数据官的选任范围不拘泥于政府组织内部,选任标准突出专业性,比如深圳市龙华区任命电子科技大学(深圳)高等研究院的教授为龙华区首席数据官。

2.2 政府首席数据官的职能配置

课题组对调查收集的文本进行梳理与整合,通过 Nvivo 软件拆分文本单元提取关键词或短句,完成开放编码、主轴编码及选择编码(由于篇幅限制,省去具体编码过程),提炼出政府首席数据官的“治数”“统数”“用数”“监数”四个核心职能。

“治数”——数据战略领导者。设立首席数据官的地方政府,几乎都将数字化战略制定与执行列为政府首席数据官的首要职能,一方面组织落实省、市数字化改革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决定事项、部署任务;另一方面组织制定本级政府或者本部门的数字化发展规划和实施计划。政府首席数据官被赋予了数据治理的决策权和领导权,需要承担起业务战略与数据战略相融合的职责,负责建立健全数据治理组织体系架构、方针、标准规范及配套制度,并确保数字治理体系的有效运行。发展数字经济、建设数字政府、推进智慧城市等是当前政府首席数据官的核心战略支点,具体包括运用数据生产要素,推动传统行业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促进信息化和工业化的融合,为经济发展提供数字化新动能;加快完善数字基础制度和基础设施,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以及政务信息整合;推进交通、环保、气候、治安、医疗等智能服务建设等。

“统数”——数据资产运营者。数据被视为生产要素,各地也将政府首席数据官视为数据资产运营者,实现对数据的统筹、统建、统管。一是数据全生命周期管理者。政府首席数据官需按数据全生命周期进行整体规划和统筹协调,承担选定数据源、界定数据归集策略、实现不同类型间的技术转换、保证数据质量等职责,开展数据资源普查、采集汇聚、质量管控、流通融合等工作,建立真实、准确、完整、时效和可用的数据资产池。二是数据协同推动者。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是数据管理的关键要素。政府首席数据官需要打破传统信息化建设中碎片化、重叠交叉的数据渠道,通过完善数据平台的技术支撑、优化数据流动机制、创新数据治理形态等,实现本级政府与上下级政府之间、本级政府部门之间的数据共商、共建、共享。不同层级的首席数据官设置,也实现了数据资产的分层分级管理,旨在摸清数据资产底数、确保数据资产质量。

“用数”——数据开发赋能者。发挥数据要素效能是数字治理的关键^[11],挖掘数据资源价值、创造数据应用场景、组织开发面向数据要素市场的相关数据产品和服务成为政府首席数据官的核心职能,包括推动数据辅助政务决策、支撑政府履职、服务企业和便利群众业务办理等。如安徽亳州市将“推动公共数据与社会数据融合和应用场景创新”明确列为政府首席数据官职能,并要求“原则上每年打造5个以上的数据共享应用示范场景”;安徽滁州市将“依托城市大脑,打造典型应用”列入政府首席数据官重点任务清单;广东韶关市要求政府首席数据官“开展数据治理应用”等。

“监数”——数据安全管理者。数据被视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性资源,各地政府也愈加重

视数据安全问题,政府首席数据官需要对数据安全进行风险评估、监测预警和应急处置,牵头制定本单位数据安全策略,协调建立数据安全技术保障措施。如广东江门市印发的《江门市政务数据安全管理办法》明确政府首席数据官是本级政务数据安全第一责任人;天津市将“公共数据安全保障能力”列为政府首席数据官的核心胜任素质之一;广西河池市强调政府首席数据官“开发安全可信的数据环境”等。

2.3 政府首席数据官的任职特征

课题组采用常用的领导干部简历数据收集范式^[12],将设立政府首席数据官城市的行政区划代码输入随机数生成器,随机抽取出上海市、亳州市、岳阳市、深圳市、巴中市、合肥市、钦州市、肇庆市、滁州市、沈阳市、保定市、杭州市等12个城市,样本分布东、中、西部地区,城市层级包括直辖市、省会和地级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涵盖一二三线城市,具有较强代表性。通过地方政府官网、直接电话咨询、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和查阅官方媒体信息等方式,共收集样本城市政府首席数据官系统中70位人员的履历信息,其中市/区政府首席数据官12位、部门政府首席数据官(首席数据执行官、首席代表)58位。邀请大数据管理与应用专业的学者和政府部门工作人员对履历中工作部分进行判断归类,将归类结果进行对比,出现分歧时专家共同协商确定(一致性判断超过80%)。统计分析结果如下(见表1)。

表1 样本政府首席数据官履历基本情况

		市或区政府首席数据官	部门政府首席数据官
性别	男性	91.7%	92.3%
	女性	8.3%	7.7%
年龄	56~60岁	33.4%	36.5%
	51~55岁	33.3%	36.6%
	50岁及以下	33.3%	26.9%
学历	本科以下	0%	17.3%
	本科	41.7%	53.9%
	硕士研究生	41.7%	25.0%
	博士研究生	16.7%	3.9%
专业	计算机、信息化、数据科学等相关专业	9.0%	3.9%
	其他	91.0%	96.2%
工作内容	负责过信息化、数字化等专项工作	18.1%	20.6%
	其他	81.8%	79.4%
职务	担任主要领导职务	100.0%	73.2%
	无	0%	26.8%
工作经历	有政府部门之外的工作经历	27.3%	16.8%
	无政府部门之外的工作经历	72.7%	83.2%

在本次抽样调查的样本中,男性政府首席数据官的占比超过九成;平均年龄为53.2岁,担任市/区县或者部门政府首席数据官的最大年龄均为60岁。从学历分布来看,本科及以上学历

占比超过九成,其中担任市或区政府首席数据官中研究生学历占比接近6成;从所学专业来看,33.8%的人具有理工科背景,不过与计算机信息科学、通讯工程、数据科学相关的学科专业占比约为5%。分析政府首席数据官的过往工作经历发现,曾负责过信息化、数字化等专项工作的占比约为20%,如曾担任过负责工业和信息化建设的发改委副主任、主管经济社会调查数据管理的统计局副局长、担任信息与电教科科长等。现任政府首席数据官同时兼任市/区政府党组成员的占比为100%,不过超过四分之一的部门政府首席数据官未进入本单位党组。大约有不到20%的政府首席数据官曾有政府部门之外的工作经历,主要来自学校或者医院。

综上所述,尽管目前在中央层面没有统一的制度安排,但地方政府在组织模式、任职特征、职能配置等方面都表现出了一定的相似性。新制度主义理论认为,在制度环境的约束下,地方政府组织为了追求合法性和资源而选择在结构、程序、实践上,往往会表现出强制性趋同、模仿性趋同和规范性趋同^[13]。此外,政府首席数据官制度在各地实际运行中也存在团队式、专家型组织模式,人员任职等表现出差异性和多样化特点,可见制度通过学习来确认和适应变化的环境,组织能够充分发挥能动性构建新制度或改造已有制度^[14]。在组织管理实践中,地方政府首席数据官因地制宜推动制度变迁作为对制度环境的回应,对外表现出制度的复杂性。

3 地方政府首席数据官制度的运行效能

新制度主义在提出之时就指出,制度运行的逻辑并非与技术效率完全一致,斯蒂尔斯进一步明确了“效率”和“效能”概念的区别,认为前者主要关注单位产出消耗的资源数量,后者则关注组织目标的实现程度^{[15]51}。因此在分析地方政府首席数据官制度的运行效能时,可以考虑从数字战略实施、人才队伍建设、国家治理效能等增进公民福祉的目标入手。观测政府首席数据官制度运行发现,当前各地通过建立协同机制,尝试解决“数字烟囱”等数字治理组织困境;通过明晰职责分工,尝试破解“群龙无首”等数字治理责任困境;配合数据行政管理机构改革,尝试打破“权威缺漏”等数字治理能力困境。

3.1 建立层级制的协同结构,推进数字战略实施

当前,各地政府首席数据官的主要组织体系,实质上是一种依托权威的层级制协同模式。如何打破数据孤岛、推进数据共享开发利用是数字治理亟待破解的核心难题,同时信息分散化、管理碎片化、部门间相互封锁等也是困扰层级制组织的传统问题。政府首席数据官制度依托数字化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等任务型组织,通过述职汇报、任免报备等机制,将数据治理信息在上至省级单位、下至区县部门间贯穿流通,实现了纵向的上下联动;同时,借助数字化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同级部门召开联席会议,明确分工和任务,实现了横向的左右协同。组织结构确立后,政府首席数据官的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等随即落地。此外在调查中发现,政府首席数据官制度与地方数字战略的制定和执行密切相关。在诸如上海、浙江、北京、内蒙古、贵州等地的发展数字经济、建设数字政府、促进数据要素市场发育等政策文件中,均不同程度地提及政府首席数据官制度,政府首席数据官负责制定本地数据战略规划、建立数据管理标准、提出数据治理目标、破除数据共享障碍、保障数据质量和安全等。可见,政府首席数据官制度已被地方政府视为推进数字化建设的战略支点。

3.2 明确数字建设负责人,丰富数字治理末梢

实现数据协同治理,需要明确责任机制。在当前数字治理实践中,组织内部往往存在数据治理责任越位,亟需统筹领导以共享和交换数据,实现数据的打通、合并和统一,减少数据所承载的各类政务重复办理,节省行政成本;组织之间往往存在数据治理责任缺位,数据归集对象停留在传统文件归档或部门履职产生的政务数据层面,没能包括反映经济社会运行状态痕迹的各种数据;组织与外部往往存在数字治理责任错位,数字治理生态尚需优化,数字治理效能有待提升^[16]。而政府首席数据官按照数据全生命周期规律,有力协调和整合多个部门资源,成为地方政府数据治理的主要负责人。此外,各地在政府首席数据官组织体系建立过程中,还任命了数据专员,数据归集、数据共享、数据治理、数据开放等工作有了专人负责,数字治理末梢延伸至基层单位和部门,如浙江丽水市出台《关于进一步完善首席数据官和数据专员工作制度的通知》,建立数据专员“AB”岗制度;安徽马鞍山市将“政务数据大厅”的首席代表任命为数据专员,负责数据治理具体工作开展。为了提升首席数据官、数据专员等业务能力,各地还组织开展业务培训,营造数据应用和素养提升的社会氛围。

3.3 配合行政机构改革,保障组织数字化转型

传统的政府数据管理模式中,各部门内部办公室承担本部门数据关联业务的综合协调职责,负责数据规划和融合工作;网络部、信息中心等负责数据相关的技术工作;业务科室自行采集生成本科室履职过程中产生的相关数据;数据管理部门则是资料管理科室或数据管理中心等。数据生成部门不管理数据,数据管理部门不是数据利用的业务部门;部门间缺乏数据统筹共建的组织设计。为了解决多头管理、交叉分散等问题,地方政府先行探索建立大数据局等机构,负责数据基础制度建设,统筹推进数字战略。2023年,中央层面整合网信办、发改委、工信部、公安部等相关职能司局职能,成立国家数据局,隶属国家发改委。各地成立大数据局之后,开始探索建立政府首席数据官制度。大数据局负责人往往兼任政府首席数据执行官,协助首席数据官开展日常工作,抓好首席数据官交办任务的推动落实、督查督办等;同时,大数据局负责人还担任数字化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等职务,其他职能部门相关负责人担任副主任或者小组成员,通过组织隶属关系、联席会议机制、团队合作体系等实现大数据局对其他成员单位数据治理工作的协同管理和业务指导。此外,建立政府首席数据官制度之后,政府购买第三方数字化服务等外包活动、部门信息化建设、单位数字化培训等工作都有了专门的制度保障和对接人。政府首席数据官制度正成为公共部门推进组织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抓手。

4 地方政府首席数据官制度运行中存在的问题

政府首席数据官制度在推动数字治理等方面发挥着效能作用。但不可否认,目前我国政府首席数据官制度还在探索阶段,存在诸多不完善之处。通过理论分析与现实观察,发现地方政府首席数据官制度在运行中主要存在制度供给不足、工作场景单一、专业能力不足等问题。

4.1 制度供给不足,权责边界待明晰

当前,大部分地方依托数字化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立类似于“林长制”“河长制”等层级制协同组织体系,实质上是试图建立领导干部数字治理的“包干制”,主抓数字协同。这就要求政府首席数据官对本地数据治理最具发言权,既担任管理者也是责任人。然而,当前政府首席数

据官权力边界较为模糊,比如各地相关政策文件中多有提及政府首席数据官“协调解决市级政府或本单位数字化项目建设中的重大问题”“对数据治理运营、信息化建设等执行情况进行监督”,不过政府首席数据官对数字化项目立项、验收等工作拥有多大决策空间,是否具有“一票否决权”等问题,缺乏明确制度规定。统筹整合不同部门、不同机构间的数据开发共享等,需要赋予政府首席数据官一定的权威性,这样才有利于打破部门间数据协同的隐性壁垒。但当前地方政府普遍没有制定相关规章制度对首席数据官的任职资格、职责范围、权限边界等加以明确规定,导致相应规则、机制供给不足。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数据协同等工作高度依赖组织权威,政府首席数据官在政府领导班子中的排名位次、数据局负责人的个人能力可能直接决定政府首席数据官制度运行效果。不过,受限于信息化建设的组织注意力长期分配不足,组织数字化转型待深入,以前负责信息化工作的人员兼任部门数据官后组织权威不足。课题组调查发现,很多部门数据官由无领导职务或邻近退休年龄的调研员担任。

4.2 治理环节前重后轻,工作场景待拓展

从当前制度运行实践来看,政府首席数据官的数据汇集职能较为凸显,外部服务能力不足。政府首席数据官往往通过提高部门与国家、省数据接口对接数量、完成数据资源目录编制、获取上级回流数据等,增加政务数据汇集总量;同时借助数据共享交换平台、公共数据资源平台建设,汇聚市场主体、市场监管、城建住房、地理空间、生态环境等类型数据,提升社会数据汇集总量。不过,政府首席数据官的职能不能仅停留于当前的数据采集环节,一方面,当前政府对内部数据潜在价值的挖掘和利用还远远不够,经验决策亟待向数据驱动决策转型,政府职能转变、公共服务水平提升亟需数据提供内容支撑;另一方面,政府部门缺乏与企业等外部组织提供协同数据公共服务的合作渠道。这就要求政府首席数据官更应成为新政务、新服务和新业态的赋能者,促进数据治理形态的创新,通过积极探索小切口应用场景,把制度优势转化为人民有感的治理效能。当然,这也对政府首席数据官的评价机制提出更高要求。虽然各地政府首席数据官建设方案中均提及考核评价环节,不过由于缺乏科学的评估标准和系统的评价体系,在方案落实过程中关于“工作成效”“创新特色”等维度的评价,容易划入简单的数据汇集数量比较,从而固化了政府首席数据官的数据汇集职能,不利于应用场景建设的开拓创新。

4.3 技术型领导稀缺,人才储备待提高

根据党政干部选拔的素质观模型,党政干部能力素质的主要来源是学历教育和工作经历^[17]。从课题组的抽样调查来看,计算机、信息与通讯工程、数据科学等相关专业在政府首席数据官群体中的占比偏低;而具有与信息化、数字化等相关专项工作经历的占比同样不高。虽然当前政府首席数据官多兼任本级信息化、数字化工作的负责人,不过从所学专业和过往经历来看,大部分人缺乏相关教育背景或工作历练。数字治理是需要高度协同的治理场域,领导能力是政府首席数据官的必备素质。我国选贤任能制度具有“选拔式”培养干部的特点,担任领导岗位的干部通常具备一定的领导能力^[18]。不过,与其他行政管理岗位不同,数字专业素养同样是政府首席数据官胜任力不可或缺的一环。比如市级政府首席数据官需要负责数字发展战略的规划工作,部门政府首席数据官日常工作涉及诸如采集数据、存档归档数据等责任主体划分以及管理规范设定等,如果缺乏相关专业背景和经验,将对他们领导和开展相关工作提出很大挑战。此外,在当前数字政府建设实践中,地方政府或相关部门针对诸如网络平台、数据储存管理

云平台、公共数据共享交换平台等技术支撑体系建设,往往采取外包的方式。作为项目负责人,政府首席数据官同样需要具有一定的技术素养,这不仅是判定项目绩效的必要条件,也是识别平衡数据流动和数据安全等专业问题的必备素质。

5 政府首席数据官制度运行的优化路径

与大数据局类似,政府首席数据官也是地方政府率先开始的数字时代组织制度探索,并在提升数据汇集质量、打破数据共享隔阂、进行数据安全等方面效能初显。不过,在当前的制度运行中也暴露出诸多问题。行政管理制度在实践中大部分表现为静态的结构化形态和动态的运行化形态^[19],而在现代政府治理体系中,赋能型制度为前两者运转提供了稳定的环境能量。基于此,本研究按“结构—运行—赋能”框架,依托当前大数据局管理模式,提出政府首席数据官制度优化的体制性、机制性以及工具性进路。

5.1 完善组织设置和职能配置,夯实结构性制度基础

结构性制度是将特定目标和任务以职能的形式赋予组织,实现行政权力的合法性配置,是行政管理体制的规则体系。组织权力一经创立,其他诸如职责、机构、编制等组织要素也随即确立。政府首席数据官的结构性制度主要表现为静态的组织设置和职能配置。因此,政府首席数据官制度优化的体制性进路可以从以下两个层面进行探索。

一是建立“中央—地方”两层级政府首席数据官组织体系。第一,在总结地方试点经验的基础上,设立中央层面的政府首席数据官,直接向国家数据治理决策机构的领导汇报工作,参与制定国家数字化战略;设立省级层面的政府首席数据官,直接向省级数字治理决策结构的领导负责,参与本省数字化战略的决策。第二,建立垂直管理的数据专员队伍,形成国家数据局和省级大数据局分工合作的管理体系,省级政府首席数据官垂直管理市县级(部门)数据专员。数据专员是政府首席数据官制度体系的“神经末梢”,负责对部门政务数据、社会数据、网络虚拟组织数据等收集、整理、汇总、上报工作。数据专员的工作质量直接关系到数据质量、公信力、透明度。依托网络、数据储存云管理、公共数据共享交换等平台建设,建立垂直管理的数据专员队伍。第三,采取“123”机制,加强数据稳定性和质量治理。前端数据质量是中端数据共享和后端数据开发利用的基础。“1”是指实行“实名制”数据流程化管理。基层人员流动频繁,为防止新任数据专员不知数据来源和生产方式等情况,可将采集人、核对人、审核人、录入人等个人信息“实名制”,一方面可以保证新老数据专员的沟通协作;另一方面有利于汇集数据的稳定性和连续性,方便对数据进行核实、比对、勘误、修改等溯源管理和复查。“2”是指实行“双人制”岗位设置。总结试点中的“AB”岗制运行经验,规范数据汇集过程。“双人制”方便对数据采集方法、过程、结果、范围、计算公式、权重等进行比对,提高汇集数据的可靠性。“3”是指实行“三审核”制度。数据汇集后,需要数据专员初审、数据代表复审、首席数据官终审。

二是将政府首席数据官提升为各级数字治理的第一责任人。职能是政府活动的起点。针对当前首席数据官责权配置不明晰的问题,应以规范性文件形式明确政府首席数据官数据治理的法律规范依据,确立其数字治理第一责任人的定位。数据协同管理是数字治理的关键环节,而当前政府首席数据官依托权威的纵向协同模式,很大程度上受介入合作行动的组织层级、数量、主要领导个人意愿以及组织文化等方面的影响,各地政府首席数据官的协调能力参差不齐,

而职权界限模糊同样影响政府首席数据官的行为。从地方实践来看,诸如北京市、广东省江门市已经明确政府首席数据官是数据安全的第一责任人。不过,为了更好地促进政府首席数据官统筹管理政务数据、提高其协调内外部数据关键节点的能力,应进一步确立政府首席数据官是本级数字战略主要执行人和数字治理第一责任人的地位,明确政府首席数据官的领导组织架构、职权分配、选任程序、考核内容等,为制度运行提供规范保障。

5.2 服务数字治理全流程,激发运行性制度效能

运行性制度是在结构性制度产生的权力和职能共识基础上,带动制度动态、有效运转的规范。运行性制度通过机制设计使得静态组织结构和职能设置得以落实。遵循数据共享全生命周期,政府首席数据官制度优化的机制性进路可沿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第一,实施全国联网、网上直报的数据信息工程以及预录入机制,保障数据治理前端质量。针对科层制数据分级管理的不足,可依托共享数据平台等技术支撑,推行全国联网、网上直报、整合各数据平台作业,维护数据管理的相对独立性。同时,可采取预录入机制,在各级首席数据官提交上报国家级数据平台前,设置一个修改补充期,允许数据修改和增减,以保证数据汇集质量。第二,在总结各地数字化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经验基础上,建立从中央到地方的政府首席数据官委员会,加强数据共享过程中的数据治理能力。通过定期召开联席会议等机制,一方面可以共同商讨制定各级数字治理战略;另一方面可以保证治理信息通畅,下级部门进一步明确上级部门的战略使命,上级部门了解下级部门在战略执行过程中形成的经验和遇到的问题,共同推进数据治理能力现代化。第三,加强与企业的合作,创造更多的数据治理场景,提升数据治理效能。首席数据官制度源于企业,北京、山东等地已成立企业、科研院所等组成的首席数据官联盟;江苏省、四川省、安徽合肥市等地,相继出台企业首席数据官制度建设指南。政府首席数据官可以与企业首席数据官组建更大范围的首席数据官联盟,建立合作机制,企业数据官负责将数据要素隐性价值充分转化为企业降本增效的显性价值;而政府首席数据官则在此过程中挖掘数据治理的公共价值,全面推进内外部数据产品在公共部门的综合应用,丰富智慧城市等治理场景,形成云计算、大数据人才、数据资源、行业资本、政府企事业单位汇聚的“智慧信息中心”。

5.3 推进数字化人力资源开发和管理,提升赋能性制度效力

赋能性制度通过具体规则、方式、方法等工具性制度,保障结构性制度的体制机能和运行性制度的机制效能。政府首席数据官制度优化的工具性进路可从选任、考核、监督、培训和人才开发等方面进行探索。

一方面,依托选贤任能制度优势,选拔任用能够胜任职能需求的政府首席数据官。可以借鉴“双河长制”“双林长制”等制度实践经验,设立“双政府首席数据官”。通过竞争上岗等形式,从政府组织内部选拔熟悉行政管理规则、具备较强领导力的人员担任行政型政府首席数据官,全面负责数字治理工作。针对数字治理技术性要求较高,而政府部门通晓数字技术和行政管理的复合型人才稀缺的问题,可以采取社会公开招聘等方式,从企业、科研院所、高校等选拔数据治理方面的专家学者担任技术型政府首席数据官,比如美国交通部首位首席数据官曾是咨询公司的管理顾问;纽约州雪城市首位首席数据官来自媒体行业。他们与企业中首席信息官的角色类似,更偏重技术层面的管理工作,建立数据架构、推进技术支撑系统建设、对数字化项目进行

技术审核等,参与数字治理的决策,对行政型政府首席数据官负责。另一方面,完善政府首席数据官的绩效管理。在推进数字化战略,建设数字政府、智慧城市、数字乡村等过程中,围绕促进数据共享和透明度、提高数据驱动的决策能力、保护数据安全等方面,科学设立政府首席数据官的绩效任务;建立系统性评价考核体系,采用内部考核与外部评价相结合的方式,基于治理实践提炼兼具实用性和专业性的关键指标;结合激励和问责机制,建立绩效反馈制度。同时,重视政府首席数据官监督制度建设。借鉴财政部地方监管局等垂直管理机构的建设经验,在大数据局内部设立诸如数据地方监督局等单位,配合数据常态化稽查等活动,防止政府首席数据官的权力随数据蔓延而无限扩张。通过职能责任、流程操作、技术规范等法规制度的整体性建构,监督政府首席数据官在个人信息保护、维护组织数据安全等方面的履职情况。此外,还应建立政府首席数据官数字治理的知识培训和能力开发体系,提升公务员群体的数字素养,提高公共部门技术性人才储备。

参考文献:

- [1] New Vantage Partners. Data and AI leadership executive survey 2022[EB/OL]. (2022-01-11). https://www.wavestone.us/wp-content/uploads/2022/01/Wavestone_NewVantage_2022_Data-and-AI-Leadership-Executive-Survey-Report_4.pdf.
- [2] 蒋敏娟. 迈向数据驱动政府:大数据时代的首席数据官——内涵、价值与推进策略[J]. 行政管理改革,2022(5):31-40.
- [3] 夏义堃. 政府首席数据官制度的核心要义与运行分析[J]. 图书情报知识,2020(1):74-83.
- [4] 聂钰,肖忠东,冯泰文,等. 大数据时代首席数据官的角色与职责[J]. 中国科技论坛,2019(7):157-164.
- [5] 韩啸,余怡婷,王莉. 数字化转型中政府首席数据官的关键作用:来自德尔菲法的发现[J]. 数字图书馆论坛,2023(3):52-57.
- [6] 王东方. 政府数据开放视域下政府首席数据官制度的必要性及其构建[J]. 中国科技论坛,2022(7):140-146.
- [7] 张涛. 数据治理的组织法构造:以政府首席数据官制度为视角[J]. 电子政务,2021(9):58-72.
- [8] 夏义堃. 论政府首席数据官制度的建立:兼论大数据局模式与运行机制[J]. 图书情报工作,2020(18):21-29.
- [9] 张宏云,黄伟,徐宗本,等. 大数据领导——首席数据官[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
- [10] 刘柯,谢新水. 工作专班:应对临时性任务的政府组织形式创新[J]. 中国行政管理,2023(4):63-70.
- [11] 谢新水. 联通“平行世界”的数字场景:界面基础、驱动力量与时空冲击[J]. 探索,2022(2):140-152.
- [12] 王思琦,李雪. 编码领导干部:简历数据收集与整理中的问题及方法[J]. 公共管理评论,2022(4):108-131.
- [13] 陈世香,牛一凡. “制度趋同”:基层治理草根创新的扩散路径及其发生逻辑——基于“村情通”创新扩散的案例研究[J]. 公共管理学报,2023(4):156-167.
- [14] 林婉琳. 内生的制度运行和变迁——博弈论的分析视角[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4):158-166.
- [15] STEERS R M. Organizational effectiveness: A behavioral view[M]. Santa Monica: Goodyear, 1977.
- [16] 孟天广. 数字治理生态:数字政府的理论迭代与模型演化[J]. 政治学研究,2022(5):13-26.
- [17] 萧鸣政,张睿超. 选贤任能视角下党政干部选拔的素质观模型[J]. 公共行政评论,2023(3):1-24.
- [18] 陈新明,刘一弘. 应急管理领导力:应急管理现代化关键环节[J]. 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23(4):3-13.
- [19] 刘一弘. 应急管理制度:结构、运行和保障[J]. 中国行政管理,2020(3):131-136.

Realistic Review and Optimization Path of Local Government Chief Data Officer System Operation

CHEN Xinming¹, GAO Xiaoping²

(1. School of Management,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48, China;

2. Chinese Public Administration Society, Beijing 100017,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the system of chief data officers (CDOs) in the government has become a new focus in advancing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governance and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public sector organizations. Through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operation of CDO systems in local governments, it was found that in terms of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local governments generally establish hierarchical collaborative organizations supported by authority, forming a three-tier CDO system including strategic leadership, coordination management, and business execution, along with team-based and expert-based organizational models; in terms of functional allocation, government CDOs typically possess four core functions: governance, statistics, utilization, and supervision, playing roles as data strategy leaders, data asset operators, data development enablers, and data security regulators in digital governance; in terms of incumbency characteristics, the educational background and age distribution of current government CDOs are relatively reasonable, although the proportion of those with backgrounds and work experience related to digitization is not high, local governments rely on the construction of CDO systems to establish collaborative mechanisms, attempting to address challenges in digital governance organizations such as “data silos”. Through division of responsibilities, they seek to overcome challenges in digital governance accountability, such as “lack of clear leadership”. In coordination with the reform of data 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 institutions, efforts are made to break through the “authority gap” in digital governance capabilities, and initial institutional effectiveness is evident. However, there still exist issues such as insufficient authority of government CDOs and the need to clarify boundaries of power and responsibilities; a heavier focus on later stages of governance processes and the need to expand work scenarios; technical leadership being scarce and the need to improve talent reserves. Based on the context, this paper follows “structure-operation-empowerment” framework of institutional optimization, proposing systemic practical approach includ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a two-level government CDO organizational system at the central and local levels, and the elevation of government CDOs as the first responsible person for digital governance at all levels and so on; mechanistic practical approaches including following the full lifecycle of data sharing and serving the entire process of digital governance and so on; instrumental practical approaches includ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dual government CDOs” and the promotion of performance management and supervision system construction and so on.

Key words: government chief data officer, digital governance, big data bureau, digital organizational change,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s

责任编辑: 金华宝

组织再造、内容优化与制度建构： 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三重向度

——以利川市的“小院说事”实践为例

霍军亮

(华中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0)

摘要:新时代,党建引领乡村治理已经成为一种理论自觉和实践自觉,也是提升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抓手。党建引领乡村治理有着丰富的理论内涵,蕴含着深厚的学理逻辑。政治逻辑层面遵循了党的全面领导的根本原则,理论逻辑层面体现了基层党建与乡村治理之间的耦合关系,历史逻辑层面传承了中国共产党治理乡村的优良传统,现实逻辑层面回应了乡村社会的内在诉求。利川市的“小院说事”创新实践,通过搭建“说事”平台、设定“说事”内容、制定“说事”规范,充分发挥了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动员和政治引领作用,激发了农民群众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提升了农民群众的获得感,彰显了农民群众在乡村治理中的主体地位,促进了乡村治理主体的多元化,走出了具有本土性、创新性、前瞻性的乡村治理新路。利川市的实践探索有着深刻的理论意蕴和学理价值,体现了“组织—内容—制度”的逻辑框架,通过“组织再造”整合了党组织资源,提升了组织动员能力;通过治理内容的优化,回应了农民群众的利益诉求,激发了乡村治理活力;通过制度建构,重塑了乡村治理规范,提升了乡村治理的制度化水平。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党建引领乡村治理是一项系统行动,要以增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能力为根本,优化党组织覆盖体系;以关照农民生产生活为核心,完善乡村治理内容体系;以提升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为目标,重塑乡村治理规范体系。

关键词: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组织再造;内容优化;制度建构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23)06-0093-15

实现乡村有效治理既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也是全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和目标体现。中国共产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将“政党”嵌入基层治理已成为一种理论自觉和实践自觉,党建引领也已经成为提升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抓手。从顶层设计来看,党的十九大将“治理有效”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之一,并提出:“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1]32}2021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领导基层治理的坚强战斗堡垒,使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作用得到强化和巩固。”^{[2]3}党的二十大进一步强调:“坚持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抓党建促乡村振兴,加强城市社区党建工作,推进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持续整顿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有效实现党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新时代农村基层党组织引领乡村治理的机制和路径研究”(20BDJ011),项目负责人:霍军亮。

作者简介:霍军亮,男,华中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的领导的坚强战斗堡垒。”^{[3]67} 这些重要制度安排均为党建引领乡村治理提供了政治保证和政策依据。

但从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实然层面来看,乡村社会的转型使党领导乡村治理面临空心化、个体化、复杂化的现实困境^[4],乡村治理场域内还存在诸如自治权力的弱化、精英权力的异化、政治权力的悬浮、行政权力的失重等问题^[5],党建引领尚未能正确处理与乡村自治、法治和德治的分合关系,基层党建与乡村治理之间难以很好地融合为一体,从而导致了国家政策执行的“最后一公里”难题^[6]。这些问题不仅制约了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提升,也影响着乡村善治目标的实现。在全面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新阶段,如何创新农村基层党组织引领乡村治理的方式和方法,既保证乡村社会秩序,又激发乡村社会活力,不仅是实现乡村善治的关键,也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关键。

1 文献综述和问题提出

当前,学界主要围绕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理论内涵和提升路径展开了研究,为党全面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学理支撑。既有研究主要从政党、组织和社会等三种视角进行概括和解读。

1.1 政党视角

此类研究从“政党—统合”的分析框架解读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着重体现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学者们指出,党建引领乡村治理要突出政党对乡村社会的组织、凝聚与整合^[7],凸显基层党建在方向、道路、价值、组织等方面对基层社会治理的引领、整合与把控^[8],核心在于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基层社会的全面领导和构建“一核多元”的治理体系,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功能^[9],重点内容是要发挥基层党组织在治理中的政治引领、组织引领、能力引领、机制引领等功能,根本指向是将基层党组织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10]。

1.2 组织视角

此类研究从“组织—嵌入”的分析理路解释党建如何引领乡村治理,着重体现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功能。学者们认为,党组织是一种外部变量,基层党组织要通过渗入和重塑基层治理结构,改善社会力量的贫瘠与分散,实现“政党组织社会”^[11]。因此,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根本在于充分发挥党组织的组织功能,焕发组织活力,基层党组织要通过“结构嵌入”实现党组织的垂直覆盖和水平延伸^[12],运用身份嵌入、知识嵌入、文化嵌入和制度嵌入等四重嵌入的路径机制将党建融入地方社会,重塑党群关系,取得良好乡村社会治理成效^[13]。

1.3 社会视角

此类研究从“社会—整合”的分析维度诠释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主要路径,着重体现基层党组织的社会功能。学者们指出,实现乡村的有效治理需要外部力量与内部资源的有机整合与协同,基层党组织要与其他社会主体持续开展社会互动,通过建立交往互惠机制、社会规则机制、协商对话机制等建构社会生活共同体^[14],将不同治理主体吸纳进同一党建网络,塑造相互依赖性^[15]。因此,基层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核心是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社会动员功能,创新社会动员的内容和方式,组织动员村民参与社会事务,激发村民的集体行动^[16],并通过基层党组织对各级行政力量的渗透(向内整合)、对各级社会力量的吸纳(向外整合)和对广大农民群众的融

人(向下整合)等实现党对各种社会力量的多层次有机整合,最终实现党、国家与社会在基层社会的有机协调^[17]。

上述研究对于理解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内涵、根源、价值、存在的问题和路径具有启发,拓宽了学界对基层党建与基层治理的认知,为本研究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基础,但仍存在提升的空间。第一,既有研究较多关注党建引领乡村治理“应然”层面的理论推演,实证探索和“实然”层面的研究相对缺乏;第二,既有研究运用较多的是“冲击—反应”分析模式,多从乡村治理环境、内容和目标的变化出发,探讨农村基层党组织为适应这类变化而做出的被动调适,对农村基层党组织主动适应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而调整党组织建设目标、优化建设内容的研究相对较少;第三,关于哪类因素或何种机制能够在党建引领乡村治理方面长期发挥作用,既有研究并没有给出详细回应。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将立足乡村社会场域,以鄂西利川市的《“小院说事”:让群众在乡村治理中唱好主角》为典型案例,分析基层党组织引领乡村治理的内在逻辑,研究基层党建如何通过重建组织网络、优化治理内容和制度建构等方面加强乡村治理引领,履行政党责任和使命,探究基层党建如何重塑乡村治理,揭示农村基层党组织在推进乡村治理过程中领导力的生成过程,探讨新时代农村党建创新的可能路径。本文研究案例及其访谈资料均来自笔者2022年11月在利川市开展的实地调研和田野观察。

2 新时代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内在逻辑

党建引领乡村治理不仅是一个重大实践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从学理上深入揭示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内在逻辑,既是农村基层党组织和党员队伍领导、参与乡村治理的现实需要,也是增强社会各界对党建引领乡村治理政治认同和心理认同的迫切要求,同时也可以为建立健全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体制机制提供理论支撑。

2.1 政治逻辑:遵循中国共产党全面领导的根本原则

马克思主义关于建党学说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确立和维护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核心,政党统领社会是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特质的内在要求^[18]。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事业取得伟大成就和前进发展的根本保证。党建引领乡村治理是由党的权威领导和执政地位、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的,既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的内在要求,也是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内在需要^[19]。乡村治理不仅是乡村社会的内部治理,而且是国家治理在乡村的延伸,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治理理念、治理原则、治理内容、治理方式等都必须要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党建引领乡村治理,实现“乡村再造”,遵循“政党中心主义”的发展逻辑^[20],通过党的领导将政党的意识形态和组织体系渗透到乡村治理实践中,彰显着党的全面领导的根本政治原则,直接关系到乡村治理的方向、方式和目标。

2.2 理论逻辑:体现基层党建与乡村治理之间的耦合关系

“耦合”理论强调参与同一社会实践的不同主体能够互促共进,并各自实现自身目标。基层党建与乡村治理之间存在特定的耦合关系,它们能在组织结构、治理目标上实现耦合,并形成互动^[21],这种互动主要表现为基层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现代化发展,而乡村治理也有效激活了基层党建发展活力^[22],其结果是实现了党的权威积淀与乡村治理有序共进的良性循环。实践中,在

党建引领下,基层多元社会力量遵循“耦合调适”机理而实现了乡村社会有效共治,从而为乡村振兴提供了稳定的治理秩序,而乡村治理效能释放的同时也伴随着党的威信提升^[23]。从互动关系和结果来看,乡村治理效能是在党的引领下取得的,为群众谋利益、谋幸福,由此赢得了绩效合法性;从过程来看,注重调动农民群众的参与性,助力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力,让乡村振兴政策和方案在执行过程中得到农民群众的积极回应和支持^[24]。

2.3 历史逻辑:传承中国共产党治理乡村的优良传统

从历史来看,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把各族人民凝聚起来,才能最终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这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经验^[25]。中国乡村社会治理的探索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展开的,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核心具有强大的政治优势和组织权威,在乡村秩序构建和动员农民群众等方面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百年来,正是有了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对乡村治理的全方位领导的实践和经验,才能在乡村治理的进程中不断地克服新问题、解决新矛盾和取得新成就,并成功地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26]。由此可知,党建引领乡村治理是对中国共产党治理乡村宝贵经验和优良传统的传承,也是乡村治理迈向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2.4 现实逻辑:回应乡村社会的内在诉求

面对日益开放、流动以及个体化、分散化、多元化和陌生化的乡村社会,传统乡村治理的体制和方式显得举步维艰^[27]。当前我国农村社会正面临着治理主体弱化、治理内容复杂化、治理手段受限的困境^[28],乡村治理层面存在着多元共治格局不成熟、治理机制不完善、治理“内卷化”“碎片化”、治理主体能力普遍较弱、治理方式现代化水平不高等问题^[29]。解决这些问题,迫切需要加强农村基层党的建设,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在乡村治理中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和社会号召力,健全乡村治理体系,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新格局。因此,党建引领乡村治理是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集中彰显,是破解乡村治理困境的内在需要,是应对农村党组织建设环境深刻变化的必要之举和促进农村社会全面发展的必然选择。

3 “小院说事”:利川市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创新实践

利川市曾经是湖北省贫困人口和贫困村最多的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市),如何激发村民内生动力和提升乡村治理能力,事关本区域脱贫攻坚成果的巩固和乡村振兴的全面推进。为此,利川市直面现实问题,以乡村治理最小单元、最小细胞为切入点,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动员和引领作用,把以前的“院坝会”打造成以群众为主体的“小院说事”,通过“小院说事”听民声、问民需、议民题、办民事、问民效,引导群众从“观众”变为“主角”,真正发挥了群众在社会治理中的主体作用,走出了具有本土性、创新性、前瞻性的乡村治理新路。

3.1 搭建“说事”平台

利川市地域面积广、村落分布比较稀疏,近几年又进行了合村并组,合并后的行政村与原来相比减少了一半,这就使得每个村支部覆盖的地域更广,迫切需要在组织覆盖的形式上进行创新,进一步加强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建构具有坚强领导核心的乡村治理组织体系。为此,利川市委组织部经过调查和研究,提出了“党支部联系党小组—党小组联系党员中心户—党员中心户联系党员—所有党员联系所有群众”的组织建设思路。在这种思路下,以村组院落、农家小院、

党员中心户等为对象,每个村组选定一个特色农家小院,再从农家小院中的党员致富能手、退休党员干部等群体中选拔党小组组长和党员中心户,并要求党小组组长和党员中心户挂牌亮身份,搭建“党建+小院说事”平台。至2022年11月,全市共打造“党建+小院说事”院落145个,设立“小院说事点”1200余个,挂牌党员示范户2245户,且每个“小院说事点”都由党员牵头推进。

3.2 设定“说事”内容

利川市着力把党员、村组干部、教师、村民代表、乡贤、族亲等群体动员起来,以村民需求为导向,围绕以下几类事项收集意见和开展民主决策审议。一是村级发展的“大事”。“说事”平台将村级发展的大事作为乡村治理的中心工作,引导农民群众紧扣乡村人居环境整治、基础设施建设、产业结构调整、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等内容,献计献策、群策群力,共同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各项方针政策的落实。二是农村基层党建的“要事”。“说事”平台围绕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应该在乡村治理中如何发挥作用这一核心问题,引导农民群众紧扣村级班子建设、党员教育管理、党员作用发挥、基层干部工作作风、廉洁自律等内容,谈问题、提建议,增强党员的主体责任和服务意识,共同推进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三是乡风文明的“好事”。引导农民群众紧扣执行村规民约、改善村风民风、营造邻里和谐、崇尚孝老爱亲等内容,立标杆、树榜样,倡导勤俭节约、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推动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四是影响乡村和谐的“难事”。引导群众紧扣家庭矛盾、邻里纠纷、“黄赌毒”歪风邪气、扫黑除恶以及村级财务收支管理不规范等内容,说问题、想对策,努力把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共同推进平安乡村建设。五是解难帮困的“急事”。引导群众紧扣关心关爱农村低保户、老弱病残户、受灾户、临时困难户以及失学儿童、留守儿童等内容,列出村内的急事难事和烦心事。六是利民便民的“实事”。引导群众紧扣村级各项公益事业建设、农村劳动力培训、农民创业就业、农产品市场信息、农技服务、法律援助、社会保险、卫生计生等内容,反映问题、贡献智慧,推动村级组织提升公共服务能力。

3.3 制定“说事”规范

其一,制定“说事”原则。一是坚持党的领导与发扬民主相结合的原则。“小院说事”必须在当地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下开展,乡村社会的一切重要事项和重要决定需要经过基层党组织的讨论和表决,确立基层党组织在乡村治理中的领导核心地位。二是坚持定期举行与灵活推进相结合的原则。规定每月的第一个周三为各村(社区)的“小院说事”日,增强“说事”的常态化;但在特殊情况下,经乡(镇)党委同意,可临时组织召开,以便第一时间解决群众的问题和困惑。三是坚持解决问题与疏导思想相结合的原则。利川市规定,基层党组织能现场解决的问题就现场解决,对需要调查核实的事项,须报相关部门商讨后再做解答,切实解决好群众的实际问题;同时注重做好群众的思想工作,加强对群众的思想疏导和正面引导。

其二,规定“说事”流程。“说事”流程主要由“说、议、办、督、评”等五个环节构成。一是谁来“说”:群众的事情群众说。即由本村群众来说事,充分表达意见、诉求和想法,各组“说事长”主动收集群众各类诉求和建议,并登记在《“党建+小院说事”问题记录表》中,畅通民意表达渠道。二是如何“议”:群众的事情集体议。“议事”会议主要分为“村班子集体议”“民主决策议”和“乡村联议”。“村班子集体议”解决的是村内的一般事项,“民主决策议”解决的是涉及村集体和村民共同利益的重大事务和党内的重要事务,“乡村联议”解决的是村级自身不能办理的、

需要乡村联办的复杂事项。三是怎么“办”:群众的事情分类办。根据议事内容采取“即听即办”“村级自办”和“乡村联办”。“即听即办”主要指在说事现场对能够答复的当场答复、能够协调的现场协调办理;“村级自办”主要是对涉及村级矛盾纠纷等,村级组织自己能够办理的事项,根据村干部职责分工督促相关承办村干部抓好落实;“乡村联办”主要是对于村级难以解决或解决不了的事项,实行乡村干部联合办理。四是如何“督”:群众的事情全程督。主要包括“村监会监督”和“乡(镇)组织办监督”。村监会负责对村级自办、全程代办的事项进行监督,主要包括进度监督、成效监督、作风监督;乡(镇)组织办主要结合重点工作开展专项督查,重在杜绝“说而不议、议而不办、办而不结、结而无效”的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五是谁来“评”:群众的事情群众评。乡(镇)组织办公室结合年底村班子和村干部年度考核,对“党建+小院说事”工作成效进行群众满意度考评,考评结果作为村班子和村干部年度考核、评先选优的重要依据,强化结果运用,倒逼各项工作的推动落实。

其三,明确八个“不说”。第一,损害党中央权威和党集中统一领导的不说;第二,丑化党和国家或上级党委、政府形象的不说;第三,违背政策法规、发展规律和客观事实的不说;第四,扰乱公共秩序、逾越公德和道德底线的不说;第五,编造及传播虚假信息和诬陷、侮辱他人的不说;第六,应当依法通过法定途径解决的不说;第七,已经答复、受理或正在帮助办理解决的不说;第八,审核认定办结或已复查复核终结备案的不说。

3.4 “小院说事”的实践成效

其一,畅通了民意反馈渠道,激发了农民群众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在“小院说事”推进过程中,各村(社区)党组织坚持“有事好商量、遇事好商量”的原则,以民意作为办事方向,广泛发动党员群众共谋村级产业、乡村治理和培育文明乡风的良方,广大村民可以在特定地点自由表达立场、建议和意见,畅通了民意反馈渠道。D镇的组织委员说:“办好村民的事,不能是干部干、群众看,关键要让他们说。‘小院说事’就是要畅通意见的反映渠道,根本目的是要了解群众关心什么和想解决什么问题。”A镇的党委副书记谈道:“我们利用党员的力量,发动群众参与到村级治理中来,将以前‘灌输式’的院坝会转变为以群众为主体的议事会,提高了群众参与乡村事务的积极性。”M村的村民谈道:“我们现在都知道‘小院说事’这个平台,只要村民有问题,就会通过‘小院说事’去反映和解决。”2022年,在广大农民群众的参与下,全市通过“小院说事”平台,从群众的只言片语中收集基层治理“问题清单”39类792个,为提升乡村治理的效能提供了基本依据。

其二,解决了“急难愁盼”问题,提升了农民群众的获得感。“小院说事”发起以来,村(社区)“两委”干部利用群众农闲时间,深入田间地头和农家院落,围绕村级发展的大事、邻里和谐的琐事、解难帮困的急事、乡风文明的好事,找准群众的关注点,按照轻重缓急逐一化解。F乡的党委书记强调:“乡党委出台了村两委干部定期走访和联系村民的制度,引导村干部深入农民的田间地头去发现问题、寻找答案,在解决农民具体问题的实践中拉近了与农民的距离。”利川市委组织部《“小院说事”调研报告》讲述了一个案例:一组某村民在外务工,听说村里举行的“小院说事”非常有用,就通过电话登记让村委会成员照顾家里独居的老人。2022年4月14日晚,因大风吹垮了他们家的屋顶,他非常着急,拨通了村书记的电话,村书记马上召集了3名党员冒着危险帮助他安顿老人、抢救物资,将损失降到了最小,随后该村民在朋友圈发文为该村党支部

“点赞”。截至 2022 年 11 月,全市开展“小院说事”580 场(次),化解急难愁盼问题 871 个,其中“即听即办”307 个、村(社区)自办 334 个、乡镇和村(社区)联办 230 个,有效解决了一批遗留时间长、群众反映强烈的“关心事”和“操心事”。

其三,提升了农民群众的主体意识,促进“共同缔造”活动走深走实。利川市各乡(镇)以“小院说事”为媒介,从小切口出发,办成了千余件民生实事。在办实事中,村民的主体意识得到提升,广泛参与湖北省的“美好环境与幸福生活共同缔造”活动,全方位全过程参与乡村治理,从中体现价值感、找到归属感,真正成为乡村治理的主体。Y 村的村民说:“俺们村的村民比之前积极多了,因为‘小院说事’说的都是俺们老百姓的事,每一件事都与俺村的生产生活相关。”Q 村的党支部书记谈道:“我们村的村民参与‘小院说事’热情很高,2022 年 5 月份,五组召开小院说事会,杜姓村民在田里干活时突然想起了这个事情,马上就挽着裤脚来参加了;还有一次,我因为在乡里开会耽搁了一组召开‘小院说事’的时间,延后了半个小时,但一组的大部分村民自发搬了板凳坐在院子里等候。”2022 年 5 月,利川市委组织部结合“共同缔造”活动,印发了《关于开展“小院说事”主题活动的通知》,在 304 个村(社区)中广泛开展“小院说事”主题活动,发动群众决策共谋、发展共建、建设共管、效果共评、成果共享。截至 2022 年 11 月,全市通过“小院说事”解决“发展要事、民生实事、问题难事”3 295 件,组织开展“小院说事”满意度评价 25 次,满意率达 99.7%,提升了共建共管共享的效果。

其四,突破了传统乡村治理模式,促进了乡村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小院说事”将各类民事会议开到村民的院子里去,乡村各类公共事务的决策能够在制定、执行、反馈、调整等各个阶段高效反映民意,让农村基层干部能够直面群众的问题,实现了党的基层组织与群众的良性互动。这些行为切实保障了农村基层治理的全过程人民民主,也推动了乡村治理主体从一元向多元的转变。为此,利川市委组织部部门的干部表示:“‘小院说事’的导向在于实现村委会和群众的良性互动,要求村委会改变原有的治理模式和基层管理者的身份,让他们由传统的垂直行政命令式管理的决策者身份向参与式管理的身份转变,这也是‘小院说事’基层治理制度创新的突破点。”

4 “小院说事”的理论意蕴和学理价值

利川市的“小院说事”治理模式主动求变、应变,有效推动了当地的乡村治理创新,取得了显著成效。笔者试图以“组织—内容—制度”为主要分析框架,进一步诠释这一探索的理论意蕴和学理价值。

4.1 组织再造:整合党组织资源,提升组织动员能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力量来自组织。党的全面领导、党的全部工作要靠党的坚强组织体系去实现。”^[30]党的基层组织是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在基层社会贯彻落实的根本基础和依靠。在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中,农村基层党组织是乡村治理的领导核心,通过基层党建可以促进农村社会整合,规范社会秩序。但随着城镇化、信息化水平的提高,当前的乡村治理环境不断发生变化,治理模式也由“国家—单位—个人管理模式”向“国家—社会—个人治理模式”过渡,乡村社会的“空心化”、社会关系的“功利化”也加剧了村民的“去组织化”状态和“合作化”的困境,村庄的公共精神逐步衰落^[31]。与此同时,部分农村基层党组织的设置形式不适当当前乡村经济社会的发展,组织结构存在一定的“空心化”问题。这

些变化客观上迫切要求基层党组织主动对缺位的组织进行建构,对不适应时代需要的组织进行重构,以重塑组织权威。

“组织再造”是各地党组织根据工作需要,以再组织化方式整合党组织资源力量的一种举措。“组织再造”通过优化村级党组织的组织结构、人员配置等,调整党建引领下的乡村治理制度体系,最终实现提升基层党组织治理能力的目标^[32]。“组织再造”对于巩固执政党地位、维系社会稳定、创建和谐社会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有助于整合分化的乡村社会利益、化解乡村社会风险、重塑乡村治理秩序和筑牢党的执政基础。利川市的地域特点和村级党组织建设实际,迫切需要在组织覆盖的形式上进行创新,对党组织覆盖系统进行“再造”,进一步加强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建构具有坚强领导核心的乡村治理组织体系。以“党支部联系党小组—党小组联系党员中心户—党员中心户联系党员—所有党员联系所有群众”为基础搭建的“小院说事”平台,调动和发挥了乡贤、党员、群众等各方面力量在乡村治理中的积极作用。这种新的组织构建改变了传统的组织覆盖形式和运转体系,优化了组织架构,确保哪里有群众哪里就有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为开展组织动员提供了前提条件,也从根本上促进了党组织资源力量的整合,促进了党员参与乡村治理方式的创新和治理能力的提升。这些主动求变的创新实践,是基层党组织的存在形式根据治理环境和治理目标做出的主动调适,构建了与基层社会治理扁平化结构相适应的组织体系,为有效组织和动员各方力量参与乡村治理奠定了良好的组织基础。

4.2 内容优化:回应农民群众利益诉求,激发乡村治理活力

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如果有了错误,定要改正,这就叫向人民负责。”^[33]¹¹²⁸ 乡村善治需要直面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解决好“治理什么”这一首要问题。有研究显示,农民对乡村治理有效的理解主要集中在村庄管理和经济发展两个层面^[34]，“事务面向”和“群众利益面向”是乡村有效治理的关键维度^[35]。当前乡村治理的环境在不断变化,广大农民群众的平等意识、民主意识、法治意识、公正意识等日益增强,乡村社会中的公共事务要充分体现农民的主体性,积聚智力和民力,调动农民群众参与乡村事务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因此,新时代的乡村治理要重视农民具体生活需要的满足,全过程直面村域的一线问题,并及时回应村域一线群众的不同诉求。同时,也要充分考虑乡村发展的地区间差异,鼓励各地因地制宜,围绕经济事项、社会矛盾、文化建设、公共秩序维护、人居环境治理等领域拓展村民议事协商的范围,寻求发展与稳定、秩序与活力的平衡点^[36]。

利川市的“党建+小院说事”创新实践,重点在“事”上做文章,根据新时代乡村发展需要和广大农民的诉求,不断丰富和完善“说事”的内容,解决群众难题,满足不同群体的利益,提升农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这些“说事”内容涵盖了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层面,既有村级层面,也有农民个体层面,使广大农民由“旁观者”变成了“参与者”和“推进者”。一是紧扣乡村振兴的重点。全面收集党员群众在产业发展、乡村振兴、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等方面的意见建议,广泛发动党员群众共谋村级产业、乡村治理、乡风文明的良方。二是紧抓乡村治理的难点。村党组织针对乡村治理中群众参与度不深、积极性不高、融入面不广等问题,细化村“两委”干部“小院说事”职责清单,做到能现场办理的即听即办,属村级自办的村“两委”承办,需乡镇党委支持的乡(镇)村联办。“小院说事”的探索完善了群众参与决策制度,广泛听取民意、汇集民智,过

去村(社区)干部“一锤定音”的局面被打破,群众自主、自愿、自治得到充分体现,切实保障了基层治理的民主。三是紧盯群众关心的热点。“小院说事”发起以来,发动党员干部深入一线了解群众困难,找准群众的关注点,倾听群众的声音,以满足群众多样化、个性化的服务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并按照轻重缓急逐一化解,让党员干部真正成为群众身边的暖心人。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根本指向是解决乡村社会治理中的各种问题。乡村社会事务繁多,但每一件事情都会牵涉农民群众的具体利益和诉求,这就要求及时回应和解决农民群众所遇到的具体问题。利川市立足新时代中国推进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以保障和改善农村民生为优先方向,找准乡村治理的具体问题,重视化解农村社会矛盾,确保乡村安定有序和农民安居乐业,激活了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主体性和活力。

4.3 制度建构:重塑治理规范,提升乡村治理的制度化水平

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结构的运作逻辑是乡村治理的制度规则。纵观党领导下的乡村治理发展历程,加强制度供给和变革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健全和完善乡村治理体系、提升乡村治理能力的重要途径。在实践中,各级党政机构在制度和政策层面对乡村治理的整体部署决定着乡村治理的方向。在乡村社会深度转型过程中,熟人社会渐趋解体,乡村社会进入复杂治理时代,乡村治理逐渐迈向规则之治。在推进中国乡村治理机制转型的过程中,要重视制度建设,增强制度运行的有效性,重构制度权威,减少乡村社会领域的机会主义行为,避免乡村社会陷入无序状态。

利川市的“小院说事”在实践探索中重塑了乡村治理规则,形成了制度化的规范体系。其一,制定的“说事”原则,确保了“小院说事”的正确发展方向。制定与乡村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相适应的议事、说事原则是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前提,也是乡村治理机制重塑的核心内容。为确保“小院说事”的正确发展方向和组织群众规范参与村级各项事务管理、决策和监督,利川市委明确了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其二,设定的“说事”流程,提升了乡村治理的效率。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是人民民主的真谛。”^{[37]65} 费孝通先生曾经指出,乡土社会是礼治社会,社会秩序的维持不是依靠法律,而是依赖于一套社会公认合适的行为规范^{[38]152}。利川市的“小院说事”顺利运行的基础在于有着村民认同和共同遵循的“说事议事”规范,有效形成了“进院找事、协商处理、明确职责、督导反馈”的问题解决闭环,这些避免了村级治理的无效纷争的困境与难题,提升了乡村治理的效率与效度。其三,坚持做到八个“不说”,避免了乡村治理的无序化。党和国家提出要构建“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意味着乡村治理要充分利用和有效发挥各方面的治理资源。这就要求各地在推进治理创新实践中既要不拘泥于某种形式化的“模板”,实施差异化的治理策略,也要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伦理道德规范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因此,建立科学规范的“说事”负面清单是避免乡村治理无序化的策略之选。这些制度规范为“说事”设立了不能逾越的“红线”,既体现了乡村治理的民主性和精细化,也体现了乡村治理的权威性和规范化。

5 新时代农村基层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创新路向

在“组织—内容—制度”的分析框架下,党建引领乡村治理是一项系统行动,既要凭借健全、

有效的正式组织体系,也需要契合乡村实际生产生活的内容体系,同时需要制定一套符合现代治理理念的规范体系。新时代,党建引领乡村治理需要从基层党组织、乡村生活、治理制度等层面进行实践创新,提升乡村善治水平。

5.1 以增强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能力为根本,优化党组织覆盖体系

目前,“嵌入”是党建引领乡村治理机制的主要分析工具。党组织嵌入乡村治理的机制主要包括乡村组织嵌入、党员嵌入及合作服务嵌入^[39]。而通过“组织再造”优化党组织覆盖体系是实现“组织嵌入”的基本前提。也有学者指出,当前的农村治理呈现单元缩小与重心下沉的趋势,相应地也必然伴随着微观区域内一系列治理组织的再造^[40]。利川市的“组织再造”,通过调整党的组织架构、扩大党的组织覆盖面和发挥党员示范引领作用,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村党组织—党员”简单覆盖形式,实现了党组织和基层党员干部等有效嵌入乡村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重塑了乡村治理格局,既激活了乡村社会的活力,又实现了党对农村社会的全面领导。在全面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中,要积极探索通过“组织再造”实现“组织嵌入”乡村社会生活的形式和途径,加强党对农村社会的全面领导。

一要健全农村基层党组织体系,实现党组织对农村治理的精准嵌入。随着时代的发展,当今的乡村治理正朝着“精准化”方向发展,在治理区域、治理对象、治理目标等方面都需要精准化和具体化,解决好乡村治理中存在的主体不明、措施不细、目标不具体等问题。农村基层党组织体系的完善和发展,要结合乡村治理这一发展趋势,使党组织资源精准嵌入乡村治理中的人居环境整治、社会矛盾纠纷、公共事务协调、集体资产管理、公共服务供给等层面,促进乡村治理体系与党组织架构深度融合;把党的工作覆盖到治理领域的每一个“微单元”,努力实现创新党员参与治理方式和提升党员参与治理能力的目标。

二要提升基层党组织的治理能力,将基层党组织的组织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在乡村治理中,农村基层党组织要提升政治领导能力,全面落实党和国家有关乡村治理的方针、政策,确保乡村治理的正确方向;提升思想引领能力,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提升农民群众对党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和情感认同;提升社会号召能力,充分调动村内各类主体和资源参与村内公共事务的积极性,引导大家为建设宜居和美乡村贡献智慧和力量,提升动员和凝聚农民群众的能力。

三要发挥农村党员在乡村治理中的示范引领作用,激活乡村治理新动能。党员是党的肌体细胞,党员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既是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根本要求和具体体现,也是百年大党永葆芳华的成功之道^[41]。乡村社会的有效治理,需要增强党员的主体责任和服务意识,农村党员要知农、爱农、兴农,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在乡村治理实践中,要把农村党员队伍建设作为乡村治理的关键支撑,打造“多员合一”的乡村治理人才队伍,对在职党员和无职党员等进行规范化管理,加强普通党员与在职党员的示范引领效应,明晰职责、压实责任,激发农村党员队伍参与乡村治理的活力与动力,培养造就一支作风优良、引领乡村治理的“头雁”队伍,为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奠定队伍基础。

5.2 以关照农民生产生活为核心,完善乡村治理内容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大国之大,也有大国之重。千头万绪的事,说到底是千家万户的

事。”^[42]⁶⁵ 社会治理的基础在基层,乡村善治是国家善治的基石,而促进乡村治理内容的现代化、推动乡村发展和有效解决农民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会从根本上助力乡村善治目标的实现。乡村治理内容的现代化需要立足农村群众利益诉求和乡村振兴战略的现实需要,其内容体系要涵盖乡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不同领域。利川市的“党建+小院说事”,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抓住了广大村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主动适应不断变化的群众生活诉求,激发群众的自治热情,增强乡村治理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真正让人民群众时刻感受到党组织就在身边,赢得了广大农民群众对党的情感认同和政治认同。新时代的乡村治理需要以关照农民生产生活为核心,优化乡村治理内容体系,解决好“为谁治理、治理什么、谁来评判”的核心问题。

一要坚持以农民为中心,解决好“为谁治理”的问题。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鲜明标志,也是中国共产党百年来乡村治理实践取得辉煌成果的独特优势^[43]。新时代,农村基层党组织应坚持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思想,不断推进乡村治理范式发展,带着初心和使命深入基层、深入农村群众,广泛收集社情民意,充分发挥自身的政治功能,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通过走村串户贯彻执行到每一个农民家庭,真正了解农民群众的现实生活诉求;自觉遵循“以农民为中心”的基本原则,高度重视农民群众的权益保障和利益维护,把维护农民群众利益作为农村基层党建的中心工作和主要任务,真正把基层党建的组织力和动员力用来解决农民群众的生产生活问题;坚持治理成果由农民共享的原则,紧紧依靠农民、一切为了农民,把乡村治理变成亿万农民参与的生动实践,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体现农村基层党组织在乡村治理中的责任担当,全面建设好乡村。

二要坚持治理内容贴近农民生活,解决好“治理什么”的问题。党建引领基层乡村治理,归根到底就是要全方位地满足农民的美好生活需要。中国乡村治理已经发生了面向农民日常生活的治理转向,农村基层治理的性质已经转变为生活治理^[44]。因此,如何关照和回应农民的各种生活诉求,便成为乡村治理的重要内容。新时代,乡村治理的内容要围绕各类民生服务展开,不断创新乡村生活治理机制,重塑农民生活规则,将国家基层治理的制度和规则融入农民生活,重建农民生活秩序。深入研究农民需求的变化规律,聚焦农民的生活习惯、休闲娱乐、人情交往、道德建设等生活领域,密切关注和及时回应农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把解决农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作为乡村治理创新的重点,建设契合农民需求、富有村域特色的乡村服务体系,切实推动乡村公共服务更优质、人居环境更美丽、邻里关系更和谐,持续提升农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

三要坚持提升农民在乡村治理中的话语权,解决好“谁来评判”的问题。在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实践中,要强调农民的主体地位,提升农民在乡村治理中议事、论事的能力;优化乡村治理的考核内容,杜绝乡村治理中的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作风,将与农民美好生活相关的内容纳入乡村治理的考核评价指标体系中;提升农民满意度在乡村治理评价中的权重,确保治理成效由农民评判和监督,提升乡村治理的实效,真正让广大农民群众成为乡村治理的最广参与者、最大受益者和最终评判者,有效调动广大农民参与乡村治理的能动性和积极性。

5.3 以提升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为目标,重塑乡村治理规范体系

乡村治理现代化目标的实现需要有关键性的制度创新和重点突破。利川市的“小院说事”

之所以能够取得显著成效,关键在于结合当地实际,制定了群众参加乡村治理的基本原则,规范了村民参与乡村公共事务的流程,实现了制度规则对乡村的“生活化嵌入”和农民生活问题得到“治理性吸纳”的双重目标。新时代的乡村治理需要不断推进制度的创新和完善,结合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重塑乡村治理规范体系,探寻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驱动力,全面提升乡村治理的制度化水平。

一要健全和完善农村基层党组织全面领导乡村治理的制度体系。办好农村的事情,关键在党。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程度在根本上取决于农村基层党组织全面领导作用的发挥。利川市“小院说事”的每一个环节都是在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下进行的,从制度设计上明确了“说事”的原则、“说事”的内容和“说事”的程序,组织和引导群众规范参与村级各项事务的管理、决策和监督。在提升乡村治理能力的实践中,要不断健全和完善党领导乡村治理的制度,形成涉及乡村治理的重要事项、重大问题都要由村党组织研究讨论后按程序决定的机制,充分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全面领导作用,为乡村治理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二要健全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社会治理制度体系。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是对我国社会治理实践探索的经验总结,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制度安排。利川市的“小院说事”治理模式,精准聚焦广大农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盼、所忧,引导广大农村群众在乡村公共事务中共谋、共建、共管、共评、共享,变“你和我”为“我们”,从“要我做”到“一起做”,打通了基层社会治理的“最后一公里”,形成了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新格局。新时代的乡村治理必须不断健全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探索创新农村基层群众自治实现途径,紧扣乡村振兴的重点、乡村治理的难点、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搭建“议事”平台,拓宽农村各类群体有序参与基层治理的渠道,努力做到民事民议、民事民办、民事民管,进而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

三要健全和完善走好新时代群众路线的制度体系。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也是中国共产党永葆青春活力和战斗力的传家宝。在开放变迁的乡村社会中,党群关系是日常生活秩序的重要黏合剂。在与群众的沟通和联系中,农村党员有着天然的优势。利川市打造的“党建+小院说事”,以“说、议、办、督、评”搭建了密切干群关系的桥梁,深入倾听群众声音,了解群众需求,解决百姓难事,是对湖北省“下基层、察民情、解民忧、暖民心”实践活动的重要落实,也是践行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的重要体现。在提升乡村治理能力的实践中,广大农村基层党组织要扎实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健全和完善党员干部联系群众制度,将党支部或党小组下沉到网格、村民小组一级,将党员联系群众制度化、常态化;创新互联网时代农村群众工作机制,提升互联网思维,更新和优化网络知识体系,树牢群众观点、站稳人民立场,不断提高网络群众工作的本领;始终保持与农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深入开展党员干部走村入户活动,切实在农村一线倾听农村群众呼声,了解农民、农村和农情,不断增进对农民群众的感情,进一步密切党群关系。

6 结语

乡村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基础,而以党建引领乡村治理是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本路径。本文主要考察和分析了利川市的乡村治理探索和实践图景,从

本质上看是一种“党建+乡村治理”的党建引领模式。利川市的“小院说事”的案例表明,搭建“说事”平台蕴含的是组织逻辑,是中国共产党在新形势下主动求变应变、优化组织结构、提升组织动员能力的主动创新;设定“说事”内容蕴含的是利益逻辑,表面上看是治理内容的调整和优化,实则是治理趋向务实、党组织主动将农民利益融入社会治理的一种积极探索;制定“说事”规范蕴含的是制度逻辑,是乡村治理走向规范、迈向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利川市的探索也为各地党建引领乡村治理指明了创新方向,要不断健全农村基层党组织体系、完善乡村治理内容体系、重塑乡村社会治理规范体系,进一步使组织结构科学化、治理内容生活化、社会运行规范化,切实把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定、领导乡村治理、团结动员乡村群众、推动农村改革发展的坚强战斗堡垒。

诚然,本文只是通过个案解读考察了当前部分地域开展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探索与实践,并鉴于典型个案的实践,尽力诠释所蕴含的理论意义和学理价值,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些提升党建引领乡村治理能力的基本路径。但中国的农村情况各异,不同区域之间的乡村都有着自身的特性,村庄的产业结构、人口结构、组织结构、文化传统等各不相同,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建设情况存在较大差异,乡村治理的焦点和难题也存在显著差别,乡村善治需要充分考虑村情,因地找寻村民的价值偏好,引导村民积极参与乡村公共事务。因此,提出的这些路径是否都能够有效提升广大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治理引领能力、构建乡村社会内部秩序和激发农民群众参与乡村治理的活力,尤其是每一种路径究竟能够产生什么程度的影响,仍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和探讨。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2]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 [3]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 [4] 董帅兵. 中国共产党领导乡村治理的百年历程、基本经验与实践启示[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3):197-206.
- [5] 陈松友,周慧红. 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J]. 山东社会科学,2022(2):5-14.
- [6] 张明皓,豆书龙. 党建引领“三治结合”:机制构建、内在张力与优化向度[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1):32-41.
- [7] 张紧跟. 党建引领:地方治理的本土经验与理论贡献[J]. 探索,2021(2):88-101.
- [8] 温丙存. 基层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逻辑理路——基于全国基层党建创新典型案例的经验研究[J]. 科学社会主义,2021(6):97-104.
- [9] 唐兴军,金江峰. 同构压力与目标替代: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中的“形式化”问题及治理[J]. 社会主义研究,2023(2):119-126.
- [10] 潘琳. 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形态与路径探索[J]. 理论视野,2023(3):88-93.
- [11] 叶敏. 政党组织社会:中国式社会治理创新之道[J]. 探索,2018(4):117-122.
- [12] 魏来,徐锦杰,涂一荣. 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实践机制与组织逻辑[J]. 社会主义研究,2023(1):105-115.
- [13] 何慧丽,许珍珍. 嵌入式动员:党建引领农村基层社会治理——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为例[J].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3):43-51.

- [14] 陈秀红. 整体性治理: 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一个解释框架[J]. 学习与实践, 2021(12): 93-102.
- [15] 黄晓春. 党建引领下的当代中国社会治理创新[J]. 中国社会科学, 2021(6): 116-135.
- [16] 刘厚金. 基层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作用机制——以集体行动的逻辑为分析框架[J]. 社会科学, 2020(6): 32-45.
- [17] 张勇杰. 多层次整合: 基层社会治理中党组织的行动逻辑探析——以北京市党建引领“街乡吹哨、部门报到”改革为例[J]. 社会主义研究, 2019(6): 125-132.
- [18] 章荣君. 新时代基层党建引领村庄生活治理研究[J]. 湖湘论坛, 2022(4): 85-92.
- [19] 于健慧. 党建引领乡村治理: 理论逻辑及实现路径[J]. 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1): 50-57.
- [20] 张岩, 周明明. “乡村再造”: 政党引领乡村治理的理论逻辑与历史经验[J]. 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1(6): 92-101.
- [21] 严瑾, 刘慧. 基层党建嵌入乡村治理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基于贵州省M县S村的考察[J].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1): 46-54.
- [22] 孙慧娟. 以基层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现代化[J]. 人民论坛, 2022(21): 65-67.
- [23] 吴高辉, 郝金彬. 耦合调适: 乡村振兴中党建引领社会共治的实践路径与内在机理[J]. 中国行政管理, 2022(9): 97-107.
- [24] 肖述剑. 乡村振兴中基层党组织强化领导力的理论依据、机理特征与实践推进[J]. 探索, 2023(4): 88-99.
- [25] 邱春林. 中国特色乡村治理现代化及其基本经验[J]. 湖南社会科学, 2022(2): 73-80.
- [26] 程银, 李建军, 杨正军. 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的百年变迁及经验启示[J]. 青海社会科学, 2021(5): 55-62.
- [27] 项继权, 刘开创. 城镇化背景下中国乡村治理的转型与发展[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9(2): 1-9.
- [28] 宗成峰, 朱启臻. “互联网+党建”引领乡村治理机制创新——基于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探讨[J].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5): 1-8.
- [29] 李三辉. 乡村治理现代化: 基本内涵、发展困境与推进路径[J]. 中州学刊, 2021(3): 75-81.
- [30] 习近平. 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8.
- [31] 刘启英. 乡村振兴背景下原子化村庄公共事务的治理困境与应对策略[J]. 云南社会科学, 2019(3): 141-147.
- [32] 杨正喜. 基层党组织适应性: 党建引领嵌入乡村治理逻辑分析[J]. 社会科学家, 2022(1): 101-107.
- [33] 毛泽东选集: 第4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34] 王艺璇. 乡村治理何以有效: 农民的理解与期盼[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4): 89-105.
- [35] 王向阳. 当前乡村治理中群众工作式微及其有效治理——基于“事务面向—工作方法”的二重组合分析[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4): 63-73.
- [36] 王晓莉. “十四五”时期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若干思考[J]. 天津社会科学, 2021(2): 80-84.
- [3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7.
- [38] 费孝通. 乡土中国[M].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8.
- [39] 孙柏瑛, 邓顺平. 以执政党为核心的基层社会治理机制研究[J]. 教学与研究, 2015(1): 16-25.
- [40] 狄金华. 农村治理的单元缩小与重心下沉[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23-09-05.
- [41] 詹国彬, 江智灵. 组织再造、机制嵌入与党员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基于N市B区“红领之家”个案的分析[J]. 行政管理改革, 2021(11): 45-54.
- [4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4卷[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22.
- [43] 周定财. 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的百年回望及经验启示[J]. 北方民族大学学报, 2021(5): 41-48.
- [44] 冯川. 还原论视角下中国农村生活治理的困境及其超越[J].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4): 181-192.

Organizational Reconstruction, Content Optimization and Institutional Construction: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Party Building Leading Rural Governance

—Taking the Practice of “Small Courtyard Talks” in Lichuan as an Example

HUO Junliang

(School of Marxism, Huazh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0, China)

Abstract: In the new era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using Party building to lead rural governance has become a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consciousness, as well as an important hand to enhance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rur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city. The Party building leading rural governance has rich theoretical connotation and profound theoretical logic. The political logic level follows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 of the Party's comprehensive leadership. The theoretical logic level reflects the coupl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rimary-level Party construction and rural governance. The historical logic level inherits the fine tradition of the CPC in rural governance. The realistic logic level responds to the internal demands of rural society. The innovative practice of “Small Courtyard Talks” in city of Lichuan, through building the “talking” platform, setting the “talking” content, and developing the “talking” specification, gave full play to the organizational mobilization and political leadership of primary-level Party organizations, stimulated the enthusiasm of farmers to participate in rural governance, improved the sense of acquisition of farmers, highlighted the dominant position of farmers in rural governance, and promoted the diversification of rural governance subjects. It has walked out of a new rural governance road with localization, innovation and forward-looking. The practical exploration in Lichuan has profound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and academic value, reflecting the logical framework of “Organization-Content-System”. Through the method of “organizational reengineering”, the resources of the Party organization have been integrated, thereby enhancing the ability of organizational mobilization. By optimizing the governance content, the interests and demands of farmers have been responded, thereby stimulating the vitality of rural governance. Through institutional construction, the norms of rural governance have been reshaped, thereby enhancing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level of rural governance. In the new journey of comprehensively building a socialist modernized country, Party building leading rural governance is a systematic action, and it is necessary to optimize the Party organization coverage system based on enhancing the leadership ability of rural primary-level Party organizations, to perfect the content system of rural governance with caring for farmers' production and life as the core and to reshape the normative system of rural governance with the goal of improving the modernization level of rural governance.

Key words: guidance of Party building, rural governance, organizational restructuring, content optimization, institutional construction

责任编辑:王 慧

依规治党思维的三维面向及其准确把握

刘长秋

(上海政法学院 纪检监察学院,上海 201701)

摘要: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要求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推进并实现依规治党,既需要在制度层面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也需要在思维层面运用并强化依规治党思维,助推执政党及其成员思维能力的全面提升。依规治党思维是依据党内法规管党治党的思维。党内法规所具有的法律性、政治性以及道德性特征,使得依规治党思维不可避免地具有法治思维、政治思维以及德治思维的三维面向,成为一种集合法治思维、政治思维以及德治思维在内的融汇型思维。在法治思维面向上,依规治党思维强调和崇尚规则至上,要求全体党员将党内法规作为党内具有法律意义的规则予以尊重、敬畏和遵守。在政治思维面向上,依规治党思维承载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要求,要求执政党及其成员讲政治、讲党性、讲规矩、讲初心、讲大局。而在德治思维面向上,依规治党思维则要求党“为政以德”、立政德、行德政,要求广大党员修私德、讲公德、明大德,做道德人、高尚人、老实人。作为一种集合了法治、政治与德治三种治理模式要求的融汇型思维,依规治党思维要求其思维主体不仅要有法纪意识和政治观念,还要有德行修养,不仅要讲法治、讲政治,还要讲德治,要求“三治”协同、不能偏废。广大党员在深入推进依规治党、全面从严治党过程中需要在法治思维、政治思维以及德治思维之间及时切换频道、准确把握频率,实现三者的同频共振、精准对接。为此,必须坚持法治的底线性,强调政治立场的优先性,突出对广大党员的德性要求。这是准确把握依规治党思维的基本要求。

关键词: 依规治党;思维;政治;法治;德治

中图分类号: D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194(2023)06-0108-12

当前中国政治体制的最大特征就是党的全面领导^[1]。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2]26} 党的二十大党章进一步指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3]23} 当前,中国共产党已经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顺利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在朝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阔步行进。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要具备长期执政能力,确保自身执政地位,做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领导核心,必须坚持党要管党、依规治党。也正因为如此,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要求,“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2]65-66}。从理论上来说,依规治党至少需要在制度层面与思维层面两个方向上加以努力。具体而言,在制度层面,“要领导和治理好中国,中国共产党首先要有一整套的党内法规制度,约束自身的行为,规范自身对国家和社会产生影响的范围、方式和内容”^{[4]89}。换言之,中国共产党需要借助内容良好且制度严密的党内法规来推进管党治党、全面从严治党,以便更好地治国理政。在思维层面,中国共产党要领导和治理好中国,则需要具备并运用一系列科学的思维,如党的二十大报告所明确提及的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系统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依规治党思维研究”(22BFX008),项目负责人:刘长秋。

作者简介: 刘长秋,男,博士,上海政法学院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教授,上海政法学院党内法规研究中心执行副主任。

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等,需要借助这些思维使其治国理政的理念惯性化、科学化、入脑入心,更好地推进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在各种科学的思维中,依规治党思维是尤其值得关注和研究的一种思维。该思维是在“四个全面”战略持续推进的背景下,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领导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吸收和借鉴党史中的经验和智慧,坚持以党内法规这种要求更高的法治规则作为党员行为底线,辩证分析党内法规功能,强调各种党内制度相互联动、系统集成,在管党治党方面协同发挥作用的创新性思维,是党的二十大报告所提出的七大思维在党的建设方面的融会贯通。依规治党思维具有多维面向,对深入推进依规治党不可或缺,但学界目前还缺乏对该思维的专门研究。基于此,本文拟就依规治党思维做探讨,以期引起学界对该问题的进一步关注和重视。

1 文献综述与问题提出

自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确立了全面依法治国战略并将党内法规纳入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以来,学界有关依规治党的研究便越来越多,形成了一大批比较有分量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涉及依规治党的概念、价值、历史、逻辑与要求等,对于我们正确理解和科学把握依规治党乃至依法治国都具有极为重要的参考价值。但是,目前学界对依规治党还缺乏从思维和观念意识层面的关注,尤其是还缺乏对依规治党思维的专门研究。这使得学者们对依规治党思维及其对于党的领导 and 党的建设意义之理解和把握不到位,以致于使部分学者认为,党内法规只是中国共产党运用法治思维管党治党的制度产物,主观地将依规治党思维等同于管党治党的法治思维,缩小了依规治党思维的外延。

例如,李卫华认为,依规治党“是在遵循法治思维、汲取法治精神的基础上全面推进从严治党的管党治党新模式”^[5]。王伟国认为,“将党内法规纳入法治体系,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自身建设和领导活动的决心与信心”^[6]。还有学者认为,依规治党“其自身内蕴着党内治理法治化的意涵和要求,强调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进行党内治理”^[7]。但在实际上,依规治党作为党在管党治党方面的一种创新性思维模式,其自身尽管具有法治思维的面向和要求,但并不只是一种单纯的法治思维,还具有除了法治思维面向之外的其他一些思维面向,它实际上是法治思维中的一种相对特殊的思维。目前来看,学界只有欧爱民等学者指出,“在国家法律和党内法规并存的二元法治规范体系中,应当从‘党的领导’这一宪法规范出发,挖掘党内法规固有的法治化逻辑,从而建立党规思维和国法思维并存一体的二元思维”^[8],比较难能可贵地提出了“党规思维”这一命题,将“党规思维”作为与“国法思维”相对应的一个概念,从法治思维中突显出来。

习近平同志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努力形成国家法律法规和党内法规制度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互保障的格局。”^[9]¹¹²“依规治党深入人心,依法治国才能深入人心。”^[10]²²³而要令依规治党深入人心,则不仅需要不断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使依规治党具备基本的规矩可循,更需要在全党强化依规治党思维,为依规治党提供必要的思维支撑。就此而言,强化依规治党思维,使全党具备法规意识与纪律观念,是依规治党深入党心的客观体现,也是以依规治党引领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在“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以党章为根本,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增强党内法规权威性和执行力,形成坚

持真理、修正错误,发现问题、纠正偏差的机制”^{[2]65-66}的要求下,关注并研究依规治党思维以强化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的理念与制度实践,不仅是确保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需要,也是确保其领导和治理好当代中国以进一步强化“中国之治”和走好新征程的必然选择。

2 依规治党离不开依规治党思维的支撑

思维,即思考的维度,是当代经济社会活动乃至政治活动领域中经常被提及和使用的一个概念,用以指人们观察、思考和解决问题的思想和行为惯性。思维是人脑的智能系统在意识系统的控制作用下所进行的程序性、步骤性的信息处理过程^[11]。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看来,“思维是能的一种形式,是脑的一种功能”^{[12]759}。思维是人们思想和行为的惯性所在,是哲学中最基本的概念之一。恩格斯认为,“哲学是关于思维的学说”^{[13]97}。从哲学上来说,思维是人类在开动脑筋认识世界的过程中进行比较、分析、综合的能力,是人类大脑的一种机能。思维影响着人的分辨能力、表达能力、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对我们认识世界以及改造世界具有重要作用。依规治党思维作为执政党及其成员必须具备的一种思维,则对依规治党、全面从严治党的全面依法治国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影响,是广大党员理性认识和把握党内法规之要求,进而理解和参与依规治党的关键影响因素。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善于自我革命且勇于自我革命的政党,“勇于自我革命,从严管党治党,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14]26}。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得以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而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律、实现长期执政的关键。为此,要加快推进形成覆盖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各方面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并随着实践发展不断对其加以丰富和完善。党内法规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可或缺且不可弱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领导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强化自我革命、实现“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的基本制度保障,也是当代中国最具特色的优势制度所在。

“党内法规作用巨大,其承担着通过制度设计,起到宣传、说服、引导和组织行动等作用,以最大限度凝聚社会共识、化解社会矛盾、构建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关系,最终促进两个百年目标的实现。”^[15]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从严须依法度的推动下,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大量党内法规被制定、修改或进一步完善,一个内容科学、程序严密、配套完备、运行有效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已经逐步形成。这对于深入推进依规治党,确保党成为具有强大战斗力和长期执政能力的最高政治领导力量,确保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而从理论上来说,依规治党除了需要在实践层面有完善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来加以支撑之外,更需要观念意识层面的支撑,尤其是思维方面的支撑。而依规治党思维就是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种重要思维支撑。

就其内涵而言,依规治党思维是基于依规治党、全面从严治党以及全面依法治国的目的和需要,以党内法规为基础,形成于党内法规制度建设过程之中,并作用于推进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之内,且服务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之需要的一种思维,是依规治党、全面从严治党乃至全面依法治国过程中广大党员思想和行为的惯性所在和能力所依。思维作为人的大脑的一种反映,体现了人们在观察、思考和处理相关问题时的习惯,是人们能力的一种体现。依规治党思维则体现了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领导核心的执政党及其广大成员尤其是领导干部在

观察、思考和处理有关党的问题时的习惯和能力,是广大党员习惯于从党内法规的角度和立场观察、思考和处理问题的思维,是全面依法治国与全面从严治党时代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理应具备的一种重要思维。在依规治党中,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只是提供了依规治党的基础和依据,使依规治党具备了实践可能性和可行性。然而,如果依规治党只有党内法规制度作为基础而缺乏思维方面的支撑,就会缺乏思想和行为方面的惯性和理性,缺乏实现的能力和保障。所以,要真正推进并实现依规治党,需要高度重视依规治党思维的养成与锻造,深入推进依规治党思维在全面从严治党乃至全面依法治国战略实施中的运用和强化,助推执政党及其成员思维能力的全面提升。

3 依规治党思维的三维面向

依规治党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党建理论与法治理论的重要创新,是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内在要求与重要保障,也是新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选择。而拥有完善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以及依规治党思维,则是依规治党的必要前提。在建党百年已经形成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的背景下,进一步强化依规治党思维,显然成为新征程中依规治党的关键。为此,需要科学把握依规治党思维,了解该思维所具有的基本面向。就其内涵而言,依规治党思维是依据党内法规管党治党的思维,而党内法规具有鲜明的法律性特征、政治性特征以及道德性特征^[16]。在党内法规客观上具有以上三种鲜明特征的情形下,依规治党思维必然要而且也必须解决作为执政党成员的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应如何站在法治、政治和德治的角度看待、处理和应对依规治党的问题。这使得依规治党思维不可避免地具有法治思维、政治思维以及德治思维的三维面向。

3.1 依规治党思维的法治思维面向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将“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作为全面依法治国的目标之一,把党内法规明确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使得党内法规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重要组成部分,赋予党内法规这一重要规范以法的权威与地位。为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断完善法律规范、法治实施、法治监督、法治保障和党内法规体系。”^[17]党内法规是我们党运用法治思维实现自我管理、自我约束的必然选择^[18]。它的存在和发展是法治思维的要求,也是法治思维的产物,其本身体现的首先是一种法治思维,即要求执政党及其成员扬弃人治理念、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的思维,是要求全党尊重规则、尊重制度,以党内规则和制度为管党治党依据,实行规则之治、制度之治。

从法理上来说,法治的目的在于“确保使人类行为服从于规则之治”^{[19]107},就此而言,法治的本质实际上是“规则之治”“制度之治”,法治思维实际上也就是规则思维、制度思维,是运用法治原理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意识和坚守^[20]。“法治的精要之一便是遵守既定的规则。”^[21]而党内法规则是当代中国“规则之治”中所内含规则之重要组成部分。依规治党思维作为依据党内法规管党治党的思维,本身是一种规则思维、制度思维和不突破规则制度底线的思维,是要求广大党员办事依规、遇事找规、解决问题用规的思维,具有法治思维的面向。依规治党思维是在全面从严治党过程中要求党员崇尚党内法规、将党内法规作为党员思想与行为之法的思维,是依规而治、依制而为的思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维在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方

面的映射。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将党内法规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使得党内法规成为与国法并行的法治子体系,成为全面依法治国的基本组成部分和重要保障,成为“中国之治”最具特色的法治资源与制度优势。就此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包含了国家法律与党内法规两种最为基本的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维实际上内含了国法治理思维与依规治党思维两种规则性思维。这两种思维具有共同的本质,即二者都崇尚规则与制度,追求规则至上、制度至上,要求依法依规而为。但不同的是,国法治理思维突出权利本位,强调的是对公民权利的维护和保障;而依规治党思维突出的则是义务优先,更关注党员义务与责任的履行。因此,尽管二者本质上都崇尚规则和制度,追求规则至上、制度至上,但国法治理思维体现的是一种公民权利思维和利益思维,而依规治党思维体现的则是一种党员义务思维和责任思维。

作为法治思维在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方面的映射,依规治党思维强调和崇尚规则至上,要求全体党员将党内法规作为党内具有法律意义的规则予以尊重、敬畏和遵守。而对于不同的党内主体来说,依规治党思维强调的面向并不相同。对于普通党员来说,依规治党思维往往强调党内法规作为法的严肃性、权威性与适用平等性,要求党员一体遵循,拒绝党内有特殊党员存在,以确保作为法的党内法规之权威与实效。而对于党员干部来说,依规治党思维则更强调党内法规作为一种法的程序性、规范性与理性,要求党员干部有规则意识、底线意识,依规办事,要对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有起码的敬畏和尊崇,最大可能地维护和保障党员权利,确保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

3.2 依规治党思维的政治思维面向

作为一种法,党内法规不同于国家法律,尽管其与国家法律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共同支撑起全面依法治国,但“党内法规是调整党内各种关系的,以信仰为纲,以纪律为绳,从而达到令行禁止、步调一致”^[22]。党内法规是政党政治的产物,而“政治属性是政党的第一位属性,政治建设是政党建设的必然要求”^[23]。党的政治建设决定着党的建设的方向和效果,必须将党的政治建设摆在党的各项建设之首要位置,从严突出,着重强调。基于此,党内法规作为一种以管党治党为旨归的法,与国家法律有着明显的不同,它不仅具有法律属性,更具有政治属性,且其法律属性是建立在其政治属性之上的,突出党性要求、政治要求,要求党员讲政治、明白并严格遵守政治规矩,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意义,坚定“四个自信”,树牢“四个意识”,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其“目的是坚定政治信仰,强化政治领导,提高政治能力,净化政治生态,实现全党团结统一、行动一致”^[24]。就此而言,依规治党思维也具有政治思维的面向。依规治党要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要求广大党员旗帜鲜明讲政治,要求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培育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提高党员的政治能力。这些作为党对于广大党员及各级党组织的政治要求,显然都内含在依规治党之中,是依规治党思维需要涵盖的基本方面。

党内法规是管党治党的制度保障。党内法规存在的首要价值在于通过管党治党、全面从严治政,确保党具备且保持自身的先进性与纯洁性,进而具备且能够逐渐提升自身的执政能力,永葆其执政党地位,从而更好地治国理政,更好地践行“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与使命。“从功能上来看,党内法规是改进和巩固党的领导,更好实现党的领导目标的内在制度保障。”^[25]讲政治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要求和优良传统,也是党内法规安身立命之

本^[26]。依规治党思维具有法治思维的面向,同时也具有政治思维的面向,承载了党的政治要求,是作为执政党成员所必须具有的讲政治、讲党性、讲规矩、讲初心、讲大局的思维。广大党员只有具备依规治党思维,才能牢记党的初心与使命,明白党内法规赋予党员的伟大职责以及作为一名党员应有的政治担当,才能够更加旗帜鲜明地讲政治、谋大局,也才能够始终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干老实事,真正做到“涵养政治定力,练就政治慧眼,恪守政治规矩,自觉做政治上的明白人、老实人”^[27]。作为一种承载了政治要求的思维,依规治党思维要求广大党员站稳政治立场,时刻牢记自己入党时的初心,不忘自身应当担负的使命,勇挑重担、敢于担当,要求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要求广大党员干部“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不谋私利,不谋特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3.3 依规治党思维的德治思维面向

在当代社会治理与国家治理过程中,道德是除了法律之外至关重要的一种规范。而“道德的作用之一就是使人不去单纯追求眼前的物质利益,而是有精神层次的肯定”^{[28]303}。党内法规作为党员行为的底线,在要求上高于国家法律,在内容上严于国家法律。

站在国家公民身份的立场上,党内法规要求高于国家法律;而站在其党员身份的立场上,党内法规就是行为底线。从国家法的角度上来说,党内法规具有很强的道德性。“党内法规道德性可用崇高来形容,是高标准道德向党内法规转化的结果。”^[29]而法律的道德性来源于普通道德,是低标准道德(或称底线伦理)向法律转化的结果,“法律的领域是道德要求的一部分,在特定的社会发展阶段中,对这部分遵从是必不可缺的”^{[30]147}。正因为如此,法律被一些学者认为是“最低限度的伦理”^{[30]147}。但相对于普通伦理道德而言,党内法规又具有法律性;对于党员而言,这些规范并不是纯粹的道德,而是比道德更具有规范性的法,是其作为党员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依规治党思维是要求党“为政以德”、立政德、行德政,并要求广大党员修私德、讲公德、明大德、做道德人、高尚人、老实人的思维。它不仅具有法治思维和政治思维的面向,还具有德治思维的面向。

法律是以权利义务为内容的,要求权利与义务相统一。在权利与义务之间的关系上,法律更强调权利本位,将公民享有权利作为其履行义务的条件。与法律不同,道德本身是以义务为内容的。就此而言,德治思维本身就是一种义务思维。而党内法规作为介于国家法律与伦理道德之间的一种规范,在规范的内容上更趋近于道德,是伦理道德中相比于国家法律要求更高的一种规范。正因为如此,党内法规更强调义务优先,无论是对党员还是对党组织,党内法规都更强调其对党、对国家和对人民应当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将履行相应的义务作为享有党内权利的前提。但党内法规强调义务优先,突出党员义务,并不意味着其不关注党员权利或单纯要求党员放弃权利,而是通过强调党员义务,使广大党员意识到自己作为具有先进性要求的政党之组织成员与普通公民之不同,从而能够始终牢记初心、勇担使命。相反,党内法规向来高度重视和关注党员权利及其保障,不仅在党章这一党内根本法中明确规定了党员权利及其救济途径,而且还专门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这样的党员权利保障法规以及《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选举条例》等确保党员选举权在内的各种党内权利实现的法规。此外,党内法规对党员义务的突出和强调是建立在广大党员自觉自愿的认同和接受之上的,是在充分尊重党员知情权与选择权基础上的突出和强调,其本身完全契合理法。

党内法规具有明显的伦理性和道德色彩,其最为突出的体现之一就是对其思想道德方面的要求进行了明确规定。党章有关党员义务的规定中,“坚持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个人利益服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克己奉公,多做贡献”和“发扬社会主义新风尚,带头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社会主义荣辱观,提倡共产主义道德,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为了保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在一切困难和危险的时刻挺身而出,英勇斗争,不怕牺牲”^{[3]26-27},显然都是对党员思想道德提出的要求,而《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所要求的自觉培养高尚道德情操,努力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显然也属于思想道德方面的要求。此外,《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各级领导干部必须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经得起权力、金钱、美色考验,用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为人民服务”^[31],显然也都是来自伦理道德领域的要求。中国共产党是建立在超越自私自利性质、只是为部分人与团体利益服务和负责的“理性人假设”基础之上的新型政党组织^[32]。这决定了其用以管党治党的党内法规必然充斥着高于国家法律之于一般公民要求的伦理道德要求,从而具有浓重的道德性。而党内法规的道德性决定了依规治党思维必然具有关注伦理、强化道德的德治思维面向。

4 依规治党思维面向的准确把握

中国共产党要求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增强党内法规权威性和执行力。而增强党内法规权威性与执行力,势必需要强化依规治党思维,使尊重、遵守并严格执行党内法规成为全党一种自觉的习惯。如上所述,依规治党具有法治思维的面向,又具有政治思维的面向,还具有德治思维的面向,是一种集合了法治、政治与德治三种治理模式要求的融汇型思维。作为一种融汇型思维,依规治党思维要求其思维主体不仅要有法纪意识和政治观念,还要有德行修养,不仅要讲法治、讲政治,还要讲德治,要求“三治”协同、不能偏废。这就意味着作为依规治党思维基本主体的党员(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需要在三种存在密切联系但实际上又有实质性差异的思维之间准确切换频道、找准频率。不仅如此,党员需要通过强化三种思维,实现三者的融汇,最终做到三种思维同频共振、精准对接。

4.1 法治思维、政治思维与德治思维在管党治党中统一为依规治党思维

就法治思维、政治思维与德治思维各自的特征而言,法治思维更突出和强调规则意识与法纪观念,政治思维更注重党性要求与组织立场,而德治思维则更偏重自我牺牲和无私奉献。从表面上看,三种思维存在实质性差异,似乎难以兼容。但在实际上,三种思维在依规治党中是能够相互支撑和协同、达成统一的。具体而言:尽管政治更突出组织立场,法治更关注权利意识,而德治则更强调个人义务,但三者其实都关注和维护集体利益、共同利益。德治强调道德主体对于集体和社会的责任,政治强调组织成员对于组织这一集体的尊重与维护,而法治对个体权利的强调则是建立在要求主体尊重作为集体代言人的国家制定的规则这样一个基础之上的,所维护的也是集体利益与国家利益,“由于正如不完善注定趋向完善,部分注定要归于整体,又由于个人是完善共同体的一部分,所以,法律必然正当地使自己与通向普遍幸福的安排相关”^{[33]6-7}。这注定了三种思维在依规治党中有可能做到相互支撑、彼此成就。依规治党思维中的法治并不是也不可能是游离于政治与德治之外的法治,相反,它是形成于一定政治前提特别

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样一个政治前提之上,并依赖相应道德支撑的法治,突出的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以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依规治党思维中的政治是以法治为基础而其自身又反过来影响法治的政治,即“政治定性、定向法治”^[34];而且该政治是内含了道德追求的政治,是突出政法相合、政德互助、要求行法治与行德政的政治。依规治党思维中的德治是以要求高于国家法律但同样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组成部分的党内法规为基础、以政治为支撑的德治,是要求明法规底线、讲政治,强调德为法用、德为政用的德治。也就是说,在依规治党思维中,无论是法治思维、政治思维,还是德治思维,三者都不是彼此孤立、互不影响的,相反三者是相互制约、相互支撑、相互协同的。政治思维、法治思维与德治思维在推进依规治党的过程中相互融合、交汇,最终统一成依规治党思维。不仅如此,三者都服务于国家治理的需要,服务于提高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需要。无论是法治思维、政治思维,还是德治思维,都是国家治理必须依赖的重要思维,其存在的价值都在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助力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从政理上来说,依规治党思维中的法治思维、政治思维与德治思维之所以能够相互融合并最终达成统一,得益于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领导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党地位,得益于中国共产党工人阶级先锋队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先锋队的身份,得益于中国共产党作为使命型政党与中国人民以及中华民族利益的高度统一。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领导核心,其初心和使命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其宗旨则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与民族、人民以及国家的利益是高度一致的。为此,中国共产党始终以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精神不断强化自身建设,推进依规治党。党内法规要求党员讲政治的目的在于告诫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牢记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承诺,忠于自己入党时的选择,忠于党的事业同时也是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的事业;党内法规要求广大党员讲法治的目的,则是为了在确保党内统一行动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发扬民主、实现民主,确保党执政能力的提高,确保党始终保持自己的初心且有能力完成自身的使命;而党内法规要求广大党员讲德治的目的,则是为了使广大党员充分认识到自己作为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成员与一般公民之不同,从而能够充分认识到自己作为党员的荣耀与责任,能够自觉提高自己的要求,永远保持纯洁性与先进性,不负党,不负国家,不负人民。

4.2 准确把握依规治党思维的基本要求

尽管法治思维、政治思维与德治思维在管党治党中最终统一为依规治党思维,但法治、政治与德治对于广大党员的思维要求显然是不同的。依规治党思维作为一种有着法治思维、政治思维与德治思维这样三重面向的综合性思维,必然需要直面并解决如何在管党治党中正确看待和处理法治、政治与德治对于党员之不同要求及其相互关系的问题。这是准确把握依规治党思维的前提。为此,需要坚持法治的底线性,强调政治立场的优先性,并突出对广大党员的德性要求,以实现三种思维相互协同与贯通。

第一,坚持法治的底线性,理性把握依规治党思维。无论是政治还是德治,都必须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之上,不能突破法治的底线。作为一种社会规范,法律是人类理性的产物,而法治则代

表了人类社会治理的最高水平。法治崇尚规则至上、制度至上、民主至上,其实质是规则之治、制度之治、民主之治。无论从历史的发展来看,还是立足于当代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宏观视野之中,法治都是确保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健康稳定的基础和保障。不仅如此,法治也是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不能偏离的底座。从党的建设的历史来看,凡是党内尊重规则、敬畏制度、依规办事的时候,都是党内政治有序推进、党员尤其是党内“关键少数”能够明规矩、讲底线且崇德尚法的时候,也是党的事业蓬勃发展的时候;反之,则往往是党内政治相对失序,很多党员不讲规矩、缺乏政德,而党的事业发展缓慢的时候。就此而言,法治是依规治党的底线,是依规治党真正取得突破的保障,依规治党强调讲政治与德治时不能突破法治的底线。无论政治还是德治,都是建立在法治基础之上的。遵纪守法是起码的政治规矩,也是最底线的道德要求。为此,在依规治党过程中,需要广大党员干部牢固树立规则意识、制度意识和民主意识,把党内法规及其制度性要求作为党内活动的基本依据,严格依规、守规、遵规、执规。

第二,强调政治立场的优先性。理性把握依规治党思维,还要强调政治立场的优先性,在坚持法治底线的情况下,强调政治立场、政治责任和政治担当。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使命在于确保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确保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与执政地位。该使命决定了无论在全面依法治国进程中,还是在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中,都必须坚定不移讲政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目标是全面依法治国,而全面依法治国是在作为最高政治领导力量的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下深入推进的一项工程,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其本质目的是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的统一。全面依法治国需要坚持党的领导,必须要讲政治。“从政治上看待问题,注重讲政治是无产阶级政党的鲜明特色。”^[35]讲政治的核心要求是讲党性,而党性的本质则是人民性。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是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就此而言,人民性与党性是有机统一的。“党性实际上是对人民性理论上的提炼与思想上的升华,集中反映了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整体诉求。”^[36]讲政治的实质是要求维护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维护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的统一。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在依规治党、全面从严治党的过程中,广大党员必须将讲政治摆在各项工作的首要位置,强调政治立场的优先性和根本性。

第三,突出对广大党员的德性要求。理性把握依规治党思维,还需要突出对广大党员的德性要求。作为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有着先进性与纯洁性要求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光荣一员,广大党员必须立足于执政党成员的身份,对标先进性与纯洁性要求,以相比于普通公民更高的标准约束自己,模范遵守伦理道德规范,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德治思维的依规治党思维,尽管关注和强化道德,但并不惟道德,并非以是否合乎道德作为衡量党的工作的唯一标准和指向,相反,它更强调法治和政治。依规治党对于德治的关注和重视只是突出和强调了作为全面从严治党之高线要求的道德高标准,但并不因此而要求党员牺牲其法治底线,放弃其党性要求与人民立场(亦即政治立场)。相反,作为一种德治思维并同时也是法治思维与政治思维,依规治党思维极为强调依规而治,强调对党员的政治要求,尤其是人民立场。而对于执政党及其成员来说,衡量其执政行为是否有德性,能否做到为政以德,一个主要的标准就是执政党及其成员是否具有人民立场,是否能够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在这一点上,依规治党思维中的

德治思维与法治思维以及政治思维实际上是相统一的。突出对广大党员的德性要求,其实质是强化对广大党员的高标准要求,目的是为了使广大党员通过践行更高标准的要求,始终不忘自己作为党员的政治身份,能够模范地遵守国家法。

5 结语

中国共产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37]。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经被明确载入宪法的背景下,全面依法治国需要且离不开依规治党、全面从严治党的政治保障。而依规治党、全面从严治党不仅需要且离不开法治思维,更需要且离不开内含于法治思维中的依规治党思维。为此,必须要在党内培育和强化依规治党思维。依规治党思维既具有法治思维的面向,也具有政治思维的面向,还具有德治思维的面向,是法治、政治与德治三种思维的交汇与融合。对于党来说,培育和强化依规治党思维必须正确处理好法治、政治与德治的关系,处理好依法治国、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的关系,需要“充分发挥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的互补性作用,确保党既依据宪法法律治国理政,又依据党内法规管党治党、从严治党。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党相结合,法安天下,德润民心,实现法治和德治相辅相成、相得益彰”^[38]。而对于广大党员来说,则需要理性把握依规治党思维的基本要求,做到以法治为底线、以政治为先行线、以德治为高线,不断增强法纪意识和政治观念,突出对自身的德性要求,同时“领导干部必须践履更高道德标准”^[39],强化个人思想道德修养,做懂规则、明底线、有立场、讲德行、甘于奉献的人;需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定“四个自信”,筑牢“四个意识”,做到“两个维护”,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只有如此,才能够在全党范围内形成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尊重党内法规、坚守规则、崇尚德行的良好氛围,助力依规治党、全面从严治党乃至全面依法治国深入推进,也才能够更好地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参考文献:

- [1] 赵大朋. 使命型政党:中国共产党类型化研究的探索[J]. 探索,2020(5):116-125.
- [2]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 [3] 中国共产党章程[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 [4] 王振民,施新州,等. 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研究[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 [5] 李卫华. 依规治党的法治意蕴与法治理念创新[J]. 江苏社会科学,2023(3):30-39.
- [6] 王伟国. 党内法规作为新时代中国法学新范畴论纲[J].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21(1):46-59.
- [7] 梁颖,黎家娴. 深化对“制度治党、依规治党”的认识[J]. 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6):27-34.
- [8] 欧爱民,李政洋. 党内法规构成行政法渊源——以新时代二元法治规范体系为分析视角[J]. 上海政法学院学报(法治论丛),2020(5):119-134.
- [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

- [10] 习近平. 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0.
- [11] 郭成安. 直觉、灵感与顿悟是思维吗[J]. 发明与创新, 2007(1): 13.
- [1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 [13]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之四: 智慧的明灯[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3.
- [14]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7.
- [15] 蒙慧. 论党内法规横向分类的政治逻辑与体系结构——基于中国共产党政治活动的视角[J]. 探索, 2019(3): 87-95.
- [16] 刘长秋. 论党内法规的特征——兼论党内法规调整作为一种制度调整的优势[J]. 观察与思考, 2023(8): 48-55.
- [17] 习近平. 推进全面依法治国, 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积极作用[J]. 求是, 2020(22): 4-7.
- [18] 周叶中, 汤景业. 关于“党章是党的总章程”的法学解读[J].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4): 22-28.
- [19] 富勒. 法律的道德性[M]. 郑戈,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5.
- [20] 张效羽. 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法治思维——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例[J].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20(4): 61-68.
- [21] 朱程斌, 李龙. 新时代的国家监察委: 通过党内法规的政治机关法治化路径初探[J]. 广西社会科学, 2018(3): 12-18.
- [22] 李军, 刘东芝. 毛泽东首倡“党内法规”的历史意蕴探究——基于《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文本考查[J]. 上海政法学院学报(法治论丛), 2020(6): 118-126.
- [23] 张荣臣. 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要求[N]. 中国纪检监察报, 2019-03-07.
- [24] 周廷勇, 张帆. 切实加强党的政治建设[J]. 红旗文稿, 2019(14): 22-24.
- [25] 陈光. 党内法规在社区治理中的作用研究[J]. 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 2017(3): 51-58.
- [26] 靳澜涛. 党规“姓党”: 党内法规的理论定位与实践指南[J]. 社会科学动态, 2018(9): 73-77.
- [27] 习近平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在常学常新中加强理论修养 在知行合一中主动担当作为[N]. 人民日报, 2019-03-02.
- [28] 陈根法. 心灵的秩序——道德哲学理论与实践[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8.
- [29] 郭忠. 论党内法规法性质之独特性——从党内法规的道德性角度分析[J]. 甘肃社会科学, 2020(3): 138-145.
- [30] 罗斯科·庞德. 法律与道德[M]. 陈林林, 译.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3.
- [31] 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J]. 党建, 2016(11): 15-23.
- [32] 唐亚林. 人心政治论[J]. 理论与改革, 2020(5): 115-129.
- [33] 阿奎那. 论法律[M]. 杨天江,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6.
- [34] 江必新, 戢太雷. 习近平法治建设重大关系理论[J]. 东南法学, 2021(2): 1-42.
- [35] 王可园. 中国共产党政治建设的百年探索: 理论创新和基本经验[J]. 探索, 2020(5): 103-115.
- [36] 祝佳兴, 刘占祥. 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的演进逻辑和当代审视[J]. 广西社会科学, 2020(12): 35-40.
- [37] 习近平. 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J]. 求是, 2020(14): 4-17.
- [38] 李林.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核心要义[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20-11-23.
- [39] 黄建跃. 习近平关于政德建设重要论述的原创性贡献[J]. 探索, 2022(5): 1-13.

On the Three-dimensional Orientation and Accurate Understanding of the Thinking of Governing the Party According to Regulations

LIU Changqiu

(School of Discipline Inspection and Supervision, Shanghai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Shanghai 201701, China)

Abstract: The report of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learly requires adhering to institutional governance and governing the Party according to regulations. To promote and achieve the governance of the Party according to regulations,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rnal party regulations and systems at the institutional level in order to form a perfect system of laws and regulations within the Party, as well as to apply and strengthen the thinking of governing the Party according to regulations at thinking level, to promote the comprehensive improvement of thinking ability of the ruling Party and its members. The thinking of governing the Party according to regulations is the thinking of governing the Party according to internal regulations. The 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legal, political, and moral aspects of internal Party regulations make the thinking of governing the Party according to regulations inevitably have a three-dimensional dimension of rule of law, political, and moral thinking, becoming a comprehensive and integrated thinking that integrates rule of law, political, and moral thinking. In terms of the rule of law, the thinking of governing the Party according to regulations emphasizes and advocates the supremacy of rules, requiring all Party members to respect, revere, and abide by Party regulations as legally significant rules within the Party. In terms of political orientation, the thinking of governing the party according to regulations carries the political requirements of the Party, requiring the ruling Party and its members to emphasize politics, Party spirit, rules, original intentions, and the overall situation. In terms of moral governance, the thinking of governing the Party according to regulations requires the Party to “govern with morality”, establish political ethics, and conduct moral governance. It also requires the majority of Party members to cultivate personal ethics, uphold public ethics, understand great virtues, be moral, noble, and honest. As a comprehensive and integrated thinking that combines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three governance models of rule of law, politics, and moral governance, the thinking of governing the Party according to regulations requires that its thinking subject not only have a sense of law and discipline and political concepts, but also have moral cultivation. It is not only necessary to emphasize the rule of law, politics, but also moral governance, requiring the coordination of the “three governance” and not being biased. In the process of deepening the rule of law and strict governance of the Party, Party members need to switch channels and accurately grasp frequencies between legal, political, and moral thinking in a timely manner to achieve resonance and precise docking among the three.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adhere to the bottom line of the rule of law, emphasize the priority of political stance, and highlight the moral requirements for the vast number of Party members. This is the basic requirement for accurately grasping the thinking of governing the Party according to regulations.

Key words: governing the Party according to regulations, thinking, politics, rule of law, rule of virtue

责任编辑:王 慧

中西比较视野下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特色与优势

张 蕴^{1,2}, 孙道进¹

(1. 西南大学 三峡库区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重庆 400715;

2. 四川外国语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重庆 400031)

摘要:从中西比较视野探究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所具有的统摄现代化“普遍性”与中国社会“特殊性”的典型特征,有助于深入理解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特色与优势。西式现代化囿于“资本至上”叙事话语框架,在理论发展上主张以乡村“从属论”支撑“城市偏向论”,在价值导向上片面强调农业部门的“从属性”而边缘化农民利益诉求,在发展经验上受制于西方中心主义,因而难以避免农业农村现代化理论缺位、社会正义缺失及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等发展桎梏。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相较西方模式具有典型超越意义,主要表现在:基于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立足“大国小农”基本国情,坚持“四化同步”,发挥现代化的超越性;基于土地制度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变革农业生产关系,确保现代化的普惠性;基于传统乡村的现代转型,重塑乡村内生秩序,保障现代化的可持续性。中国的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实现了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规律的创造性运用,有力化解了“资本意志”主导的现代化陷阱,体现了对传统现代化内涵的升华以及自主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可行性。其重要成就既是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指导中国实践的创造性成果,也是坚持党的领导和“人民至上”现代化立场的经验凝结,体现了推动传统农耕文明现代转型的创新探索。以农业农村现代化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契合了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这一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特色与优势,也为后发国家农业农村发展及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有益启示。

关键词:农业农村现代化;资本逻辑;人民至上;共同富裕;道路优势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23)06-0120-14

农业农村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任务,是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必然要求”^{[1]158}。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农业持续发展,农村改革不断推进,积累了大量发展经验,为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奠定了重要基础。从中西比较视野分析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西方桎梏,以及中国对此所探索的解题方案,有助于深入探究中国的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以其独立自主的探索成就,统摄现代化“普遍性”与中国社会“特殊性”,构筑以“共同富裕”为旨归的现代化图景的重要意义,从而深度阐发其鲜明的中国特色与独特优势。

1 文献回顾与问题提出

现代化过程作为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变迁历程,各国现代化的共性在于,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后期资助项目“马克思主义环境思想解读研究”(19JHQ025),项目负责人:孙道进;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及其中国实践研究”(2022ZDZJ13),项目负责人:张蕴。

作者简介:张蕴,女,博士,西南大学三峡库区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四川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孙道进,男,博士,西南大学三峡库区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创造了极大超越传统社会的生产力,实现了生产生活方式的跨越式变革。中国式现代化有着显著区别于西式现代化的鲜明特色,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2]22}，“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2]22}，“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2]22}，“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2]22}，“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2]23}，“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2]23}。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构筑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本土化命题,是当下热点研究议题。其中,较多学者将中国式现代化置于世界现代化坐标中进行了历时性和共时性等多维视角的研究。例如,杨凤城和叶子豪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在“普遍性与民族特殊性的统一”中凸显独立自主性,在“尊重历史规律性和发挥主体能动性的结合”中彰显历史主动性的内在特质^[3];张艳斌结合内容维度(全面协调的现代化)、价值维度(以人民为中心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现代化)、时空维度(立足国情的时间压缩和空间重构的现代化)、关系维度(在辩证把握诸多关系中开拓的全新现代化)等多重维度诠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规定性^[4];曹丽基于马克思有关“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历史观,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对社会主义传统模式和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的突破,以及对人类文明形态的新贡献等^[5]。这些研究对于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发逻辑、内涵特质、独特优势和世界意义具有启示意义。

基于学界研究现状,为更深入探究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史与现实必然性,以及该道路对破解人类社会难题的贡献,可聚焦农业农村现代化这一重要研究维度。农业农村现代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具有“压舱石”作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没有农业现代化,没有农村繁荣富强,没有农民安居乐业,国家现代化是不完整、不全面、不牢固的”^{[6]32}。当前,学界有关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议题的研究渐趋丰富。其中,不乏学者针对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生成逻辑、内涵特征等进行了探究。例如,蓝红星等人分析了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农富国强”目标与“大国小农”禀赋特征^[7];刘吉双等人分析了中国特色“并联式”农业现代化的历史逻辑、内涵和发展现状^[8];高原探讨了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对现代化规范性含义的拓展,剖析了其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统筹效率与安全、乡村社会全面发展等内涵^[9];高杰等人分析了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以党的全面领导为核心、以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为基础、以小农户共同富裕为目标、以乡村全面振兴为抓手等方面的特征^[10];李明星等人基于历史回溯探讨了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战略演变的时代特征,剖析了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内涵^[11]。此外,部分学者从经济学、管理学等视角对该议题展开实证探究。例如,李媛等人从多个维度实证考察了数字经济对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12];刘璐等人基于对我国区域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水平的测算评估,分析了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时空特征、发展类型及障碍因子^[13]。

从世界历史看,农业农村发展困境是中西现代化共同面临的挑战。本文认为,以中央对“三农”工作的总体部署和行动纲领为遵循,结合学界当下研究,从中西比较视野进一步思考我国现实国情下“三农”发展道路的必然性和现实启示,从农业农村维度辨析中国式现代化在跨越时空意义上超越西式现代化的独特性,具有可深化的研究空间。一是有助于突破西式现代化的话语框架,揭示西式现代化“资本至上”价值向度的桎梏,更深入厘清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所具有的统摄现代化“普遍性”与中国社会“特殊性”的典型特征;二是有助于通过对中西农业农村发展方略的廓清和鉴别,更深入把握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升华”现代化传统内涵,构筑以“共同

富裕”为旨归的现代化图景对于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意义。鉴于此,本文基于对西式现代化引发的农业农村发展桎梏的审思,将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置于世界现代化坐标中,结合其理论意涵、典型特征、经验成就及重要意义展开探究。

2 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西方桎梏

现代性权力在开辟世界历史的进程中也形成了“农村从属于城市”“东方从属于西方”的“支配—从属”关系。资本二重性及其矛盾的世界历史展开,既催生了资本主义文明的现代化,也使得后发国家的社会转型面临乡村衰落的困境,引发对西方话语主导下现代化模式的反思。受西方现代化“资本至上”主流叙事话语影响,其农业生产及农村治理的先发优势被片面扩大,其中所关联的殖民、暴力等非人道手段及农业农村异化危机则被掩盖。从中西比较视野审思西式现代化“资本至上”的桎梏,更能深度理解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的独特优势。

2.1 理论发展桎梏:以乡村“从属论”支撑“城市偏向论”

现代化的本质是西方发展理论关注的重要问题。在西方发展经济学研究谱系中,通常结合工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及岗位收益,以工业和服务业经济比重、城市人口占比等指标界定现代化,将农业局限于为工业提供补给的“衰退”产业,“农业农村现代化”未被给予合理重视。比如,阿瑟·刘易斯(W. A. Lewis)等人提出零值劳动力理论,认为在劳动边际生产率趋零或为负数的国家或地区,劳动力的无限供给是存在的^[14]³,强调以产业结构转型推动剩余农业劳动力向工业转移。劳尔·普雷维什(Raúl Prebisch)等人提出剪刀差理论,认为国际交换中工农业产品比价失衡,发展中国家要摆脱农产品输出“剪刀差”的剥削,则应通过“向中心出口除传统产品以外的其他产品”或“加快国内生产速度”的方式,以获取受制于资源、技术、资金条件而不易进口或生产的产品^[15]²¹⁰,强调将有限资金投入工业,从而最大限度促进国民经济发展。此外,在乡村发展趋势上,乡村问题通常被视作工业文明的从属问题,各国进入大众消费阶段的进程则被视作迈入城市文明的“乡村终结”过程。比如,罗斯托(Walt W. Rostow)的“经济发展阶段论”认为,“传统社会阶段”通过农业生产资源投入而从农业体系中产生“分层的社会结构”,社会结构的纵向流动受制于宗族和家庭而具有狭隘性,因而“传统社会的价值体系一般是与所谓长期宿命论相吻合的”^[16]⁵;该阶段必然过渡至农业人口大量减少、产业结构深层次变化的起飞阶段和成熟阶段。佩鲁(F. Perroux)的“增长极理论”认为,“革新首先是从工业部门开始,然后转到农业部门”^[17]¹³⁹,作为“外围地带”的乡村通过“增长极”对区域经济的扩散作用才得以发展。

正确定位农业农村在经济发展中的角色与功能,是国家制定现代化政策的重要出发点。然而,西方传统理论通常狭隘地将农业视作落后的基础部门,将农村视为工业化积累原动力的场所。事实上,农业中并不存在边际产出为零的剩余劳动力。农业劳动力“需求—产出”趋势伴随农业技术和产业结构的变化而变化,比如农业机械化可提高单位土地的产出而增加有效供给,赋予农民更多生产选择空间。同时,优先发展何种产业更多取决于国内外产品交换的比较利益,仅从农产品在国内消费结构中份额下降难以得出农业衰退的结论,也不能仅从粮食换取工业品的比重对“剪刀差”加以判断。发展中国家具有劳动力资源优势,应基于“成本—效益比”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通过农产品交换积聚资本并逐渐向资本密集型产业过渡。这些理论强

调农业部门的“从属性”却忽视了乡村社会多元发展样态,将乡村功能局限于依托资源禀赋而实现另类价值的想象载体,强调农业社会庞大的“零值劳动力”必将向现代工业部门转移,从而形成城乡一体化劳动力市场。究其理论实质,在于以乡村“从属论”支撑“城市偏向论”。概言之,“农业农村现代化”在西方发展理论中囿于“资本至上”的价值向度,未能形成科学的知识框架,难以为农业农村发展提供理论支撑。

2.2 价值导向桎梏:边缘化农民利益诉求,加剧社会正义缺失

透过当代资本主义表象不难发现,“资本至上”的价值向度决定着西式现代化必然边缘化农民生存发展的利益诉求。根据古典政治经济学观点,现代农业必须经历农业经营的规模化和资本主义化,现代化的发轫则密切关联于农业资源条件优越的英格兰、北美等国家或地区的区域性经验。英格兰在工业革命前,以圈地运动使农村沦为资本主导的大规模农场,失地农民集聚城镇而成为原始工业化的劳动力大军,乡村和城镇分别提供原材料和制成品,并通过海外殖民的红利加持以提高农业生产率。如马克思就资本剥夺人民土地和生产生活资料展开分析,强调“广大人民群众被剥夺土地、生活资料、劳动工具,——人民群众遭受的这种可怕的残酷的剥夺,形成资本的前史”^{[18]873}。英格兰通过资本的大规模掠夺,形成了“小国大农”特色。就北美地区而言,殖民者驱逐印第安原住民,独享新大陆丰沛的农业资源,通过繁荣的对外贸易使工农业发展相得益彰,形成了北美“大国大农”特色。然而,资本的逐利性扩张致使失地农民被动卷入全球化浪潮,在促进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同时,也加剧了农村凋敝和城市“贫民窟”现象。此外,受制于农村市场投资回报与企业运营成本之间的矛盾,资本攫取土地等生产要素却排斥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如美国白宫 2022 年一则简报所载,“长期以来,农村社区的主要基础设施需求被忽视”,“超过 3 000 万美国人生活在缺乏宽带基础设施的地区”,“生活在农村地区的美国人仅占总人口的 20%,却占据了道路死亡总人数的近一半”^[19]。

还应认识到,西式现代化高度迎合了西式民主“资本的游戏”和“精英政治”特征,将农民作为汲取资源和权力的工具,必然边缘化农民政治参与的利益诉求,挤压其争取权益的话语空间。以美国政府反贫困政策为例,该政策往往受制于农业利益集团而与经济结构脱节,忽视村庄发展多元样态,以及相当数量农户从非农产业获取收入的现实,将“农业发展”作为“乡村发展”的代名词。再如,早期由美国盖茨基金会等共同援建的非洲绿色革命联盟,承诺消减目标国饥饿人数,号召将非洲农业由自给改造为现代模式。然而,“绿盟成立 14 年来,累计获得 10 亿美元资助,但根本没有兑现其 2020 年前让 3 000 万小农户产量收入倍增和饥饿人口减半的承诺;相反,在绿盟关注的 13 个重点国家,饥饿人口增加了 31%”^[20]。同时,对套用西式民主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农民难以跨越精英政治而发挥话语优势。以印度政府 2020 年颁布农业改革法案为例,政府利用议会多数席位通过了《农产品贸易和商业(促进和便利)法案》等旨在推动农业市场化改革的三项法案,这些法案“取消了印度农民最看重的‘最低支持价格’机制”^[21],对农民切身利益产生极大冲击,从而引发社会冲突。此外,资本主流叙事受种族因素影响,鲜有为少数族裔农民尤其是其妇女的利益发声。“斯坦福大学贫困与不平等研究中心 2017 年发布的报告显示,美国南部农村的整体贫困率为 20%,其中非洲裔美国人的贫困率是 33%,非洲裔妇女的贫困率高达 37%。”^[22]可见,西式现代化与西式民主交织影响,严重损害了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民的基

本权益,并在资源代际传递影响下进一步加剧了西方社会公平正义的缺失。

2.3 发展经验桎梏:坠入西方中心主义窠臼,难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对奉行所谓“新自由主义”、盲目照搬西方农业农村发展模式的国家而言,忽视了西式现代化“资本至上”的实质,难免坠入西方中心主义的窠臼,跌入“中等收入陷阱”。以拉美地区为例,其资源丰富、发展潜力巨大,原本主要属于农业社会,但19世纪晚期以来,受欧美影响而逐步形成了起点低、速度快且依附性强的“畸形城市化”模式。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依靠资源消耗型和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既缺乏创新性和可持续性,也加剧了生态恶化、能源危机与社会分裂,催生了“一个国家,两个世界”的城乡发展失衡现象。经历20世纪60-70年代的经济飞速发展期后,以墨西哥债务危机为触发点,大多数拉美国家开启了新自由主义改革之路,经济私有化、贸易自由化的结果使其深陷“经济失去的十年”,经济增长至今仍然乏力。拉加经济委员会发表的拉美社会展望报告显示,2021年拉美地区“极端贫困人口增加500万人,再次攀升至8600万人,倒退27年,极端贫困率从2020年的13.1%增加到13.8%”;该地区“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GDP)收缩6.8%,是120年来的最大衰退”^[23],各种社会矛盾伴随经济低迷而持续激化。

高城市化率未能使大多数拉美国家步入发达国家行列,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未能正确处理城市化与农业农村协调发展的关系。一方面,政府受制于“城市化即现代化”的思想观念,罔顾社会承载力而将资源配置过度向大城市倾斜,导致城乡之间、工农业之间、劳动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产业之间发展失衡,过度城市化与农村边缘化、农民贫困化相伴而生;另一方面,土地改革耗时长、政策变动频繁且极具不彻底性,难以保障农民生存权益,农村人口大量流失,严重牵制了现代化进程。“从1915年墨西哥开启土地改革算起,至今约1个世纪。”^[24]然而,大多数拉美国家的土地改革并非致力于消灭高度集中的大地产制度,而是以减少土地闲置、发展资本主义大规模农场为目标,并未根本触及庄园主的“土地领主权”和土地私有化结构。比如,得到美国财政支持的《哥伦比亚社会农业改革法》看似具有进步性,但“10年之后,这一改革仅将总耕地面积的0.25%分配给了微不足道的0.45%的农民”^{[25]287}。此外,缺乏对小农生产经营所需资金、技术和劳动资料的扶持,进一步加剧了土地垄断、贫富分化现象,引发巴西、墨西哥等国农民与政府和大地主之间争夺土地的武装冲突。小农因基本生活无法保障而被排挤至城市谋生,难以回归土地匮乏的乡村家园。然而,政府盲目地将农村人口流向城市视作社会矛盾的“减压阀”,无视城市就业、住房、医疗和教育等配套措施缺位的现实,催生了大批“城市边缘地带”,致使城市化进程与现代化进程严重脱节。拉美地区牺牲农业农村发展以换取工业化、城市化的结果充分说明,任何遵循“资本至上”价值向度、盲目接受西式现代化所谓新自由主义“药方”、试图超越农业发展阶段的经济发展战略均不具有可取性;短暂的经济增长必将以经济长期停滞为惨痛代价,其结果必然是农业凋敝,工业发展也难以达到预期目标。拉美的经验教训为深度思考中国的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提供了负面参照。

3 立足国情凸显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中国特色

现代化理论的孕育不能脱离其经验“场域”而盲目照搬西方经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普遍面临农业资源不足、工业基础孱弱、难以广泛吸纳农村就业人口等困境,中国的农业

农村现代化道路,同样无法通过“农民变市民”的城市化路径实现。“我国农村地区占国土总面积的90%以上,集聚着大量农业产业、生活着几亿农村人口,还有2亿多小农户。”^[26]人均农业资源稀缺、农业生产要素水平低,以及现代工业孱弱的“大国小农”国情,使解决城乡工农矛盾极富挑战性。仅靠城市化难以将超大规模的农业人口纳入现代经济体系,必须走出一条统筹规划“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农村就地现代化”道路,以“三农”有机衔接推进我国由“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跨越。

3.1 坚持“四化同步”:基于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发挥现代化的超越性

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先发内源性现代化,以300余年的生产力积淀渐次推进各阶段“串联式”发展任务,中国的现代化属于后发外源性现代化,具有目标高度叠加、时间高度压缩、战略高度融合等“并联式”现代化的超越性特征。第一次工业革命后,西方发达国家的农业发展普遍滞后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农业部门在国民经济中囿于“农产品—食物”供给保障的单一功能。区域专门化、机械化生产虽提高了农业生产率,但也伴随着能源消耗大、农产品供求波动大、农村人口老龄化等一系列问题。然而,从经济内涵上考量农业农村现代化,应当蕴含着“始终坚持农业发展的基础地位,坚持发展农业生产力为根本”^[11]的本质要求。就我国而言,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农业部门对维系国家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功能,以及农林牧渔等传统农业对贡献食物来源、手工业原材料、能源及动力的关键作用。尤其在全球供应链调整的时代变局下,始终坚持以农业农村现代化夯实发展根基。正如党的二十大报告所强调的,“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牢牢守住十八亿亩耕地红线……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21],体现了统筹兼顾经济效率与国家安全、社会稳定的现代化愿景。党和政府强调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新四化”)在空间上一体布局、在功能上耦合叠加,以其他“三化”成果赋能农业发展,彰显了农业在我国“并联式”现代化蓝图中的特殊地位。

基于“新四化”建设思路,工业化创造供给反哺农业,城镇化创造需求支持农村,信息化促进资源要素在农业中加速聚集与优化配置,共同提升农业机械化、产业化、绿色化和信息化水平,激活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内驱动力。一是农业与工业化融合,为农业发展夯实了物资基础。我国用改革开放40多年时间实现了制造业规模世界第一,拥有的220多个工业品种产量居世界前列,农业物质装备水平、科学技术转化程度及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不断提升,实现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二是农业与信息化融合,为变革农业生产经营方式提供了信息支撑。农村网信事业快速发展,极大地促进了智慧农业发展。《2023年数字乡村发展工作要点》指出,“到2023年底,数字乡村发展取得阶段性进展”;“农村宽带接入用户数超过1.9亿,5G网络基本实现乡镇级以上区域和有条件的行政村覆盖,农业生产信息化率达到26.5%,农产品电商网络零售额突破5800亿元,全国具备条件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建档评级基本全覆盖”^[27]。三是农业与城镇化融合,为现代农业生产创造了环境和要素条件。我国的城市化呈现“农民进城”与“就近就地城镇化”的融合轨迹,为城市人才、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下乡,推动农业生产品牌化、标准化和绿色化提供了良好环境。还应认识到,以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成果助推农业现代化的同时,农业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也促进了三次产业的深度融合,以及区域之间、人与环境之间的协调发展,加快了城乡一体化进程。得益于“四化同步”的现代化布局,为形成“工农互促、

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夯实了根基。

3.2 变革农业生产关系:基于土地制度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确保现代化的普惠性

不同于西式现代化鼓吹新自由主义思潮,放任资本野蛮侵蚀农民生产生活空间,加剧了土地私有化和阶层固化,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聚焦社会公平正义,“引入政府‘有形之手’来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28],既以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优化土地资源配置利用,激发集体经济活力,同时坚守土地公有制这一底线,抵制资本无序扩张和过度逐利的影响,确保了土地制度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切实维护了农民的生存权、财产权和发展权。党和政府坚守维护农村社会公平正义的价值导向,在农村生产关系领域不断寻求突破。新中国成立之初,面对工农业极端落后的现状,通过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合作化集体农业体制,稳定了粮食总量,改善了农业基础设施,提高了农业生产力,有力支持了国家工业建设。改革开放后,通过“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兼顾了效率与公平,实现了集体组织和家庭经营优势互补,提升了农业社会化、专业化水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征程上,以农村土地“三权分置”制度创新为契机,形成了农地集体所有、农户承包、土地经营权流转的新局面,使农村土地成为吸引社会财富涌入、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资源。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社会化服务,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保障进城落户农民合法土地权益”^{[2]31};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也强调,“研究制定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工作指导意见”。党中央从顶层规划上进一步明确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土地制度改革方向,为赋予农民更加充分的财产权益夯实了政策依据。

新发展阶段,为使广大农民更好地分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增值收益,党和政府顺应农村资源重组、人口和要素流动的新形势,以一系列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制度安排保障现代化的普惠性。比如,发挥新型集体经济效能以“规避资本排斥小农导致的社会风险”^[29],重构集体村社衔接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功能,进而通过土地确权、资源再配置等政策举措,使农地的物权属性和承包经营权更加明确,土地折股量化、流转出租和有偿转让更加规范有序,巩固了农民参与现代生产经营的主体地位。同时,有效驾驭了资本下乡。一方面,盘活资本惠农功能,为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农业产业链和新业态、促进农村三次产业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为农户和返乡人员搭建就业创业平台,为农民转型为现代新型经营主体提供了多元空间,拓宽了农民长效致富之路;另一方面,严格设定资本下乡门槛,完善涉农股份制企业利润分配机制,明确资本参与利润分配比例上限,防止外部资本无序扩张,最大限度发挥资本的积极作用以促进农村生产方式变革、吸纳更多农村就业人口。正因为党和政府坚守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坚持农民利益优先,才保障了广大农民“进城能就业,回乡能种田”的土地权益,为中国以仅占世界7%的耕地将占全球1/5的人口整体带入现代化奠定了制度基石。

3.3 重塑乡村内生秩序:基于传统乡村的现代转型,保障现代化的可持续性

不同于西式现代化在资本主宰下使农村在经济体中沦为城市的附庸,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致力于从根源上破解城乡之间的不平等依附关系,推动传统乡村向现代转型,满足农民建设美好家园、追求幸福生活的愿景,促进城乡可持续发展。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全国“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90 199万人,占63.89%;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50 979万人,占36.11%”^[30]。人

口基数大、农村人口多的现实国情决定着以乡村振兴战略实现亿万农村人口“以农为业、以农为家”的深远意义。2022年《“十四五”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明确了“三个建设”的重点任务,即“建设宜居宜业乡村”“建设绿色美丽乡村”“建设文明和谐乡村”。2022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乡村建设行动实施方案》对乡村人居环境、公共基础设施、基本公共服务和精神文明建设等提出具体要求,明确了到2035年乡村振兴“建什么、怎么建、怎样建”的任务规划,强调“农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进一步增强”的行动目标,使乡村振兴的时间表、路线图更加明晰。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对“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2]31}作出战略部署,这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理论创新的深化成果,充分诠释了中国的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是具有明确价值导向、蓝图规划和实施路线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村庄的建设和发展不仅是农民自主建设的自为过程,也是被外力不断规划与塑造的过程。”^[31]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以系统重塑乡村内生秩序为着力点,提升乡村可持续发展能力。在乡村发展规划上,通过一系列强农惠农政策,有效协调国家整体规划、政策推广和地方自主建设的关系,鼓励因地制宜探索乡村振兴新模式。在乡村软硬件建设上,增强乡村基础设施完备度、公共服务便利度和人居环境舒适度,加快补齐生活基础设施功能与便民服务短板。在乡村生态保护上,持续推行农业标准化清洁生产,发展生态循环农业,打好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攻坚战,致力于将乡村绿色资源转变为创造价值,将对生态环境保护的被动要求转变为正向激励。在乡村文明风尚培育上,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常态化培育,规范村规民约,激励家风传承,强化文化惠民,促进乡村社会安定和谐,满足乡村群众高质量精神生活需求。在乡村治理体系建设上,加强国家力量向农村下沉的民主制度设计,健全乡村自治与公共治理有机融合的治理格局,乡村自治重在提升乡村群众自我管理、服务、教育和监督能力,而乡村公共治理的发展则“意味着国家及多种力量对乡村的支持在增强”^[32],为增强乡村与外界的互动联系、以更多公共资源赋能乡村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在乡村人力资源流动上,强化人才支撑,为乡村培养输送大量青年人才,并通过变革传统生计农业的生产方式、保留宅基地、完善基础设施等举措为小农户在融入市场化发展而“有尊严地实现转移和转型”^[33]的同时又在乡村“留根”提供了物质和制度保障,“部分小农户正在逐步向专业农户转变”^[33]已成为当前我国农民形态演变的典型事实。概言之,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致力于乡村建设从“塑形”到“铸魂”的飞跃,探索出一条以乡村高质量发展为驱动力,塑造城乡健康和谐关系、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可持续发展新路。

4 把握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独特优势

现代化不应囿于固有的单一线性模式,而应扎根本国土壤,基于理论与实践创新,开辟传统文明向现代转型的新道路。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着力于破解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难题,推动乡村高质量发展以满足广大农民的美好生活需要,以实践经验拓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成果,彰显了党的领导优势和“人民至上”的价值立场,契合了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该道路以其独立自主的探索成就,从更宽广、更深邃的视野升华了现代化的传统内涵,体现了鲜明的中国特色及独特优势。

4.1 创造性运用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拓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成果

中国的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生动践行,实现了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规律的创造性运用。区别于西方经济学“理性人假设”及实证主义方法论立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于唯物辩证法及系统观念的方法论,强调社会生产关系的变革建基于生产力发展之上。如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所述,“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34]602}。同时,其理论也并非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视作机械对应关系,强调变革生产关系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在一定生产力条件下弹性选择生产关系提供了理论空间。其主要围绕劳动价值论与资本循环理论,阐释了社会经济循环中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的普遍规定性,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规律及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强调的,生产关系“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35]591}将催生社会革命,“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35]592}。为适应社会进步和生产力发展的要求,需要不断完善调节社会关系和社会活动的体制机制。由于生产力的现代化在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处于先导地位,决定着经济基础及上层建筑的现代化,从而需要发展与生产力水平相匹配的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持续优化农业农村发展的顶层规划。鉴于我国人口众多与资源相对不足之间的现实矛盾,国民经济中工农业占比失衡是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制约因素,这关涉推动现代经济资源同现代农业深度融合、优化长期投资和资本积累条件、畅通经济循环中乡村参与渠道,以及引领农户分散经营融入社会化大生产等一系列问题,但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受制于经济社会背景,未能就相关问题给出直接答案。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旺盛生机和活力,根本在于能够与时俱进地指导解决中国现实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中国共产党基于初心和使命探索公平与效率的辩证关系、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为研究主线,以致力于成功探索社会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运动规律,从而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为研究任务”^[36]。从以其指导农业农村发展维度看,党和政府科学研判我国各阶段生产力水平,聚焦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而不断优化生产关系,逐步推动“以农支工”向“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向“城乡融合”转化,将共同富裕的价值追求全面融入“三农”工作中。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政府反思苏联工业化破坏农村生产力的教训,既优先发展重工业,更遵循“工农业并举”的建设原则,保障农产品供给和在地化资本积累,极大地支持了国家工业化建设。改革开放后,党和政府把握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契机,推进农村“统分结合”经营体制改革,以城镇化建设辐射带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将广大农村作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场域,深化落实“脱贫攻坚”“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重大战略部署,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保障农业高质量发展。党和政府致力于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的难题,将稳住农业基本盘作为应对世界大变局、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压舱石”;适应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需要,将农村发展作为扩大内需的重要战略支点,以城乡经济循环促进国内大循环。在推动我国由“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跨越的不懈探索中,积累了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指导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宝贵经验。

4.2 化解“资本意志”陷阱,彰显党的领导优势和“人民至上”现代化立场

中国的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有力化解了“资本意志”主导的现代化陷阱,充分诠释了发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优势、独立自主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可行性。在西方霸权构筑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下,很多国家会出现以乡村透支为代价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该过程也是城乡差距、东西方差距不断扩大的过程。与资本主宰乡村而掉入“拉美漩涡”形成鲜明反差,我国“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37]的脱贫成绩单充分说明,资本也可以被社会主义所驾驭。我国作为超大人口规模的发展中国家,面对全球资本体系的冲击,并不以创造所谓“普世性”的乡村发展形态为现代化目标,而是致力于打破城乡对立的窠臼,实现城乡社会发展和资本规制的合一。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摒弃了城市中心主义,通过资源向农业农村倾斜和乡村秩序重构,使乡村同城市处于共享现代化红利的同一水平线,以巨大的成就证明:乡村并非城市辐射的被动承接者,其本身即为孕育现代化动能的重要场域。

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中国共产党的农业农村现代化思想根据时代大潮而变,却始终保持着理论内核的稳定性与承续性。”^[38]作为使命型政党,其“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构成了中国共产党农业农村现代化思想的逻辑原点”^[38]。在当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全球背景下,党中央深入研判“三农”工作的时代方位,高度重视守好“三农”基本盘对我国把握战略机遇、战胜风险挑战的基础作用。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聚焦“三农”工作重心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历史性转移,结合“十四五”时期“三农”工作战略规划,强调“构建新发展格局,潜力后劲在‘三农’”,“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挑战,基础支撑在‘三农’”,并就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重要农产品保障能力、强化现代农业科技支撑、构建现代乡村产业体系、提升农村公共服务水平、促进农村消费、加快县域内城乡融合等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加快补齐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三农”领域短板,为新发展阶段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明确了行动方略。同时,党中央以中国特色的战略安排和实践创新,保障了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方向。比如,在规划引领上,《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明确了分类别、分步骤推进乡村振兴的重点任务、时间规划和实施路线;在组织建设上,基于“党建促发展”的建设思路,发挥好农村基层党组织在盘活资源、整合资产、引领致富等各方面的组织优势,巩固其对集体经济组织、乡村群团及自治组织等各类组织的政治领导力,使“三农”工作组织体系不断趋于系统化、规范化;在政策落实上,完善强农、惠农、富农的政策框架,大力实施乡村建设行动,不断增强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正因有党的领导为“三农”事业把航定向,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才能以其理论和实践成就实现了对资本逻辑主宰下西式现代化的超越,鲜明体现了坚持人民至上、增进民生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现代化立场。

4.3 开辟传统农耕文明现代转型的新道路,契合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

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的探索过程,也是传统农耕文明赓续与现代转型、展现更强大生命力的过程。中华民族的祖先围绕村落定居并进行农业活动,形成了高密度的农村人口、源远流长的氏族血脉和祖先信仰,孕育出以农耕文明为底色的中华传统文化。但就世界历史范畴而

言,难以对资本积累过程作出“田园诗式”的描绘。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揭示的,通过对公有土地的盗窃和暴力掠夺等,“为资本主义农业夺得了地盘,使土地与资本合并,为城市工业造成了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阶级的必要供给”^{[18]842}。工业革命加快了现代产业的流动,但严重冲击着城乡传统产业结构,促使乡村沦为城市的附庸;人类通过发掘新资源促进了生产改良,但又以新型耗费和污染为代价,激化了人口扩张与有限资源的矛盾。马克思、恩格斯基于对城乡矛盾的分析,强调城乡关系的未来走向不应该此消彼长,而应是共享成果的共生过程,进而提出城乡融合思想,对“达成‘共美’理想状态的和谐城乡关系”^[39]作出展望。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消灭城乡之间的对立,是共同体的首要条件之一,这个条件又取决于许多物质前提。”^{[40]185}“生产和交往之间的分工随即引起了各城市之间在生产上的新的分工,不久每一个城市都设立一个占优势的工业部门。最初的地域局限性开始逐渐消失。”^{[40]187}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只有当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才能消灭旧的社会分工,使城乡关系由对立走向融合,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以马克思、恩格斯城乡融合思想为指引,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一项重大任务在于创造城乡融合的发展条件,应对传统农耕文明转型过程中城乡割裂、贫富分化的冲击。

我国农耕文明的现代转型密切关联于党和政府对城乡融合道路的不懈探索,契合了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21世纪以来,我国城乡关系经历了“城乡统筹”和“城乡一体化”的政策探索,将“三农”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全局进行谋划,调整重城抑乡政策,改变城乡资源要素流向。然而,突破城乡二元结构体制需从根源上解决城乡“人、地、业”融合困境。为此,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41]32},强调城乡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等各领域深度融合,推动城乡居民基本权益平等化、公共服务均等化、居民收入均衡化、要素配置合理化、产业发展一体化。尤其应当重视,城乡融合的要旨在于推进农民共同富裕、满足农民美好生活需要,使城乡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如党的二十大报告所强调的,“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2]22},党和政府不断总结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成功经验,形成了边探索、边迭代的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良性生态,持续丰富了共同富裕的内涵。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3—2021年,农村居民年均收入增速比城镇居民快1.7个百分点。2021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为2.50(农村居民收入=1),比2012年下降0.38”^[42]。伴随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深度衔接,农村居民收入增速明显快于城镇居民,城乡居民相对收入差距持续缩小,充分体现了现代化的普惠性。此外,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作为实现共同富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应有之义,党和政府着力重塑“乡村精神”、补齐“文化短板”,推动乡村精神生活朝着更加丰富、更有品质的方向发展。

5 结语

现代化并非单一的、静止的模式,而是富有强烈历史与时代内涵的动态范畴,蕴含着世界历史演进历程中各领域的系统性变革,昭示着人类文明的未来发展趋势。农业农村作为传统文明的主要栖息场域,但人类迄今的现代化模式仍主要依据工业化、城市化经验,从而愈加凸显探索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深远意义。传统农耕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鲜明底色,农业农村现代化则是稳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一环。揭示西式现代化“资本至上”的发展桎梏,更能深入把握我国立

足“大国小农”基本国情所赋予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独特内涵;通过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确保土地制度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以及重塑乡村内生秩序等战略举措,充分体现了现代化的超越性、普惠性和可持续性。

不可否认,源于独特的国情农情,中国的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尚有持续拓展与优化的广阔空间。我国在以创新引领农业高水平自立自强、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推动农业绿色发展,以及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的全方位振兴,推动乡村人口整体迈进现代化等诸多方面还存在着需破解的现实困境。但毋庸置疑的是,我国“三农”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主要的。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农业正成为产业链与创新链深度融合的现代产业,农村正成为宜居宜业和美家园,农民正成为优势鲜明的新型职业,农村集聚人才、技术、资金等生产要素的潜能不断被激活。“2020年,全国各类返乡入乡创新创业人员达1 010万人,比上年增加160万人,同比增长19%。”^[43]这些成就的取得,既是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指导中国实践的创造性成果,也是坚持党的领导和“人民至上”现代化立场的经验凝结,体现了推动传统农耕文明现代转型的创新探索。以农业农村现代化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契合了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这一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特色与优势,也为后发国家的农业农村发展及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有益启示。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
- [2]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 [3] 杨凤城,叶子豪.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历史观探析[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3(6):34-41.
- [4] 张艳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出场逻辑、理论规定与实践效能[J].湖南社会科学,2023(4):1-7.
- [5] 曹丽.从三个维度看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创新与世界意义[J].科学社会主义,2023(3):10-16.
- [6]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习近平关于“三农”工作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
- [7] 蓝红星,王婷昱,施帝斌.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生成逻辑、内涵特征与推进方略[J].改革,2023(7):105-115.
- [8] 刘吉双,白洋,刘子洋.中国特色“并联式”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的探索[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4):9-18.
- [9] 高原.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理论意涵[J].农业经济问题,2023(4):28-40.
- [10] 高杰,苏艺,付尧.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科学解析、生成逻辑与推进战略[J].农村经济,2023(3):1-9.
- [11] 李明星,覃玥.农业农村现代化:历史回溯、时代内涵、目标定位与实现路径[J].当代经济研究,2022(11):71-82.
- [12] 李媛,阮连杰.数字经济赋能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理论逻辑与经验证据[J].经济问题,2023(8):25-32.
- [13] 刘璐,辛岭,朱铁辉.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的时空特征及障碍因子研究[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23(6):135-147.
- [14] 阿瑟·刘易斯.二元经济论[M].施炜,谢兵,苏玉宏,译.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
- [15] 劳尔·普雷维什.外围资本主义——危机与改造[M].苏振兴,袁兴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 [16] W. W. 罗斯托.经济增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M].郭熙保,王松茂,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 [17] 弗朗索瓦·佩鲁.新发展观[M].张宁,丰子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

- [1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 [19] White House. FACT SHEET: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s historic investments to create opportunity and build wealth in Rural America [EB/OL]. (2022-03-01).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2/03/01/fact-sheet-the-biden-administrations-historic-investments-to-create-opportunity-and-build-wealth-in-rural-america/>.
- [20] 非洲绿色革命联盟(绿盟)遭问责[EB/OL]. (2020-09-09).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i/jyjl/k/202009/20200902999903.shtml>.
- [21] 毕振山. 莫迪妥协了,但印度农民未必是赢家[N]. 文摘报,2021-12-07.
- [22] 中国人权研究会. 美国长期存在的性别歧视问题严重阻碍妇女人权的实现[N]. 光明日报,2019-11-27.
- [23] 2021年拉美极端贫困人口达到27年来最高位[EB/OL]. (2022-01-29). <http://uy.mofcom.gov.cn/article/jmxw/202201/20220103246898.shtml>.
- [24] 王效云. 拉美土地改革的延误与经济增长困境:演化发展经济学的视角[J]. 拉丁美洲研究,2022(1):137-153.
- [25] E·布拉德福德·伯恩斯. 简明拉丁美洲史[M]. 王宁坤,译.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
- [26]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评论员. 农业强国和农村现代化是什么关系?——八论农业强国[N]. 农民日报,2023-01-11.
- [27] 五部门印发《2023年数字乡村发展工作要点》[N]. 光明日报,2023-04-14.
- [28] 李冠霖,史作廷. 农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农民农村实现共同富裕的障碍与突破方向[J]. 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3):20-28.
- [29] 张红杰,张旭. 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探索历程、基本逻辑和发展趋势[J]. 经济纵横,2023(2):14-22.
- [30]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评论员. 让“繁荣的农村”与“繁华的城市”交相辉映[N]. 农民日报,2021-08-26.
- [31] 吴春宝. 规划下乡:改革开放以来村庄规划的发展脉络及其实现逻辑[J]. 探索,2023(4):64-75.
- [32] 陆益龙,李光达. 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与路径选择[J]. 江苏社会科学,2023(2):78-86.
- [33] 陈明. 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底层逻辑与中国道路[J]. 经济体制改革,2023(4):5-13.
- [3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3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36] 白永秀,吴杨辰浩,刘盼.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的演进和学科体系[J]. 政治经济学评论,2023(4):15-28.
- [37] 习近平. 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 [38] 李浩然,马万利.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农业农村现代化思想演变研究[J]. 江西社会科学,2022(2):49-58.
- [39] 黄旭东,冉光仙. 城乡“关系”的建构、形塑与共美——马克思恩格斯城乡关系论述对当代中国乡村振兴的启示[J]. 贵州社会科学,2020(12):11-17.
- [4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41]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42] 国家统计局. 居民收入水平较快增长 生活质量取得显著提高——党的十八大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十九[EB/OL]. (2022-10-11). http://www.stats.gov.cn/xxgk/jd/sjjd2020/202210/t20221011_1889192.html?eqid=8ac90dac0006d92a00000003642acf76.
- [43] 李慧. 打通返乡创业堵点 让“领头雁”扎根广袤乡村[N]. 光明日报,2021-03-17.

Characteristics and Advantages of China's Agricultural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from the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of China and Western Countries

ZHANG Yun^{1,2}, SUN Daojin¹

(1. The Research Center for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Three Gorges Reservoir Area,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2. School of Marxism, Sichu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31, China)

Abstract: Exploring the typical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s agricultural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which encompasses the "universality" of modernization and "particularity" of Chinese society from the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of China and Western countries, is more helpful to deeply understand its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advantages. Western-style modernization, which is confined to the framework of "capital first", advocates the "urban bias theory" supported by rural "subordination theory" in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unilaterally emphasizes the "subordination" of the agricultural sector in the value orientation to marginalize farmers' interest, and is subject to Western centralism in its development experience. Therefore, it is difficult to avoid the constraints in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such as the absence of theory, the lack of social justice and the falling into the "middle income trap". Compared with the Western model, China's agricultural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has its typical transcendent significance: China's modernization is based on building a new type of urban-rural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ustry and agriculture; based on the basic national condition of "small farmers in a big country", China exerts the transcendence of modernization by simultaneously promoting industrializati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urbanization and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based on the socialist direction of rural land system reform, China's modernization ensures the universality by reforming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relations; based on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traditional rural areas to modern areas, China's modernization guarantees the sustainability by reshaping the internal order in rural areas. China's path of agricultural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has realized the creative application of the contradictory movement laws of productive forces and production relations, effectively resolved the modernization trap led by the "will of capital", reflected the sublim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connotation of modernization and demonstrated the feasibility of independently exploring the modernization path. Its important achievements are not only the creative results of applying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to guide China's practice, but also the condensation of the experience of adhering to the leadership of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the modernization stance of "people first". It also embodies the innovative exploration of promoting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farming civilization. Promoting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rough agricultural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is in line with the essential requirements of socialism for common prosperity, highlights the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advantages of the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path, and provides the inspiration for the agricultural and rural development and modernization construction of later developing countries.

Key words: agricultural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capital logic, people first, common prosperity, road advantages

责任编辑: 金华宝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促进农民共同富裕的 内在逻辑与路径选择

张锦兰¹,何 湾²

(1. 沈阳建筑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辽宁 沈阳 110168;2. 沈阳工业大学 管理学院,辽宁 沈阳 110870)

摘要: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是我国深化农村改革的重要任务,也是促进农民共同富裕的重要保障。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不断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积极构建科学高效的运行机制,探索多样化途径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有效激发了农民共同富裕的内生动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产生和发展与我国农村发展实际紧密相连,有其发展的历史必然性。与传统农村集体经济相比,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保留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优越性,具有产权关系明晰、治理架构科学、经营方式稳健、收益分配合理等特征。实现农民共同富裕是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价值指引,二者存在着逻辑上的必然联系。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丰富了农民共同富裕的理论内涵,在实践中通过股份制等方式实现集体与农民的联结,让集体经济与组织成员形成高效合作,提高了生产经营的规模化和专业化水平,成为促进农民共同富裕的重要支撑。由于不同地区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距,当前我国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面临诸多制约因素,主要表现在地区差距和产业弱质、资源要素供给短缺、组织引领力不足、人口老龄化和人才匮乏、数字化建设缓慢等方面。破解这些问题,需要在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下,不断强化党建引领,因地制宜引导各类资源要素向农村集体经济流动,以数字化建设作为农村发展新引擎,推动“三变”改革,强化制度保障,做好集体成员收益分配的公平普惠,实现农民共同富裕。

关键词: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共同富裕;内在逻辑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23)06-0134-13

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本质要求,随着脱贫攻坚战的胜利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我国开启了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新征程。共同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而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当前,实现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就农民共同富裕的路径而言,集体所有制较好地融合了集体优越性与个人积极性,实现了“集体强”和“农民富”的有机统一,在制度上具有无可比拟的巨大优势,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是实现农民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破解当前城乡差距、要素供给短缺、农业低效率等困境,离不开农村集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围绕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进行了一系列安排部署,有效激发了农民共同富裕的内生动力。从地方的实践看,凡是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好的乡村,其发展活力和凝聚力就更强,集体经济已成为农民持续增收的重要渠道。可见,在促进共同富裕的进程中,需要牢牢把握个体与集体两者之间的关系,充分发挥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优越性,通过集体共同奋斗实现农民共同富裕。

作者简介:张锦兰,女,博士,沈阳建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何湾,女,沈阳工业大学管理学院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博士研究生,中共辽宁省委党校副教授。

1 文献回顾与问题提出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农村集体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农业生产结构、生产方式、技术供给都发生了重大变化。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推动农村集体产权股份制改革,保障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利,赋予农民对落实到户的集体资产股份占有、收益、有偿退出及抵押、担保、继承权,提高集体经济组织资产管理水平,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1]。2014年9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五次会议审议了《积极发展农民股份合作赋予农民对集体资产股份权能改革试点方案》。2015年29个县区参与改革试点,2017年新增100个试点^[2]。经过6年的改革实践,我国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基本完成阶段性目标,在厘清集体资产、确认集体成员、明晰产权归属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截至2020年8月,全国共有43.8万个村完成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共确认集体成员6亿多人,清查核实账目资产6.5万亿元,集体成员累计分红超过3800亿元^[3]。2021—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连续三年对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进行部署。

着眼我国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实践,很多学者对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进行了研究,形成了丰富的理论成果。总结来看,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内涵和特征。苑鹏等人认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有别于传统农村集体经济,具有所有权关系清晰、组织治理民主、所有者主体清晰、分配制度灵活、组织机构“去行政化”等特征^[4]。李天姿等人提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实现了经济体制、产权结构、个体经济关系上的转变,其核心特征是股份合作和集体所有^[5]。黄延信认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在功能定位、主体地位、产权关系及实现形式、成员边界、发展目的五个方面与过去有着本质区别^[6]。二是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方式。高鸣等人通过对比不同类型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适用范围和发展优势,提出新发展理念下多角度创新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政策构想^[7]。高强等人从四川彭州小鱼洞镇“联营联建”模式总结出,拓宽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路径,要在落实“分”的权利与利益的基础上提高“统”的层次和质量,探索农村集体经济多元化实现形式^[8]。余丽娟通过对天津、山东、河北部分村庄实地调研,总结得出村集体组织界定权责关系、完善激励机制、加强政策扶持是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9]。张克俊等人在研究中发现,无论采用何种发展模式,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处理好政府干预与基层积极性、特别法人和市场主体地位、短期与长期利益分配、封闭与开放需求的关系^[10]。龚燕玲等人对万州区生猪生态养殖项目和城口县岚天乡“磐石山舍”民宿项目进行案例分析,强调持续激发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内在动力,必须做到有为政府、有效市场、有能集体“三位一体”^[11]。三是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对促进共同富裕的理论依据。丁忠兵等人基于全国各省数据相关性分析,测算了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对促进共同富裕的贡献程度,提出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与促进农民增收具有正相关性,要不断增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对促进共同富裕的组织功效^[12]。匡远配等人认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对促进共同富裕效应凸显,主要体现在带动农民增收致富、提升公共产品供给能力、促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等方面^[13]。曾恒源等人认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具有治理优势、组织优势、政治优势和体制优势,能够为促进共同富裕提供重要保障^[14]。张龙等人认为,经营村庄是村集体促进农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15]。

总体上看,学者们对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研究,目前已基本形成较为完善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框架,但有关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逻辑和路径选择方面的相关成果较少。在既有的研究成果中,主要以个别省份或特定区域典型案例、新闻宣传报道为主,不足之处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内涵和特征归纳不足;二是对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历史必然性、理论内涵和现实作用分析得不够深刻;三是对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面临的共性问题,以及实践中具体做法缺少全面的梳理和归纳。因此,本文将系统阐释我国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本质特征,深刻剖析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与共同富裕的内在逻辑关系,并通过分析当前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现实困境,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实现路径。

2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基本内涵和本质特征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产生和发展与我国农村发展实际紧密相连,有其发展的历史必然性。随着农村改革的不断深入和现代农业的创新升级,各地在实践探索中逐渐形成租赁型、党建型、托管型、股份合作型等多种组织模式,对促进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作用。深入分析农村集体经济对农民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首先就要剖析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基本内涵,进而回答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与传统农村集体经济之间的本质区别。

2.1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基本内涵

针对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基本内涵,学者们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研究,大体形成以下三方面共识:一是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必须以产权集体所有制为基本前提;二是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要充分体现集体成员“共建共治共享”,并更加注重内部成员享有成果的权利;三是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并非单一的表现形式,需要适应不同发展阶段不断加以完善。马克思从生产力创造角度提出集体经济的必然性,指出:“这里的问题不仅是通过协作提高了个人生产力,而且是创造了一种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本身必然是集体力。”^{[16]378}由此可见,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制度的优越性,就是能将农村各类要素进行有效整合,进而最大限度地盘活集体资金、资产、资源,在保障农民权益的同时,带动农民共同致富。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巩固提升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成果,构建产权关系明晰、治理架构科学、经营方式稳健、收益分配合理的运行机制,探索资源发包、物业出租、居间服务、资产参股等多样化途径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17]从政策层面对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内涵进行了明确界定。综合学者们的观点,笔者认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就是在广大农村以农民为主体,以多种形式的集体组织为依托,推动农村集体要素资源赋予集体组织成员,通过利益相关方集体合作与利益共享,促进乡村振兴,实现共同富裕。

2.2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本质特征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与传统农村集体经济相比,既保留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优越性,也克服了产权模糊带来的效率不高和不够公平等问题,使广大农民更加享受到改革发展的成果。从本质特征看,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产权关系明晰。明晰的产权关系是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当前,集体资产在性质上归属于集体成员所有而非组织自身。截至2021年底,不包括土地等资源性资产,我国镇、村、组三级集体经济组织资产达8.22万亿元,其中经营性资产3.74万亿元^[18]。由于受计划经济体制的不利因素影响,传统农村集体经济存在着产权虚置、权责不明等问题,导致集体资

产严重流失,极大阻碍了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2016年,我国全面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为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迎来历史性机遇。随着集体产权改革不断深化,一些领域的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比如,集体资源性资产确权颁证、经营性资产以份额方式量化到个人、非经营性资产集体统一管理取得明显成效。明晰的产权关系能够有效保障农民的财产权益,各地在改革实践中,通过采取针对性的举措,有效提高了集体组织成员参与生产经营的积极性,为农村集体经济实现创新发展提供了条件。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可以利用股份合作的方式,通过市场机制优化资源配置,实现从“共同占有”到“股份占有”的转变,赋予个人对集体资产处置、收益、占有等权限。各地在实践中,探索出形式多样的合作方式,比如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存量资产量化、农民投资入股等。无论哪种方式,只要产权归属清晰,能够明确集体与个人权责边界和占比份额,均可纳入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范畴。

二是治理架构科学。科学的治理架构是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实践中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制度在运行中逐渐出现“分”的层次有余、“统”的地方不足的问题^[19]。1982年颁布的《宪法》明确规定,农村人民公社、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其他生产、供销、信用、消费等各种形式的合作经济,是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据此,农村集体经济特殊的法人地位被承认,允许其在市场中独立自主经营。农村集体经济不仅要承担经济职能,还要承担农村建设的社会职能。相对于传统农村集体经济“政经合一”的治理架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在治理架构上更加科学合理,有效克服了政经权责不清、分工不明和集体成员参与度不高等问题。建立科学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治理架构,需要处理好“统”与“分”之间的关系,如果“统”的程度过高,则不利于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如果“分”的内容过散,小农户则无法实现与市场的有效对接。随之,我国推行产权制度改革,在集体所有的基础上承认个人产权并鼓励入股,“统一经营、共同生产”已经成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运行模式。2020年,农业农村部印发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示范章程(试行)》为建立健全现代农村内部治理结构提供了制度依据,尤其是民主决策投票管理机制的实行,进一步提高了集体资产运营的科学性、合理性和透明性。

三是经营方式稳健。稳健的经营方式是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的关键。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社会化服务,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20]31} 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关键在于推动产业发展、实现产业兴旺,这是解决农村一切问题的前提,也反映了农村经济适应市场需求变化、加快优化升级的新要求。产业发展得怎么样、是否真正兴旺,对广大农民来说,主要看能否带来持续收益,这就要求农村集体经济必须具有造血能力,如果单纯依靠国家政策扶持,或者盲目跟风,这样的产业往往是昙花一现。基于我国国情,乡村发展远比城市发展复杂得多,所以对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而言,在发展产业中并非追求“大而强”,而是要尊重市场发展规律,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各地要充分考虑自身历史条件、资源禀赋、区位特征等因素,积极探索行之有效的发展模式,使集体成员持续获得正向激励,提高他们对集体组织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产业发展得好不好,关键在于经营者的能力,特别是领头人的能力和水平。传统农村集体经济负责人一般由村干部担任,往往受自身专业水平和能力限制,不能较好把握发展机遇。从委托代理理论角度分析,相对于独自经营,委托职业经理人经营可能获得更好的经济效益。加之传统集体经济由于

受封闭区域局限性影响,各类资源要素在城乡之间、乡村之间流动不畅,容易造成资本、人才、技术等要素短缺。而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在经营方式上更加灵活,能够通过形式多样的集体合作方式,有效激发乡村内生动力,推动农村产业发展,确保农民持续增收。

四是收益分配合理。合理的收益分配是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物质基础。随着农村集体经济不断发展壮大,集体资产也在积累中日益增多,就会产生资产收益权问题。对于集体收益分配规则,我国并没有在法律上予以明确,而是由村集体自行研究决定。传统农村集体经济多数收入水平较低,加之分配过程不够透明,部分农民的集体收益无法得到保障。特别是随着城镇化推进和城乡一体化发展,劳动力自由流动使集体成员变动较大,如果按照现有“人头”平均分配收益,显然不够科学合理,容易产生经济纠纷。为此,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需要制定更为合理的分配体系,以此形成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对集体组织以外的经营主体,收益分配方式一般以“谁出资、谁受益”的原则,在不影响集体权益的情况下,按照投资或出资比例作为分配依据。不同于营利性法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收益分配上需要保证财产公共性和成员身份性,始终坚持农民集体所有制的底线不动摇。2021年,财政部、农业农村部联合印发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财务制度》对收益分配相关事项作出具体规定。参照这些规定,在收益分配上,要在集体收益有剩余的基础上做好相关分配,实现分配过程的制度化、公开化。其中,重大财务事项决策可以参照“四议两公开”机制,确保发展成果惠及集体组织的每一个成员。

3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促进农民共同富裕的内在逻辑

共同富裕是以所有人富裕为目标的发展形态。共同富裕的“富裕”,指的是全体人民对社会财富的创造和积累,切实把“蛋糕做大”;共同富裕的“共同”,指的是全体人民对社会财产的分配和占有,如何把“蛋糕分好”。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而不平衡不充分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城乡之间的差距。让农民富裕起来的关键在于如何促进农民增收。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经济基础,而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是推进农民共同富裕的重要支撑,二者之间存在必然的内在逻辑关系。

3.1 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是促进农民共同富裕的必然选择

以家庭为单位的小规模农业是我国农业的本源性制度,当前和今后很长一个时期,小农户家庭经营仍是我国农业的主要经营方式,但家庭经营更容易受到自然环境和市场竞争的冲击。为摆脱农村发展的不利局面,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坚持引导农民走集体化道路,提高农村土地的集约化程度,有效降低了生产成本。为了从根本上解决我国人多地少、土地细碎化、农民原子化等实际问题,在实践探索中形成了“集体所有、双层经营”的管理体制。事实表明,农村集体经济克服了因碎片化生产带来的无序竞争,让小农户都能享受到生产规模效应带来的好处。回顾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历程,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土地分田,发展到合作社,再到人民公社,尽管部分地区的集体经济在发展中有时可能会脱离社会实际,但农村集体经济的总体发展方向从未改变,始终坚持集体所有特别是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性质,以保障农民土地、收益分配权益为底线,创新发展方式,带动农民增收,不断推进农民共同富裕。从历史发展脉络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一直是基于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上,特别是随着集体土地制度持续深化,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

权和经营权“三权分置”,集体产权归属问题得到进一步明确,这必将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创新发展提供难得契机,也意味着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适应了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需要,表明我国在发展农村集体经济中坚持走符合中国国情的农业农村发展道路。

3.2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实践丰富了共同富裕的理论内涵

共同富裕是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价值指引,在推进过程中需要把握“富裕”和“共同”两方面内容。实现共同富裕既要做大蛋糕,也要分好蛋糕,做大蛋糕是分好蛋糕的物质前提,分好蛋糕是做大蛋糕的激励基础。分析来看,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工业化进程,使得生产力达到较高水平,虽然蛋糕做大了,但在如何分好蛋糕上出了问题,由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人民没有共同权益,必然导致社会贫富差距悬殊。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社会化大生产理论,认为跨越贫困必须要发展集体经济,这种集体经济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目的是为个人和集体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邓小平指出:“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是又一个很大的前进,当然这是很长的过程。”^{[21]355}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党和国家工作的重中之重,不断深化农村改革,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农业现代化进程的推进,离不开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唯有如此,才能不断增加农民收入,进而激发农民奔向共同富裕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农民既是农村集体经济的参与者也是受益者,有着对集体的认同和对个人价值的追求,这种主体性的激活也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具体体现,为促进共同富裕提供了更多可能。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根本目的是推动实现农业高质高效、农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集体经济除了具有“集体性”之外,还具有“公共性”,它可以有效克服市场机制不能兼顾公平的问题,从而有效防范返贫致贫的风险;同时,集体经济还具有“市场性”,这一属性能够更好解决实践中出现的效率不高等问题,有利于提高集体资产经营管理水平。因此,共同富裕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民生问题。

3.3 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是促进农民共同富裕的现实需要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让广大人民群众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经过不懈奋斗和艰苦努力,我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绝对贫困问题得到历史性解决,共同富裕的重点转向如何更好实现效率与公平。但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发展最不平衡最不充分的区域仍然在农村,村庄分化现象在农村地区不同程度存在,在一些相对落后的乡村,农民难以增收成为促进共同富裕的难点问题。突破这个瓶颈,关键在于解决好农民的思想认识问题,让广大农民认识到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重要性,让他们认识到仅靠单干虽然能够解决温饱问题,但要过上幸福美好生活,必须发展大农业,立足家庭经营这个基础,大力推广适度规模生产和集体经济,切实提升产出效率和集体效益。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通过股份化方式,实现了集体与农民的联结,让集体经济与组织成员互利共生。尤其是将离散的农民重新组织起来,形成高效合作,极大提高了生产经营规模化和专业化水平,增强了集体组织的市场竞争力。此外,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能够有效解决效率不公的问题。当前,我国

农村问题相对复杂,农民基本权益在本村经济发展中往往无法得到充分保障,导致农村资源、人口等要素不断向城市涌入,甚至出现无集体意识现象。因此,资源共享、收益共担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在本质上有效保障了农民的财产权益。农村集体经济是农民富裕的基础所在,在产权制度改革后,农村集体在调动集体和个人两方面的积极性上优势明显,尤其在资源管理、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社区治理、公益事业等方面更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4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促进农民共同富裕面临的困境

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是我国深化农村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促进农民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近年来,农村集体经济在各地实践探索中重新焕发生机,在带领农民致富、实现集体资产保值增值、推进农民共同富裕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与此同时,我们也要客观地看到,不同地区的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水平仍存在较大差距,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面临诸多的制约因素。

4.1 地区差异和产业弱质

从全国范围来看,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良莠不齐,有些地区发展势头良好,个别村集体年收益可达百万元甚至更多。但有的地区发展水平较低,2021年全国村集体经济组织总收入6 684.9亿元,村均122.2万元,经营收益5万元以上的村占总村数的59.2%^[22]。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地区之间差异较大,部分地区缺乏具有竞争优势的资源。在推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上,部分基层组织缺乏引领力和带动力,习惯于“拿来主义”,盲目照抄照搬,不切实际的发展思路造成产业无序发展,甚至产生相互间恶性竞争,致使共同富裕的蛋糕无法做大。加之部分基层组织对农村集体产业发展缺乏规划能力,特别是对资源的统筹能力较弱,通过资源开发和特色产业发展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显得不足,无法实现集体资产利用效益最大化,往往错失了带动农民富裕的发展机遇。从产业发展现状看,一些农村集体经济还是以种植业和畜牧养殖业为主,绝大多数仍然停留在初级农产品生产上,产品附加值低且受环境影响较大,这种弱质性产业难以有效促进农民共同富裕。

4.2 资源要素供给短缺

资源要素有效供给是推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实现农民共同富裕的重要保障。近年来,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虽有所改善,但资金、技术、金融等生产要素依然主要流向非农领域,这势必影响和制约城乡共富的实现。例如,2021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552 884亿元,其中第一产业占比2.6%、第二产业占比30.7%、第三产业占比66.6%^[23]。从经济学视角分析,资源总会流入生产效率高的部门,长期要素分配不平衡、资源结构不合理,必然导致城乡差距的拉大。由于农村缺少发展机遇,使得农户整体收入水平增长缓慢。在农村,一般传统集体项目初始投资较大,加之经营过程面临病虫害、极端天气、销路困难等风险,收益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必须加大对乡村的资源要素保障,为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创造良好条件。如果仅仅依靠政府扶持,农村资源要素短缺问题可能还是无法得到根本解决,甚至还会导致农村经济发展对政府扶持产生过高依赖。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当前一些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常年缺乏维护、网络信号较差、工业用水用电不稳定等问题依然存在,特别是偏远

地区比较突出。可见,资源要素供给不足一直是农村经济发展的短板。

4.3 组织引领力不足

当前,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已经建立起较为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和法人治理结构,但部分村委会仍掌握着实际控制权,这种高度重合的组织架构既加重了村“两委”的负担,也使集体成员参与决策的能动性减弱。在推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中,由于个别基层党组织作用发挥不明显,对集体经济发展缺乏引领力和凝聚力,导致组织管理不规范,进而引发集体资产管理混乱、资金使用审批不严、集体组织账务不清等问题。这些问题影响了农民参与农村集体经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部分农户对集体经济能否带来增产增收缺乏信心。同时,由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带头人主要来自村“两委”班子,在农民参与意愿不高的情况下,带头人容易产生专断行为,村委会有时会直接或间接干预村集体的有关决策。事实上,村“两委”与村集体经济组织不同,如果决策不够科学合理,就会造成村集体资产利用低效,农民对集体经济的获得感和认同感也会下降。由于客观原因,村“两委”经费和农村集体经济收益难以实现分账管理,在财政无法全面覆盖的情况下村集体收益还需要用于服务村庄的公共事业。在实际运行中,村集体经营的项目不可避免受到一定程度的行政干预,如果村集体负责人缺乏市场管理专业知识,可能会增加集体资产流失的风险。共同富裕重在全民参与,如果民主管理、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流于形式,就会影响农民追求共同富裕的信心和决心。

4.4 人口老龄化和人才匮乏

实现共同富裕需要有高素质的劳动力作支撑,人才紧缺是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农村60岁、65岁及以上老人的比重分别为23.81%、17.72%,比城镇分别高出7.99、6.61个百分点^[24]¹⁰⁵。伴随城市化进程加快,多数农村人为改善生活质量,涌入城市务工,特别是农村青壮年人口流失和耕地利用率低下,大大削弱了扎根农村的有生力量。加之生育力下降等因素叠加,农村老龄化问题使得能够进行生产经营活动的劳动力数量大幅下降。同时,农村人口受教育程度较低,根据2019年农普结果显示,我国初中文化程度的农村居民占42.5%,高中或中专文化程度的农村居民占11.0%,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农村居民占3.9%^[25]。在信息化、智能化加速发展的时代,农村人口老龄化和整体素质较低,严重影响着农村地区对新产品新技能的推广和应用,不仅不利于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也难以提振农民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如果这种现状不加改变,也会影响农民共同富裕的实现。

4.5 农村数字化建设缓慢

乡村数字经济发展是促进农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既能提升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服务质量和生产效率,也给集体成员提供了共建共治共享新途径,进而实现增产增收和乡村治理的良性互动。但受传统生活方式的影响,农户对数字化建设缺乏足够认识,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数字化水平较低,尤其是在管理集体资产方面的应用相对滞后。比如,涉及农村集体资产、资金和资源相关数据的收集,需要农业农村、自然资源、财政等多个部门相互协调,但由于各部门统计口径和方法的不一致,导致数据之间衔接不畅,数据的准确性难以保障。从实践看,虽然各地农村产权交易中心已经挂牌启动,但对集体资产流转数据仍采取纸质

登记和审批方式,原始数据上传不够全面,致使数据利用程度较低、交易数量有限,难以形成活跃的线上交易市场。另外,由于基础设施和技术问题,广大农村对集体资产数据应用开发程度明显不足,大量数据被搁置在数据平台无法得到使用。面对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管理需求和释放集体资产商业价值需要,如果农村数字化发展不能突破空间阻隔,就会影响农民共同富裕的实现。

5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促进农民共同富裕的实践路径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作为促进农民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通过集体经济组织把分散的单个农户组织起来,形成农民利益联合体,有助于推动农村集体经济的市场化、规模化发展。有效推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促进农民共同富裕,需要深化对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重要性的认识,不断强化党建引领,因地制宜引导各类资源要素向农村流动,以数字化建设为引擎、以改革为动力强化制度保障,合理做好集体成员收益分配的公平普惠,促进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农民共同富裕。

5.1 坚持党建引领,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

农村基层党组织作为农村各项工作的领导核心,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促进农民共同富裕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掌舵领航作用。只有抓住健全乡村组织体系这个关键,才能更好地将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功能、组织功能、服务功能等有机融合起来,真正将党的方针政策转化为推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实现农民共同富裕的集体行动。实现农民共同富裕的关键在于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从近年来各地探索实践看,我国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空间巨大,只要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有力、方法得当、推进有序,就一定能够实现乡村全面振兴。为此,要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把牢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正确方向,通过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提升多元利益主体对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认同感和参与度,汇聚起强大的乡村振兴力量。对于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较弱的村,党组织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争取早日带领农民打开局面;对于一些基础较好的村,党组织要带领广大农民持续奋战、再上一层楼。

基层党组织引领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需要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培养一批懂生产、有技术、善经营的多层次人才。制定农村集体经济人才引进相关政策,形成政策倾斜性强的创业扶持体系,对于个人拥有专利或技术成果的,要给予一定的股利分配权力,使其更加积极主动地融入集体经济发展。优化返乡人员创业相关政策,利用“乡情黏性”与高素质人才情感对接,大力宣传实干人才在集体经济发展中的先进典型,营造鼓励返乡创业的良好氛围。建立“政府主导+社会力量+高校”培养模式,定期安排专业人员下乡交流先进经验,建立稳定的人才队伍。加大教育资源向农村倾斜,让农村子女享受高质量的教育,从根本上解决农村集体经济人才短缺的问题。同时,要强化法律保障、制度供给、基层创新和政策支持,尽快出台和实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以法律的形式明确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特别法人”地位和法律赋予的权利义务。加大农产品深加工力度,推动农产品从初级向高级提升,增强产品的附加值,实现弱质向强质转变,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强有力支撑。

5.2 坚持因地制宜,引导各类要素向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流动

更广泛的要素联合是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重要特征,也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的基本前提,更是促进农民共同富裕的重要条件。面对农村要素短缺问题,需要

在发展协调性和平衡性上下功夫,利用优势互补推进城市资本、技术、信息等各类要素有序下乡。正确处理城市和农村要素资源双向流动,充分利用好土地制度改革、户籍制度改革、工商资本下乡、技术下乡等政策,搭建城乡资源交换平台,以提高城乡资源匹配程度和匹配效率,让要素资源为共同富裕助力。正确处理合作开放性和集体封闭性的关系,以产权股权量化为突破口,逐步打破集体产权流通壁垒,建立健全集体股权资产交易平台,建立共享、开放、合作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模式。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要加大精准扶持力度,保护集体经济组织在市场中的竞争地位;加强市场对资源要素配置的主体地位,通过优胜劣汰选择高质量集体产业,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加入,为实现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持。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需要考虑切合实际的目标,我国农村不同地区经济发展速度、发展路径和发展方式有着较大差异,要突出乡村优势,走差异化发展道路,形成独具特色的乡村经济,避免低质量、同质化发展。对于区位优势、资产资源和增收渠道相对缺乏的村集体,可以考虑实施“异地置业”,通过采取自有集体资产作抵押等方式,选择异地经营,以此获得相应收入,增加村民的财富积累渠道,多方面促进农民增收。充分发挥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统”的功能,立足自身优势,提升产业规模,不断提高产品质量和服务效率。加大自身品牌建设和推广,围绕优势产业推进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展,形成具有影响力的产业集群,增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促进农民共同富裕的产业韧性。

5.3 坚持数字转型,提升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共富功能

当前,数字经济正在全方位改变着经济社会发展格局,尤其是数字农业与数字乡村正在成为解决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2019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之后结合“十四五”发展规划,出台《数字乡村发展行动计划(2022—2025年)》,数字化建设正在成为农村发展的新引擎。要加强数字政府建设,加快建立数字化集体资产运营和监管平台,对所辖范围内村集体资产按照地域分布、工程建设、资产情况、经济合同、成员组成等情况进行统计并整合分类上传。要做好与全国农村产权交易中心,以及省、市、县三级农村产权交易服务站的数据联结,打通村集体资产“数据孤岛”,将数字鸿沟转化为数字红利,促进农民共同富裕。

大力开发信息化系列数据应用工具,实现集体资产集约化管理。通过开发集体资产可视化查询功能,让外来企业方便查询所需信息,实现项目精准对接。同时,提高农民对集体资产的“能见度”,强化群众监督。开发资源、资产、资金线上交易系统,实现电子审批、网上竞投、线上付款、全程管控“一条龙”服务,做到全程留痕、动态监管、关联分析,有效减少集体资产线下交易腐败,提高工作效率。探索村集体经济合作新模式,实现数字化和村集体经济深度融合,完善农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为农村居民提供上网便利,这些既有利于促进集体增收,又能激发平台经济发展,通过村集体经济发展实现良性循环,为促进农民共同富裕提供保障。

5.4 坚持“三变”改革,优化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分配方式

实行农村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三变”改革,既是促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市场化经营的有效举措。在农村推广“三变”改革,能够将大量分散闲置的农村土地进行集中利用,有助于提高农村资源的使用效率。同时,能够更

好地发挥存量资产的集体优势,特别是能够优化集体成员的收益分配,促进农民得到稳定的财产性收入。为此,各地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创新发展过程中,要围绕农村“三变”改革,突出做好集体成员的收益分配。结合我国当前农村发展实际,注重引导更多社会资本投入“未用土地”的开发和使用,尤其是“四荒地”,对改荒地良田的,鼓励各级财政按相关标准给予适当补贴;对能够合理利用闲置集体资源的,可以按照市场化方式引导集体资金入股,进而让农民分享收益。对于闲置资金,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可将其投资到优质的农业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等主体,通过“保底+分红”等办法,推动资金变股金,确保农民得到实惠。

当前,要围绕农村集体经济从“共有”走向“共富”“共享”的发展思路,通过推行村集体联合发展,采取“资金+技术+土地”等方式增加农民工资性收入。各地可以结合自身乡村产业发展优势,组建股份制经济实体,采取跨地域联动的方式,将一些自然资源相近、产业类型相关的村集体经济联合起来,实行村村抱团,组建合资联合体,以强村带弱村、先富带后富的方式带动区域内协同发展,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好地惠及广大农民。鼓励农户采取“保底+分红”“保底+就业”等方式,将承包地经营权入股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承包地经营权参股的,在政策扶持方面给予必要的倾斜,搭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农户之间的利益联结纽带,让农民共享更多产业增值收益,实现共同富裕。

5.5 坚持制度保障,推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公平普惠

推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实现农民共同富裕,离不开完善的体制机制作为保障。从实践来看,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不仅具有凝心聚力的组织优势,而且有着公平普惠的制度优势。建立健全具有可操作性、高质量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体系,能够更好地维护广大农民的基本权益。在促进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只有重塑农民利益联结机制,才能保障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不断发展壮大。利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区别于一般企业的优势,在管理决策上充分发扬民主,通过采取“一户一票”“一人一票”的方式,确保集体经济发展的参与权。集体成员在参与决策时,只需保留集体成员权身份,而不与成员的出资多少、股份大小等相关联,以此形成人人参与、人人监督、人人平等的内部治理局面。这不仅有助于增强集体成员的主人翁意识,确保推动集体成员之间利益的公平共享,而且有利于集聚促进共同富裕的无形社会资源。

让集体成员平等享受收益分配,减少彼此间的分配差距是实现公平正义的必然要求。可以采取资产折股量化推动集体收益进行合理分配,这对于确保利益分配的公平普惠十分必要。对村集体经济相对较弱的地区,可以采用“一人一股”的办法进行折股量化。比如,为克服因集体成员家庭人数、股份多少等差异而导致的成员之间分红差距较大等情况,要结合村情、家庭实际,采用家庭股、土地股、劳龄股等多种股份形式进行分配。无论采用何种股份形式,都应坚持广覆盖、促公平的政策导向,推动形成公开公平、共建共享的收益分配机制,确保村集体成员的合理收益分配权。同时,可以建立公平普惠的福利制度,采取按股分红与村集体福利相结合的分配方式,在按股分红上实现“初次分配”,体现公平性;利用公益金的提取使用实现“二次分配”,体现普惠性,以此缩小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最终实现农民共同富裕。

参考文献:

[1] 关于全面深化改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若干意见[EB/OL]. (2014-01-19). <https://www.gov.cn/>

- zhengce/2014-01/19/content_2640103. htm.
- [2] 乔栋. 村民有分红 干活有劲头——全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账面资产 5 年增 9200 亿元[N]. 人民日报,2017-08-23.
- [3] 郁静娴. 超七成村完成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N]. 人民日报,2020-08-23.
- [4] 苑鹏,刘同山. 发展农村新型集体经济的路径和政策建议——基于我国部分村庄的调查[J].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6(10):23-28.
- [5] 李天姿. 农村新型集体经济:现实旨趣、核心特征与实践模式[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9(2):166-171.
- [6] 黄延信. 发展农村新型集体经济亟需更新观念[J]. 农业经济与管理,2021(4):48-54.
- [7] 高鸣,魏佳朔,宋洪远.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创新发展的战略构想与政策优化[J]. 改革,2021(9):121-133.
- [8] 高强,孔祥智. 拓宽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路径的探索与实践——基于四川彭州小鱼洞镇“联营联建”模式的案例分析[J]. 东岳论丛,2020(9):162-171.
- [9] 余丽娟.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内涵特征、实践路径、发展限度——基于天津、山东、湖北三地的实地调查[J]. 农业经济,2021(6):17-24.
- [10] 张克俊,付宗平.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理论阐释、实践模式与思考建议[J]. 东岳论丛,2022(10):105-114.
- [11] 龚燕玲,高静,刘畅.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逻辑进路与案例剖析[J]. 农林经济管理学报,2023(4):478-486.
- [12] 丁忠兵,苑鹏. 中国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对促进共同富裕的贡献研究[J]. 农业经济,2022(5):1-10.
- [13] 匡远配,彭凌凤.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共同富裕效应[J].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2):16-22.
- [14] 曾恒源,高强.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理论逻辑、制度优势与实践路向[J]. 农业经济与管理,2023(2):1-9.
- [15] 张龙,张新文. 经营村庄:村集体促进农民共同富裕的实践过程与内在机制——基于川西 Z 村的个案分析[J]. 探索,2023(5):149-162.
- [16] 马克思. 资本论:第 1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 [17]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做好 2023 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EB/OL]. (2023-02-13). https://www.gov.cn/zhengce/2023-02/13/content_5741370.htm?dzb=true&wd=&eqid=b3c1b6270011990300000046457cd20.
- [18] 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N]. 经济日报,2023-03-09.
- [19] 沈秋彤. 中国农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D]. 沈阳:辽宁大学,2021.
- [20]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 [21]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22] 对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 6897 号建议的答复摘要[EB/OL]. (2023-09-04). http://www.moa.gov.cn/govpublic/zcggs/202309/t20230904_6435767.htm.
- [23] 国家统计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 2021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EB/OL]. (2022-02-28). http://www.stats.gov.cn/sj/zxfb/202302/t20230203_1901393.html.
- [24] 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0 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M].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21.
- [25] 农村经济持续发展 乡村振兴迈大步——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十三[EB/OL]. (2019-08-07). https://www.gov.cn/xinwen/2019-08/07/content_5419492.htm.

The Inner Logic and Path Choice of New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Promoting Common Prosperity Among Farmers

ZHANG Jinlan¹, HE Wan²

(1. School of Marxism, Shenyang Jianzhu University, Shenyang 110168, China;

2. School of Management, Sheny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henyang 110870, China)

Abstract: Developing and expanding the new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is a great task for China to deepen its rural reforms and also a crucial guarantee for promoting the common prosperity of farmers.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PC has consistently taken “agriculture, countryside, and farmers” as the top priority of the entire Party’s task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concrete measures include continuously deepening the reform of the rural economic system, actively constructing a scientific and efficient operational mechanism, exploring diverse approaches to develop the new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and effectively stimulating the endogenous power for the common prosperity of farmers. Th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new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are closely linked with China’s actual rural development situation, which has the historical inevitability of its development. Compared with traditional rural collective economies, the new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retains the superiority of socialist public ownership, with clear property rights relations, a scientific governance structure, a stable mode of operation, and a reasonable income distribution. Common prosperity serves as the guiding value for the new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and there is an inevitable and logical connection between them.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ew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enriches the theoretical connotation of the farmer’s common prosperity. In practice, it achieves the connection between collectives and farmers through shareholding methods, enabling efficient cooperation between collective economies and organization members, improving the scale and specialization level of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 and becoming an important support for the common prosperity of farmers. However, due to significant disparities in the development levels of rural collective economies across different regions, China currently faces numerous constraints in developing and expanding this new type of economy. These constraints are mainly manifested in regional disparities and weak industries, shortages in resource elements supply, insufficient organizational leadership, aging population and talent shortages, and slow digital construction, etc. To solve these issues, it is necessary to continuously strengthen guidance of the Party building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primary-level Party organizations in rural areas, guide various factors to flow towards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according to local conditions, use digital construction as a new engine for rural development, promote the “three changes” reform, strengthen institutional guarantees, and reasonably distribute the income of collective members for common prosperity, and ultimately achieve common prosperity among farmers.

Key words: new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common prosperity, internal logic

责任编辑:金华宝

制度画像与行动呈像：乡风文明建设中的 双重可视化路径

——基于山西Y县积分制的案例观察

马超峰

(南京大学 社会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23)

摘要:作为乡风文明建设中的制度创新,积分制联结政策与生活、贯通行动与乡风,是和美乡村建设的重要依托。然而治理实践中的积分制,常常会面临“看得见社会”却“照不见人心”的困境。基于可视化的分析视角,对Y县积分制实践的个案观察发现:积分制不仅是基层群众参与文明乡风建设的有效途径,而且是国家治理社会模糊领域的可视化方式,乡风文明建设中的积分制具有双重可视化特征,即数字技术下看见社会的制度可视化和团结技术下社会自我呈像的行动可视化,两种可视化之间的张力,形成了积分制的实践困境。上述张力在Y县积分制实践的不同阶段具体表现为:清晰的浙江经验蓝本与复杂的地方场景之间的植入张力、清晰的治理任务与复杂的部门利益之间的推进张力、清晰的实践方案与乡村社会弥散场域之间的落地张力。在清晰与模糊之间,Y县积分制实践通过经验蓝本再造、非正式借力与庇护式执行,完成了积分制的移植与运行。进一步讨论上述张力的来源,则在于技术知识与地方知识在实践中的抵牾。在知识结构上,作为并联特征的技术知识具有共时性结构,而作为串联特征的地方知识具有序贯性结构。两种知识之间的结构差异,影响积分制实践中的制度画像与行动呈像。在知识关系上,两种知识之间并非此消彼长,而是相互强化、相互激活。正因如此,可视化的过程并非直射,而是不断的折射与反射。两种知识的相互适配能够实现双重可视化的有效互补,从而促进文明乡风建设的有序推进。而两种知识之间的失衡则会导致双重可视化的相互排斥。因而,需要规避技术知识对地方知识过度再造而导致的“制度悬浮”,以及地方知识对技术知识过度俘获而导致的“庇护执行”。

关键词:乡风文明;积分制;治理可视化;清晰治理;乡村治理

中图分类号:D6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23)06-0147-14

作为乡村振兴的铸魂工程,文化振兴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也是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推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的重要举措。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弘扬新风正气,推进移风易俗,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焕发乡村文明新气象。”^[1]³¹³从聚焦脱贫攻坚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文化振兴在中国农村发展与减贫奇迹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2]日益被研究者关注。在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上,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实现全体人民全面发展的价值旨归,也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体人民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3]。日常生活作为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重要领地,既是乡村文化振兴的实践地,也是乡风文明建设的训练场。如何在日常生活领域探寻有效的文化振兴之路,是乡风文明建设研究中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时代文明实践中的乡村社会民情重塑研究”(22BSH045),项目负责人:马超峰。
作者简介:马超峰,男,博士,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

的关键议题,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

1 文献综述与问题提出

作为脱贫攻坚战略实施中的实践创新,积分制是联结政策与生活的纽带,也是激活村民参与村级治理^[4]、重塑乡村集体经济^[5]、提升乡村治理效能^[6]的有效途径。实践中的积分制能够有针对性地解决乡村治理中的重点难点问题,是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益探索。在乡风文明建设过程中推广积分制,能够将农民群众心中所感、眼中所见转化为具体分值,让文明乡风由无形变有形,使乡村治理的模糊领域变得清晰可见,乡风文明建设中的共识显性化。已有多数研究往往从“制度运行”与“民众参与”两个视角出发,分析积分制的实际运行与治理效能。一方面强调以“小积分”来撬动村民公共精神培育^[7]、基层信用治理提升^[8]、传统文化激活,以低治理成本优势实现乡风文明建设的良序运行^[9];另一方面通过诊断积分制运行中的梗阻,分析制度安排与实际运行、政策实践与农民声音之间相互脱嵌的原因,从而为积分制实践优化^[10]提供建设性意见。上述两个方面的解释丰富了学界对积分制运行的认识,但在理论资源的获取上依然属于政府行为研究中的制度性视角。进一步将以制度为中心的分析转入以人心为基础的分析^[11],探究制度与行动之间的脱嵌,需要引入新的理论视角。

积分制不仅是农民群众参与乡风文明建设的有效途径,也是国家治理社会模糊领域的可视化方式。作为治理领域的重要概念,可视化并不陌生,因为国家治理的首要任务便是使治理对象清晰化,而实现这一任务的关键便在于可视化技术。由此可见,现代国家治理的起步与可视化技术密切关联。随着数字技术在治理中的不断应用,治理的可视化视角得到进一步强化^[12]²²⁶,成为国家权力渗透与国家治理能力测量的重要指标^[13]。不过,现有治理视角中的可视化,往往突出自上而下的清晰度,强调国家借助技术看见社会,容易忽视可视化的另一个层面,即自下而上社会本身的自我呈像。因而积分制的实践过程,出现了“制度画像”与“行动呈像”两条不同可视化路径。理解上述差异,需要从双重可视化的视角,分析积分制的运行,即“国家看见社会”的制度型可视与“社会自我呈像”的行动型可视。为此,本文提出“双重可视化”这一分析概念,通过探讨积分制的双重可视化过程,理解积分制运行过程中制度画像与行动呈像的脱嵌困境,为积分制的方案优化提出见解,为和美乡村建设提供新的阐释。

2 双重可视化:乡风文明建设研究的新视角

双重可视化是对可视化的一种拓展,也是尝试分析乡风文明建设研究的新视角。所谓双重性是指可视化的两个向度,一是数字技术下看见社会的制度可视化,二是团结技术下社会自我呈像的行动可视化。已有研究较多关注制度可视化,突出国家看见社会的能力维度,较少关注社会自身的呈像能力,以及两种可视化的互构过程。因此乡风文明建设过程中的可视化,既需要国家制度化的引领,也需要社会自身不断的激活。

2.1 “看见社会”:现代国家能力的向下扎根

首先,社会生活的数字化是国家治理可视化的基础。在现代国家形成阶段,无论是对人口的管理,还是对土地的造册,获取治理对象的准确信息并使之进入国家的视野,是实现治理有效的基础^[14]⁴³²⁻⁴³⁴。而将信息进一步可视化的“制图术”,则是大数据时代国家治理的一个重要方

向,借助数字技术国家将具体社会事实抽象为数字与图表,并以此来开展社会治理实践^[15]。可视化的治理图景,在“看见社会”的同时,也使得权力照射到社会生活的诸领域,甚至进入了“私人生活”领域,改变了中国社会中的国家与个人关系^[16]。可视化技术不断嵌入社会的同时,也加速了社会生活数字化进程,从而为国家治理提供了丰富的信息。

其次,可视化是国家在技术治理领域的延伸。从总体性支配权力向技术化的治理权力转型过程中,社会诸多主体得到有效激活,但也预示了权力主体会借治理技术向社会不断渗透。随着数字技术在治理体系中的成熟应用,以及政府自身数字化改革的不断推进,技术化的治理开始从一个“放活社会的策略行动”逐渐转化为“涵养社会的整合过程”。治理技术整合带来的革新,不仅再造了政府流程,也改变了治理中的主体间关系。技术在治理体系中的延伸,既拓宽了社会信息的广度,也增强了社会信息的厚度。正因如此,政府治理过程不再局限于信息获取,更加强调对信息的加工以及算法优化,可视化便是技术治理的进一步拓展。借治理界面、媒介平台、客户端口,将治理信息加工为图像化的形式,更加具象化的治理流程展示在了人们面前。

然而,当技术带来治理绩效有效提升的同时,也面临着可能存在的风险。特别是,工具意义被过度开发和利用,目的价值被弱化,从结构上可能“解构国家治理的多样性、公共性和回应性”^[17],从内核上可能导致“技术异化与治理的情感缺位”^[18]。而更为关键的是“国家通过技术之眼观察社会时,看到的可能是自己的影子”^[19]。那么,社会何以会在技术照射之下被遮蔽,需要研究者关注社会自身的可视化逻辑。

2.2 照见人心:现代社会活力的自我呈像

社会生活的自我呈像是涂尔干意义上的可视化,它并不强调工具在治理中的嵌入,而是突出人心在社会中的黏合。正如涂尔干对多数启蒙主义哲学家思想的反对一样,原子论倾向的社会学解读,容易忽视“非契约性因素”,进而在社会道德与个人道德的裂痕之上形成社会失范的温床^[20]¹²¹。因此,与数字技术带来的“看见社会”不同,社会的自我呈像更加突出社会内部的互动与团结,强调数字背后的理性与温暖。

首先,互动是社会自我呈像的基础,也是社会可视化的前提。涂尔干意义上的国家社会关系,强调社会在互动中与国家进行关联,以有机的社会秩序作为关系依托。因而他认为,如果在政府与个人之间没有一系列次级群体的存在,那么国家也就不可能存在下去。如果这些次级群体与个人的联系非常紧密,那么它们就会强劲地把个人吸收进群体活动里,并以此把个人纳入社会生活的主流中^[21]⁴¹。正是在“吸纳—团结”的过程中,人们实现了相互之间的理解,进而在社会互动中得到自我呈像。与此同时,当每一个人都按照惯例与其他人互动时,惯例就凝结为一种道德力量^[22],成为乡村社会的黏合剂,构筑了熟人社会中的可见性。不过,这种道德力量却不易被数字技术捕捉,这也是为何在大数据的算法与算力之下,有时会存在“后真相”的困境^[23]。可以说,社会不是一个简单的信号“输入—输出”系统,而是在互动中不断完成道德再生产的累积系统。

其次,互动中的强度与密度,是社会自我呈像清晰化的关键。随着个体主义的快速成长,以及流动性不断加速的现代化进程,乡村社会中的“道德社区”面临快速解体的困境,社会互动中的自我呈像变得日益模糊。特别是乡村社会中的日常生活领域,“集体意识”所涵养的共同情感

在弱化、“礼俗仪式”所联结的共同场域在分化、“无公德个人”所引发的道德领域在重建^[24],如何使乡村社会实现团结再造,成为乡风文明建设中的重要议题。虽然数字技术在努力捕捉着社会现实,力图将模糊与碎片的生活领域以数字化图式进行可视化呈像,但对于乡风文明的有效治理而言,为人们提供主要场景的,不是原则和权力的外在世界,而是在其内部^[25]¹⁶⁵。走进乡村社会的内部,找回主体性^[26]需要更多关注社会关系之中的社会资本培育,因为这样的“公民美德是最有力量的”^[27]⁷。只有不断提高互动的强度与密度,才能提升乡村治理中的社会资本,从而促进社会自我呈像的清晰化。

2.3 双重可视化:乡风文明建设的一个解释框架

马基雅维利曾言:应当注意公共广场的思想,而非宫殿之中的思想^[28]⁷⁵。这并不是对两种思想做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提醒观察者注意两种不同的思想资源。同样,对于乡风文明的可视化而言,也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路径。制度维度的可视化路径,强调对社会的数字化标识,从而能够借助治理技术来“看见社会”,实现对社会道德的显化;而社会维度的可视化路径,强调社会互动中的自我呈像,从而在团结意义上“看见人心”,实现对社会道德的实践。因此,可视化具有双重特性,即“国家如何看见社会”与“社会如何自我可见”,本文将之命名为双重可视化。双重可视化在意涵、形式、特点、效果方面存在差异,如表1所示。

表1 双重可视化的特征差异

双重可视化	可视化意涵	可视化形式	可视化特点	可视化效果
制度型可视化	积分之术 “分”的维度	数字技术下的 制度画像	离散信息的 结构化	社会的 清晰可见
行动型可视化	积善之道 “积”的维度	团结技术下的 自我呈像	原子个体的 关系化	社会的 有效黏合

双重可视化视角下的积分制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从制度可视化视角来看,积分制的实践过程是通过将社会生活中的个体行为与分值挂钩形成社会生活中的道德量表,从而实现治理技术对日常生活的可见。这种积分之术,是积分制在“分”的维度上的实践,借助数字画像使离散化的社会行为实现结构化表达。其二,从行动可视化视角来看,积分制的实践过程是通过将社会生活中的个体行为与具体场景关联形成社会生活中的行动示范,从而实现日常生活的自我呈像。这种积善之道,是积分制在“积”的维度上的实践,它不仅使个体行动有了道德方向,而且社会在团结技术下形成了有效黏合。上述两个方面并非相互排斥,而是双向互补。从“分”的维度来说,借助数字与治理关联的技术逻辑,实现积分制运行的制度画像;从“积”的维度来说,通过行动与乡风关联的团结逻辑,实现积分制实践的行动呈像。

3 乡风文明建设中积分制实践案例观察

理解双重可视化视角下的积分制运行,需要走入真实世界,从案例中体察更多细节。为此,本文选择山西Y县作为研究案例展开分析。一方面,积分制作为引入型的治理实践是不成熟案例,与相对成熟案例的经验相比,其内在的张力较为明显,能够为研究议题提供较好的研究场景;另一方面,处于初步实施阶段的案例,有利于跟踪调查,并为研究者提供较长的时间线,从而

为研究议题提供较长的研究线索。基于上述考量,本研究从 2019 年底开始跟踪观察 Y 县积分制实践。

3.1 案例选择与基本背景

Y 县是山西省北部 T 市的下辖县,全县辖 7 镇 4 乡,共有 197 个行政村,全县总人口为 265 947 人^①。2019 年由 T 市市委组织部遴选,69 位中青年干部参加了“乡村振兴战略专题培训浙江行”的学习班,Y 县 8 名干部参加了本次培训,目的在于“提高乡村振兴理论水平,借鉴浙江乡村治理经验”。在培训过程中,主办方在常规化的课堂教学之外,还组织了 6 场现场教学,分别考察了智慧乡村、未来社区、枫桥经验、“三治”融合等现场教学点。培训班结束后,T 市市委组织部又召开了“学员分享会”,并要求学员结合自身岗位与区县特色,以浙江案例为蓝本转化学习成果,推出本区县乡村振兴的实践创新案例。在此背景下,Y 县经过实地调研后,初步形成了在全县乡村开展积分制的治理实践。之所以选择积分制,主要原因有二:一是乡村是 Y 县社会治理的重心,特别是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乡村有了大量的项目投入,如何保持政策的持续性、项目的稳定性、群众参与的积极性,是 Y 县地方治理创新的落脚点;二是 Y 县有丰富的文化资源,如二人台、鳌石赛戏、晋北鼓吹、高家笙管、恒山道乐等,如何将这些文化元素融入地方治理,一直是 Y 县地方治理创新的思考点。Y 县的积分制实践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如表 2 所示。

表 2 案例过程的三个阶段与可视化张力

案例过程		案例第一阶段 方案设计	案例第二阶段 方案论证	案例第三阶段 方案落地
双重可视化中的张力	自上而下可视化	清晰的浙江经验蓝本	制度的整体设计原则	清晰化的积分方案
	自下而上可视化	模糊的地方性知识	部门的多元利益诉求	庇护式的方案实现

3.2 积分制的引入:经验移植与细则优化

Y 县的积分制实践是从“经验蓝本”学习开始,因此“制度临摹”是 Y 县积分制实践的第一个特征。与发达地区基层治理创新实践相比,后发地区的治理创新动力往往不足,多数实践推行受自上而下政治势能的影响较大^[29]。Y 县积分制实践的促发机制,便是 2019 年 8 名干部赴浙考察学习的结果。清晰化的经验蓝本能否适用于 Y 县乡风文明建设,是积分制落地的关键,而具体实施方案的细化成为工作重点。在实施方案的设计过程中,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结合经验蓝本,由工作组制定草案,形成积分制实施的初步方案;二是征求相关部门意见,对草案进行修订,形成积分制实施的最终版本。

第一,以工作小组为核心,通过对经验蓝本的学习与讨论,形成积分制的实施草案。虽然浙江经验的制度蓝本有明确的实施方案,但蓝本的临摹并不是简单的复制过程,而是对经验的在地性转化。以工作组为核心,建立“积分制微信工作群”,协商建构适合县情的实施细则。微信

^① 资料来源:Y 县 2020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群最初核心团队由16人组成,包括4名组织部干部、2名宣传部干部、2名乡村振兴办公室干部、8名中青年干部。8名中青年干部为团队核心,主要解读积分制的内容与分享考察体会,其余8位成员分析方案在Y县的可行性。

经过反复的讨论协商,2019年12月工作组形成了《Y县乡村治理全域推广运用积分制的实施方案(草案)》,交Y县组织部上报县委会议。可以说,将浙江积分制的学习经验转化为Y县积分制的在地实践,关键在于设计出有效的实施方案。“办公室的头脑风暴”意在以基层干部的工作经验与生活体验,批判性地修正经验蓝本,形成适合Y县自身特色的乡风文明量表。

第二,征求相关部门意见,通过对草案的完善,形成积分制的最终版本。从意见稿到正式方案,Y县积分制实践方案既是合法性的获取过程,也是实施细则不断优化调整过程,而实现上述环节的重要途径便是征求意见。积分制方案草稿提交后,Y县县委会议肯定了这一议题,并确定宣传部作为牵头单位,正式成立积分制工作小组。2020年1月在工作组牵头下召开了5部门(组织部、宣传部、民政局、农业农村局、文化局)与乡镇相关负责人的协商会议,对积分制方案的细则展开意见征求。

与草案形成中的“头脑风暴”不同,意见征求则是部门利益与治理风险的权衡过程^[30]。这种意见往往以“执行困难”的形式出现在协商会议之中。在3次征求意见会议中,民政局、农业农村局、文化局等部门较为重视资源困难,组织与宣传部门强调考核的有效设置,乡镇负责人则是介绍本区域的现实情况。在三方协商中,最大的问题是“积分兑换”的资源配套。不过,协商中的意见虽然能够反映执行中的困难,但更多地是在考验领导决策的信心。在部门意见之上,实施方案的细则做了一定修改,于2020年3月交由县委会议进行讨论。

在经过多方考虑之后,积分制被正式列入了Y县的政府工作议程,保留工作小组作为推进机构,牵头领导为Y县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从议题生成到实施细则修订完成,一项有关社会治理的创新实践正式进入Y县政府议程。但相比于经济发展,社会治理的议题在Y县往往处于边缘化的境地,最终全域推广积分制并没有列入Y县2020年的中心工作。作为探索性试验,Y县对积分制的实施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探索规划期,初步建立积分制的运行框架,Y县全域各乡镇逐步开始探索有效的实施方案;第二阶段为巩固运行期,完善积分制运行机制,重点乡镇推出积分制实践的样板案例;第三阶段为考核验收期,完成积分制评估验收工作。

作为引入型的治理创新,积分制在Y县一开始便存在实践张力,这是近年来中西部地区开展治理创新中的第一困境。由于本地区创新动力的不足,治理实践的展开往往需要通过学习先进地区的成功经验,因而大量基层干部到东部发达地区学习取经。带回来的先进经验,常常需要经历从“水土不服”到“入乡随俗”,如何协调经验与现实之间的张力,是地方复制经验的第一步。正如在Y县积分制方案的设计过程中,面对清晰的蓝本与地方实践的不确定性,使得“取经干部”需要在“先进经验”与“熟悉地方”之间有效平衡。清晰的经验蓝本与复杂的地方场景,成为乡风文明建设中积分可视化的第一重张力。

3.3 积分制的推进:目标任务下的非正式借力

非中心工作的运行逻辑,有时并不是“层层加码”的压力过程,而是“四处找码”的互动过程。尽管积分制未能进入中心工作序列,但作为分管领导还是在年度考核中争取了3个分值的

权重。Y县宣传部干部谈到:“有了这3个分值,工作也就有了抓手。”非中心并不是无压力、无任务,而是说在整个工作序列中排在靠后的位置。这种非中心、小分值的工作,有时比中心工作还难做。一是缺少来自上级的压力,因而基层的执行力往往不足。调研中某村民谈到:“乡镇有时候对工作并不是很清楚,但他们会按照牵头单位、分管领导来感受工作的缓急。在下乡过程中,有时候我们还要给他们想办法,为他们出主意,只有下面有行动,上面才能有工作。”二是小权重工作往往并不是常态化的任务,因而基层工作的持续力常常不足。两年的积分制实践探索使基层干部对这项工作形成一个预期,甚至有部分干部会认为“积分制就是一阵风,只要规定动作做到位就可以”,因而对工作开展的主动性不足。在上述情境之下,“层层加码”的运行逻辑开始失效。

因此,与中心工作中的“挂图作战—科层任务推进模式”^[31]不同,非中心工作的加压方式常常来自非正式的关系实践。从Y县积分制推广工作正式发文开始,工作推进小组便开始了“7镇4乡大走访行动”,目的是推动乡镇村积分制工作的有序开展。为此,由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带队走访了Y县经济社会发展较好的3个镇,其余8个乡镇则由宣传部副部长带队进行了走访。走访行程一般包括三个环节:一是乡镇汇报设想与现阶段困难;二是可能打造的典型与希望获取的支持;三是带队领导与乡镇领导交换意见。“领导带队走访,既是让下面了解我们的工作,也是到下面寻找好的样板。”因而与层层加码的压力传导不同,积分制落实的交流更像是一种协商,“积分制是不是可以和党员积分制一起搞、是不是可以用文明评比的套路来弄”,这种捆绑式执行^[32]的试探性交流,形成了执行方案的再造。在此值得关注的是,这种协商的深度取决于双方之间的信任程度。正因如此,作为非中心工作的积分制,执行过程中的压力机制,并不是来自正式制度本身,而是非正式制度下的“相互合作”。

可以说,当治理目标选定以后,积分制实践就需要面对目标统一性与行动多重性之间的矛盾。在此过程中,地方政府往往借力“政治势能”“中心工作”“一号工程”等方式来对其进行化解。但对于Y县积分制这一非中心工作任务而言,可能获得的压力往往处于不足状态,因而通过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互为依赖、相辅相成来调节缓和^[33]是基层治理中的常见手段。而正是在调节过程中,具有可视化目的的积分制,需要回应不同部门的诉求,在任务量化到部门的同时,部门也需要被亮化,以此来凸显部门在工作中的位置,经过多元力量打包后的积分制,可能会形成碎片化的执行风险,进而导致整体性可视原则受到部门分立的影响。清晰的治理任务与复杂的部门利益之间的张力,成为乡风文明建设中积分可视化的第二重张力。

3.4 积分制的落地:熟人社会中的庇护执行

村庄是积分制实践的最终场域,也是积分转化为行动的最后环节。如何真正实现让村民从“台下看戏”变为“台上唱戏”,需要将积分制的政策文本进行在地化的解码。正如Y县积分工作小组与乡镇工作人员走进H村时,村干部的第一个问题便是“这个制度是什么,我们如何去干”。可以说,入村后的“解码”,一定意义上是执行中“找码”的延续。只不过“找码”是干部之间的协商,而“解码”则是村干部在日常生活中寻找对应,使政策从“文字”变为“抓手”,并以此来协调制度与生活之间的张力。

围绕积分制的落地,领导小组相关负责人、乡镇负责领导与村干部首先召开了动员会议,乡

镇领导说明了选择H村的原因,村主任做了表态发言,领导小组相关负责人则做了相关动员。在完成基本内容学习之后,三方又进行了自由交流。由于H村是Y县发展较好的村庄,因而村主任也是县乡干部眼里的熟人,在交流中村主任又进一步向领导提了两个问题:一是未来考核验收会关注哪些指标;二是现有工作内容哪些可以与积分制挂钩。之所以问这两个问题,H村村主任后来解释:“这是村干部工作的两个关键:尺度与原则。”对于原则,是指政策要做什么,是方向性问题;对于尺度,是指干部要做什么,是手段性问题。面对上述问题,乡镇干部的处境往往是调节器,领导小组的处境则是整合器,既不能背离原则,也不能尺度过大。虽然不断宣讲积分制的原则,但最终还是尽力为村庄争取政策空间与资源,从而达成“务虚共识”。正如H村干部会后的解释:“‘虚’不是没有的意思,而是看看村里能做什么,有了这个‘虚’才能‘实’。”最终,在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统一的基础上村干部制定了“定积分”与“用积分”两种落实方案。

所谓定积分,是H村干部依据积分制实施方案,将村民的日常行为进行赋分定值,形成了村庄层面的实施细则。通过“一事一记录、一月一审核、一季一公示、一年一评比”的实施方法,H村村民的日常生活在表格中得以呈现,并构成了村庄积分制的基本台账。与此同时,村干部将积分制主题标语、进度专栏等进行“上墙”,如在H村村口墙上,用白底红字刷出了“积出文明乡风,建设美好家园”的标语。“上墙”不仅使普通村民看见了制度,也形成了积分制展示的“打卡点位”。

相比于定积分中的台账与上墙,用积分则是根据积分给予相应的精神鼓励、物质奖励或者行为约束,从而使积分制活起来,它是积分制运行中的有效激励环节。不过,理性主义的激励设计,能否与“真实的社会构建”相吻合,是研究者历来比较关注的议题。在积分制实施过程中,就有部分村民将“用积分”中的“用”理解为“赚”。这种自我行动在自我主义和关系理性的驱动和约束下^[34],与干部在日常动员中的连带责任机制^[35],以及村民对村庄公共事务参与的冷漠形成合流,将“看见道德”的积分逐步转变为“扫一扫”与“晒一晒”式的“赚积分”。

与此同时,这种“赚”的逻辑,面对并不富裕的村庄资源基础,进一步形成了积分制实施中的熟人关系。相比于浙江经验蓝本中的积分制实践,Y县能够支持积分制实践的资源并不充裕,因而干部开展动员的能力也受到限制。如何在紧张的资源约束下,将积分制得到有效落实,就需要干部依托自身关系网络展开动员。正是这种关系逻辑,与部分村民“赚”的逻辑得到有效结合,构成了积分制实践中的熟人关系。部分村民便认为“不是谁想有‘分’就有‘份’的”,在“分”与“份”之间形成了干部选择性执行方式,最终使全景式的道德可视化只能在局部得到呈现。

面对日常中的生活逻辑,清晰化的实践方案需要转换为日常话语,从而动员普通人参与积分制实践。即便是在村庄这一微型治理场景之中,如何把握“度”与“界”依然是治理实践中的难点。H村干部在积分制推行之初,就积极采用人格性、权宜性和道德性的动员手段,以此来完成积分制推广的落地。不过,这些非正式手段的使用也需要合理运行,其限度只能在共同认可的维度内切换^[36],而不是以“行政化的权力”与“社会化的势力”来强行推进。积分制方案需要在干部与村民合力之下,进行“模糊的清晰化设置”与“清晰的模糊化处理”,来实现方案的有效落地。清晰的实践方案与乡村弥散场域之间的张力,成为乡风文明建设中积分可视化的第三重张力。

4 乡风文明建设中积分可视化的内在机理

斯科特在讨论“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时指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是寄生关系,而它们之间的张力在于地方知识与技术知识之间。与此相类似,马奇在《经验的疆界》中也发现:“自然语言派强调主题和语法,主张用带有文法规则的叙事表征生活。符号语言派强调数学框架、假定和推导,主张用带有数学逻辑规则和推断证明规模的模型表征生活。”^{[37]61} 由此观之,无论是马奇所讨论的组织经验再现,还是斯科特所分析的“米提斯”在治理中的意涵,两种不同知识之间的角力,是导致经验失效与项目失败的重要因素。从可视化的视角来看,积分制实践中的梗阻,与两种知识之间的成像差异存在较大的关联。双重可视化的内在机理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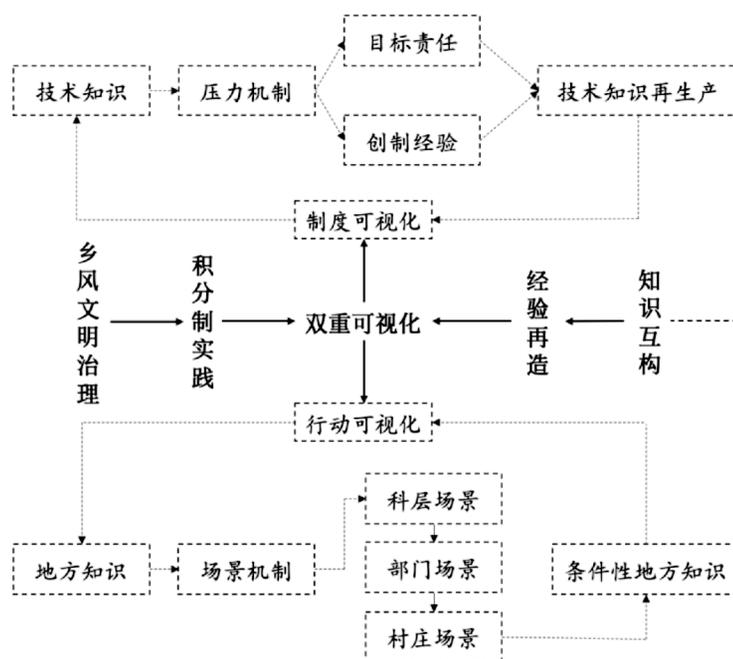


图 1 双重可视化的知识链及其内在机理

4.1 积分制实践中制度可视化的技术知识

技术知识是科层制有效运行的基本要素,科层组织是技术知识生产的重要场域。而连接科层制与技术知识之间的中间环节则是地方治理中的实践创新。借助地方治理创新,一方面可以优化科层组织运行,另一方面可以积累技术知识。相比于东部发达地区,Y 县基层治理中的科层力量往往较为薄弱,因而组织中所蕴含的技术知识也较为匮乏。积分制实践的引入,不仅能够丰富乡风文明建设的地方治理实践,也有利于更新技术知识与激活地方知识。

首先,先进治理经验的引入能够促进原有科层组织内部的技术知识更新。不同地区虽然科层制在形构上趋同,但其内部的势能强弱与节奏效率并不相同。学习先进地区的治理经验,不仅是为了解决基层面临的相似问题,而且能够促发组织内部的学习机制,从而更新技术知识。对于 Y 县而言,积分制所负载的治理内容,在类型上属于斯科特所定义的技术知识,它是相对于地方知识的另一种知识体系。积分制经验的引入能够为 Y 县乡风文明建设领域提供清晰的方

案,也能够丰富地方治理内容。在引入积分制的同时,Y县需要整合科层组织内部力量与外部社会力量,为积分制的有效落地提供制度性保障。正是在此过程之中,技术知识得到有效更新,制度可视化得以展开。

其次,技术知识更新与科层组织内的压力机制密切相关。经验引入为技术知识更新提供机遇,而技术知识更新的速度则取决于经验在新治理场景中的位置。因为基于位置而传导出的压力以及所蕴含的政治势能能够促发不同的技术知识再生产路径。其一,是“目标责任”为核心的技术知识再生产;其二,是“创制经验”^[38]为核心的技术知识再生产。目标责任为核心的技术知识再生产,主要体现在科层组织内部,通过数字管理,将数字作为目标考核的量表,突出责任与数字之间的关系,以此来优化科层组织内部的运行,从而使得科层运行的轨道清晰化。创制经验为核心的知识再生产主要体现在上下级之间的经验输送,通过对地方实践经验的技术化总结,突出具体问题与技术知识之间的关联,借助信息报送系统进行上报,以此来增强地方实践的合法性,实现地方先进经验的点位打造。

可以说,地方政府的多数治理实践往往都会包括上述两条技术知识再生产路径,不同之处在于压力差异而导致的知识再生产强度。技术知识的快速生产不仅能够促进积分制的有效落地,而且能够丰富基层治理的技术知识体系。以Y县为例,积分制的引入使得技术知识迅速在科层组织内部传播,激活了原有科层组织内的技术知识,为制度可视化提供了基础。但非中心工作的位置使得技术知识生产的压力强度不足,形成了目标任务下的非正式借力,从而导致制度可视化在运行中受阻。

4.2 积分制实践中行动可视化的地方知识

与制度型可视化链条不同,行动可视化的内在逻辑依托于社会结构下所蕴含的德性基础——行动伦理^[39],它在治理意义上往往被理解为场景,而场景的背后则是地方知识。正是这种具有场景的“集体的条件性地方意识”^[40]⁵⁷成为积分制实践的支点,从而激活相应的地方知识。只有地方知识的有效激活,才能使社会自身的呈像得以显现。不过,这种地方知识,并非只存在社会的底层,也并非单纯来自社会,而是可能出现在积分制实践的各个环节。

首先,科层组织内部的地方知识。理性化作为理解科层组织的合成特征,却不是理解干部行为的有效视角。特别是位于科层制末梢的基层政府,干部行为并不能单纯以理性化作为标尺,因为他们不仅是理性人,还是关系人与情感人。因此,从干部视角来理解科层组织,其内部的知识结构便具有了复杂性。一方面作为组织人的干部,往往需要明确工作的任务与目标,另一方面作为情感人的干部,则需要审视政策实施中可能面临的现实场景。正因如此,即便科层组织内部也存在着技术知识与地方知识相混合的“一体两面”形式。Y县干部在积分制实践过程中的实际行为常常是在理性人、关系人与情感人之间做最大公约数。干部自身所携带的地方知识融入Y县科层组织的内部,成为影响积分制实践的重要因素。

与此同时,积分制在实际运行中还存在两方面的张力:一是指挥中心与部门之间的横向协调张力;二是指挥中心与村庄之间的纵向执行张力。目标设定下的统一权威往往是技术知识的载体,而灵活行动的部门与村庄则是地方知识生产的领域。一定程度上而言,横向协调张力与纵向执行张力的形成也在于两种知识之间的紧张。从Y县积分制实施过程来看,统一步调下的

全域推进,需要部门和村庄“对标对表”来落实积分方案。但是,标与表中的目标设定有时并不符合部门与村庄的实际。为此,技术知识需要借力地方知识来完成相应的治理目标,而地方知识也在技术知识介入的同时得到激活。正是这些干部经验、部门实际与村庄现状,构成了科层体系内地方知识的来源。

其次,村庄内地方知识的分化。村庄作为地方知识的重要来源,体现着生活场景下的日常逻辑,但即便是位于末端的村庄,地方知识也会存在自身共享的边界。因此,乡村中的地方知识并非只有一种形态,而是多种诉说。Y县H村的积分实践案例就可以发现:基于情势而分化的地方知识,对积分制有着不同的认识。“有分”与“有份”的戏说便折射出两种不同的说辞:一是能够融入积分制实践的“有份”;二是游离于积分制实践之外的“冷淡”。而在两种不同说辞的背后则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地方知识。积分实践能否有效吸纳村庄内部不同类型的地方知识,成为考验实践绩效的关键。

总之,积分制实践的展开过程也是地方知识不断被发现的过程,而这种发现的机理在于场景机制。科层组织内在的地方知识与村庄地方知识内部的不断演变是积分制实践中地方知识的来源,而地方知识发现的促发因素是技术知识在不同场景的不断嵌入。正是地方知识的不断发现,使行动可视化成为可能。不过,相比于技术知识的两条路径,地方知识发现的链条具有串联特征,它是地方治理实践在不同层级对治理场景的再发现。

4.3 积分实践中的知识张力与可视化困境

如果说技术知识是依赖于科层运行而不断强化,那么地方知识则是依托于场景转换逐步显现。积分制实践中的可视化,一方面借助技术知识不断嵌入乡土社会,另一方面则需要激活地方知识使积分实践融入乡村生活。在“技术知识—地方知识”的互构中形成了积分制的双重可视化路径。正因如此,积分制实践并不是“一杆到底”的直射过程,而是反复的折射与反射过程。正是这种折射与反射,使得制度画像与行动呈像之间出现实践张力。

对于上述张力的形成,一定程度上与两种知识内在的结构有关。技术知识的运行机理往往突出其内在的统一性,因而在特征上具有共时性,在结构上呈现并联特征。而地方知识的运行机理常常强调其内在的灵活性,因而在特征上具有序贯性,在结构上呈现串联特征。当两种知识相遇时,在积分制实践层面就会形成一定的张力。此时,两种知识在相互关系上并非此消彼长,而是相互强化、相互激活。技术知识的不断嵌入能够激活地方知识,而地方知识的不断调适形成技术知识的补充。两种知识的相互适配能够实现双重可视化的有效互补,从而促进文明乡风建设的有序推进。而两种知识之间的失衡则会导致双重可视化的相互排斥。如果技术知识对地方知识过度再造,容易引发“制度画像”对“行动呈像”的替代,形成积分制实践中的“制度悬浮”。而地方知识对技术知识过度俘获,可能引起“行动呈像”对“制度画像”的扭曲,导致积分制实践中的“庇护执行”。

5 结论与讨论

一个国家的民情、民风、民俗决定了这个国家的法律特征,也是国家制度精神的重要基石^[41]。如何重塑乡村社会的民情、民风与民俗,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重要内容。作为乡风文

明建设中的制度创新,积分制联结着政策与生活,贯通了行动与乡风,是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依托。从经验蓝本描摹到村庄具体实践,Y县在文明乡风治理领域开展的积分制探索,其目的在于将软性要素融入乡村治理领域,从而涵养乡村文化,激发乡村振兴活力。不过,Y县积分制在实施过程中,常常会面临“看得见社会”却“照不见人心”的实践困境。对其诊断不仅可以理解移植创新实践中的梗阻,也可以探究文明乡风治理中的实践难题。多数研究者重点讨论了积分制与治理体系之间的匹配问题,强调嵌入在积分制实践中的作用机理。这种制度性视角的行为研究容易忽视社会性的机理以及制度本身的社会基础。为此,本研究引入可视化视角,进一步探究积分制实践中的困境。

区别于以往国家治理能力中的清晰化讨论,可视化更加强调国家看见社会的过程。因而国家能力中的易读性与信息基础^[42],不单是获取数字的能力,更需要理解数字所经历的过程。对Y县积分制的个案观察,发现乡风文明建设领域中的模糊地带并不是线性化的清晰过程,而是在不断反复的“清晰与被清晰”的实践转化,它不仅反映出文明乡风治理中的难点,也投射出治理技术不断嵌入乡村社会中可能存在的梗阻。正因如此,可视化是对清晰化的过程表达,作为结果的清晰化并非以直射路径来“看见社会”,而是在国家与社会之间不断折射与反射。借用双重可视化的分析路径,一方面在于分析积分制运行中的实践困境,另一方面则在于理解文明乡风建设中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不同取向及其所内含的知识基础。本文延续了斯科特对于项目失败的讨论,也沿用了技术知识与地方知识这一孪生概念。不过,本文不同于斯科特的讨论在于,地方知识的出场并非在于社会的底层,而是会出现在积分实践的各个层级。因而,地方知识在本文中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与此同时,积分实践中技术知识与地方知识并非此消彼长的关系,而是相互强化、相互激活的过程。两种知识的相互适配形成了双重可视化的相互协调,从而促进乡风文明建设的有效推进,而两者的失衡则容易导致乡风文明建设中的“制度悬浮”与“庇护执行”。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 [2] 王春光.中国社会发展中的社会文化主体性:以40年农村发展和减贫为例[J].中国社会科学,2019(11):86-103.
- [3] 文丰安.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理论内涵、现实困境及破解路径[J].探索,2023(4):151-163.
- [4] 许源源,杨慧琳.“动因-过程”视角下的积分制:产生、运行与效能——基于湖南省D村的个案研究[J].中国行政管理,2022(11):89-97.
- [5] 谭海波,王中正.积分制何以重塑农村集体经济:基于湖南省油溪桥村的案例研究[J].中国农村经济,2023(8):84-101.
- [6] 马九杰,刘晓鸥,高原.数字化积分制与乡村治理效能提升:理论基础与实践经验[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5):53-68.
- [7] 马树同.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下乡村治理模式的生成逻辑:基于宁夏J县积分制的实践考察[J].宁夏社会科学,2020(4):133-138.
- [8] 孙笑非,张亚鹏.“上墙”与“落地”:国家治理视角下村规民约的现实困境与优化策略[J].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3):79-86.

- [9] 程明,方青. 乡村有效治理驱动共同富裕:价值意蕴、内在逻辑与实践进路[J]. 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2022(12):105-113.
- [10] 李斌.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如何影响集聚提升类村庄情感共同体建构——基于关中平原 S 村的调查[J]. 探索, 2023(2):141-151.
- [11] 周飞舟. 政府行为与中国社会发展:社会学的研究发现及范式演变[J]. 中国社会科学, 2019(3):21-38.
- [12] RAMON J G, THERESA A P, LUIS F L. Policy analytics, modelling, and informatics: innovative tools for solving complex social problems[M]. Berlin: Springer, 2018.
- [13] 韩志明. 国家治理的信息叙事:清晰性、清晰化与清晰度[J]. 学术月刊, 2019(9):82-94.
- [14] 詹姆斯·斯科特. 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M]. 王晓毅,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
- [15] 杜月. 制图术:国家治理研究的一个新视角[J]. 社会学研究, 2017(5):192-217.
- [16] 晋军,蒋睿. “可见性”的生产:一个公安派出所的人口管理实践[J]. 社会发展研究, 2022(2):173-192.
- [17] 马卫红,耿旭. 技术治理对现代国家治理基础的解构[J]. 探索与争鸣, 2019(6):68-75.
- [18] 谢瑜,谢熠. 大数据时代技术治理的情感缺位与回归[J]. 自然辩证法研究, 2022(1):124-128.
- [19] 彭亚平. 技术治理的悖论:一项民意调查的政治过程及其结果[J]. 社会, 2018(3):46-78.
- [20] 刘易斯·科塞. 社会思想名家[M]. 石人,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 [21] 涂尔干. 涂尔干文集[M]. 渠敬东,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21.
- [22] 方钦. 从社会规则到个人道德:论萨格登关于惯例的演化博弈论分析[J]. 社会科学战线, 2008(6):47-64.
- [23] 于君博. 后真相时代与数字政府治理的祛魅[J]. 行政论坛, 2018(3):90-96.
- [24] 阎云翔. 当代中国社会道德变革的轨迹[J]. 思想战线, 2019(1):93-105.
- [25] 克利福德·格尔茨. 文化的解释[M]. 韩莉,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 2018.
- [26] 温丙存. 找回村民主体性:移风易俗有效治理的实现逻辑与发展路向[J]. 探索, 2023(3):137-148.
- [27] 罗伯特·帕特南. 独自打保龄:美国社区的衰落与复兴[M]. 刘波,等译.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8.
- [28] 米歇尔·马费索利. 部落时代:个体主义在后现代社会的衰落[M]. 许轶冰,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2.
- [29] 贺东航,孔繁斌. 中国公共政策执行中的政治势能:基于近 20 年农村林改政策的分析[J]. 中国社会科学, 2019(4):4-25.
- [30] 张国磊,曹志立. 上下左右:部门征求意见中的利益吸纳和责任排斥[J]. 公共行政评论, 2020(6):1-20.
- [31] 李利文. 挂图作战:科层组织如何完成难点任务? ——基于违法建设综合整治的个案研究[J]. 公共管理评论, 2020(3):42-66.
- [32] 邓燕华,张莉. “捆绑式政策执行”:失地社保与征地拆迁[J]. 南京社会科学, 2020(12):79-86.
- [33] 周雪光. 论中国官僚体制中的非正式制度[J]. 清华社会科学, 2019(1):7-42.
- [34] 汪和建. 自我行动的逻辑理解“新传统主义”与中国单位组织的真实的社会建构[J]. 社会, 2006(3):24-45.
- [35] 印子. 乡村社会诚信建设中的连带责任机制[J]. 中国农村观察, 2022(6):38-55.
- [36] 董磊明,李健民. 制度实践中的生活逻辑:非正式运作的社会基础与运行机制[J]. 开放时代, 2022(5):140-156.
- [37] 詹姆斯·马奇. 经验的疆界[M]. 丁丹,译. 北京:东方出版社, 2018.
- [38] 任克强. 创制经验:城市基层政府社会治理创新的动因与优化[J]. 学习与实践, 2021(2):50-56.
- [39] 周飞舟. 行动伦理与“关系社会”:社会学中国化的路径[J]. 社会学研究, 2018(1):41-62.
- [40] 爱德华·雷尔夫. 地方与无地方[M]. 刘苏,相欣奕,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21.
- [41] 渠敬东. 作为文明研究的社会学[J]. 中国社会科学, 2021(12):55-72.
- [42] MELISSA M L, NAN Z. Legibility and the informational foundations of state capacity[J].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2017(1):118-132.

Institutional Portrait and Action Presentation: Double Visualization Path in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Civilization

——Based on the Case Study of County Y in Shanxi Province

MA Chaofeng

(School of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Abstract: As an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in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civilization, the point redemption scheme connects policy and life, which also links action and rural style. The point redemption scheme has thus become an important support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beautiful and harmonious countryside. However, the point redemption scheme in governance practice often faces the conflict dilemma of “I can see society” but “I can’t see people’s hearts”. Based on the analytical perspective of governance visualization, this research makes a case study on the practice of point redemption scheme in county Y. The study shows that point redemption scheme is not only an effective way for grassroots to participat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civilization, but also the visualization for the state governance in the ambiguous territory. The point redemption schem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civilization have double visualization characteristics, one of which is the institutional visualization in seeing society under the digital technology, and the other is the action visualization in presentation of the social self-image under the solidarity technology. The tension between the two visualizations leads to the practical dilemma of the point redemption scheme. There are three specific manifestations about the tension in different practical stages of the point redemption scheme in county Y: the implanting tension between the clear blueprint of Zhejiang experience and the complex local scenes, the promoting tension between the clear governance task and the complex sectoral interests, and the implementing tension between the clear practice plan and the dispersive rural social fields. In order to reduce the tension between clarity and ambiguity, the practice of county Y realizes the transplantation and operation of point redemption scheme, which adopts experience blueprint reconstruction, informal borrowing and patronage implementation. Further discussing the source of above tension, it lies in the practical contradiction between technical knowledge and local knowledge. The structure of those two knowledge is different: the technical knowledge, which has a parallel feature, tends to be synchronic; but the local knowledge, which has a tandem feature, tends to be sequential. The structural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kinds of knowledge affects the mutual reconstruction between institutional visualization and action visualization. In terms of knowledge relationship, the two kinds of knowledge are not trade-off, but mutually reinforcing and activating. Therefore, the process of visualization is not beating, but continuously refracting or reflecting. The mutual adaptation of the two kinds of knowledge can realize the effective complementation of the double visualization, so as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civilization in an orderly manner. Nevertheless, the imbalance between the two kinds of knowledge will lead to the mutual exclusion of the double visualization.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avoid the “system suspension” caused by the excessive reproduction of local knowledge by technical knowledge, and the “patronage implementation” caused by the excessive capture of technical knowledge by local knowledge.

Key words: rural civilization, point redemption scheme, governance visualization, clear governance, rural governance

责任编辑:牟 怡

论思想政治教育的网络贯通

骆郁廷,余杰

(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摘要:随着移动终端的普及与社会交往的数字化,网络日益渗透于人们的现实生活中,成为当代人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时空。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贯通,便是在此情境下应运而生的思想政治教育贯通新形态,是思想政治教育贯穿到网络全民、全时空、全互动的思想价值引领活动。“网”是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贯通的基础,“贯”是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贯通的精髓,“通”是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贯通的目的。“因网而贯”“因贯而引”“因引而通”,这三者紧密相连并层层递进,共同构成了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贯通的内在逻辑。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贯通具有海量性、交互性与多样性的特征,其创造了思想政治教育新样态,拓展了思想政治教育新场域,开辟了思想政治教育新边界。深入探索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贯通的新形态,对于深化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具有独特贡献和价值。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贯通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立足新时代、面向新征程,应通过提升话语权、赋能新媒体、破解茧房化与形成新合力,推动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贯通的有效实现,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思想保证与强大精神力量。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贯通;价值引领;共识凝聚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23)06-0161-12

与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贯通形态不同,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贯通是伴随着网络发展而产生的思想政治教育贯通新形态。随着网络与人们生活世界的深度融合,网络对人们思想的影响日趋加深,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贯通的重要性也不言而喻。习近平指出:“当今世界,谁掌握了互联网,谁就把握住了时代主动权;谁轻视互联网,谁就会被时代所抛弃。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得网络者得天下。”^{[1][4]}在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再次强调要“着力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着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面对网络化的时代浪潮,无论是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还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都离不开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贯通。因而,我们必须在认识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贯通重要性的基础上,深入探索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贯通新形态,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贯通的内涵本质、主要特征、独创贡献与实现进路,增强对网络互动的思想引导,强化对网络新媒体的价值引领,这既是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的时代要求,又是当今网络纵深发展的现实需要。

思想政治教育贯通问题,是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重大课题。习近平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关系高校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这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研究”(22&ZD008),项目负责人:骆郁廷。

作者简介:骆郁廷,男,博士,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院院长;余杰,女,博士,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个根本问题。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努力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3]³⁷⁶ 当前,学界对于思想政治教育贯通问题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五大方面:一是发展趋势研究,有学者指出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具有融入贯通的特点^[4],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亦呈现出贯通性的发展趋势^[5];二是体系贯通研究,有学者提出以“三全育人”理念指导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体系,通过实施全贯通的一体化育人体系,推进全过程育人^[6],亦有学者强调要“切实发挥思想政治工作体系的贯通与指导作用”^[7];三是历史贯通研究,有学者重视对历史的学习,指出要“在历史与理论的贯通中增强担负历史使命的思想和行动自觉”^[8];四是内容贯通研究,有学者表示我国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应遵循横向贯通的原则^[9],推进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建设要构建内容贯通机制,增强教学内容的系统性、递进性^[10],秉持教材内容具有贯通性的价值取向^[11];五是融入贯通研究,有学者提出要“以‘四史’为主线贯通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全过程”^[12],还有学者呼吁应将伟大建党精神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以构建多维立体、贯通融合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体系^[13]。总体而言,虽有学者从互动的视角提及要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在线上与线下的双向互嵌和“在场空间”与“缺场空间”的全面贯通^[14],也有学者明确提出“思想政治教育贯通具有横向贯通、纵向贯通、动态贯通、网络贯通和全员贯通等基本样态”^[15],但学界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贯通关注较少。作为一门在实践中发展的学科,实践的变化和发展客观地要求思想政治教育与时俱进,及时介入一切影响人们思想观念、政治观点和道德规范的群体、环境与活动中,尤其是介入如今被称作“第二生存世界”的网络中,通过网络将正确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和道德规范贯通到人们的头脑中,积极掌握网络话语主动权。

1 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贯通的内涵本质

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贯通是思想政治教育贯通的形态之一,其既具有思想政治教育贯通形态的共性,又具有自身独特的个性。深入分析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贯通的内涵与本质,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贯通这一概念。

1.1 内涵:贯穿网络全网民、全时空、全互动的思想价值引领

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贯通就是思想政治教育贯穿到网络全网民、全时空、全互动的思想价值引领活动,其作为伴随着网络发展而产生的思想政治教育贯通新形态,以网络为思想政治教育贯通的场域、承载与依托是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贯通形态与思想政治教育传统贯通形态最大的区别。正确理解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贯通这一概念,要着重把握以下三点。

其一,思想政治教育要贯穿到“网络全网民”。“人在哪儿,宣传思想工作的重点就在哪儿。”^[16]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5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3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0.79亿人^[17],约占全球网民的五分之一,十亿多网民构成了全球最大的数字社会。“无人不网”“无事不网”“无时不网”“无处不网”,可以说是当代中国人现实生活的最真实写照。面对数量如此庞大的网民群体与网络如此深刻地嵌入人们日常生活的现状,思想政治教育首先必须高度重视网民,使思想政治教育自觉贯穿到网民这一群体。进一步而言,网民不是一个抽象的群体,其内部是高度细分差异化的,他们有着不同的性别、年龄、职业,有着不同的成长经历、教育背景、生活境况,自然也有着不同的思想观念、政治倾向和

价值取向。因而,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贯通既要贯穿到网民整体,更要贯穿到网民全体中的不同群体,贯穿到网民不同群体中的每一个人,进而对网民这一抽象群体背后的每一个具体的人进行思想价值引领,如此才是真正贯穿到“网络全网民”。

其二,思想政治教育要贯穿到“网络全时空”。不同于现实中精神交往所受到的时间与空间的阻隔,在网络中,思想互动是无疆域的,交流交锋是无止息的,其不拘泥于某一片空间,亦不局限于某一段时间,它们在网络广场上众声喧嚣,在网络暗潮下此起彼伏,共同塑造了网络复杂的舆论生态。诚如习近平所言:“当今时代,社会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日趋活跃,主流的和非主流的同时并存,先进的和落后的相互交织,社会思潮纷纭激荡。”^{[3]328} 面对此情此景,思想政治教育也必须打破传统时空观念的束缚,自觉贯穿到“网络全时空”中,通过24小时全过程不间断的思想引导与360度全方位无死角的价值引领,切实坚守思想舆论领域的“红色地带”,逐步压缩思想舆论领域的“黑色地带”,努力转化思想舆论领域的“灰色地带”,从而不断壮大主流舆论。

其三,思想政治教育要贯穿到“网络全互动”。随着网络传播权力图谱的改变与网络传播主体的激增,在去中心化的网络平面中,平等的交流互动成为网络交往的主要方式,亦成为影响人们思想发展、导致人们观念变革的重要途径。针对当前网络互动主体多元化、互动动机复杂化、互动频率高频化和互动形式多样化的特征,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要适应网络交往互动化的趋势,由以往的单向灌输走向互相尊重的平等对话。由于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贯通过程实质是一种互动过程,是一种基于全网民、全时间、全空间的互动过程,因而只有理解了“互动”,才能更好地理解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贯通。另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要在参与互动的基础上,增强对于网络互动全过程、全方位的思想引导与价值引领。虽然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贯通过程是一种互动过程,但互动只是手段而非目的,必须明确互动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引领,是为了将思想引导与价值引领融入每一次网络互动中,贯穿到网络的每一次交流、交锋、交融中,使每一次网络互动都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开展的契机。因而只有理解了“互动”的目的,才能更好地理解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贯通。

1.2 本质:因“网”而“贯”

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贯通的本质是因“网”而“贯”,这一本质基于网络贯通而内含着三重意蕴。

其一,“网”是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贯通的基础。计算机技术与移动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为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贯通创造了可能,从内部网(Intranet)到企业外部网(Extranet)再到全球互联网(Internet),从PC互联网到移动互联网再到物联网,网络的连接能力与移动能力逐步增强,使思想政治教育能够借助网络随时随地开展。网络是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贯通的根基,倘若没有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贯通形态就不可能诞生,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贯通也将如同无源之水与无根之萍。

其二,“贯”是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贯通的精髓。网络固然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场域、承载与依托,但思想政治教育若不主动贯通到网络中,思想政治教育与网络仍将处于相互孤立、彼此分离的状态,甚至思想政治教育还会单方面遭受到来自网络的冲击。因为一旦网络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空白的场域,各种错误思潮、腐朽思想、偏颇价值和落后观念就将在网络中肆意激荡,不仅对网络中人们的思想造成影响,亦将对现实中人们的思想与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造成巨大冲

击。因而,“网”“贯”结合是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贯通的关键。“网”“贯”结合,即通过网络转载与价值引领的结合,在洞察“网”之特性、掌握“网”之资源与利用“网”之优势的基础上,通过主动作为之“贯”、精准施为之“贯”与成效有为之“贯”使思想政治教育在遵循传播规律的前提下积极介入网络之中,主动进行价值引领,并使网络真正赋能思想政治教育,不断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渗透力、辐射力、亲和力与吸引力。

其三,“通”是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贯通的目的。所谓“贯通”,“贯”而不“通”,非“贯通”也。“通”既是“贯”的目的,也是“贯”的结果。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贯通就是要通过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引领将网络中的各种思想、观念、价值和诉求引导到正确的方向上,达到价值整合和凝聚共识的目的,最终使网络这个最大“变量”成为社会凝心聚力的最大“增量”。

可以说,“网”“贯”“通”是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贯通的要义。正所谓没有“网”就不能“贯”,没有“贯”就不能“引”,没有“引”就不能“通”,“因网而贯”“因贯而引”“因引而通”,这三者紧密相连并层层递进,共同构成了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贯通的内在逻辑。

2 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贯通的主要特征

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贯通作为思想政治教育贯通新形态,与网络紧密相连,具有与思想政治教育传统贯通形态不同的一些特点。分析这些特点,有助于我们深化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贯通的理解。

2.1 基于海量信息、海量频率与海量观点的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贯通

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贯通的海量性是思想政治教育对网络海量性特征的客观反映与主动应对,其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基于海量信息的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贯通。“人类存储信息量的增长速度比世界经济的增长速度快4倍,而计算机数据处理能力的增长速度则比世界经济的增长速度快9倍。”^{[18]13}网络时代,无数的信息碎片不断冲击着人们的思想观念,数量爆炸并且仿佛无穷无尽的信息使人们宛如生活在信息汪洋中。这些信息碎片在丰富人们认知、拓宽人们视野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风险,如认识能力有限但信息无限带来的信息过载风险、信息数量众多但质量良莠不齐带来的信息甄别风险,以及其他信息增长速度快于主流意识形态信息增长速度而带来主流意识形态信息被稀释的风险等。因而,作为贯穿网络全民、全时空、全互动的思想价值引领活动,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贯通也必然要具有海量性。只有通过把握网络信息传播规律,抓住网络信息传播重点,提升网络信息传播质量,才能驾驭、引领海量的网络信息,以实现在海量的信息中贯通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

第二,基于海量频率的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贯通。网络时代是一个变动不居的时代,瞬息万变是网络时代的突出特点。无数信息汇聚在人们手中小小的屏幕上,极力试图吸引人们的注意,但许多信息来不及浏览就已经逝去了,旧的信息不断被新的信息所覆盖,旧的事物不断被新的事物所取代。面对如此之快的更新频率,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贯通就要具备高频的特征,做到在网络信息的流变中贯通思想政治教育,做到因变而变、以变应变。

第三,基于海量观点的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贯通。随着传播权力的转移与扩张,越来越多的人拥有了发声的权利,成为传播的主体。在众声喧嚣的网络舆论广场中,不同的利益诉求、价值

观念和思想观点相互碰撞、相互激荡。在这些海量的观点里,正确的观点与错误的观点相交织,传统的观点与现代的观点相竞合,先进的观点与落后的观点相角力,自然流露的观点与人为操纵的观点相混杂。思想政治教育势必要贯穿到网络海量的观点之中,通过交流、交锋与交融实现对不同观点的价值引领。

2.2 呈现多向交互、实时交互与虚实交互的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贯通

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贯通过程是一种互动过程,交互性是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贯通的本质特征。虽然在思想政治教育传统贯通中,思想政治教育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互动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绕不开的一个话题,但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贯通所具有的交互性与思想政治教育传统贯通所进行的互动已有了鲜明的差异。

第一,从贯通方向上看,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贯通体现为多向交互。在互联网尚未普及之前,思想政治教育者的话语权威一定程度上建立于相对封闭的信息环境之中,单向灌输是这一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特点。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日益多元,生产信息与传播信息的权力日趋平等,去中心化的网络环境客观要求重构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客体关系。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贯通就是要通过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主体与客体、主体与主体、客体与客体之间的交互,在“一对一”“一对多”“多对多”的多向度交往、沟通与互动中、在观点观念的相互碰撞和比较中,逐步加深对客观事物和社会现象的认知和理解,形成正确认识,达成价值共识,使思想政治教育从“独白”走向“对话”,从单向灌输走向多向交互。

第二,从贯通时效上看,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贯通体现为实时交互。曾经思想政治教育受限于时间、场地、人力、物力等现实因素,主客体之间的交往频率处于一种相对低频的状态。但每一次信息技术革命都会催生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交互模式的变革,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的出现与普及使思想政治教育能够打破时空的限制,通过线上的同时在线、全程直播与实时反馈,极大地降低了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互动的成本,提高了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互动的效率。当前,正在到来的具有超低时延、超高速率和超广连接特性的5G时代更是为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贯通提供了有力的物质支撑,推动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贯通实现了从低频交互到高频交互再到实时交互的跃升。

第三,从贯通场景上看,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贯通体现为虚实交互。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贯通所开展的场景仅仅只有现实世界,如今随着虚拟现实技术、增强现实技术与混合现实技术,乃至数字孪生技术的发展,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贯通实现了从仅在线下到线上线下相结合再到线上线下相融合的演化,使得思想政治教育者既可以通过虚拟现实技术构建虚拟的场景,使教育对象置身完全虚拟的世界,又可以通过增强现实技术将虚拟的信息融入现实世界,还可以通过混合现实技术在虚拟环境中引入现实场景信息,甚至基于数字孪生技术构造一个“融生共在”的镜像世界,带给教育对象虚实结合、身临其境的感官体验,为思想政治教育交互搭建了更为丰富的场景。

2.3 多样贯通载体、贯通内容与贯通方法的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贯通

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贯通的多样性源于网络的复杂性。网络的纷繁复杂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不能采用单一的载体、内容和方法进行贯通,必须要结合网络特性,采用多种多样的载体、内容和方法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贯通。

第一,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贯通载体的多样性。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贯通载体是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所运用的能承载并贯穿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到网络全网民、全时空、全互动的手段和形式,是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从现实到网络再到网民头脑的桥梁与中介。在如今竞争激烈的互联网时代,传统的网络载体迭代迅速,新兴的网络载体层出不穷,它们不仅“可以作为信息的载体”用于思想政治教育信息的传播,还因其技术性载体的特点而使思想政治教育者能够更好地发挥自主性^[19]。为了提升思想政治教育贯通吸引力与有效性,思想政治教育者应当主动进驻微博、微信、抖音、快手和哔哩哔哩等多样化的平台,通过微小说、图片、微电影、微动漫、微音乐和直播等多样化的形式,将书本中静态平面的内容转化为网络中动态立体的呈现,将课堂中枯燥单调的理论转化为网络中多姿多彩的体验,在深度情感共鸣的基础上,打造一批易理解、易接受、易传播的网民喜闻乐见的思想政治教育网络作品,更好地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入脑、入耳、入心。

第二,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贯通内容的多样性。面对海量的网络信息冲击,内容仍然是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贯通的根本。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贯通内容要适应不同的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贯通载体的特性,根据不同载体的特性去设计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贯通内容,使之更加符合传播规律,以达到更好的贯通效果;另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贯通内容要适应不同网络议题和网络群体的特性,根据不同的网络议题和网络群体的特性去设计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贯通内容,使之更具现实性和针对性,从而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引导力。

第三,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贯通方法的多样性。如果说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贯通而言,载体是基础,内容是根本,那么如何运用载体传播内容则需要方法,尤其是需要方法的创新、选择和组合运用,以做到因人而“贯”、因事而“贯”和因势而“贯”。具体而言,首先,要区分不同群体的差异性,通过数据挖掘与用户画像,结合算法做到“千人千面”,实现“因人而贯”;其次,要深入分析在网络领域产生较大影响的事件,分清事件所分属的领域与产生的根源,理清事件发展的脉络,实现“因事而贯”;最后,要动态分析网络事件发展的形势、态势和趋势,把握好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贯通的时、度、效问题,做到因势利导以实现因势而“贯”。

3 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贯通的独创贡献

习近平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做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要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要运用新媒体新技术使工作活起来,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传统优势同信息技术高度融合,增强时代感和吸引力。”^[20]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贯通正是立足于网络价值引领的思想政治教育与网络的深度融合和优势互补。在网络强国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贯通不仅对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与深化具有重要贡献,而且对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亦具有深刻意义。

3.1 创造思想政治教育新样态

在网络与思想政治教育深度互嵌、互动与互融的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贯通创造和发展了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新样态,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创造思想政治教育贯通新形态。随着互联网与移动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思想政治教育传统贯通形态面临着诸多困境与挑战,已难以适应与覆盖日益重要的网络时空。随着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对于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探索的逐步深入,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贯通形态这一思想政

治教育贯通新形态应运而生。与网络的相伴相生赋予了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贯通有别于思想政治教育传统贯通的特性,其所具有的海量性、交互性与多样性为思想政治教育进一步提升影响力、亲和力与吸引力创造了无限可能,有助于思想政治教育传统贯通形态突破自身发展瓶颈,在网络时空中为思想政治教育注入新的生机与活力。

第二,创造思想政治教育引领新样态。面对当今网络信息多元性冲击主导性、娱乐性取代理论性、碎片化消解系统性的问题,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贯通将自身与网络的特性相结合,破除了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外在于网络或生搬硬套至网络而水土不服的困境。以微文化育人为例,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贯通能够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网络自身孕育的微文化中,用具有思想政治教育意义的微文化去引领其他微文化,进而寓重塑主导于多元引领之中、寓说理于娱乐之中、寓系统建构于分散整合之中,在融入、整合与引领中创造了思想政治教育引领新样态。

第三,创造思想政治教育体验新拟态。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灌输式的理论宣讲,较难让听众感同身受,进而常常会给听众留下远离生活和不接地气的印象。面对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时常遇到的思想政治教育对象体验不佳、无动于衷的问题,具有虚实结合特征的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贯通能够通过虚拟现实技术、增强现实技术与混合现实技术进行虚拟情境创新,在情境再现或情境刻画的基础上,帮助思想政治教育对象深度代入情境、代入角色,重新感知历史、模拟选择,在氛围渲染的基础上实现情感共鸣,带给思想政治教育对象身临其境的思想政治教育新体验。

3.2 拓展思想政治教育新场域

网络为思想政治教育贯通构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新空间、新环境与新生态,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贯通主动融入其中,为思想政治教育拓展了新场域。

第一,网络构建思想政治教育贯通新空间。互联网作为一种新的网络空间,对大众的交往与思维方式进行了重构,延伸着人们的生活与意义空间,逐步成为最具当代意义的社会公共空间。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与改革攻坚期,各种现实中的社会矛盾与利益纠葛纷纷投射到网络中,使网络不仅成为舆情风险的集散地与放大器,也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新空间与新契机。面对机遇与挑战,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贯通在这一思想政治教育新空间中承担着建立广泛连接、搭建对话平台、调节利益关系的重要功能,是网络空间化危为机的关键。

第二,网络创设思想政治教育贯通新环境。“一切技术都具有点金术的性质。每当社会开发出使自身延伸的技术时,社会中的其他一切功能都要改变,以适应那种技术的形式。”^{[21]363} 互联网与移动通信技术的出现,深刻地改变了人们获取信息、生产信息与传播信息的环境,也深刻地影响着人们思想品德、政治观点与价值倾向的形塑过程。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贯通作为适应信息技术发展而产生的思想政治教育贯通新形态,是思想政治教育主动适应网络这一思想政治教育新环境的结果,有助于思想政治教育在遵循网络传播规律的基础上准确认知网络环境,进而更好地利用与影响网络环境。

第三,网络塑造思想政治教育贯通新生态。“生态”这一概念来源于生物学,意为一个由不同类型生物种群及其所处环境通过相互支持与制约而形成的动态平衡的统一整体。大至一片海洋,小至一个池塘,均可称作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网络亦可视作一种存在于虚拟时空中的生态系统。互联网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生态发生了诸多变化。首先,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贯通主体之间的关系日趋扁平化,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贯通主体的管理模式由传统的层级结构转向更适应

网络的扁平结构。其次,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贯通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关系日趋平等化,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贯通客体由被动的内容接收者转向参与的内容创作者。最后,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贯通主体和其他主体之间的关系日趋协作化,逐步由相互竞争走向共同合作。这些变化将有助于更好地释放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贯通主体与客体的活力,更加充分地调动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贯通主体与客体的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性,使其在良性互动与合作共赢中重塑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生态。

3.3 开辟思想政治教育新边界

从传统疆域到现代疆域、从物理疆域到信息疆域,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贯通基于拓展、守卫与建设三个维度,开辟了思想政治教育新边界。

第一,网络贯通拓展思想政治教育新边界。当今时代,一个国家的信息传播到哪里,信息中蕴含的价值观念传播到哪里,一个国家的影响力就传播到哪里。随着国内互联网与国际互联网的接轨和融通,网络意识形态交锋也不再局限于一个相对稳定或固定的范围之中,开始呈现出无界化的特点。传统的物理疆域逐渐被信息疆域所取代,网络成为继领土、领海、领空、太空之外的第五主权空间。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贯通正是思想政治教育者在认识到网络疆域重要性的基础上,自觉打破物理空间、主动投身于网络疆域拓展的表现。

第二,网络贯通守卫思想政治教育新边界。人类发展的历史表明,人类活动的空间拓展到哪里,人类利益的角逐便如影随形地跟进到哪里。随着互联网在社会生活与国家发展方面重要性的日益凸显,一些西方国家试图凭借技术与资本优势,通过网络不断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攻击、价值观渗透与文化殖民,使网络沦为利益的新型角斗场。面对日趋激烈的国际网络空间权力争夺,习近平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强调:“从世界范围看,网络安全威胁和风险日益突出,并日益向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国防等领域传导渗透。”^[22]¹⁵ 网络贯通作为批驳错误舆论的利剑与坚守主流价值的厚盾,有助于守卫我国思想政治教育新边界,维护我国网络安全与政治安全。

第三,网络贯通建设思想政治教育新边界。若想真正拓展、守卫好思想政治教育新边界,必然要加强网络新边界的建设。习近平指出要“以网络强国建设新成效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新贡献”^[23]。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贯通能够通过国际议程设置,积极掌握网络话语主导权,增强中国话语在国际领域的影响力;另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贯通能够通过加强互联网国际沟通,深化互联网的国际合作,进而凝聚国际共识,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打造网络安全新格局。

4 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贯通的有效实现

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贯通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立足新时代、面向新征程,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贯通应通过提升话语权、赋能新媒体、破解茧房化与形成新合力,推动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贯通的有效实现,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思想保证与强大精神力量。

4.1 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贯通要提升话语权

提升话语权,既是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贯通的题中之义,又是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贯通的

必由之路。

第一,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贯通要坚持内容为王。要坚持以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紧密联系社会实践、人们的思想实际特别是网民的思想动态,加强网络分析,创新网络话语,深化话语内涵,引领网民的思考与思想。要开展话语交锋,揭露错误话语,批驳错误思想,不断增强网络话语的说服力、影响力和引领力,切实维护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占领和巩固新时代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阵地。第二,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贯通要强化议题设置。议题设置权主导着网络话语权。要善于洞察社会形势,把握发展大势,及时提出大众关注、关心的重大议题,增强议题设置自觉,抢占话语引导先机,把控议题转换节奏,不断增强网络正能量,巩固壮大奋进新时代的主流思想舆论,提高新时代网络舆论引导能力。第三,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贯通要掌握网言网语。网言网语是网民思想动态的直接反映,分析网言网语,既可以把握网民思想动态,又可以熟悉网络最新话语,进而转变话语方式、增强话语能力、提高网络话语亲和力,实现在学会网言网语中运用网言网语,在融入网民中引导网民,不断提高网络话语价值引领有效性。第四,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贯通要研发主流算法。要加强主流算法在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贯通中的研究和运用,通过提升话语权重、拓展话语辐射、传播主流话语、强化精准传播,不断增强话语传播的针对性,扩大主流价值话语版图,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网络空间落地生根。

4.2 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贯通要赋能新媒体

网络新媒体是网络时空中最具活力的传播媒介,亦是网络时空价值观念的重要承载。网络新媒体不仅能够赋能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贯通,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贯通亦能够赋能网络新媒体。面对当前网络新媒体存在的利益至上、流量为王、“娱乐至死”等乱象,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贯通要以网络新媒体为抓手,通过价值引领赋能网络新媒体,发挥网络新媒体在弘扬主旋律中的作用,促进网络新媒体良性有序发展,进而促进网络价值生态日益健康清明。

第一,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贯通要遵循真实原则。要通过在信息真空中提供及时、准确的信息,压缩不实信息的生存空间,提高网民辨别网络信息是非的条件和能力,驱散网络新媒体舆论环境中的迷雾,使网络新媒体成为“信息灯塔”。第二,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贯通要遵循权威原则。要加强网络主流媒体对网络自媒体的规范和引导,通过在众说纷纭中发布网络主流媒体权威、有力的解读,为讨论、争论拍板定调,削弱网络新媒体舆论环境中的杂音、噪音,使网络新媒体成为“定海神针”。第三,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贯通要遵循主动原则。要把握网络引领主导权,增强网络引领主动性,通过及时分析网络舆论生态,探究网络舆论成因,完善网络舆论因应对策,加强网络舆论引导,在激浊扬清中澄清事实、批驳谬误,击溃别有用心势力的图谋,发出网络新媒体舆论环境中的强音,使网络新媒体成为“照妖宝镜”。

4.3 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贯通要破解茧房化

在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贯通的实现过程中借助人工智能技术等可以推动教育场景创设、教学方式创新及教学内容优化等,同时也因为选择性心理机制、智能信息服务及圈层传播结构等多种因素影响而潜隐着“信息茧房”的弊病^[24],进而对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贯通产生阻碍。对此,要破除“信息茧房”带来的负面影响。

第一,完善智能算法推荐机制,助力破解茧房化。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贯通要完善算法的推

荐机制,丰富算法价值选择维度,加强信息偶遇,以优化算法模型助力算法“破茧”,以智能算法之矛破网络信息之茧,使算法成为网民浏览多元观点的窗口。如抖音个性化推荐算法就专门设计了“兴趣探索”机制,即在每次推荐时,抖音都会选择用户过去不常观看的内容类目进行一定比例的推荐,并且在每次获取推荐内容的过程中,抖音都会特别增加一条随机内容,以此来保障用户可见内容的多样性。第二,提升网民智能算法素养,助力破解茧房化。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贯通要唤醒网民的主体自觉,涵育网民异质兼容心态,改善“信息偏食”,以提升媒介素养助力网民“破茧”,在网民驯化智能算法的基础上使网民自主破除“信息茧房”成为可能。具体而言,就是要在意识到“信息偏食”的基础上,通过对缺食或少食信息的主动检索、浏览与点赞等行为,使智能算法在“投其所好”中增加对于缺食或少食信息的推送,从而促进信息摄入的“营养均衡”,实现对智能算法推送内容从被动接受到主动策划的转变。

4.4 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贯通要形成新合力

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贯通的实现,不能单兵作战、各自为政、一盘散沙,而要协同作战、加强整合、形成合力。

第一,加强党对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贯通的领导。习近平强调要“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全面领导,落实政治责任,勇于改革创新,强化法治保障,建强干部人才队伍,为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提供坚强政治保证”^[2]。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贯通要形成新合力,就要以加强党对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贯通工作的领导为核心,加强党对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贯通工作的顶层设计、战略谋划、统筹协调与部署落实。第二,推进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贯通的队伍建设。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贯通涉及管理主体、教育主体与技术主体,要不断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贯通的管理主体、教育主体与技术主体所构成的队伍建设,培养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贯通骨干力量,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贯通意识,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贯通能力,优化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贯通队伍结构,打造一流的思想教育网络贯通的主体与队伍。第三,构建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贯通的长效机制。党对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贯通的领导要通过有效的机制加以实现,所以在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贯通管理主体、教育主体与技术主体三支队伍建设的同时,还要构建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贯通的长效机制。要改变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贯通工作的管理主体、教育主体与技术主体分散、孤立的状态,打破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贯通工作的管理主体、教育主体与技术主体之间的壁垒与隔阂,建立健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贯通工作的管理主体、教育主体与技术主体之间的协调机制,定期沟通、谋划、协调、推进,在明确目标、合理分工、各司其职中使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贯通的不同主体同向同行、共建共享,形成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贯通工作管理主体、教育主体与技术主体的整体合力,为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贯通的有效实现奠定坚实基础。

5 结语

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贯通的出现与深化,是思想政治教育顺应互联网时代潮流与大势的必然结果,亦是互联网时代赋予思想政治教育者的光荣而艰巨的历史使命。一方面,网络作为信息技术发展的前沿阵地,思想政治教育若不主动贯通到网络时空,就将落后于信息技术的发展,落后于时代的发展;另一方面,网络作为获取信息、学习新知、交流思想以及意识形态斗争的主要

场域,思想政治教育若不主动贯通到网络时空,虚假的、有害的信息就将充斥网络空间,思想价值引领就将失去网络制高点与话语主导权,正确的思想观念就得让位于错误的思想观念,思想政治教育就可能在失语失声中黯然退场。面对日新月异的网络技术发展,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贯通亦要与网俱进、与时俱进。唯有如此,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贯通方能始终立时代之潮头、发思想之先声、引价值之潮流、促民族之复兴。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习近平关于网络强国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
- [2] 习近平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利文化条件[N].人民日报,2023-10-09.
-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 [4] 余双好,王军.中国共产党百年征程中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探索与创新[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6):11-22.
- [5] 余双好,马桂馨.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成就、基本经验与发展趋势[J].思想理论教育,2022(2):33-39.
- [6] 冯刚.新时代高校“三全育人”的理论蕴含与深化路径[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1):1-8.
- [7] 王学俭,顾超.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矛盾的新特点与解决思路[J].思想理论教育,2019(2):10-15.
- [8] 田克勤,郑自立.在历史与理论的贯通中增强思想和行动自觉——深入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学好“四史”的论述[J].思想理论教育,2020(7):11-17.
- [9] 李明,高向辉,孙佳星,等.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体系构建[J].现代教育管理,2020(6):14-19.
- [10] 子央.全环境立德树人视域下的思政课一体化建设[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3):94-101.
- [11] 陈淑清.“大思政”观视域下大中小学思政课教材一体化构建[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0(12):98-101.
- [12] 冯霞,刘进龙.“四史”教育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三维审视[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1(2):118-122.
- [13] 王管.伟大建党精神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审视和实践路向[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21(11):46-52.
- [14] 卢岚.从互联网到 ChatGPT:思想政治教育的重塑与建构逻辑[J].探索,2023(2):163-174.
- [15] 骆郁廷.论思想政治教育的普遍贯通[J].马克思主义研究,2022(9):74-84.
- [16] 习近平.加快推动媒体融合发展 构建全媒体传播格局[J].求是,2019(6):4-8.
- [17]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5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2023-08-28).<https://www.cnnic.net.cn/n4/2023/0828/c88-10829.html>.
- [18] 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肯尼斯·库克耶.大数据时代[M].盛杨燕,周涛,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
- [19] 陈宗章.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创新发展[J].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3):65-72.
- [20] 习近平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 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 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N].人民日报,2016-12-09.
- [21] 埃里克·麦克卢汉,弗兰克·秦格龙.麦克卢汉精粹[M].何道宽,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
- [22] 习近平.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 [23] 习近平对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深入贯彻党中央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 大力推动网信事业高质量发展[N].人民日报,2023-07-16.
- [24] 王天民,郑丽丽.智能思政“信息茧房”的生成机理与治理路径[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

(5):30-42.

On the Network Penetr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LUO Yuting, YU Jie

(School of Marxism,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popularization of mobile terminals and the digitization of social communication, the network has increasingly penetrated into people's real life and become an important time and space for contemporary people's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The network penetr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s a new form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rising in this context, and it is an ideological value leading activity tha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runs through the internet to all netizens, all time and space, and all interaction. Network is the basis of network penetr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penetration is the essence of network penetr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understanding is the purpose of network penetr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Relying on the network to penetrate, guiding along the direction of penetration, and making people accessible because of guidance, these three are closely linked and progressive, and together constitute the internal logic of network penetr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e network connec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ass, interaction and diversity, which creates a new patter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expands the new field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opens up a new frontier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depth exploration of the new form of network penetr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has original contributions and value deepening the research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promoting th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Network penetr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s not only a theoretical problem, but also a practical problem. Based on the new era and facing the new journey, network penetr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should enhance discourse power, empower new media, break the cocoon of housing, and form new forces,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effective realization of network penetr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o provide a strong ideological guarantee and strong spiritual strength for the comprehensive construction of a modern socialist country and the comprehensive promotion of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Key word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network penetration, value leading, consensus aggregation

责任编辑:陈 卓

驾驭资本与防范风险：数字文明建构的实践策略

姜淑娟

(华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31)

摘要: 资本作为现代文明的发端性力量, 是我国数字文明建设中的重要驱动要素。习近平关于数字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为社会主义框架内的数字文明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与实践指导, 实现了我国数字文明话语体系对“资本主义+资本”文明范式的超越, 更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开辟了驾驭资本风险推动数字文明建设的新方案。目前, 两个大局交织凸显资本融入数字文明建设的紧迫性, 从文明与资本复杂关联的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及其有机统一出发, 全面理解和科学把握资本对人类文明的双重效应, 是我国数字文明建设中利用资本与防范风险的前提性探索。当下, 我国数字文明建设面临数字经济发展中的资本垄断风险、数字治理中资本对政治意识形态的全新侵袭风险、数字技术发展中的数字极权化风险以及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建设中的数字霸权风险。对此, 我国数字文明建设要勇于彰显区别于资本主义文明的社会主义底色, 不断筑牢驾驭数字资本的制度保障以防范资本垄断风险, 强化“数字文明+数字资本”的系统布局以防范政治安全风险, 对数字资本理性进行人文价值赋能以防范新型数字极权化风险, 携手共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以抵御数字霸权挑战风险, 不断推进社会主义作为数字时代文明建构的优势制度方案, 推进根本异质于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人类文明发展新进程。

关键词: 数字文明; 数字资本; 资本风险; 风险防范; 数字命运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 D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194(2023)06-0173-12

数字技术推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发生系列深刻变革, 极大拓展了人类文明进步空间。对此,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加快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 引领数字文明发展。而在资本主义所开辟的世界历史情境和中国所处的社会主义制度现实中推进数字文明建设, 亟须牢固树立资本利用的创新意识和风险防范的问题意识。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如何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 这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研究解决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1]219} 在辨明两个大局交织背景下资本融入我国数字文明建设紧迫性的基础上, 进一步深化对利用资本推动数字文明建设潜在风险的认识, 能为化解多重风险挑战、助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程中数字文明发展提供深刻洞识。

1 文献综述与问题提出

习近平在致 2021 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的贺信中提出“让数字文明造福各国人民”^{[1]205}, 此后, 学界围绕数字文明建设问题展开了多元多维的探讨, 主要涉及数字文明的内涵和重大意义、数字文明建设与资本利用问题的关联、数字文明建设的可行策略等方面。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基于数字文明建设的数字资本风险防范研究”(23BKS134), 项目负责人: 姜淑娟。
作者简介: 姜淑娟, 女, 博士, 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1.1 阐释数字文明的内涵与意义

学界关于数字文明建设重大意义和核心内涵的理论研究,实质是对习近平关于数字文明建设重要论断的学理性解读以及我国开展数字文明建设何以必要这一时代问题的科学回应。学者们普遍认为,数字技术革命浪潮极大地释放了信息生产活力,对当前社会的生产方式和文明样态产生全方位、深层次的影响,数字文明建设构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引擎力量^[2]。对数字文明概念的阐发,学界有狭义与广义、横向与纵向不同层次的界定,狭义的数字文明即数字技术、数字经济的发展给人类带来的成就和福祉,广义的数字文明则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在数字技术、数字经济高度发展基础上生成的一种复合文明形态^[3]。少数学者对数字文明内涵的界定聚焦其社会主义属性,认为我国数字文明是技术向度与价值向度的统一^[4],具有共同富裕的目标指向,全面富裕、全民富裕、共建共享是我国数字文明道路的应有之义^[5]。习近平强调,要推动“数字文明造福各国人民”^{[1]205},在这个意义上,数字文明是数字技术推动下有别于工业文明的人类发展新进程,更是对人类文明发展方向的中国主张,本质上是异质于数字资本主义的新的文明形态。这便敦促我们在现有研究基础上直面数字时代资本主义文明带来的种种风险,追问数字文明建设的历史唯物主义内涵和价值意蕴。

1.2 解析资本与数字文明建设的内在关联

当今时代数字与资本的关系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学界对资本与我国数字文明发展的耦合性研究集中于三大层面。一是对资本与现代文明演进的辩证关系研究。相关学者通常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立场,认为资本对文明演进具有双重效应,资本主义文明形态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兼具“创造性”和“破坏性”影响^[5]。二是对资本逻辑统摄导致文明困境的研究。国内外学界对资本尤其是数字资本以多面向的否定性批判为主,普遍认为数字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使得数字文明日益演变为一种野蛮的“反文明”力量。有学者对数字经济平台利用数据收集、聚合的差异优势获取市场垄断地位的风险展开阐发^[6],也有一些学者关注到数字帝国主义风险并进行学术探讨^[7],另有学者对算法权力、数字劳动异化等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讨论^[8]。国外对数字化与资本的关联性批判包括肖莎娜·祖博夫的监控资本主义批判、哈特和奈格里的生命政治批判、克里斯蒂安·福克斯的数字劳动批判、斯尔尼塞克和威廉姆斯的平台资本主义批判等。揭示资本主义数字文明的发展实质,无疑是进一步探究我国数字文明建设中防范资本风险的理论前提和逻辑基础。然而也要看到,现有研究聚焦资本主义数字文明批判,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对资本促推文明进程等积极向度的观涉。三是对我国数字文明建设利用资本文明面的可能性研究。有学者认为,改革开放使资本作为生产力要素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从而激活了“资本的文明面”^[9]。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通过释放数字资本作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动力,让广大发展中国家可以不再简单地重复或追随资本主义文明发展道路,而是主动寻求新的、更为合理的数字文明发展模式^[10]。上述对资本与文明内在关联的学术性探讨深化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伟力,也激活了对资本文明效应聚焦研究的现实需要。

1.3 探索数字文明的建构路径

学界对我国数字文明建设路径的探索通常关联着对数字资本主义的批判,认为数字文明建设不仅要充分利用数字技术的革命力量,还要扬弃数字资本主义的种种文明弊端,着力构建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文明

样态^[11]。在这个过程中,要着力消解数字被资本权力占有和控制的隐患,积极发挥平等、共享的公有制制度优势;警惕资本权力借助数字化加重剥削劳动主体,以数字共建共享保障人民的主体性权利;在驾驭资本中积极推进数字文明发展,与世界一道共建数字经济的命运共同体。可见,学界目前初步关注我国资本驾驭问题,但对文明视域下的数字资本利用和风险防控问题的探究有待系统性深化。实现资本的有序化发展必须正确认识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历史地、发展地、辩证地认识和把握我国社会存在的各类资本及其作用。目前,学界有从政治逻辑研究资本驾驭问题^[12],还有学者厘析中国共产党驾驭私人资本的百年图景和历史经验,认为中西方文明在利用资本维度时具有不同的逻辑起点、模式选择与价值追求。中国式现代化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妥善对待和处理资本,在驾驭与超越资本逻辑的历史进程中走出了自己的道路,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资本文明观^[12]。事实上,数字资本既具有资本的一般性特征和逻辑,又具有自身的特殊性机制和表现,作为资本的最新形态,数字资本也是我国数字文明建设中的重要推进力量。这决定了我国数字文明建设必须聚焦数字资本的特殊性,完成从资本运行逻辑到数字资本运行逻辑的切换,形成对数字资本本身风险生成逻辑和表现形式的理论透视,从而提炼具有数字时代特色的资本驾驭方式。

综上,现有研究为数字文明建设的学理探讨奠定了多层面的基础,但也存在着一些应被聚焦审视却未被系统明辨的关键问题。其一,对资本与文明关联的辩证唯物主义分析较为深入,却仍需对社会主义文明利用资本的必要性这一前置性问题的阐发开展进一步的开拓性补充。其二,对资本主义条件下数字与资本的同质化关联和否定性批判较多,在一定程度上裹挟了对数字要素社会主义利用方式研究的勃兴。其三,对数字文明的阐发多从人类文明演进的一般性视角展开,在某种程度上隐遁了对数字文明内涵的社会主义属性考察。其四,针对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如何驾驭资本的研究有待补强创新性,以彰显数字文明建设中资本风险防范研究的时代意义。可见,目前学界围绕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利用和驾驭资本的历史与经验的研究逐渐兴起,但对数字时代资本要素特殊性的关注和将资本置于文明形态建构层面予以审视的理论考察尚付阙如。为此,立足现有的学术阐发基础,重点聚焦我国数字文明建设层面的资本风险防范和驾驭维度,尝试辩证看待资本文明面和野蛮面,进而围绕我国数字文明建设的性质以及为什么要利用数字资本、如何利用数字资本等问题展开学术探索和努力具有重要意义。

2 两个大局交织下资本融入数字文明建设的紧迫性

数字技术以新理念、新业态、新模式给人类生产生活带来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使得人类文明样态快速裂变。“资本主义+资本”的文明范式和制度安排不再有能力把握和处理世界难题。面对数字化浪潮和资本主义文明形态危局的双重冲击,我国数字文明建设推进中的矛盾风险挑战之多、治国理政考验之大前所未有的。为此,必须从文明与资本复杂关联的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及其有机统一出发,全面理解资本的双重效应尤其是文明效应,以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方向为利用资本的原则性底线,方能科学认识资本融入我国数字文明建设的紧迫性及其难题所在。

2.1 清醒认识资本对人类文明进程的“双刃剑”效应

现代文明本质上与资本及其承载的意义紧密关联,故围绕文明的讨论很大程度上亦是在审

视资本的功过是非。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资本具有自觉追求价值增殖的“非正义性”和非自觉创造人类文明的“正义性”。

一方面,资本在快速推进人类“文明”进程的同时,也导致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自身关系等多方面的“野蛮”效应。数字化时代不过是让资本主义的矛盾完成了现代化而已^{[13]241},深入挖掘数字资本风险有助于充分开显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自反性”^[14]和内在悖论。从人的层面来看,资本依存于劳动和劳动创造,即人的发展,又依赖于组织社会生产要素剥削劳动者,即规制人的发展,形成“建立在劳动奴役制上的罪恶的文明”^{[15]175};从生产力层面来看,资本既推动生产力发展的“解域化”,又使得技术发展“再结域化”^{[16]157},不仅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也将生产力辖制于抽象统治的政治经济统摄,造成人与自然的相互对立;从政治解放层面来看,资本发展既以自由、平等的价值理念消解封建落后的等级观念对主体的束缚,又开启了奠基于权力支配结构的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形成“民主资本主义”^{[17]100}特有的冲突;从全球化层面来看,资本不断突破民族和地域的封闭限制,通过开辟世界历史为文明交流互鉴提供了前提,又造成不同民族国家之间文明的激烈冲突。如此资本运行的矛盾逻辑必然导致多维文明悖论,激化物的尺度与人的尺度、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物质生产与自然生态等多方面的二元对立。

另一方面,资本作为推动现代文明发端的“普照的光”,又被马克思称为“伟大的文明”,充分彰显了资本对人类文明发展的驱动力量。当下,资本通过介入数字时代的经济运行和技术发展,借助现代技术等快速进步的对象化劳动力量,再次凸显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巨大文明效应。立足目前的世界历史情势,可以说资本仍然是推进人类文明演进的重要角色,我国推动数字文明建设必然离不开资本融入其中。对此,马克思早已前瞻性地做出预测,认为即使未来新的社会形态扬弃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在一段历史时期内仍需继续进行资本生产,“资本主义的股份企业,也和合作工厂一样,应当被看作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18]499}。可见,资本并不等于资本主义,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主导性制度安排下亦可借助资本的作用发展生产力,彰显资本文明的一面。文明的概念其实是非常晚近的事情,“文明”作为有具体所指的名词是启蒙运动的产物,启蒙思想家普遍认为资本主义商业贸易是使国家文明化的重要方式^{[19]94}。而在马克思的理论境域中,文明亦通常用来指称资本主义文明。马克思在其著述中常将“现代文明”与“资产阶级文明”或“文明国家”与“资产阶级国家”等交替使用,并用“文明战争”代指资产阶级国家发动的战争,用“文明时代”指称资本主义时代。如马克思认为“傅立叶最了不起的地方表现在他对社会历史的看法上,他把社会历史到目前为止的全部历程分为四个发展阶段:蒙昧、野蛮、宗法和文明。最后一个阶段就相当于现在所谓的资产阶级社会”^{[15]532}。又如,马克思指出“不同的文明国度中的不同的国家,不管它们的形式如何纷繁,却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建立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上”^{[15]444}。马克思在诸多此类阐发的基础上断言了资本与现代工业文明的共时性和紧密关联,认为“在资本的简单概念中必然自在地包含着资本的文明化趋势”^{[20]115}。可以说,无论从理论视角还是历史实践来看,资本都是推动现代文明发端的基本性力量。目前,学界对数字资本进行了多层面的批判,对国外资本批判理论亦进行了丰富的引介,这对社会主义国家利用资本必须聚焦“红灯”问题提供了理论启示,然而也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对资本巨大文明性效应的把握。只有全面识别资本对人类文明发展的双重效应,尤其是挖掘其积极效应,才能正确理解我国社会主义数字文明为什么不仅可以利用资

本,而且必须将资本融入其中,才能推动我国数字文明建设超越资本主义文明框架。

2.2 毫不动摇利用资本推动数字文明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

数字技术进步驱动人类文明转型已成普遍共识,在这个过程中形成的中国式数字文明建设话语和实践,必须正视资本主导全球化发展以及资本“文明”与“野蛮”双重效应交织的现实情势,聚焦如何在社会主义制度框架内激活资本要素积极效应的问题,并对数字资本的可能风险做出前瞻性研判,让数字资本切实服务于我国数字文明建设的大局。

目前,作为资本集中主体的数字化产业主要是数据资源和数字技术两大领域。数据资源领域的核心业态包括数据挖掘、存储、分析、交易等,数字技术领域则指向软件开发、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网络通信等。两大领域构成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板块,在数字资本的加持下获得迅速成长,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增长和文明样态建构的核心动力。《全球数字经济白皮书》显示,我国拥有最为庞大的数字社会,数字经济以9.6%的增长速度位列世界第一。然而,如习近平所强调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和社会主义社会的资本固然有很多不同,但资本都是要追逐利润的”^{[1]211}。面对数字经济发展浪潮,各类资本争相抢滩布局,催生了互联网金融资本、平台资本等诸多新的资本形态。数字时代的资本既有资本的一般性特征和逻辑,又具有自身的特殊性机制和表现,在活跃社会经济发展活力、提高人民生活品质方面发挥重要支撑作用的同时,数字资本的新投资领域和运作方式极易衍生超常规发展手段,引致资本无序扩张、野蛮生长,导致市场垄断风险、数据隐私问题、社会不平等现象丛生,不仅会对个体消费者和市场竞争产生负面效应,甚至可能会对整个社会结构和政治生态产生深远影响,从而损害经济秩序、经济公平乃至冲击国家政治安全 and 经济安全。从国际上看,部分国家的垄断资本通过自身所掌握的数据资源,对数据技术发展相对落后的国家实行数据渗透和数字产品倾销,导致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领域的多重争端。市场垄断建立在广泛的数据收集和分析基础之上,用户个人信息和行为数据被运用于广告定位和市场推广,隐私安全和数据滥用问题引发诸多担忧。缺乏有力约束的数字资本逻辑亦在不断加剧“数字鸿沟”问题,带来社会财富不平等的同时也使得缺乏数字技能的人面临更大的就业风险,从而导致资本逻辑挤压社会主义制度下人的发展逻辑等重大难题。

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是我国数字文明建构的根本原则性框架,在社会主义框架内合理运用资本对于促进经济增长、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实现社会公平等诸多文明要素的发展至关重要。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中不断深化对于资本问题的认识与把握,创造性地在社会主义制度框架内利用资本、发展资本和驾驭资本,以此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在这个过程中,我国经历了从被动卷入资本所主导的世界历史图景到主动改造资本、运用资本的伟大历程,可以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妥善对待和处理资本利用问题,在驾驭与超越资本逻辑的社会主义探索中走出了自己的道路,积累了丰富的资本利用和风险驾驭经验。2021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以“迈向数字文明新时代——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在这个意义上,数字文明作为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的文明创造,是中国共产党人形成文明论话语并运用于数字时代的结果,本质上是超越资产阶级文明,从而探索一种体现社会主义先进文明本质的资本利用方案。

3 利用资本推动我国数字文明建设的潜在风险

资本仍是当代世界经济发展中的主要角色,就我国数字文明建设而言,亟须探索一种体现

社会主义先进文明本质的资本利用和驾驭方案。在这个过程中,要识别和力避资本潜在风险,就需要将马克思对资本一般性风险的讨论与数字资本特殊性风险的分析相结合,将重大理论问题研究与现实风险情势考察相结合。在此基础上,方能明辨数字资本在数字经济、数字技术、政府治理和全球发展中衍生的历史性风险与挑战,确定设置数字资本发展“红灯”的关键环节和重点领域,从而摆脱资本主义制度体系下数字资本对文明内在结构和发展进路的操纵。

3.1 数字经济快速发展面临资本垄断风险

数字经济是数字文明建构中的基础性驱动引擎。要全面把握数字经济的革命性、系统性、全局性影响,必须站在人类经济社会形态发展和文明创生衍化的历史长河中进行审思。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凭借低廉的劳动力、丰富的土地资源等优势要素,一度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并迅速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然而,当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人口老龄化、人力资源和土地成本大幅提高等问题,亟须新的经济发展要素驱动。随着世界阔步迈向数字时代,数字经济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引擎。在这种时代变局之下,习近平强调:“我们要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融合发展的契机,以信息化、智能化为杠杆培育新动能。”^[21]²⁴⁷数字经济带来的极大便利渗透入日常生产生活,影响着传统经济活动的革新。其中,数字平台的兴起是全球数字经济发展的共性现象,凭借技术进步、商业模式创新和消费升级,大批数字平台企业迅速崛起并渗透到越来越多的行业和领域,成为数字经济中协调和配置资源的基本单元。

马克思曾深入揭示资本无限扩张的逐利逻辑必然导致资本积聚和资本集中问题,认为资本的垄断必然发展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桎梏,从而敲响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事实上,新兴数字资本平台在推动社会进步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垄断风险及相应的监管难题。平台资本的垄断性运作不符合公平发展的价值理念,不利于技术、劳动力等资源的高效配置,还可能会冲击国内经济大循环的良性运转。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为保护市场公平竞争,促进平台经济规范有序创新与健康发展,维护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深入总结平台经济领域打击资本无序扩张的相关案例经验,在平台经济领域开展了严格的反垄断监管并发布《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习近平强调:“要纠正和规范发展过程中损害群众利益、妨碍公平竞争的行为和做法,防止平台垄断和资本无序扩张,依法查处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22]然而也要看到,市场发展往往先于制度规范。当下数字平台能够借助抓取数字劳动所生成的海量数据,通过智能算法将海量剩余数据转化成可量化的一般数据,进而强势分割实体企业的大量利润,挤压着实体企业生存空间。同时,数字平台借助数据优势呈现出不同于传统资本的动态竞争、跨界经营、网络效应、寡头竞争等特征,使得垄断问题日益严重且复杂,会在一定程度上破坏市场竞争环境并抑制不同主体创新活力,阻碍数字时代的高质量发展。因此,如何迅速研判垄断问题并及时更新相应监管机制依然是我国数字文明建设所面临的挑战。

3.2 数字治理现代化伴随资本对政治意识形态的全新侵染风险

政治文明是数字文明的重要显现面相。数字化革命不仅深刻影响着经济社会发展,也在不断解构和重构政府治理生态,推动治理模式发生颠覆性变革。现代社会通过互联网、物联网、区块链等技术实现高度互联,使政府面临全新的社会治理场景、治理技术和治理对象,公共治理范式亟需突破旧有框架和结构,实现转换与重塑。一方面,政府部门掌握着构成社会治理基础的海量原始数据,通过普适计算对其进行关联分析和统一管理,能够推动政府治理在市场调控、社

会治理、公共服务等方面更加智慧智能,从而变革社会资源配置方式和社会组织运行形态,优化政府主体的决策和行为方式。另一方面,“我们的数字技术未来将如何发展,不是取决于‘互联网’如何运作、计算机如何运作的因素,而是我们选择怎样让它们运作的因素”^{[23]368}。在人类文明新形态视野下建构的我国数字文明从根本上不同于资本主义的数字文明,其对数字技术的应用由社会主义的内在意蕴及本质规定所涵纳。

政治意识形态是呈现思想逻辑、表达文明状况、形塑行为规范的力量,随着全球融合程度的不断加深,我国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话语资源日益多样和复杂。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讨论早已揭示了资本逻辑对政治文明的渗透风险。数字时代,经过数字资本平台生产加工的一般数据,绝不是关于物性对象和人性活动的具象还原和客观再现,而是将反映对象属性和活动逻辑的信息结构置于资本抽象统治滤镜中的精炼,深度还原着现实社会中的市场权力关系和经济运行体系。如此,数字资本通过算法理性的形而上学力量在经济活动中的主导地位,试图僭越政治边界乃至重塑现代文明的价值图景,甚至出现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冲击社会主义根本政治原则和治理方案的潜在风险,形成我国数字文明建设中驾驭数字资本的重大安全挑战。

3.3 数字技术发展凸显新型数字极权化风险

数字技术是数字文明建设中的关键支撑力量和活跃因素。数字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数字技术赋能,数字文明建设离不开数字技术变革支撑。历史上每一次科技革命都深刻改变了世界历史发展面貌和格局,“一些国家抓住了机遇,经济社会发展驶入快车道,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军事实力迅速增强,甚至一跃成为世界文明强国”^{[24]202}。基于此,我们要创新增长方式,把握好新一轮科技革命带来的历史机遇,支持基于互联网的各类创新,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要顺应第四次工业革命发展趋势,共同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机遇,共同探索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探寻新的增长动能和发展路径。”^{[21]493}

数字技术具有高度的整合性,林林总总的传统行业经过“互联网+”的技术渗透,形成了多姿多彩的数字化呈现方式和交互式多媒体服务方式,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影响着人民的生活福祉。然而,正如马克思所揭示的,必须区分技术本身和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因为后者必然导致资本逻辑碾压人的发展逻辑的境况。在数字技术全方位渗透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的当下,数字资本平台也通过大数据圈占将不同个人和群体转化为虚拟空间的“数字主体”,导致人们愈发困顿于数字极权化的潜在牢笼。从数字资本运作机制来看,作为民主主体,大数据能够反映集体无意识,不仅能通过统一的“视觉机器”施行顺从既有权力结构的规训,还能把“政治人”变成“透明政治人”,从而带来犬儒主义生存与民主失真风险;作为消费主体,数据算法成为一种强劲的意识形态力量并巧妙实现着对消费者的意识再造与需求重塑;作为劳动主体,借助数字技术劳动零工幽灵式地分散于全球空间,成为数字资本和对象化智能物对立面的弱小主体,正如马克思所描绘的,“工人创造的对象越文明,工人自己越野蛮,劳动越有力量,工人越无力”^{[25]158}。算法与资本共谋是资本在数字时代全新的结构性运作框架,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力量巧妙侵入主体并实现了对生活世界的无意识控制,带来人类生存自主被数字极权运作吞噬的风险。人与数字技术关系的深刻改变是在不同社会制度体系下的普遍情势,我国能否在利用资本的同时对数字资本“独裁”现象进行有效制约,直接关系到人的生存境况和现实的发展,是我国数字文明建设需予以高度重视的领域。

3.4 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建设经受数字霸权挑战风险

数字文明在全方位、多层次地改变着经济范式、治理模式与技术样态的同时,也遭遇着数字霸权主义的挑战,反映在文明层面则是将人类文明进行高低不同的差序排列,并按照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文明标准”制造出文明与野蛮、西方与非西方等的对立性结构,造成“中心—边缘”的文明分裂机制。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战略焦虑正进一步加剧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动荡,使得数字资本风险搅动下的“文明冲突论”牵一发而动全身,呈现更加复杂化的危机态势和文明焦虑。

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基于马克思对世界历史的科学判断,站在数字文明发展高度提出的全球治理主张,意在搭建维护国家疆域安全、实现国家间交流互联的网络平台。早在2015年,习近平便提出“各国应该加强沟通、扩大共识、深化合作,共同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24]534},在向2023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开幕式发表的视频致辞中再次重申国际社会“要深化交流、务实合作,共同推动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迈向新阶段”^[26]。在当今世界变乱交织、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情势下,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必然面临与数字帝国主义的严峻交锋。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对于资本逻辑必然导致的殖民结构,他写到,“当我们把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体面的样子,而在殖民地它就丝毫不加掩饰了”^{[27]690}。当下,帝国主义的侵略性、扩张性借助数字技术以更加巧妙的方式在数字领域获得了新的生存和发展空间。传统殖民者打着传播西方先进文明的旗号,数字帝国主义则以互联互通、智能共享为幌子,在数字资本集聚过程中通过技术垄断和数据圈地等在数字生产、数字分发、数字消费各环节中,建立了垄断性的数字平台,以期构建全球化的数字殖民体系并实现对他国数字殖民的长期化和稳固化。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根本异质于二元对立下的野蛮殖民和文明结构,如此不同文明理念的较量也形成我国数字文明建设在国际关系领域所要面临的风险挑战。

综上,我国数字文明建设指向在数字技术革命加持下数字化生产方式、治理范式和社会需求等多层面的进步趋向,在这个过程中,资本是数字文明发展的重要要素,使得各类矛盾张力内嵌于我国数字化结构和发展节奏中,形成数字文明建设利用资本过程中的多重风险性因素。作为一种强制性的社会关系,数字资本在一般资本逻辑基础上于当下展现出更加强烈的支配性、吸纳性和扩张性,不仅形塑了现代经济生产关系和数字生活样态,而且呈现出向政治社会领域扩张的内在趋势,试图打造全球范围内以资本为核心的社会结构与支配关系,导致多重现代文明发展危机。对此,习近平强调:“资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生产要素,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规范和引导资本发展,既是一个重大经济问题、也是一个重大政治问题。”^{[1]217}可以说,人类亟须新的文明形态框架以有效利用和驾驭数字资本并防范各类文明层面的风险挑战。

4 防范数字资本风险推动数字文明建设的实践策略

社会制度形态是文明发展的产物,又是文明演进的基础。数字时代的到来内嵌于国际格局深刻调整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提供了在社会主义制度文明框架内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重塑全球治理理念的百年未有之大机遇。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提出的数字文明建设主张是中国在实现现代化伟大征程中的文明产物,是对资本主义主导之下人类文明的超越形态,是对数字

时代文明形态建构的中国式话语叙事和主张。必须将防范数字资本风险与推进数字文明建设同步进行,方能服务于在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下创新文明发展形态的时代大局。

4.1 筑牢驾驭数字资本的制度保障以防范资本垄断风险

中西方文明在利用资本维度具有不同的逻辑起点、模式选择与价值追求。从数字文明制度设计来看,建构凸显社会主义文明范式特点的制度体系十分重要。一方面,围绕数据产权、流通交易、收益分配、安全治理等夯实数据治理制度基础。大数据发展日新月异,在推动资源优化配置和跨界融通发展等方面具有天然优势,是数字经济时代新的生产要素。要深入探索大数据发展的现状和趋势,并对我国大数据领域的成就和面临的挑战进行深入剖析,进一步倡导和实施国家大数据发展战略。要着力强化数字平台与被抓取数据的公共属性,确保大数据服务于公共利益,“使它们受生产者共同监督”^{[28]134},以更快的速度完善数字基础设施,促进数据资源的整合和开放共享,确保数据的安全性,有力支持我国经济社会进步和改善人民生活,筑牢我国数字文明建设中防范和化解数字资本风险的基础原则。另一方面,强化反垄断监管体系,完善反垄断制度保障。我国反垄断法产生之初借鉴于欧美,规则的普适性和滞后性注定其无法前瞻性地顾及数字平台的特殊性。要调整反垄断法的标准,以保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鼓励创新、维护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更好适应数字时代特点,在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中为资本与权力划界,尤其注重防范资本对公共服务领域的侵染。通过健全数字竞争规则推动改进数字平台反垄断监管的前提保障,以削弱数字化市场中的恶性竞争筑牢防范平台垄断风险和保障新业态新模式健康发展的基础。

4.2 强化“数字文明+数字资本”的系统布局以防范政治安全风险

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是党对经济工作全面领导的重要内容。要在不断深化对数字时代资本性质理解和资本规律把握的基础上,科学强化制度安排和系统布局,完善在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下利用数字资本并防范各类风险推动新文明形态呈现的顶层设计。数字资本社会权力本质来源于数字技术以及大数据,数字资本最有效的东西是数据^{[29]17}。但是,单就海量数据来说它必须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才能够被激活为资本。即数字技术由人参与构建、创造、运营并被选择,能够被资本主义制度体系激活,也能够成为社会主义制度安排下的生产要素。如果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工业文明的制度方案,那么目前则要以我国数字文明建设为契机,推进社会主义作为数字时代的文明建构的制度优势方案^[30]。在宏观制度层面,要进一步明确数字资本利用的社会主义制度原则,正确认识社会主义文明建构中的资本与资本主义文明安排下资本的本质区别,将基本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镶嵌在对“数字文明+数字资本”的顶层设计之中,有力防范数字资本对我国政治领域的意识形态侵染风险。在微观机制层面,在做大做强数字经济与拓展经济发展新空间的同时,通过普及数字技能教育、创新数字金融模式、完善社会福利政策、推动反垄断监管等,推动数字文明建设和共同富裕进展的实质性融合,促进公平与效率更加统一的社会主义数字文明形态。

4.3 对数字资本理性进行人文价值赋能以防范新型数字极权化风险

要准确理解新时代数字文明建设主张,将人文价值作为我国数字文明建设的重要规范性要素,高度重视并谨慎处理资本和人的关系问题,是我国数字文明建构的重要时代课题。主动彰显区别于资本逻辑主导下资本主义文明的社会主义底色,更加突出“数字文明是人的文明”的价

价值理念。不断厘清经济活动的根本价值与宗旨,对资本活动进行更具引领性的价值融入,实现人的价值对资本逻辑的调节与修正,能够为我国数字文明提供理论框架和实践智慧。在文明样态发展过程中,一旦价值理念模糊则必然导致资本主导并裹挟人类生存场景的情况,进而偏离通过充分释放数据潜力来为人民创造更美好生活的初衷和愿景。正如马克思描述资本主义文明两极分化风险所阐发的,“不管小房子的规模怎样随着文明的进步而扩大起来,只要近旁的宫殿以同样的或更大的程度扩大起来,那座较小房子的居住者就会在那囚壁之内越发觉得不舒服,越发不满意,越发感到受压抑”^{[25]729}。在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内,始终以防范“资本主义+资本”模式框架内数字极权导致的两极分化风险、社会治理风险和人的发展风险是我国数字文明建设的基本性原则和底线。对此,其一要持续推进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参与分配,推动各市场主体通过要素协同、数据协同,有效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实现价值共创和利益共享,在数字文明发展大局中促进区域间、城乡间和个人收入间的差距弥合,实现数字化利益共享,切实提高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其二要营造符合伦理标准的数字劳动社会生态,加强相关部门在数字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中的伦理审查和评估工作,确保数字技术的设计和应用符合社会伦理准则和社会价值,避免其对人类社会产生负面影响;其三要鼓励数字平台对数字算法和决策进行适当程度地公开,推动算法运作尽可能符合社会伦理标准,并宣扬正面积的数字劳动思想,从社会层面抵制数字劳动异化现象^[31]。

4.4 携手共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以抵御数字霸权挑战风险

在维护国家在数字时代的独立性和安全性基础上,如何有效利用数字技术促进国家建设,已经成为各个国家在应对重大发展挑战时亟须解决的问题。我国提出的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旨在推动各国更好地应对数字时代带来的共同挑战,推动全球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资本主义文明形态推崇“文明—野蛮”的形而上学对立,以文明为辩护词,自诩为一个向外界传递文明的旗手,推崇单一文明论,导致全球分裂、对抗甚至世界体系崩溃的治理危机。“每一个文明都把自己视为世界的中心,并把自己的历史当作人类历史主要的戏剧性场面来撰写。与其他文明相比较,西方可能更是如此。然而,这种单一文明的观点在多文明的世界里日益不相关和无用。”^{[32]33} 中华文明本身便是不同文明交相融汇的产物,具有内在的包容性和开放性。要基于世界历史视域,着力推动人类文明交流互鉴。正如习近平指出的:“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以一种制度代替另一种制度,不是以一种文明代替另一种文明,而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历史文化、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形成共建美好世界的最大公约数。”^{[1]475} 因此要着力建构摆脱西方文明中心论和资本主义文明弊端的文明方案,制定符合数字时代特点的国际规范,创设平等共享的协商平台,增进各国的文化互信,提升数字技术维护国家安全的水平,丰富发展中国家的数字治理策略,真正关切全球治理层面的双边和多边利益。这种数字文明不是已有事物的重复出现,而是具有全新的内涵和特征,指涉未来文明发展目标 and 方向。

5 结语

资本创生的现代文明被套在了资本逻辑的轭具之下,发展到数字时代罹致人类社会矛盾凸显、危机重重。我国数字文明建设以资本不等于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逻辑为基本前提,以社

会主义“数字文明+数字资本”的理论视角和实践机制实现了从对资本主义文明批判到社会主义数字文明建构的话语转向,更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基于世界历史视域和历史发展规律开展数字资本利用的全新探索。这是对资本逻辑主导的现代文明形态的根本性超越,是在经济制度设计、社会价值弘扬和全球治理理念上均体现为规范社会权力、彰显人的价值、倡导开放包容的创新性文明主张。资本作为重要生产要素,是带动各类生产要素集聚配置的重要纽带,是发展经济的方式和手段,社会主义国家也可以利用各类资本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然而也“必须认识到,资本具有逐利本性,如不加以规范和约束,就会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不可估量的危害”^{[1]219},甚至导致文明的灾难,故此,必须“加强新的时代条件下资本理论研究”^{[1]219}。在各国纷纷于数字版图抢滩布局的今天,基于文明层面的数字资本利用和风险防范仍是我们面临的重大时代课题和理论研究任务。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
- [2] 洪燕妮.数字资本主义批判与中国式数字文明建构[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3(3):68-77.
- [3] 廖小丹,吴艳东.中国式数字文明的伦理意蕴、发展趋势及建构理路[J].学术探索,2023(9):49-55.
- [4] 孟庆龙.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数字中国”建设的价值向度[J].江西社会科学,2023(7):76-83.
- [5] 梁红秀.人类文明新形态“新”的四个维度探索[J].科学社会主义,2022(5):75-82.
- [6] 袁志刚.东西方文明下数字经济的垄断共性与分殊[J].探索与争鸣,2021(2):5-8.
- [7] 李江静.帝国主义与数字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分析[J].马克思主义研究,2022(7):140-148.
- [8] 余斌.“数字劳动”与“数字资本”的政治经济学分析[J].马克思主义研究,2021(5):77-86.
- [9] 侯鉴洋,张澍军.超越“资本的文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革命性变革[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23(5):1-5.
- [10] 刘卓红,刘艺.中国式数字文明的形成、特质与意义——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J].学习与探索,2022(7):1-8.
- [11] 罗建文.中国共产党驾驭和超越资本力量的政治逻辑[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6):150-159.
- [12] 胡博成,朱忆天.超越资本主义文明“幻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根本指向和价值旨归[J].经济学家,2022(8):14-23.
- [13] 丹·席勒.信息资本主义的兴起与扩张:网络与尼克松时代[M].翟秀凤,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
- [14] 乌尔里希·贝克,安东尼·吉登斯,斯科特·拉什.自反性现代化[M].赵文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 [1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6] 德勒兹,加塔利.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M].姜宇辉,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
- [17] 沃尔夫冈·施特雷克.资本主义将如何终结[M].贾拥民,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
- [1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9] 布鲁斯·马兹利什.文明及其内涵[M].汪辉,译.刘文明,校.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
- [2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2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 [22]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四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把握数字经济发展趋势和规律 推动我国数字经济健康发展[N].人民日报,2021-10-20.
- [23] 叶夫根尼·莫罗佐夫.技术至死:数字化生存的阴暗面[M].张行舟,闫佳,译.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4.
- [24]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 [2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26] 习近平向 2023 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N]. 人民日报,2023-11-09.
- [2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2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3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 [29] 蓝江. 一般数据、虚体与数字资本[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22.
- [30] 刘建军.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J]. 中国社会科学,2023(3):60-74.
- [31] 曾祥明. 数字经济推进共同富裕的理论机理、现实困境与路径优化[J]. 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5):11-20.
- [32] 塞缪尔·亨廷顿.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 周琪,刘绯,张立平,等译. 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

Harnessing Capital and Preventing Risk: Practical Strategie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 Digital Civilization

JIANG Shujuan

(School of Marxism,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1, China)

Abstract: Capital, as the originating force of modern civilization, is an important driving factor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digital civilization. Xi Jinping's important discourse on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civilization provides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civilization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socialism, which realizes the transcendence of China's digital civilization discourse system to the civilization paradigm of "capitalism + capital" and means that Chinese modernization opens a new program for harnessing the risk of capital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civilization. At present, the intertwining of the two situations highlights the urgency of integrating capital into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civilization. It is a prerequisite for exploring the utilization of capital and the prevention of risks to comprehensively understand and scientifically grasp the dual effects of capital on human civilization. Nowadays,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digital civilization is facing the risk of capital monopoly in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 the risk of brand-new infiltration of political ideology by capital in digital governance, the risk of digital totalitarianism in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technology, and the risk of digital hegemon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digital community of destiny. In this regard,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digital civilization should have the courage to highlight the socialist undertone that distinguishes it from capitalist civilization, continuously build up institutional safeguards to prevent the risk of monopoly of capital, strengthen the systematic layout of "digital civilization + digital capital" to prevent the risk of political security, empower the rationality and humanistic values of digital capital to prevent the risk of a new type of digital totalitarianism, and join hands to build a digital community of destiny to resist the risk of challenges from digital hegemony, so as to continuously promote the superiority of socialism as a systemic solution for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in the digital age, and to build a new proces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civilization that is fundamentally heterogeneous with respect to capitalist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Key words: digital civilization, digital capital, capital risk, risk prevention, digital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责任编辑:陈卓

《探索》格式规范要求

根据国家相关标准要求，结合编辑出版行业相关规范，《探索》杂志执行如下格式规范。请作者在投稿前对照要求调整文章格式（建议参考《探索》近年来已发文章）。

1.文章题目。新颖、简洁，一般不超过30个字。

2.文章摘要。须简明、客观地对文章进行概述，不对文章做评论、补充或解释；具有独立性，能脱离论文独立使用，具有与正文基本等量的信息；不使用“作者指出”“本文认为”等与之类似的词汇。400字左右。

3.关键词。一般3~5个，关键词之间以中文分号分隔。

4.作者署名。一般不超过2人，在同等条件下优先采用独立署名文章。作者署名之下注明每个作者的工作单位全称及所在地的城市名、邮政编码。

5.基金项目。若有基金项目，请在文章首页页脚标明，格式如下：项目性质、项目名称（项目编号），项目负责人。如：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具体项目名称”（具体项目编号），项目负责人：XXX。

6.作者简介。标注在文章首页页脚。列出：姓名(出生年—)，性别，学位，工作单位及职务、职称。

7.文章各级标题编号采用“1 1.1 1.2 ……2 2.1 2.1.1 ……2.2……”标注。

8.注释。注释是作者对标题和正文中某一特定内容的解释或补充说明，须放置在当页页脚；注释序号与文中指示序号相一致，一律用阿拉伯数字加圆圈标注：①、②……。

9.参考文献。引文出处采用文尾注形式。参考文献序号与文中指示序号一致，左顶格用阿拉伯数字加方括号标注：[1]、[2]……每条参考文献最后均以实心句号结束。专著和汇编文献的具体页码标注在文中序号旁。同一处有多个文献出处的，只选一个。同一个文献在文中多处出现的，该文献标识序号不变，文献为专著或汇编的，文中序号后标注具体页码。

9.1主要文献类型及其标识代码。专著[M]、会议论文集[C]、汇编[G]、报纸[N]、期刊[J]、学位论文[D]、报告[R]、标准[S]、数据库[DB]、电子公告[EB]、联机网络[OL]。电子文献类型标识说明：[J/OL]——网上电子期刊；[EB/OL]——网页信息；[DB/OL]——网络数据库。

9.2常用类型参考文献的编写格式：

(1) 专著、汇编

[序号] 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文献类型标识代码].出版地城市名：出版者，出版年.

(2) 期刊文章

[序号] 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J].期刊名，X年(X期)：起止页码.

(3) 报纸文章

[序号] 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N].报纸名，出版年月日（用“YYYY-MM-DD”的格式表示）.

(4) 外文译著、译文

[序号] 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文献类型标识代码].中文译者.中文本出版地城市名：中文出版者，出版年或中文期刊名，X年(X期)：起止页码.

(5) 专著（论文集）中的析出文献

[序号] 析出文献主要责任者.析出文献名[文献类型标识代码]//专著（论文集）主要责任者.专著（论文集）题名.出版地城市名：出版者，出版年.

(6) 电子文献

[序号] 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文献类型标识代码].(网页日期).具体网址.

(7) 学位论文

[序号] 作者名.论文题目[D].学校所在地城市名：学校名，出版年.

9.3 外文参考文献格式按照中文参考文献格式列出。当以英文著录作者名时，其姓要写全且每个字母都大写，名可缩写为首字母且大写，缩写名后省略缩写点；文献名首字母要大写，文献名中专用名称的首字母大写，其余都为小写字母。

10.英文摘要。包括文章题目、作者名、作者单位、邮编、摘要、关键词。内容与前面的中文信息一致。

探索

哲学社会科学（双月刊） 1985年创刊

第6期（总第234期） 2023年11月出版

主管/主办：中共重庆市委党校

编辑出版：探索杂志社

邮编地址：400041 重庆市渝州路160号

电 话：（023）68593010

网 址：<http://www.tszszs.net>

总 编 辑：金华宝

副总编辑：王 慧

发行范围：国内外公开发行

印刷单位：重庆市国丰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国内发行：重庆市邮政公司

海外总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广告经营许可证：渝工商广字011153

PROBE

Philosophy and Soeial Sciences Edition (Bimonthly) (Started in 1985)

No.6 (Sum No.234) November, 2023

Competent Authorities / Sponsor: Party School of Chongqing Municipal Committee of CPC

Edited and Published: Journal Press of Probe

Postcode and Address: No.160, Yuzhou Road, Chongqing, China, 400041

Tel: (023)68593010

URL: <http://www.tszszs.net>

Editor-in-Chief: JIN Huabao

Vice Editor-in-Chief: WANG Hui

Distribution Range: Public offering at home and abroad

Printed: Chongqing Guofeng Printing CO.,LTD

Distribution in China: Chongqing Postal Service Corporation

Distribution Abroad: China International Book Trading Corporation

Advertising Business License: 渝工商广字 011153

ISSN 1007-5194
CN 50-1019/D

国内发行代号：78-84
国外发行代号：BM4024

定价：每册15.00元 半年价：45.00元 全年价：90.00元

ISSN 1007-5194



9 771007 519239